地方文革民间实录

贵州風雲

Guizhou Fengyun

邓振新 编著

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

本书简介

“文革”中贵州是全国夺权和成立革命委员会较早的省份。贵州夺权被誉为“西南的春雷”。但上台后的当权者大权在手，派性膨胀，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遭到广大受害者的坚决反对。他们为维护公平正义，不怕流血牺牲，在换防部队支持下，进行英勇反抗，当权者被拉下马来。本书“不虚美，不隐恶”，真实地反映了贵州“文革”的全过程，记载了“文革”至今被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的许多大事，追溯了贵州“文革”的前因，展现了贵州社会各族各界包括学生、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知青、市民等各个群体在斗争中的作为和遭受的磨难，有利于读者吸取经验教训；对当代贵州历史也有拾遗补缺和填补空白的作用。

赠给贵阳市图书馆

邓接新

2014.6.6

贵阳市图书馆 藏书

受赠图书

贵阳市图书馆
0664274

贵州风云

Guizhou Fengyun

地方文革民间实录

邓振新 编著

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风云——地方文革民间实录/邓振新 编著. —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1

ISBN 978-988-13111-6-0

Ⅰ.贵… Ⅱ.邓… Ⅲ.纪实-中国-当代 Ⅳ.1140

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021 号

贵州风云——地方文革民间实录 邓振新 编著

出　　版：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
地　　址：香港九龙旺角弥敦道 678 号
网　　址：http://www.zgwys.net
发　　行：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
责任编辑：黄文圣
装帧设计：刘　倩　王燕燕
印　　刷：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mm　1/32
字　　数：260 千
印　　张：13.4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988-13111-6-0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若干要点解读

本书以"贵州风云"为名，据实反映贵州"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编著者根据成书过程中的认知，现对本书若干要点作些解读。

1. 贵州"文革"触及贵州大饥荒事件，兴师问罪者是贵州工学院部分师生。《炎黄春秋》2012 年第 8 期对此刊登了拙作。敢于在"文革"中碰触"大跃进"年代饿死大量农民问题，这在全国是罕见的。为了防止这一现象在全国各地蔓延，中央文革和省文革立即打招呼叫停。贵州夺权较早，起到了制止这一现象蔓延开来的作用。

2. 贵州"文革"连"四清"，这是贵州"文革"的突出特点。已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在其《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一文中指出：贵州的"四清"是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进行的，这在全国属于鲜见。由 2000 多人组成的中央工作团对"四清"前贵州全省工作的基本估计是"一个根子不正，两个不彻底，三关未把好"[1]，省会城市贵阳则被定为"反革命两面派政权"，被号称"小香港"、"小台湾"，导致贵州省和贵阳市两级领导几乎全体换班子。群众信任的新班子刚组建不久又开始搞"文革"，群众认为"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确的"实属自然。北京南下串连队到达贵阳后，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与之针锋相对，从而导致"保"与"革"两派迅速形成和对立。

3. "全红总"从兴起到消亡虽然时间不长，但颇具历史意义，作家柯云路先生对这一历史现象作了阶级分析[2]。这个群众组织的

真正发起人是贵州人，他是贵阳市建筑公司的临时工蔚碧瑛。他把自己写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随身带上北京，在来自全国各地的临时合同工中传阅，引起共鸣，达成共识，从而在“文革”初期引发了一场来去匆匆的临时合同工运动。

4. 在1967年“一月风暴”中，毛泽东多次亲近贵州、热忱支持贵州夺权斗争，是对贵州前期“四清”的否定。因为贵州前期“四清”是按刘少奇的思路和“桃园经验”开展的。1967年1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王力、关锋与贵州代表团讨论了贵州“四清”问题[13]。

5. 李再含通过向中央发电报要求“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抓捕贵州工人“红卫军”头头李铁乃，这件事是“歪打正着”。他的本意是为了保护以贾启允为首的中共贵州省委，不料其结果却催生了贵州夺权、爆响了“西南的春雷”，他摇身一变成了全国军队中当时少有的造反派代表。

6. 毛泽东并不知道李再含何许人也，他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介绍才知道李再含其人的。当时李再含身为贵州省文革领导小组中的军队代表，既给省委第一书记先后写了6封信提意见，又避开省文革领导小组向中央先后发了18份电报，反映了贵州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王力觉得李再含能这样做很不错，便向毛泽东推荐。这是毛泽东赞赏“军队出了个李再含，地方出了个王绍禹”[14]的缘起之一。

7. 贵州夺权总指挥部核心小组的分裂，是贵州革命造反派分裂的缩影。这个七人核心小组因留下一个农民代表名额，实际只有六人。省红代会后，其中三名民众代表李承宗（贵工学生）、袁昌福（省新印厂工人）、耿铁（省植物园工人）先后加入“四——”，而另三名干部代表李再含、戚休（新华贵州分社）、蔡秀臣（地化所）则是支红派领军人物。到“八月踏平”时，李再含们的响亮口号是“打倒刘邓陶，踏平‘四——’！”把“四——”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捆绑在

一起。在1969年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二月会议”上，周总理问：“李再含的对立面有多少人？”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回答：“全省对立面群众有二三十万。”周总理对李再含说：“几十万人你镇压，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是大问题，不能检查一次就算了，你走向反面的危险并未取消。”[15]对承认“四——”是革命群众组织问题，李再含当面含混其词，回到贵阳就不认账；直到“七·二九”事件后召他进京，在北京学习班才被迫签发电报，在全省范围内公开宣布“四——”是革命群众组织。

8. 贵阳医学院是“四——”运动的诱因。该校既是“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文革”初期又是试点单位。试点意味着超前。两次试点，两次超前。“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掩盖了这种超前性，致使该校“文革”初期具有区别于省内其他高校的特点：一是院党委书记不像其他高校是要打倒的“走资派”，而是留任的“四清”工作队的队长，等同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组长；二是该校“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在“四清”中以“军统特务”的罪名揪出了院党委原书记并取而代之，因此在“文革”中对院党委书记的“革”与“保”导致该校在全省高校中最先出现了对立的两派；三是这两派在校内和校外都表现出两面性，针对校内的院党委书记和校外的省委第一书记，一派表现为内“保”外“革”、另一派则表现为外“保”内“革”；四是由于外界一般会按这两派的校外表现，即对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态度，来区分两派的“革”与“保”，从而造成内“保”外“革”的一派冒牌吃香，外“保”内“革”的一派蒙冤吃亏。在省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时，省革委主任李再含无视贵医问题的复杂性，支一派、压一派，只让“工尖兵”参加省红代会，而将“二二六”拒之门外，从而导致“二二六”率先冲击省红代会，诱发了“四——”运动。

9. 王力以极左面目出现，对贵州“文革”起了很坏的作用。一是在贵州“四——”出现前的省红代会问题上，李再含以王力为后台，

不是虚心检讨省革委的工作，不是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化解红卫兵中的矛盾，而是在赴京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回来后，在贵阳市六广门体育场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指责冲红代会是错误的；他还通过王力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了贵州省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与冲红代会的红卫兵们不希望公开报道的意愿针锋相对，从而激化矛盾、导致红卫兵队伍分裂，纷纷拉出队伍形成两派、破坏了正在形成的归口大联合局面。二是在“八月踏平”前，王力不知天高地厚，在他即将垮台前接见李再含派出的李立等5人，他的讲话被支红派奉为中央“三点指示”，为李再含血腥镇压贵州“四——”提供舆论支持，其罪行累累。但在《王力反思录》中，他对此竟只字未提。

10. 李再含企图通过“八月踏平”来实现“一派掌权”，实际上“四——”是“踏而不平”。他们既跑到首都北京和全国各地开展外围斗争，在京成立全省性组织，又在省内开展不怕流血牺牲的地下斗争，弄得李再含们不得安宁。这种外围斗争和地下斗争，是贵州“四——”斗争的突出特点，全国少见。在1968年的“三·六围捕”中，“四——”虽遭重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但天无绝人之路，部队换防让“四——”重现生机；在周总理主持下，最终让李再含这个两面派人物认错下台，“四——”的斗争终于胜利。这在全国造反派的结局中也是少见的。获胜的贵州“四——”在北京学习班听从了中央告诫：人家的错误让人家自己讲，不要攻击对方；不要翘尾巴；两派都错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回贵州后没有搞报复，大家静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岗位或等待分配。

11. 关于“二月兵变”材料。李再含抓捕李铁乃，是报经中央文革的，红卫军因此溃不成军，几乎成为“反革命组织”，失去夺权资格。因受“公安六条”的严厉限制，红卫军不敢公开翻案。但一些人内心不服，便声称他们掌握了“李再含参与‘二月兵变’的材料”，想

利用“四——”的力量来推翻李再含。当事人之一杨延昭实在交不出材料，“四——”确认这是个骗局。他害怕被“四——”扭送至有关当局，在北大跳楼身亡。

12. 李再含垮台的根本原因在部队。他先后制造了1968年9月18日的“龙广事件”和次年的“七·二九”事件。这两个事件的共同点是擅自调动部队开枪打死群众。前一事件导致部队换防，在贵州为李再含树立了强有力的对立面；后一事件直接导致李再含下台。

13. 贵阳“七人大字报”反映了贵州人民对后期“文革”普遍的厌倦心态和要搞经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反映了人们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消极态度，也反映了人们对批林批孔引导大家脱离实际而去钻故纸堆的不满。

14. 否定“文革”带来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历史的灾难从历史的进步中得到补偿，再证“物极必反”，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的确是历史发展规律。

15. “文革”三大回合你死我活的政权斗争伴生出许许多多民俗现象，把“文革”只理解为政权斗争是不够的，透过种种民俗现象看“文革”，有许多问题会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

[1]见本书第三章

[2]见附录6

[3]见附录9

[4]见本书第十五章

[5]见附录19

目 录

第一章 “文革”的前奏 …… 1
第二章 “文革”三部曲 …… 9
第三章 贵州“文革”连“四清” …… 20
第四章 贵州“文革”序幕 …… 39
第五章 贵州夺权前的“革”与“保” …… 58
第六章 “全红总”贵州分部的兴亡 …… 73
第七章 贵州“文革”触及“贵州事件” …… 86
第八章 红卫军与李再含 …… 106
第九章 西南的春雷 …… 112
第十章 “西南春雷”激起的学生运动 …… 144
第十一章 省红代会召开与“四一一抗争” …… 148
第十二章 李再含大刮“十二级台风” …… 154
第十三章 “四一一”迎着风暴 英勇战斗 …… 160
第十四章 血腥的“八月踏平” …… 179
第十五章 李再含独立王国的专政工具 …… 198
第十六章 “四一一”转战首都和全国各地 …… 204
第十七章 不畏强暴的地下斗争 …… 218

第十八章　夺取“文革”全面胜利之年的省内国内大事 …… 225
第十九章　子虚乌有的“二月兵变”波及贵州 …… 232
第二十章　部队换防“四一一”迎来胜利曙光 …… 236
第二十一章　开枪杀害无辜群众的“七·二九”事件 …… 261
第二十二章　中央解决贵州问题 李再含靠边 …… 274
第二十三章　蓝张入黔主政 …… 325
第二十四章　鲁郭赴黔履新 …… 344
第二十五章　贵阳街头鼓呼现代化的《七人大字报》 …… 362
第二十六章　对帮派活动的揭批查 …… 369
第二十七章　“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和判处帮派罪犯 …… 379
第二十八章　从民俗现象看“文革” …… 387
第二十九章　否定“文革”带来改革开放 …… 396
后记 …… 420

第一章　“文革”的前奏

（一）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革命开始了”。1958年6月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以此为题。人们记得，早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中国大地就搞过昙花一现式的文化革命，那时扫盲运动和诗歌运动在农村遍地开花，城乡兴办的大中小学校犹如雨后春笋，小学改中学、中专变大学屡见不鲜。刘少奇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根据当时情况确定的文化革命内容，主要有以下五点：

1. 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做到一般的乡有一个中等学校，一般的专区和许多县都有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

2. 完成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字和改革，积极地进行汉字的改革。

3. 消除四害，讲究卫生，提倡体育，消灭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人民精神。

4. 开展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

5. 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设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上述内容与文化革命是名副其实的。而八年后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以“文化大革命”之名，行政治斗争之实。只因这场政治斗争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称之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也说得过去。

广义的“文革”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历时10年多，

包含三大回合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第一个回合,整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第二个回合,用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林彪外逃摔死;第三个回合,第一夫人江青以及张春桥被判"死缓"。这三个回合构成"文革"的三部曲。以这三大回合为标志,广义"文革"的发展过程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或三个阶段。中、后两个时期的斗争都发生在上层,全国人民对其结局均属事后"被告知"。而人们心目中的"文革"则是前期由毛泽东掀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得以将他的政治对手置之死地,这是狭义的"文革"。中央文革小组在"九大"后撤销,是狭义"文革"告一段落的重要标志。

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召开的遵义会议把毛泽东逐步推向权力顶峰。"文革"初贵州的夺权号称"西南的春雷",震惊中外。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毛泽东抓住贵阳棉纺织厂的"归口"大联合经验向全国推广,那时"文革"已九个多月,他希望贵州再出奇制胜,在全国领先结束群众运动,早一点结束"文革"。不料贵州的李再含[1]是扶不起的阿斗,辜负了毛泽东的心愿,在贵州逼出了也许可以预防的"四一一"运动,使贵棉经验在贵州只是昙花一现,更未能在全国开花结果。这是贵州"文革"特别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

由于随后的贵阳"七·二九"事件发生在"团结、胜利"的"九大"之后,贵州的狭义"文革"直到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中发(69)71号文件下达、李再含下台、贵州省革命委员会1971年5月补台后才结束。这比全国狭义"文革"结束推后了两年之久。

有一种意见认为1971年标志着"文革"的结束。因为1971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林彪的非正常死亡;二是美国总统特使兼国务卿基辛格于7月9日秘访北京;三是10月25日中国获得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按照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1976年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才结束。

[1]李再含,1919年生,四川富顺人。1937年10月参加工作,1938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八路军中任政治助理员、指导员、干事、宣传科科长。1945年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第十五军分区43团副政治委员,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军政大学分校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云南军区干校教导团政治委员,遵义速成中学校长兼政治委员,贵州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贵州夺权前任中共贵州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6年9月至1967年1月,李再含不通过中共贵州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直接向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发出18封电报,汇报贵州"文革"情况,受到王力赞赏,并向毛泽东推荐。毛泽东觉得贵州有李再含就行了。夺权后李再含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10月中发(69)71号文件后靠边站,1971年5月撤职后下放辽宁盘锦垦区的西安农场劳动。1975年8月14日,李再含在大连去世。

(二)"文革"的前因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

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2]

历史的遗憾是一个接一个的左转弯,中国走上了以暴力为后盾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实验,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悲剧——饿死3755万人。研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抓住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破解毛泽东之谜的一把钥匙。所谓"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为了把饿死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神圣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揪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则是要主动出击,打倒那些采取务实的经济政策,领导国家走出危机,救人民于水火的领导人。为此,悍然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作破釜沉舟地一搏。没有三年"大跃进"的错误,就不会有十年"文化大革命"。[3]

[2]《毛泽东文选》第三卷。

[3]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导言:"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

(三)"文革"的导火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一篇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大批判文章,拉开了"文革"序幕,成为引发十年内乱的导火线。这就是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4]共同策划,姚文元历时八个月精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的文章在全国掀起大批判的熊熊烈火,祸及《海瑞罢官》一戏的作者、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殃及要保护吴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罪及有海瑞形象的彭德怀。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966年5月,姚文元又一篇文章《评"三家村"》出笼,制造新的罪名要打倒北京市委,从批判吴晗入手,株连同吴晗一起写《三家村札记》的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和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

"三家村",本来是晚清小说《何典》中一个虚构的村庄名。邓拓、吴晗、廖沫沙从1961年起在他们自己掌控的刊物《前线》上,开辟了一个"三家村"专栏,轮流发表了60多篇文章,用谈天说地、摆龙门阵的形式,对造成大饥荒的错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其中有一篇《白开水最好喝》,讽喻老百姓穷得只能喝大锅清水汤。

从评《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集中火力炮轰北京市委,背后的目标则是所谓的"暗藏在中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四)"文革"的序幕

早在1964年7月,中央就设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担任组长,成员有陆定一、周扬、康生、吴冷西。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发表后,彭真掌控的北京各报未即转载。经周恩来说服得以转载后,毛泽东仍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当吴晗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时,彭真认为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

题，并把这种看法贯彻到他所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之中。1966年2月3日拟定的《二月提纲》强调实事求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显然违背当时的武斗争现实。2月8日彭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当时对这个提纲没有表示反对。2月12日这个提纲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发全党。

与此同时，从1966年2月2日至20日，并无军职的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一个《纪要》，经林彪审阅、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后，标题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于4月10日也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这个《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给当时已经发展得十分严重的政治批判运动火上加油。

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的问题包括彭真的错误，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

5月4日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仍在外地休假，委托刘少奇主持。这次会议在5月16日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林彪在5月18日的长篇讲话被称之为"五·一八"讲话，其主要内容，一是大念政变经，二是大捧毛泽东。这次会议还决定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停止他们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撤销其他职务，进行专案审查。

6月3日，《北京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以及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定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彭真的主要罪名是主持制定《二月提纲》和搞"独立王国"；罗瑞卿的主要罪名，一是"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二是有野心，要夺林彪的权；陆定一任部长的中宣部被毛泽东视为"阎王殿"，陆自然是"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直接对象，但被打倒的直接原因却是所谓匿名信事件，罪名是"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林彪和他的一家"，匿名信系陆夫人严慰冰所写，旨在揭露林彪和叶群的恶行；杨尚昆的罪名一为对毛泽东搞"窃听"，二谓泄露党的大量机密资料。这四人各有各的情况，问题根本不同，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可是，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却由林彪定调而定为"反党集团"。林彪说："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

"彭罗陆杨"是"文革"序幕中被打倒的当权派。毛泽东剥夺四人权力，从而掌握了首都控制权、军警控制权、宣传控制权，对其夺取"文革"控制权、把握"文革"全局具有关键作用；而削弱属于刘少奇、邓小平主政左臂右膀的中央书记处的权力，遂使"中央文革小组"一跃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的夺权意图顺利展开。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王力[5]、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为组员，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这个小组名义上是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只隶属于毛泽东一个人；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但实际当家人是江青，表明了毛泽东通过夫人江青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意图。

[4]戚文元(1932-2005)，浙江诸暨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曾在中国作协、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迹后，历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中共九、十届政治局委员，"文革"中积极参加夺权活动，1976年被捕，1981年被判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刑满释放，因患癌早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逝。

[5]王力，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他的岳父王翔千和王恩美、邓恩铭共同成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可以说是最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那批人之一。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共，50年代后期进入中

央写作班子，成为中共重要的笔杆子，起草过“九评”和“文革”初期的许多重要文件，包括被中共九大到十一大的说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那段“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文字，也是他根据毛泽东的话归纳出来的。1966年6月，他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次年1月，中宣部长陶铸被打倒，中宣部更名中央宣传组，毛泽东提名他任组长。1967年7月在武汉“7·20”事件中被群众组织打伤，回北京时受到中央组织的盛大欢迎，红极一时。一个月后被打倒，后关进秦城监狱14年，直到1982年被释放。晚年生活上虽然得到较好的待遇，但1984年被开除出党。他引用王光美说法，这是当了替罪羊。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终年75岁。去世前，他已经将《王力反思录》一书基本编定。此书约80万字，除少量篇幅是“文革”期间在秦城监狱所写外，其余是1982年从秦城监狱释放后回家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嘱咐家人在他死后方可发表。

1967年4月贵州省红卫兵代表大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消息，1967年8月奉再合成聚踏平贵州“四一一”，都是因为得到王力的支持。王力给贵州“文革”铸成过大错，但《王力反思录》中只字未提。

本章参考资料

1.《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6月9日
2.刘少奇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
3.高华《革命年代》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
4.王年一《大动乱年代》
5.(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二卷
6.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7.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8.饶地、敖武、天逸《文革之谜》

第二章 “文革”三部曲

“文革”中的事情纷繁复杂，多如牛毛。有人列举其中十件大事编了个数字串：一月风暴、二月抗争、三家村、四条汉子(彭、罗、陆、杨)、五·一六通知、六·一大字报、七·二〇事件、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九·一三事件、十月的胜利，等等。这个数字串的缺点是颠倒了时序。我们在这里把“文革”三个时期斗争的三大回合称之为三部曲，各提取一对关键语句，用来揭示各个时期的斗争实质。

(一)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刘少奇屈死开封城

从1966年5月“文革”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是“文革”前期。这一时期的斗争，是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是掀起红卫兵运动；方法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和《五·一六通知》的公布，是“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并对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6月1日晚，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次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大字报全文，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当天，即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第一天，就写了一

篇社论，题目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由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先声。

6月6日，西安交通大学学生要赶走工作组，数十名学生分别到西北局、陕西省委、新华分社等地提出省委工作组和省委有黑线。同日晚，驻校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线。同日晚，驻校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7、8、9三天，交大各系对“尖子”学生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

6月16日，《人民日报》公开报道南京大学6月3日发生的匡亚明事件。校长匡亚明因劝阻师生造反，被定为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分子”。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揪斗“黑帮”的“6·18”事件。随后，刘少奇向全国批转北京大学工作组的一份简报，指出北大一些人避开工作组乱批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的行动。要求各单位参照北大工作组的做法制止乱批乱斗。由于工作组不让揪斗“黑帮”，北京39所高校在邮电学院的带动下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掀起了驱赶工作组的浪潮。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7月26日在接见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性错误。

7月29日，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上宣布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作了检查。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8月5日，毛泽东针对刘少奇批转北大工作组简报，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月8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后对“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大批判。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从中看到，林彪在

中央的排位升到第二，周恩来第三，陶铸第四，刘少奇则从第二降到第八。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撤出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运动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串连”。红卫兵们把“造反有理”传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造反运动。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全国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966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范围内的夺权斗争由此开展。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等诬陷迫害老干部和乱党、乱军的行为进行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称之为“二月逆流”。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

1967年7月20日，武汉爆发“七·二〇”事件。湖北省在这一事件后被打伤残打死的干部、军人、民众达18.4万余人。这一事件是“文革”斗争矛头转向军队的标志。从2月开始，武汉地区两大派民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不断扩

大,流血事件频频发生。7月,毛泽东、周恩来到武汉解决这一问题。随后从重庆来到武汉的王力、谢富治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激起了"百万雄师"民众的愤慨,他们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并将王力打伤。林彪、江青称"七·二〇"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政变"。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

在林彪、江青、康生等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1968年9月5日,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1969年10月17日夜,刘少奇被逐出北京,被押送到开封"监护",担架载着他被摧残的伤病之躯塞进飞机。11月12日,凄凉地死在开封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他的骨灰盒上写着"刘卫黄"的假名字。骨灰证上的"职业"一栏,填着"无业"。

(二)接班人外逃摔死,周恩来力挽危局

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是"文革"中期。"九大"以后,全国开展新的"斗、批、改"(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革"轨道。这一阶段开展的"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清查"五一六"分子,使

"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4至7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江青炮制的《会议纪要》中那"两个估计",长时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

"文革"中期的主要内容,是林彪与毛泽东之间出现分歧,貌合神离,"九·一三"事件中林彪等人匆忙乘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

林彪因"文革"而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1969年4月在"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确定为唯一的接班人。作为"文革"公认的副统帅,与毛泽东并列而受到"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万众祝福。没有"文革"就没有林彪的尊贵位置。林彪成为接班人是"文革"前期的最大果实,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党内军内的显赫地位,也与"文革"有着因果关系。可是这样的政治果实和唯一接班人,却在1971年9月13日突然"走向反面"。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林彪是"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9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停职反审,彻底交待。12月开始,中共中央又不断印发《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批林整风运动。1973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陈、黄、吴、李、邱等人的党籍,并撤销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被永远开除出党的"陈"是陈伯达。陈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被定为"五一六"的操纵者。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运动开始。陈的主要罪状是,具有反动的历史,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篡权。1972年7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陈被定性,说他长期从事反共活动,一贯坚持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周恩来力挽危局处理了林彪事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

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其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批"极左"，得人心顺民意，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也引起毛泽东强烈不满，不仅遭到阻止，而且掀起批"极右"的风暴，导致"左"倾错误继续发展。二是促成了中美接触及中国重返联合国，使他的国际威望空前大增。他做的这两件利国利民的大事，竟遭遇了晚年最深重的磨难。1973 年底，中央政治局开会严厉批判周恩来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简直成了敌我矛盾，周被迫作了检讨。

1973 年 7 月，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革"。"批林批孔"，林是林彪，孔是孔子。批林批孔就是把这两个人挂钩批判。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4 年 1 月 18 日，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从 1974 年年初至同年 6 月，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批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周恩来；他们借批林彪"克己复礼"，影射周恩来 1972 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他们还极力吹捧"女皇"，为其反周"组阁"阴谋大造舆论。毛泽东发现江青一伙借机进行夺权活动以后，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评，斥责他们是"四人帮"，使他们反周"组阁"的阴谋失败。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不但在历史研究领域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造成混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在江青一伙煽动的所谓"反潮流"的冲击下，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出现的各方面工作好转的局面又遭到挫折。

(三)邓小平复起复落，"四人帮"束手就擒

"文革"后期是从 1973 年 8 月党的"十大"开始，到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粉碎结束。

1973 年 2 月 20 日，邓小平在江西度过三年多时光后返京。3

月 10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1973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倡"反潮流"，继承"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委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使江青等人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1973 年 12 月 22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相互对调，年底到职，1974 年元旦开始主持工作。毛泽东在 12 月 29 日谈话中向他们宣布，请邓小平来当军委委员。这件事情不但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在国际上也引发了各种猜测。

1974 年 6 月 1 日周恩来因动手术住院后，邓小平开始主持接待外宾，1974 年春天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成为第一位在联大发表重要讲话的中国领导人。

1975 年新年伊始，全国开展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前后发表，还有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也下发各单位学习。

"反潮流"活动造成钢铁生产下降，铁路运输不畅。毛泽东在 1974 年底多次提出需要安定团结。1975 年 1 月 8 日至 10 日的十二中全会，"安定团结"成为全会的口号。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会议，从整顿铁路入手整顿各条战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1975 年 1 月 6 日成立由胡乔木、吴冷西等人组成的政治研究室，出台了《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周荣鑫 1 月出任教育部长，他计划恢复高等教育，他起草的教育政策受到猛烈批判，次年 4 月 12 日在批斗会上昏倒，次日去世时年仅 59 岁。

1975年三、四月间，江青等人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掀起反经验主义的浪潮，往上打击周恩来，往下打击各级老干部。毛泽东4月23日批示似应反对修正主义，并指出反对修正主义既包括反对经验主义，也包括反对教条主义。在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等严词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片面大反经验主义和搞宗派活动的错误。

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的讲话首提以"三项指示"为纲：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铁路的整顿推广到煤炭和钢铁，1975年6月4日中央下发整顿钢铁的13号文件。7月15日下发16号文件解决浙江问题，牢牢控制住造反派。王洪文因为给浙江造反派头头翁森鹤撑过腰，处理浙江问题不力，从此失势，毛泽东再没让他回到原来的岗位上。邓小平从5月27日开始取代王洪文主持政治局会议。

1975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的病情也逐渐加重，他希望邓小平在不改变"文革"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远新从辽宁来京坦任伯父毛泽东的联络员后，1975年11月2日对伯父说，邓小平有恢复"文革"前体制的危险。毛泽东让毛远新当天就去见邓小平，在邓家中的交谈彼此都不愉快。第二天增加汪东兴和陈锡联，与邓共4人一起开会，邓没有顺从地接受批评。11月4日又开8人会议(前4人又加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让邓承认"文革"成绩是主要的，拥护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毫无进展。继而召集包括江青参加的政治局17人会议，11月16日和17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邓进程20日达到顶点。毛泽东指示在政治局内讨论对"文革"的评价问题，提出由邓小平对"文革"作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邓小平委婉地谢绝了。邓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1975年1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邓小平大声地宣读了毛主席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指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11月26日将会议要点下发给全国高层党政军干部。政治局又在两个月内召开一系列会议，批判邓的"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批准发表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拉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

1976年2月5日，中共中央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毛主席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与此同时，中共中央(1976)第一、二、三、四号文件经毛主席批示"照办"传达到全国党内外群众：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将《毛主席重要指示》传达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4月初，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由于当时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诬称邓小平为"邓纳吉"[11]，邓小平遭到错误处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10月4日，"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在《光明日报》登载，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

团、江青的“女皇梦”彻底破灭。毛泽东生前对华国锋亲笔书写“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执掌党政军大权。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文革”结束。

[1]纳吉是指纳吉·伊姆雷(1896-1958)，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叛乱的罪魁，1958年6月被处决。他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53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因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被开除出党并解除政府职务。1956年10月反革命叛乱期间窃据总理职位，叛乱平息后被捕。

本章参考资料

1.“文化大革命”珍贵老照片及说明
2.高军、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3.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4.晓地、敬武、天逸《“文革”之谜》
5.《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6.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7.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8.贵大红缨枪《贵州“文革”全过程大事记(1966年5月-1967年8月)》

审判“四人帮”(左起：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

第三章　贵州“文革”连“四清”

“文革”连“四清”[1]意指“四清”之后接着搞“文革”，甚至“四清”没搞完接着又搞“文革”，于是沿用“四清”的办法，派工作组搞“文革”。派工作组被毛泽东指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方向路线错误。

1966年5月5日，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委城市“四清”领导小组《关于今后城市“四清”运动的安排意见》。《意见》说：全省城市“四清”运动，前后共进行了三批，第三批预计1966年六七月份结束。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发动。

6月21日，张一樵、成克、丛亚凡、解杰主持召开贵阳市文教、财贸、工交一部负责人会议，张、丛提出“文化大革命”与“四清”的关系是“‘文化大革命’是‘四清’的复查或补课，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文化大革命’是把对敌斗争提前了”。并强调“对反击、查上当搞得不好的少数单位，要集中力量加以解决”。

7月21日，省委批转省委城市“四清”领导小组关于“文革”与“四清”的关系的报告。《报告》提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指向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和“四清”运动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一致的。

“文革”连“四清”既是贵州“文革”的背景，又是贵州“文革”的特色。“文革”初贵州省的“炮轰派”高呼“打倒贾启允、周林、苗春亭、陈璞如！”其中周林是“四清”下台的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保守派”提出口号“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确的”，就是因为当时

的中共贵州省委和中共贵阳市委都是“四清”中才换过班的。

贵州高等院校高年级师生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参加了贵州农村“四清”。“四清”还没结束，又奉命提前回校搞“文革”。在遵义县“四清”工作团担任副团长的贵州大学常务副校长陈希文，回校第二天就被打成“走资派”挨批斗。

贵州“四清”运动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很大的事件，在当时被认为是“第二次解放贵州”，牵涉到中央最高领导间的分歧。在贵州“四清”中挨整的干部和群众受到残酷打击，直到1984年6月24日，中央才对贵州的“四清”冤案作出平反。

在贵州“四清”运动中层层开展夺权斗争。“文革”连“四清”也是“文革”中贵州省较早开展夺权斗争的动因。

[1] 参见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全文见《领导者》2006年10月号，总第12期，目录为：序言；周林治黔的“功”与“过”；贵州“四清”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高涨的刘少奇的权威；毛对贵州“四清”的干预；刘少奇“四清”模式的失败；在回忆文本后的“权势关系”和“人情”。

(一)贵州省委"四清"中基本上全体换班子

1964年七八月中央"四清"工作团到贵州后,认为贵州省此前开展的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都走了过场,必须"从头做起";认为贵州"一个根子不正,两个不彻底,三关未把好"。[2]10月,中央改组中共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主持贵州党政工作十年之久的原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降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一职也被免去。原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候补书记一人,及四个省委常委被停职反省。

贵州"四清"工作团是西南局李井泉派出的。李井泉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常务书记李大章被任命为西南局贵州"四清"工作总团团长,中央并派出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予以协助,李大章还带上了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刚。196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和国家机关、4个大区和军队抽调2000名工作队员,其中有100多名师局级干部到贵州,对全省区以上的领导实行层层夺权。外派去贵州的"四清"工作团的阵容和规模如此之大,这在全国是唯一的。

贵州的"四清"是在刘少奇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贵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贵州去昆明开会的领导们带回刘少奇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在整个大"四清"过程中,除反复地播放"桃园经验"录音之外,就是要干部们学习李大章的报告。

从10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一律夺权。毕节、安顺、铜仁等三个地委书记和遵义地委副书记均遭免职被批斗。

列为"四清"重点的有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公安厅、贵阳市、遵义县、晴隆县和贵阳医学院等。仅晴隆县1875名党员受各

种处分就达430人,新划地主、富农164户,四类分子129人,新定"暗藏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217人。"顷刻之间,贵州的大批干部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有的遭到停职、革职,有的遭到开除党籍、工作籍,有的甚至遭到逮捕,关进监牢"。几年前才从东北调往贵州工作、担任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的汪小川,虽然是老红军,也被斗争了近四十天。

周林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撤的公开理由是"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贵州城乡资本主义泛滥"。

[2]一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根子没有扎正,镇反和土改在相当一部分地区不彻底,肃反、审干、"清理中内层"未把好关。

(二)贵阳市是贵州"四清"的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西南局认为,"贵州已烂掉了","贵阳市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贵阳市被宣布是"小台湾",进而再扩大,使一向默默无闻的贵州省,一下成为"第二台湾"、"第二香港",在全国名噪起来。

"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为刘少奇所独创,以后又被正式使用于《后十条修正草案》。1964年9月18日,中央正式下发《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修正草案》,此文件经过毛泽东修改,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有的地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改变了原《后十条》草案中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首先要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还提出全国完成这场运动需要五六年或更长时间。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各地大员都在1964年10月大作报告,动员清除"反革命两面政权"。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一时全国各地都在查找"小台湾",甚至连武汉大学哲学系一个小小的单位,也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两面政权"。

贵州的特殊性在于"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已不是一个个"烂掉"的基层单位,而是扩大到贵阳市这个省会城市。

事情的起因是贵州省公安厅指控贵阳市委书记伍嘉谟包庇贵阳市公安局贪污黄金,并指控原贵阳市市长秦天真是"叛徒"。虽然几经调查,上述指控都没有事实凭据,但公安部门还是查抄了伍嘉谟的家,此时伍已被隔离审查,在伍的家里没有人在的情况下,据说在伍家的字纸篓的一张报纸的边上发现了"反动文字"——"中华民国万岁"。伍随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贵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孙登善也被逮捕。贵阳市委副书记夏贞文被戴上"修正主义"帽子,贵阳市市长兼公安局长柴龙被撤换、批斗,贵阳市委宣传部长朱厚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下放劳动。

贵阳市南明区区委书记李增贤也被捕入狱。

贵阳市的情况正好印证刘少奇的"反革命两面政权"新概念。李大章认为"贵阳市的问题就是贵州省的缩影","只要伸手去摸,没有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不是烂透了的"。伍嘉谟的"现行反革命"是否符合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搞出了一个从上到下都"烂掉"了的市委,从此可以"典型引路",在更大的范围内全面推广。

(三)贵阳医学院"文革"连"四清"后患多

贵阳医学院作为贵州高等学校中的试点率先搞"四清"。"四清"运动从1964年8月开始,到1965年6月底结束,原院党委书记张植范因受诬"军统特务"被打倒,"四清"工作队长陈远吉留校任党委书记,副队长倪皓年留任政治部副主任。

贵阳医学院"四清"一开始就被认定为"烂掉了的单位",省委抽调200多人组成庞大的工作队进驻夺权,在指导思想上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运动中搞"人人过关",使不少干部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同时对教学、医疗、科研工作的一些正确的东西进行了错误的批判,造成了消极后果,学校遭受的损失特别严重,直到1984年-1985年才对"四清"中的错误作出了彻底的否定,"四清"中被重点批判的张植范、乔晓波、解彩年等同志和受到批判与冲击的高级知识分子,才得到平反。

1966年6月"文革"初期,贵阳医学院又被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附录1]选定为省内高等院校中"文革"的试点单位。"四清"后新组建的贵医领导班子陈远吉等,在"六·六"事件中大抓"反革命",大小批斗会不断,全校批斗了230余人,占教职工总数的15.9%,贵医附属医院一名儿科副主任和李同庆等两名学生因贴大字报,被当作攻击党报《贵州日报》的"现行反革命"逮捕入狱,一名生物化学教师被迫跳水自杀身亡。

试点意味着超前。"四清"和"文革"两次试点,两次超前,弄得贵医"文革"中两派的"革"与"保",校内校外,彼此交错,复杂难辨,后患多多。

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对这个试点单位的"文革"运动采取了三大步骤：

第一步，在派工作组进驻省内其他高等院校领导"文革"运动时，省委对贵阳医学院没有派工作组，只安排了观察组；省委信任贵医"四清"后的新党委，贵医的"文革"是在新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展开的，而省内其他高等院校的党委在"文革"初期统统瘫痪了，这些院校的运动都是由省委派驻的工作组来领导。

第二步，在7月26日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性错误"后，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紧跟毛泽东，很快给贵阳医学院受到资反路线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的受害者平反，并宣布领导"文革"的院党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停职反审。

第三步，在毛泽东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首次检阅全国百万红卫兵大军后，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亦步亦趋，四天后即8月22日就在贵阳医学院召开群众大会，支持该校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师生成立全省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团"，并通知省内其他高等院校组织队伍到会祝贺和取经。

上述三大步骤在贵医的实施，"红卫兵·红旗战斗团"这些资反路线受害者对省委贾书记自然心存感激；但遭到校内跟随院党委执行过资反路线、参与整人的人们的反对，五天后即8月27日他们也宣布成立了另一红卫兵组织"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于是，贵医的两大对立红卫兵组织正式形成。

次日即8月28日，省邵南下串连队到达贵阳，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很快被打成贵州省最大的"走资派"，贵医"红卫兵·红旗战斗团"因为拥护贾书记，一顶"保守派"的帽子很自然地落到他们头上，"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由于反对贾启允，也就自然地被视同造反派组织，成为造反派的同盟军。

从上述三大步骤可以看出，与省内其他高校对比，贵医的"文革"具有超前性，但这种超前性被"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掩盖了；当时本地学生们着意于外出串连，也忽视了这种超前性；显而易见，该校"文革"初期具有区别于省内其他高等院校的特点：

一是领导贵医搞"文革"的院党委书记不是要打倒的"走资派"，而是留任的"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它等同于"文革"初期的省委工作组组长，院党委等同于省委工作组；

二是该校"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在"四清"中开展对敌斗争"成绩显著"，以"军统特务"的罪名揪出了院党委原书记并取而代之，因此在继后的"文革"中对院党委书记的"革"与"保"导致贵医校内早于其他高校出现了对立的两派；

三是这两派在校内和校外都表现出两面性，针对校内的院党委书记和校外的省委第一书记，一派表现为内"保"外"革"，另一派则表现为外"保"内"革"，这种情况很容易迷惑外界，包括驻在贵阳医学院的首都南下串连二队也不知究竟，未能引起注意；

四是由于外界一般不知内情，往往会按这两派的校外表现，即对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态度，来区分两派的"革"与"保"，从而造成内"保"外"革"的一派冒牌吃香、外"保"内"革"的一派蒙冤吃亏。贵医"工尖兵"和贵医"红卫兵·红旗战斗团"的境遇正是如此。例如："工尖兵"中的赵贵起，运动初期被推举为贵阳市大中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工尖兵"在省市造反派联合夺权活动中，是参与夺权的40个造反派组织之一，通过夺权公告得以名扬中外；而"红卫兵·红旗战斗团"的群众不仅在"四清"中挨整、在"文革"初期挨整，直到贵州夺权后还在挨整。好在他们的遭遇和处境能够得到贵阳市"八大院校联络站"的充分同情和理解，并吸收"红卫兵·红旗战斗团"为"八大院校联络站"的成员；这个联络站还动员贵医"工尖兵"同"红卫兵·红旗战斗团"联合起来搞"文革"，可是"工尖兵"头头不同意，"工尖兵"因此未加入"八大院校联络站"。

"八大院校联络站"是在《人民日报》2月1日社论《西南的春雷》激励下，于2月3日成立起来的，10天后即2月13日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二月逆流"的风声从北京传来，"八大院校联络站"被刚执掌贵州大权者视为红色政权的威胁。2月24日，地化所的大字报将"八大院校联络站"、贵医"红卫兵·红旗战斗团"以及《主沉浮》小报打成"三股反革命逆流"。贵医"红卫兵·红旗战斗团"1月17日对本校的夺权被视为无效，贵州省军区认为不是左派夺权，不予支持。2月26日，李再含出动了2000多人，其中

有支左部队三个连队，动用数十辆卡车、指挥车、宣传车开进贵阳医学院对贵医"红卫兵·红旗战斗团"进行打砸和反夺权，"红卫兵·红旗战斗团"的组织名称因此改为贵医"二二六"兵团。3月5日，在省总指挥部主持、省军区负责人参加的大会上宣布：《主沉浮》是"反夺权的舆论准备"，"八大院校联络站"是"反革命复辟的组织准备"、贵医"二二六"是"反革命复辟的急先锋"。

"二二六"屡遭迫害，真是有苦说不出，有理说不清，以抱团痛哭、饱含"泪水"著称省城贵阳。后来，贵医"二二六"的"泪水"与贵阳师范学院的"墨水"（因写大字报出名）以及贵州工学院的"汗水"（因搬印刷厂出名），合称贵阳"三水"。

在1967年4月全省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时，省革委主任李再含无视贵医问题的复杂性，对贵医的两派不公平、不公正，支一派压一派，只让"工尖兵"参加省红代会，把"二二六"拒之门外，导致"二二六"在贵医"东方红"战斗团和贵阳六中狙击兵配合下，于4月10日下午3时大会开幕时率先冲击省红代会，赢得主张公平对待"二二六"的大中学生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从而诱发了"四一一"运动。贵阳医学院"文革"连"四清"是"四一一"运动的直接诱因。

（四）遵义县虾子区的"四清"唱了三出戏

曾参加过虾子区"四清"[附录2]的同志说：这次虾子区"四清"，是唱了三出戏：开始是"苏三起解"，洪洞县里没有一个好人；中间是"三岔口"，自己打自己人；最后是"将相和"，大家团结起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从"四清"运动总体上来讲，他们认为是党在指导思想上一大失误。尽管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集体财产、经济账目进行清理，对少数干部在集体经济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和干部作风问题进行清理、整顿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把经济问题、作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无限地拔高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则是错误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4年6月4日党中央在批转贵州省委《关于彻底解决贵州"四清"问题的请示报告》中作了正确的结论：1964年贵州的"四清"运动，是在"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当时认定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这种估计和分析是完全错误的。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是完全正确的。中央批示下达后，在"四清"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干部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

1995年，参加过虾子区"四清"的洪星到北京看望周林时，周林详细向他讲了当时贵州"四清"的起因和毛主席看了他的报告及时采取措施纠正错误的过程。他语重心长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往事依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首贵州1964年'四清'运动，它是贵州历史上一大灾难。它早于'文化大革命'两年，但错误性质是一样的。对于我们每一位经历这场运动的人，都有责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回顾这段历史，避免重犯，但是有些同志在其著述中回顾这段历史时，对'四清'运动含糊其辞。这是对待历史的态度吗？古人司马迁在其鸿篇巨著《史记》中尚能遵循对待历史'不虚美'、'不掩恶'的原则，难道我们今天写党的历史就可以背弃这个原则吗？我已是80多岁的人了，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对待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让后人引以为鉴。"

（五）毛泽东对贵州"四清"作出不同反应

1965年1月，毛泽东找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南局几个负责人谈话，毛问李大章带了些什么人去贵州搞"四清"。当李大章回答说有陈刚等人时，毛当即对李井泉下令："立即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贵州省委周林复职。"

《王力反思录》说："贵州，第一书记周林，毛主席也认为不错。人民公社办食堂就是从他那里开始的，直到《六十条》以后才解散。"

1965年2月9日，中共中央首先免去陈刚的贵州省委代理第三书记的职务，任命贾启允为贵州省委第三书记。1965年4月26日，中央任命贾启允为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取代了李大章，钱瑛也被调回了北京。李井泉则将周林调任西南局书记。

本章参考资料

1.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载《领导者》2006年10月号)
2.贵阳医学院校史编委会《贵阳医学院校史》1938-2008
3.贵州人民出版社《当代贵州大事记》1949-1953
4.《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5.洪 星《虾子区"四清"运动》
6.黄大红缕绘《贵州文革全过程大事记(1966年5月-1967年8月)》

附录1 红雨斋:两度短命的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

贾启允(1914~2004),山西闻喜人。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六七十年代两度出任省委第一书记,都很短暂。第一次是1965年4月由四川省书记处书记调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至1967年1月在全国夺权的形势下下台,任期不到2年。第二次是在"文革"后期许多老干部重新复出的情况下于1975年10月出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到1977年2月离职前后只有16个月。

贾启允的运气为什么这么差?主要是因为"文革"的特殊形势造成的,其次也与他对政治走势的判断有关。第一次短命的任职可以说是大势使然,因为"文革"前的29个省级第一书记,除了河南的刘建勋与黑龙江的潘复生起来造反蒙混过关以及广西的韦国清因某些特殊的原因幸存以外,有26个第一书记被打倒。当时的贾启允可能也想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不得其门,又碰上李再含和中科院贾阳地化所等造反这样的偶然事例,在"一月风暴"中下台也属正常。

让人好笑的是他第二次短命任期。进入1975年秋,邓小平的整顿,已让毛主席日益不满,感受他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意思。这时的贾启允给好复出,据《邓小平年谱》记载,在中共中央任命贾启允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之前,邓小平叮嘱他到云南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坚决反对派性,抓好领导班子的调整,团结、使用和依靠老干部。其用意非常明显,贾启允到云南后也想这样办,只可惜随后国内政治形势突变,反击右倾翻案风浪潮又起,这时的贾启允本可选择与大多数老干部一样的消极态度,但是不知为何,他在云南省内造反派的压力下,选择了向造反派妥协,并在1976年2月份把邓小平与他的一些谈话暴露出来,如批邓时邓小平的一条主要"罪状",是邓小平曾对贾启允说:"你到云南工作,人家骂你搞复辟了,你的工作就搞好了。"客观上

为批邓提供了炮弹,使"文革"尾声的云南省更加动荡,丧失了一个老同志应有的立场,所以"四人帮"一下台贾启允于1977年2月也受牵连下台,其在"文革"尾声的表现好比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一样。贾启允虽然两度出任省委第一书记,但是都在两次党代会之间,所以他不曾进入中央委员会。

在坐了两年的冷板凳后,贾启允在1979年3月任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行署副专员,1983年4月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于2004年4月12日逝世,享年90岁。贾启允在"文革"前后的表现,在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很具有代表性,值得历史学家们研究。

红雨斋(2009-02-19)

附录2 洪星:虾子区"四清"运动

1964年,党中央派出了有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等组成的阵容强大的工作团来贵州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中央为什么要把贵州作为"四清"的重点?原因很多,但我认为这是和曲解了贵州省委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特别是遵义地区发生"五九事件"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纠正当时左的错误,恢复和发展贵州经济的正确做法是分不开的。

1959年,当时遵义地委继续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鼓干劲"的左的指导思想,坚持大办公共食堂,推行供给制、在粮食上搞高估产、高征购、反瞒产、反富裕农民、打击农村基层干部、助长了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等违法乱纪的歪风,导致这年年底和1960年春,遵义地区农村,特别是遵义县和湄潭县发生严重饥饿、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现象。为了挽救局面,省委在全省采取了许多正确措施:缩小人民公社规模,纠正"一平二调",取消公共食堂,推行"三包一奖",试行"大包干"分配办法、恢复自留地、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开放农村集贸市场等,让农民休养生息。因此,从1962年后全省农村经济形势有了好转,各项工作走向正常轨序。到1964年,全省整个经济形势根本好转,呈现出新的生机。1963年省委书记周林同志在视察湄潭时,曾给我讲过:这两年省委工作重点是抓农业和农村工作,搞农村经济形势好了,要重点抓一下城市经济工作和城市的建设。后来徐健生同志(当时副省长)也给我讲过:说在1963年召开的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听了他的汇报后,对贵州这几年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但是,1964年8月我看到了刘少奇同志在昆明召开的西南地区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其中点了贵州省委书记周林的名,认为贵州近年来这些做法是搞资本主义。这使我很震惊。我预感到形势变了,周林

同志要挨整了、贵州要挨整了。少奇同志在讲话中认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强调社教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犯有严重四不清的干部有受地富反坏影响的根子,也有上面的根子。这次"四清"运动不仅要挖下边的根子,也要挖上边的根子。这就意味着贵州搞资本主义的根子有可能是周林同志,要挖上边的根子,也必然要牵连到周林同志。不出所料,不久之后,中央于1964年10月份改组了贵州省委,由四川省长李大章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接着,改组后的省委决定在全省开展"四清"运动。1964年10月21日省委正式通知遵义地委:遵义县作为全省"四清"运动的重点。由省委派出工作团领导运动。

省委"四清"工作团是由中央、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和省直机关、各地、州、市、县、区、公社抽调干部组成的,共4731人。其中遵义地区1,400人,我们湄潭县120人。工作团设总团,由国家劳动部副部长李正亭同志担任团长和党委书记。下设10个队。我们湄潭县由县委副书记、县长陈邦海带队,我协助他工作。我们编在第九队,由解放军画报社×××任队长,陈邦海同志任副队长,我任支部委员。第九队下设五个组,我任第一组组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舒凡任副组长,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任秘书,八一电影制片厂场记陈静任记录员,同我编在一个组的是我县各区、社的同志蒋胜隆、万林、张锡忠等12位同志。参加工作团的人员全部于1964年10月28日到遵义报到,参加集训。

这次集训为期一个月,主要内容之一是:对由贵州省各级抽来参加工作的干部进行全面审查,查阶级、查观点、查立场。规定每个队员必须交待从7岁起的历史,凡政治不可靠、思想作风存在严重问题,在"五反"中暴露有严重错误而又没有认真检查的都不能参加工作团。同时规定,在每个人自我检查交待后,还要开展互相检举揭发。交待或揭发些什么内容呢?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例如我自己就检查交待了:从7岁起上抗日小学,14岁参加革命,15岁入党,来到贵州后曾给省委书记周林当过秘书,1959年在湄潭工作时曾被作为右倾分子调贵州大学工作,调回湄潭后为了恢复身体,曾经领导批准,买过两斤白糖、一条哈德门香烟、一双水胶鞋、一件闹衣、一对五羊牌电池等等。我的以上检查交待,工作团领导总的认为还是好的,但他们认为我给省委书记周林当过秘书应当作为重点审查对象。所以工作团派了两位同志(解放军总政干部)专门找我谈话,要我检举揭发周林同志的问题。他们告诉我周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政治上长期否定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向敌人让步,导致贵州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倒退。还说,目前省里正在对他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他们要我同周林同志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当时我想到周林同志

在劫难逃,我也因此会受到株连。然而我以事实为根据把问题讲清楚了。经过几次交谈,两位解放军干部不仅认为我没有问题,而且认为我是正派的,至今回忆起来我觉得这两位解放军干部也是正派的。他们没有对我采取过"左"的手段,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第一阶段的自我交待检查、互相揭发中有不少同志被清退回去,还有个别干部因想不通自杀。这是工作团集训中不应该发生的历史悲剧。

集训的内容之二是学习双十条(即"前十条"和"后十条")和"六十条"。但重点是学习中央批转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的经验(简称"桃园经验")。这个经验强调这次"四清"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因此工作队学习中首先进行了反右倾,然后学习桃园工作队的具体做法,即: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夺权斗争,然后进行"四清",最后开展对敌斗争。这个所谓经验,是一套极"左"的东西。

这次集训的纪律是极其严格的。规定学习期间工作队员不准互相到其他队、组去串门,不准一人外出,出入上街要二人同行。不准买零食吃,更不准到饭店吃饭,一次陈邦海县长和陈光文商业局长二人外出吃羊肉粉,还喝了一点酒,回来后被发觉,工作队当晚召开支委会对陈邦海进行了批判。王晓棠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曾在《山间铃响马帮来》、《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中扮演角色,当时遵义市有很多群众都想见到她。但规定她出门必须带一个大口罩,让人们认不出来。一次我县张大彬来信给我说,他想见见王晓棠。我叫他以给我送邮票为由门岗才让他进来,终于见到了王晓棠。由于纪律严,在集训中也不能同她多讲话,一次同组的禹朝廷同志在交谈中问她拍电影情况,她当即回避了,使禹朝廷很难为情。

省委"四清"工作团集训于11月26日结束后,又进行了重新组合,全团人员一分为二,一部分到遵义县参加县直机关"四清",大部分参加遵义县虾子区农村四清。工作团总部设在虾子区,下设8个工作大队,43个工作队,440个工作组,另有一个区级机关工作队。我们湄潭的同志被重新分配到虾子公社四清工作大队、山羊大队工作队。虾子公社工作大队长是刘冀平(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副队长是李舒田(北京人大会堂保卫处处长)和王荣。山羊大队工作队长是李卓冬(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副队长是龚松甫(解放军总政)。我是大队工作队支部委员、分工负责齐心、白杨两个工作组工作。齐心生产队工作组组长是蒋胜隆,白杨生产队工作组组长是李秉清。参加山羊大队工作队的同志来自四面八方,除我们湄潭的同志外,还有解放军总政、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新华社贵州分社(王金福等)、省民政厅以及仁怀、凤岗、余庆县的同志。春节前夕又有贵州工学院一部分师生编入我们队。

在1964年11月28日进入虾子区这天，总团调集了80多辆大卡车，分两批将队员送到虾子区。一路上浩浩荡荡、歌声嘹亮，每过一场镇，人们都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支庞大的队伍。当时我们自己也感到格外自豪。我们于当天到达山羊大队后，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就住在邪先选好的"根子"家中。

工作队入村后，首先向新组合的队员宣布纪律(工作队会议是选在一个山坡上开的)。接着向当地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以及"四类分子"分别宣布约法几章。工作队的纪律是：不准在干部、中农和"四类分子"家中吃、住，不准到非指定的群众家中，特别是干部家中吃饭，不准吃群众做的好菜，否则就会被腐蚀；不准到虾子区街上买零食吃、如葵花子、花生等，更不准到饭店吃饭喝酒；不准打扑克、下象棋。记得我县曹国仁同志从湄潭家中带来一瓶包谷酒，放枕边，每晚睡觉时喝两口。后被人检举，工作队领导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由于对工作队员的种种限制，致使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也包括我自己。为了治病工作团采取措施：一是给每个队员发两包黄豆粉作营养补充；二是给每个队员轮流休假10天。本地人回家、外地的到遵义市休息。经我与我们工作队领导商量，由我回湄潭抽一名炊事员来队部办伙食，自己开伙。我利用回家休假机会，叫我县派了老居师祝云山同志随我回到山羊大队给我们做饭。由于工作队自己开伙，生活得到改善，大家的病情也逐步好转，身体得到恢复，对此工作队的同志对我非常感激。

至于对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的限制就更严了。如：不准破坏发动群众，不准躺倒不干、不准打击报复，不准搞攻守同盟，不准分散财产，不准外出等等。严令四类四分子：不准乱说乱动、不准造谣破坏、不准拉拢干部、不准东走西窜等等。工作队人村后气氛十分紧张，特别是中央、中央国家机关来的同志由于不了解情况，更把虾子区看成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以为到处都是阶级敌人，使他们晚上不敢出门了。

工作队入村后不久"四清"运动正式开始。虾子区的"四清"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访贫问苦，找根子，发动群众开展夺权斗争。在这一阶段，先后介绍了青山堡大队和三渡关公社发动群众夺权的经验。他们的经验主要是高举"四清"旗帜给贫下中农撑腰，猛压"四类分子"，急刹干部威风，长贫下中农志气，造"四清"声势，打开斗争局面。根据各工作队一个多月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问题所收集的情况，当时工作团党委对虾子区的问题作出了如下错误结论："在前省委少数领导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出现了全省范围的大退却，社会主义阵地失守，造成资本主义泛滥。""虾子区也刮起了单干风——全区农业单干半单干的生产队占37.5%。场镇上资本主义泛滥让出了社会主义市场，造成私商大发展。区委所在地有不少'千字号'、'万字号'投机倒把分子。农村许多人弃农经商，

区委核心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虾子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是严重的尖锐的。""虾子区2069名干部中有30%左右的人问题多、民债大、性质严重，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属夺权对象。"基于上述判断，就紧接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夺权斗争。1964年12月27日，工作团在青山堡召开了1000多人参加的夺权斗争现场会。虾子公社各工作队都派领导前往参观，学习经验。我们山羊大队工作队领导参观回来后，又经过一段充分准备，于1965年1月13日也进行了夺权。全区夺权斗争持续到元月下旬才结束。在这场夺权斗争中，全区有567人受到错误批判，305人被撤职，占干部总数的14.7%。全区87%的公社，83%的大队和60%的生产队被夺权。同时还从干部和群众中挖出一些所谓地主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富农分子，有的被管制，有的被判刑，特别是在夺权中，不少地方发生违法乱纪行为，对被斗争的对象，实行民兵看看管，武装押送，查封财产等。由于极左政策和错误行为，全区有10人因不忍被辱而自杀，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工作队北京来的同志也十分紧张，为此工作团还专门发了武器，让他们外出时随身携带。

第二阶段是贯彻落实中央《二十三条》。中央《二十三条》早在元月27日已发到虾子区工作团了，但未传到基层。2月4日(即正月初三)我参加了工作队集中学习"二十三条"，总结前段工作。这时根据省委关于从遵义工作团抽调2000人支持面上"社教"的指示，我们山羊大队工作队抽出45人到面上参加社教。"二十三条"下来后，省委和工作团党委都有一些贯彻意见。2月13日工作团党委书记李正亭同志在工作团党委扩大会上总结发言说：前段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一是对干部缺乏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干部严肃多热情少，思想上有片面性；二是对夺权缺乏全面平衡，有的定高了；三是发生简单化做法，如民兵看管，持枪押送；四是工作队人数过多形成人海战术，包办代替。初步承认了前段"四清"夺权的一些错误。他强调指出："前段斗争的夺权对象90%是不该斗的，要复查。"接着工作团于1965年2月25日在虾子场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包括贫下中农、干部及家属、地富子女)的大会。还破例让"四类分子"代表列席会议。会上传达了省委书记李大章在修文县贫下中农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中讲了对"四不清"干部处理的政策界限，即：1964年从严、1963年从宽，1962年以前不算。会后，全区根据"二十三条"精神总结了前段的经验教训，对被批判和被夺权的干部进行了全面复查。

根据"二十三条"精神和工作团党委要求，我们山羊工作队立即着手开展工作。我的主要精力是抓白杨和齐心两个生产队的复查工作。这两个队的工作组同志多数是来自湄潭区、社的领导干部，对农村基层工作体会深，对贵州情况了解。我和蒋胜隆、杨德学以及贵州工学院的曹硕、周逸芳共同先后召开了这两个队的贫协会、干部会、干部家属会，向被错误处理的干部传达"二十三

条"精神,做他们思想工作。我在会上主动检查了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我说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希望贫下中农正确对待他们,不要歧视他们,并对被错误处理的干部进行了适当安排。我们做了这些工作使两个队的干部和群众谅解了我们,使两个队的干群关系更加融洽。

经过一个多月的总结复查工作,虾子区共宣布解放了1404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被处理的干部降到占干部总数的2.3%,达到了团结95%以上干部和群众的要求。"二十三条"下达后,纠正了"桃园经验"的错误做法,对前段运动中发生的问题做了一些纠正,但由于"二十三条"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左"的,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问题并未彻底解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中央拨乱反正的政策,遵义县委派出工作组做了大量工作,才使当时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得以彻底平反纠正。

第三阶段是组织建设。虾子区原有基层党支部46个,党员559人。运动开始,工作团认为全区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员277人,觉悟低的71人,问题多的111人,性质严重的100人。党员中有8.6%是各级干部。在这次整党中经过教育,允许登记的党员404名,暂缓登记的57人,合计461人,占党员总数的83%,不予登记的29人,退党的34人,开除党籍35人,共98人。(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党员,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的。)在运动后期吸收新党员250人,其中26人不要预备期,党员由原来559名增加到718名,做到每个队都有党员。与此同时还对公社、大队、生产队进行了民主选举,共选出社队干部2116名,其中1034名为新成长起来的积极分子。原有干部只有50%当选,还建立了贫下中农协会、民兵班、排、连组织等。

在这一阶段,工作队复查工作是做得认真的。针对有些地方对于自己纠正错误,总怕给"翻掉"的思想,工作团党委指出:"只要是事实,就不怕被翻掉。不符合事实的,迟早要翻案,与其别人来翻,不如我们自己翻。敢不敢实事求是,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同时在工作方法上提出了三允许(允许本人作补充交代、更正;允许别人为他申辩;允许翻案)、"三对面"(工作人员、本人、贫下中农代表对面核实)、"一通过"(召开群众大会通过结案材料)。在处理上还规定了若干政策界限。最后处理结果:戴地主、富农分子帽子的6人;反革命分子帽子的3人,坏分子帽子的9人,阶级异己分子帽子的4人,蜕化变质分子帽子的6人,投机倒把分子帽子的1人,共计29人(占原有干部总数1.28%);开除党籍19人,开除公职5人(共占原有干部总数的2.39%)。这就大大减少了处理干部的面,这在当时来说能够做到这种程度也很不容易了。当然这些干部的彻底平反纠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完全实现。

工作队从一开始入村,到运动结束,每个队员一直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坚持抓生产,抓农田基本建设,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工作队在虾子区

期间,帮助当地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仅全区新建水轮泵站就有5处,安装抽水机17台,新增灌溉面积3000余亩,帮助土变田480多亩,群众是满意的。

整个"四清"运动于1965年4月20日结束。由于"四清"工作队在个别领导人"左"的思想影响下,在对待工作队员工作上和认识上的不同意见,也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因此使一些同志受到不白之冤。我所在的山羊工作队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湄潭县和工学院的几位同志负责两个生产队,工作兢兢业业,在运动中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抵制上级一些错误思想和一些过"左"的做法,但却受到工作队少数领导和一些思想品德不好的人的非议,以"莫须有"的问题对我们几位进行错误的批评和作出错误的鉴定;说我们不执行领导指示,与领导分庭抗礼,工作上另搞一套,搞小集团等等。后来我们得到虾子区公社工作大队领导刘冀平、李舒田等同志的支持,才责成山羊工作队给我们的错误鉴定予以纠正,不白之冤终于在我们离村之前洗掉了。贵州工学院周逸芳同志当时写了一首诗:"此风此浪从何起?真稀奇,心中疑,同志不能存友谊,认识不能有分歧。任凭风流来打击,行得正,心不虚,革命道路多离奇,区区小事焉能比?狂风恶浪能行舟,让事实除稀稀,歪风邪气无地立,胜利永远属真理。"表达了对这种错误做法的极端愤慨和真理必胜的信念。

虾子区"四清"运动于1965年4月底全部结束,工作团决定5月2日解散。山羊大队于4月30日召开群众大会与我们话别。5月1日我们与白羊、齐心两个队老乡依依不舍告别,返回湄潭。

虾子区"四清"特别是"桃园经验"其教训是特别深刻的。它的根本错误就是否定了贵州省委、否定了贵州广大干部。把贵州省委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祸根,把全省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极不公平的。对此,周林同志在他调西南局工作之前,通过邓小平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对贵州"四清"运动的一些做法提了一些意见。同时对贵州存在的问题承担了责任。他说:贵州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贵州出现的问题和发生的错误应由他个人负主要责任,请不要追究基层干部的责任。由于中央一些领导人对贵州的错误看法,从中央调集大军对贵州开展"四清"运动,后又从全国各地抽调干部支黔,准备对贵州各级领导班子来个大换班、大调整、大改组,这对贵州干部是一个严重打击。当然,不少参加过贵州"四清"运动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同志,经过5个多月的实践,他们逐步了解了贵州、逐步转变了对贵州的看法。曾参加过虾子区"四清"的同志说:这次虾子区"四清",是唱了三出戏:开始是"苏三起解",洪洞县里没有一个好人;中间是"三岔口",自己打自己人;最后是"将相和",大家团结起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从"四清"运动总体上来讲,我认为是我党指导思想上一大失误。尽管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集体财产、经济账目进行清理,对少数干部在集体经济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和干部作风

问题进行清理、整顿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把经济问题、作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无限地拔高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则是错误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4年6月4日党中央在批转贵州省委《关于彻底解决贵州"四清"问题的请示报告》中作了正确的结论：1964年贵州的"四清"运动，是在"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当时认定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这种估计和分析是完全错误的。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是完全正确的。中央批示下达后，在"四清"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干部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

1995年，我到北京看望周林同志时，他详细向我讲了当时贵州"四清"的起因和毛主席看了他的报告，及时采取措施纠正错误的过程。他语重心长向我讲了这样一段话："往事依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首贵州1964年'四清'运动，它是贵州历史上一大灾难。它早于'文化大革命'两年，但错误性质是一样的。对于我们每一位经历这场运动的人，都有责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回顾这段历史，避免重犯，但是有些同志在其著述中回顾这段历史时，对'四清'运动含糊其辞。这是对待历史的态度吗？古人司马迁在其鸿篇巨著《史记》中尚能秉承对待历史'不虚美'、'不掩恶'的原则，难道我们今天写党的历史就可以背弃这个原则吗？我已是80多岁的人了，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对待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让后人引以为鉴。"这是周林同志的肺腑之言。如今，周林同志已经走了，但他这段肺腑之言，我会永远牢记。（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12期）

第四章　贵州"文革"序幕

1966年2月下旬，彭真到成都向李井泉传达《二月提纲》精神后，李在批转《关于四川省开展学术批判的意见》的西南局批语中，要求云南、贵州省委参考四川省的意见，也制定出开展学术批判的方案来。3月6日彭真回到北京，4月的一天打电话给李井泉说："毛主席天天看各省的报，统计省报的批判文章。"于是，西南地区各省都抛出了批判对象。

1966年5月，由贾启允任第一书记的中共贵州省委，把"四清"时就遭过批判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汪小川又抛出来，作为贵州"文革"开刀祭旗的第一个牺牲品。

老红军汪小川在写长征《冲出绝境》的文章中，有句"太阳像块死马肉一样挂在西边的天际"，竟成了他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罪证；他在安顺《二铺调查》中有"大跃进"中干活是"人多人懒，狗多狗馋"的真实描写，这又成了他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铁证。

《贵州日报》直至1965年12月19日才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同时又刊登负面文章为《海瑞罢官》辩护，开展学术性讨论。

（一）贵阳师院斗争矛头指向贵州省委

贵阳师范学院（现贵州师范大学）6月6日最早出现矛头指向贵州省委的大字报。

6月5日下午，全院师生开大会拥护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

定、会上省委宣布撤销院党委书记、"四清"工作队队长、文化革命工作组组长黄辅忠的一切职务，由省委统战部部长王林岗任贵阳师院文化革命工作组组长、"四清"工作队队长、代理党委书记。但不到24小时王林岗就被轰下台了。

6月6日上午，全院师生开大会声讨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汪小川。王林岗在声讨会结束前作总结发言，竟然大讲汪小川的光荣革命史，说汪是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干事。说汪犯错误是毛主席的书读少了，钻到《廿四史》等古书堆里面去了，工作之余喜欢写点东西。这是公开为汪小川开脱，引起了师生公愤。下午声讨王林岗的大字报雪片般飞来，"立即撤销王林岗代理党委书记"、"斗倒斗臭王林岗"的大标语也刷出来了。

师院中文系等系学生当晚自发组织写大字报揭批省委工作组，并派代表连夜到省委贴大字报，把矛头指向省委，质问省委。贾启允派组织部副部长郭乐天出面对付，派宣传部副部长张向阳到师院向学生"表明省委的态度"。各系召开紧急会议，革命师生怒火越烧越旺，广播室反复播放声讨大字报，呼"打倒王林岗"的口号。一些系的同学还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大街上。吃了晚饭后，各系互相串联，声势更大，调子越升越高，不少师生还到省广播电台要求电台播送他们的大字报，向西南局、中央发电报反映情况。晚12时，学院广播室播送了省委撤销王林岗一切职务的决定。全院沸腾。

师院附中的学生到贵州日报造反，要求《贵州日报》停刊。贵阳市委指示市公安局加强对贵州日报的"保卫"工作。市公安局以蔡邦臣副局长为首，出动大批侦察员到达报社。

这就是拉开贵州"文化大革命"序幕的"六·六"事件[附录3]。

(二)贵阳地区革命群众到《贵州日报》社造反

1966年6月6日，《贵州日报》用三个版面刊登了长篇署名文章《坚决拔掉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和编辑部文章《彻底揭露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文中的小标题"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省略了主语"汪小川"。贵阳五中有

学生蒙住大标题，就说"这些小标题是反动标语"，得到很多师生认同。贵阳五中与贵州日报社距离不远，五中在上合群路北头西侧，报社在下合群路南头的延安路南侧。

当天傍晚六七点钟，五中师生一两百人来到贵州日报社，将报社围困起来，要求报社交出在《贵州日报》上刊登反动标语的反革命分子。要求邮局停售当天"刊登有'反动标语'"的《贵州日报》。并张贴大字报，认为批汪小川是'舍车保帅'，提出要"彻底揭露省委'舍车保帅'的阴谋"，"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这一行动立即引来许多群众参与和围观，聚集的人数上千，阻断了延安路交通。事件进行约两小时，五中师生经劝说后回校。

贵州工学院(现贵州理工学院)机械系六五级学生吴之行也有同样看法，写了大字报悬挂在饭厅大字报专栏里。因该校距离市中心较远，他们没有参与围攻报社的行动。

6月8日，贵阳一中、四中、五中、六中、七中、八中、十七中、十九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合群路小学、省机械厅、化工局、工干校、市手管局、工商局等单位的干部继续到贵州日报社造反。

6月7-8日，贵州大学(现贵大北区)、贵阳医学院、贵阳二十中(现贵州实验中学)以及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等都出现了类似活动。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职工也有不少人参加这样的行动，许多人亲自跑到报社、电台和省委去送大字报，给中央发电报、写信。

随着《贵州日报》向各地传播，各地州县也飞来了炮轰《贵州日报》的信件。"六·六"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全省。

中共贵州省委向西南局汇报，说学生要"捣毁报社"、"破坏电台"、"上街闹事"，并叫公安厅派人前往省广播电台制止学生闹事。

(三)"六·八"反击——派工作组，抓"反革命"

6月1-8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第二届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和《五·一六通知》，研究制定《贵州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意见》，省委决定由贾启允为主组成文化革命小组。要求各地、州、市都要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县委要有专人负责。

6月8日下午,省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把向省委和报社写"质问信"、贴大字报等行动定为"六·六反革命事件",决定进行追查、处理和反击。"六·八反击"开始了。

这是按照1957年反右斗争的逻辑:攻击省委、攻击党报的,就是反党、就是"现行反革命"。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从6月8日晚8时开始,反复广播省委的反击令。

省委抽调干部130人组成7个工作组1个观察组分赴8所大专院校、对"六·六事件"组织全面反击,其中贵阳医学院进驻观察组。

贵阳市、遵义、毕节、安顺、铜仁、兴义等市地和省级各厅局所属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共计153所,派出147个工作组共有704人。

贵阳市委派到贵阳市八中的工作组,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学生和教师,实行白色恐怖。6月6日,八中高三班学生邬国芳贴出两张大字报批评学校党支部,支部采取紧急措施镇压。6月7日,高一(2)班蔡瑞民等14位革命师生与工作组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质问工作组组长刘秉新:"你们为什么不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汪小川,而是指向学生和老师?"工作组拒绝回答学生提出的正确意见。学生到市委反映,市文革办公室请示张一樵、丛亚凡后,决定由宣传部副部长汪清出面,把学生软顶了回去。贵阳市女中开始白色恐怖,34名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

省委派工作组进驻贵州大学,从6月10日开始反击。据统计,贵州大学公开攻击《贵州日报》的有119人,公开煽动、议论的有135人。工作组组长刘震东宣布:"凡是参加了这次反革命事件的人,都是参加了反革命。这是必须肯定的。但其中有的是主谋策划,有的是充当帮闲打手,更多的是盲从盲动,要区别对待。"工作组点名,中文系教师曲沐是学校里攻击党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物理系党总支委员会是攻击党报的委员会。系总支书记张同生成为物理系的主要批斗对象。物理系主任黄润荣、物理系62级同学刘庸也都被列为攻击《贵州日报》的"现行反革命"。贵州大学的打击面,占当时在校学生数(不含下乡四清尚未返校学生数)的50%以上。

贵阳医学院在"六·六"事件中抓"反革命"受株连273人,被逼

自杀的有基础部主任朱清干和生化教师林敦英等2人,被逮捕的有69届学生李同庆、70届学生张绍伦和儿科副主任何祥等3人。

"六·八反击"首先从贵阳师范学院开始,接着全面铺开。师院中文系在全系大会上宣布系学生会是"反党集团",把系学生会主席汪文森和写大字报的骨干分子孙世政等人打成"反革命分子",把学生会宣传委员邱富伦打成"反动学生",帽子暂时捏在群众手里。师院打"反革命"的情况,物理系学生杨文华在日记中记载:

6月8日

晚自习时系上通知要交待重要事情,先通知几个人去开会。我们等到十时,工作队的老徐非常严肃地到班上宣布6月6日我院发生的事是"反革命事件"。我一下子蒙了,啥?我们热血沸腾参加的是反革命事件?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刘某(我班参加刚才小会的同学)拿出一张大字报底稿念起来。这张大字报点明写质问省委大字报的余开生是反革命。另外几个参加开会的立即附和。刘某叫大家签名却没人响应,毕竟把一个同学打成反革命可不是件小事。

质问省委的大字报虽然不是我写的(如果当初的分工是我写质问省委、他写顾惠之的大字报,那当反革命的就是我了,好险!),但我积极地帮着贴、帮着挂,干系是少不了的。我冥思苦想了好久,决定连夜写一张检查。

6月9日

一清早把检查贴了出去,走了十几步又忽然想到,这样做岂不是不打自招,自投罗网。管他的,反正贴大字报的不止我一人,等等看。我返身把检查撕了下来。

上午的全院师生大会再次把六月六日师院发生的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大会发言人声色皆厉,简直把全院师生都当成反革命训斥。他详细介绍了六六那天我院校内校外的情况,这些情况有的知道,甚至自己是目睹耳闻者、参与者,有的则闻所未闻,但忍不住想如果自己在场会参加吗?总之头皮发麻,心有余悸。会场周围有不少从未见过的人在巡视,据说学院已被公安厅的人包围了。真可怕!

下午各系追查反革命,除上午系的大会点的五个人外,又追查出了不少人,我班就有余开生、沈某、黄某、孙某等五人。我也很紧

张，紧张得昏乱了，想不起自己在质问省委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没有，想不起那天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一天要去看几次大字报，唯恐自己被点名，被揪出来。

6月11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中共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贾启允任组长，苗春亭任副组长，成员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向阳、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等。28日，增补陈行庚任副组长。

6月12日，省委向中共中央、西南局上报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坚决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提出全省开展"文革"七条措施，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抓运动。

6月21日，贾启允布置："上阶段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今天开始打一个歼灭战，斗垮、斗臭、斗倒。"

6月22日，《贵州日报》报道，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改组贵阳师范学院党委。

7月1日前后，贵州大学等各院校下乡搞"四清"的师生提前返校参加"文革"。

7月20日，省文革小组向西南局报告：贵州省"八所院校共揭出反革命黑帮35个，牵涉校内人员198人，校外人员46人。还有17个反革命集团线索，有待查破。"

6月6日至7月26日，贵阳市属单位共贴出大字报130万张，共有13188人被点了名，其中"重点对象"3196人。6月6日至7月24日，贵阳市自杀75人，死30人，"逃跑"35人，拘留和逮捕20人。

7月26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性错误。

7月27日，赴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贾启允从北京打电话给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向阳：尽快撤出工作组。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72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对他们开批斗会，还私设监狱关押，遣送农场劳改。到7月10日，贵阳地区被迫自杀的达189人，其中身亡107人。拘捕206人。在省级8个系统和贵阳市的3万多干部中，打击面达8.1%。李再含在省军区四十四医院蹲点，在这个医院里也打了一批"反革命"。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撤出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贵州省委派驻各院校的工作组随后撤出。贵州大学工作组8月10日撤出，走前要求校、系两级分别成立文革委员会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各班则成立"文革"小组。

本章参考资料

1.《贵州日报》1966年6月6日
2.当代贵州简史编委会《当代贵州大事记》1966年
3.《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4.贵阳市文革大事记(1966年6月6日至7月31日)
5.贵大红缨枪《贵州文革全过程大事记(1966年5月-1967年8月)》
6.杨文华《那样的年代，那样的事儿——文革日记摘抄》
7.张再兴《我的文革与红卫兵运动史观》

附录3 贵阳市文革大事记(1966年6月6日至7月31日)

六月六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派工作组到各中学，要求今日到校。八中高三班学生邹国芳贴出两张大字报批评学校党支部，支部采取紧急措施镇压，学生派出代表到市委反映，市委不仅不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反而认为这是"少数地富反坏右子女和有问题的教师兴风作浪"，决定立即派出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秉新、市计委办公室主任孙省三为首的工作组入校，配合校党支部对学生施行镇压。

师院学生派代表到省委贴大字报，造贾启允的反，贾派组织部副部长郭乐天出面对付，派宣传部副部长张向阳到师院向学生"表明省委的态度"。

师院附中学生到《贵州日报》社造反，要求《贵州日报》停刊。市委指示公安局加强对《贵州日报》社的"保卫"工作。公安局以蔡邦臣副局长为首，出动大批侦察员到达报社。

文革办公室向市委请示两个问题：

第一，要求市委立即确定内部排队的标准。

第二,要求对第二人民医院、妇产医院、传染病院、工人医院派出工作组。

今日自杀一人。

六月七日

市委派到八中的工作组,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学生和教师,实行白色恐怖。高一(2)班蔡瑞民等十四位革命师生与工作组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质问工作组组长刘秉新:"你们为什么不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汪小川,而是指向学生和老师?"工作组拒绝回答学生提出的正确意见。学生到市委反映,文革办公室请示张一樵、丛亚凡后,决定由宣传部副部长汪清出面,把学生轰顶了回去。

女中开始白色恐怖,三十四名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

师院附中、南明区委组织部的革命师生和干部到贵州日报社造反。

晚上,市委文革领导小组召开各校工作组组长紧急会议,由成克、丛亚凡、解杰、韩子栋、于佳临主持。

六月八日

今天,一中、四中、五中、六中、七中、八中、十七中、十九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合群路小学、省机械厅、化工局、工干校、市手管局、工商局等单位的革命干部继续到贵州日报造反。在这种大好革命形势下,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却一片惊慌,连续召开三次紧急会议,"研究措施",张一樵、成克、丛亚凡、于佳临都在三次会上作了"重要指示"。

中午,贾启允把丛亚凡叫去面授机宜,丛急速返回机关,顾不得吃饭,立即召开各校工作组组长紧急会议。

下午,市委召开各"口"负责人紧急会议,部署全市性的"反击"。

晚上,又召开各学校工作组组长紧急会议,部署学校"反击"。

在这三次紧急会议上,市委几个主要负责人的言论是:

张一樵说:当前"学校力量薄弱",我们已经"控制不住",因此,"要发动左派连夜贴大字报",立即"把跳出来的都抓住"……

成克说:现在干部对"六六"事件的精神状态是"前怕狼,后怕虎,不敢理直气壮",因此,我们要发动广大干部"把力量组织起来,除去不能丢的工作以外,要倾巢出动,把学校抓住"……

解杰说:凡是到《贵州日报》贴大字报的人"必须反击",要在"三天之内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解杰还特别强调,对工交、财贸系统"决不能麻痹",因为这两个系统,究竟是谁坐天下,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韩子栋说:"光说只听毛主席的话,这是一句反动的话。《贵州日报》是正确的。"对报社提意见"是反动的矛头","是对着省委的",因此"革命者一定要反击","是党员,不拥护省委的,开除党籍"。

六月九日

各系统分别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昨日"紧急会议精神"。

女中工作组组长秦延海启发诱导学生喊"拥护省委","谁攻击省委,我们与他们作拼死斗争"的口号,同时,勒令十五位送大字报到贵州日报社的革命学生写检讨。

市工商局董东海等三人,六月八日到贵州日报送大字报,市委工作组勒令他们写检讨,两人写了,董拒绝写。

妇幼保健院工作组开会斗争陈爱华。

市委文革通报批评"工交系统有些企业对反击行动不快,领导不力"。

自杀一人。

六月十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张一樵、成克、解杰、丛亚凡、韩子栋主持。着重"研究当前文化革命形势,分析敌情,部署下步工作"。

会上,张一樵说:前段我们对"敌情"没有很好研究,只想到"闹事",没想到机关和部队也在搞,现在替汪小川说话的人不少。今天,就是要讨论一下"敌情",看怎么办?二十几个中学情况怎么样?机关怎么样?厂矿怎么样?在这个会上,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玉奎、云岩区委书记孙建修、工交二部副主任郑玉侠、财贸部主任傀永忠、统战部副部长李灿云、南明区委书记王忠臣,宣传部副部长穆颖等十四人,汇报了各系统的"敌情"。王玉奎说:这几天,全市跳出来的"敌人"有128人,但还是"处在暴露时期"。前天晚上,公安局已布置了"反击"的各项工作。

会议决定:要继续"发动群众","反击攻击《贵州日报》的牛鬼蛇神","要跟踪追击"、"乘胜追击"、"把根子挖出来"。张一樵还提出要选择三张大字报印个材料发下去,于是臭名昭著的"六·十"通知出笼。

六月十日发生自杀事件五起,死亡一人,"逃跑"四人。(按:所谓"逃跑",一是被公安局逮捕,二是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下暂时外出躲避。下同)

到一八五厂实习的"北航"教师寇百万等九人联名写信责问省委在文化革命运动中是什么态度?该厂工作队请示市委后,确定组织"反击"。

今天,十中、十八中、二十一中、新华书店计划发行部、市委组织部、柴油机厂等单位,都对革命群众进行了反击。

六月十一日

市委工交一部、工交二部召开厂矿企业领导干部紧急会议,解杰亲自出马,作反击的动员报告,他在会上特别表扬了有些单位对市委紧急会议精神"行动迅速,火力集中,反击有力",批评了一些单位。

文化、教育、卫生各局党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攻击《贵州日报》,攻击贵州省委"的群众展开反击和斗争。

今天,自杀五起,死四人,"逃跑"二人。

六月十二日

张一樵、成克、丛亚凡、解杰主持召开文革领导小组会议,扩大文化系统部分负责人参加,"着重研究运动重点对象的材料",会上,张一樵叫大家讨论:"省委批判汪小川对不对?《贵州日报》批判汪小川对不对?"之后,张、丛对文化系统如何组织反击作了"重要指示"。

今天,云岩区委召开千人斗争大会,斗争两个小学教师;南明区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斗争了十九人;文化系统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斗争杂技团支部书记李秀旗;财贸系统"揭开了董东海的盖子","全系统展开了全面反击";市东路小学教师张市琴,十六中教导主任陈登松被公安局"依法"逮捕。

晚上,工交一部召开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交流一八五厂镇压革命群众的经验,丛亚凡到会作了"指示"。

今天,自杀四起,死二人。

六月十三日

全市开始"转人查上当",少数单位"开始有领导、有控制地顺藤摸瓜,挖根子"。

永恒仪表厂技校科四位革命职工对市委文革批转的三张大字报发表不同意见,肯定这是革命的大字报,并向市委提出质问,市委和厂党委闻讯心惊胆战,立即组织"辩论""反击",但这四位同志坚定表示:"一定要把这三张大字报寄到中央去。"

晚上,张一樵、成克、丛亚凡、解杰,听取文革办公室巡视组的汇报,张一樵指示文革办公室"凡是没有组织反击的单位,要组织群众进行批判,抓住重点,理直气壮地驳倒他";已经开始反击的单位,"要做好分化工作,加强对敌斗争"。

今天,自杀二起,死一人,"逃跑"三人。

六月十四日

张一樵、丛亚凡到五中,成克、解杰到棉纺厂"检查"工作,具体研究重点单位的反击问题。

云岩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五日这期间的"反击"问题做了研究和安排。

市委文革办公室通报批评国营贵州烟厂、贵州水泥厂、橡胶总厂不组织"反击"。

今天,自杀死亡二人,"逃跑"一人。

六月十五日

上午,张一樵、成克、丛亚凡、解杰继续到重点单位督战。

下午,张、丛召开市委文革办公室和文教卫生系统领导干部会议,会上,他们提出对三张"反动"大字报,一定要"抓住重点,据理批驳,批深驳透",一定要"把牛鬼蛇神挖出来",并指示文革办公室立即"组织抓好几个典型经验"在全市推广。

丛亚凡亲自主持研究文革办公室黄英常(宣传部科长)起草向省委汇报全市组织"反击"的报功材料。

南明区委对趋侨黄雄组织批判斗争。

今天,自杀四起,死一人,"逃跑"一人。

六月十六日

财贸、文教系统召开基层领导干部和工作组组长会议,贯彻张、丛"指示",对运动"重新作了部署"。

晚上,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均到会)传达省委的"指示",部署下步工作。这次会议确定,对"跑出来的人"可以"采取隔离反省的办法"。

今天,自杀四起,死三人,"逃跑"一人,公安局"依法"逮捕二人。

六月十七日

张一樵、成克、丛亚凡主持召开文革领导小组会议,着重"总结前段反击的经验"。

云岩区委召开干部大会,批评一些办事处和派出所组织"反击"不力。

南明区委召开会议,"总结前段反击战的成绩,并根据市委的指示精神,对下步工作作了部署"。

卫生学校311班革命学生贴出《一定要把黑店揭穿》的大字报,工作组一片惊慌。

今天,自杀四起,死二人,"逃跑"一人。

六月十八日

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丛亚凡在会上作了进一步"反击"的动员报告,他提出凡是到贵州日报社贴大字报的,就是"攻击省委","就是牛鬼蛇神";对这些人,"不仅要组织斗争","还要顺黑藤,摸黑瓜"。

下午,财贸系统、工交系统、南明区委、花溪区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传达贯彻丛的"指示"精神。

由于白色恐怖统治着各个学校,各中学今日全部停课。

今日,自杀四起,死二人,"逃跑"一人。

六月十九日

成克、丛亚凡召开会议,审查文教系统"重点人物"的批斗材料。

文化、教育系统召开工作组组长紧急会议。

今日,自杀三人,均死,"逃跑"二人。

六月二十日

张一樵、成克、丛亚凡到乌当区检查"反击"的情况,丛在工作组组长会议上作了"指示"。

解杰主持召开工交一部七个企业领导干部会议,研究审查对"重点对象"的批斗材料。

今日,自杀三人,死二人,"逃跑"三人。

六月二十一日

今日,自杀四人,死二人,"逃跑"四人。张一樵、成克、丛亚凡、解杰主持召开文教、财贸、工交一部负责人会议,张、丛提出文化革命与四清的关系是"文化革命是四清的复查或补课,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文化革命是把对敌斗争提前了"。并强调"对少数反击、查上当搞得不好的单位,要集中力量加以解决"。

晚上,召开各"口"负责人会议,财贸"口"请示排队问题怎么办?丛亚凡答复:排队都要排,各"口"要排局、公司一级,市委各部委,政法机关都要排。

六月二十二日

苗春亭、成克、丛亚凡到花溪检查"反击"情况,三人听取区委书记吕俊峰和宣传部长李树芳的汇报,最后三人强调"要把矛头对准敌人,抓住敌我矛盾",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同意小学教师要搞集训。

工交一、二部进行休整,贵钢、华丰帆布厂、手管局举办训练班。党群、政法、农林、文教系统总结前段"反击"的成绩和经验。

今日,自杀三起,死二人,"逃跑"三人。

六月二十三日

上午,张一樵、成克、丛亚凡、韩子栋主持常委扩大会议,由团市委副书记李朝云,传达胡克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报告",决定下午开紧急会议传达。

下午,张一樵、丛亚凡主持召开工作队干部大会,由李朝云传达贯彻胡克实在北京镇压学生运动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丛提出两个问题:(1)文教系统各工作组力量比北京市派出的工作组单薄,决定再从市委各部和市级机关再增派一部分人。(2)要抓好人员的排队工作,学校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都要排。教员也要排。标准就按《二十三条》四类排。

晚上,五中工作组组长刘超向丛亚凡系统汇报该校镇压革命学生的情况,并商讨下一步的对策。华成胶鞋厂四十多名职工联合贴出一张署名"众声"的

革命大字报。

今日,自杀一起。

六月二十四日

张一樵、丛亚凡主持召开四个区和教育局的负责人会议,确定在小学教师中都搞集训。

贵钢、棉纺厂、明星锁厂、农机修理厂、搪瓷厂、华丰织布厂、玻璃厂、农药厂等单位召开大会,动员进一步"反击"。贵阳电石厂在"反击"中,遭到革命工人的坚决抵制,由于"出师不利",引起该厂和工交二部领导人惊慌,工交二部文革领导小组立即决定,明日召开干部大会,对运动"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进行部署"。

晚上,张一樵、成克、丛亚凡召开各校工作组组长会议,确定各中学这次一定"要把敌人斗倒",然后"从上到下要大改组"。

今日,自杀一人,"逃跑"一人。

六月二十五日

丛亚凡召集八中、九中、十九中、二十二中、贵师等五个学校工作组组长汇报,五学校工作组组长共同提出目前"工作组力量太薄弱",从同意"要充实加强"。

工交二部召开工作队长、企业领导干部会议,郑玉侠对电石厂、民修一处"反击不力"进行批判,并部署了下步工作。

市委组成工作队进入华成胶鞋厂,对"众声"大字报实行围剿。矿山机器厂到今天为止,共斗争"重点对象"十四人,有八人宣布停职反省,此外,还排出了八名"重点斗争对象",该厂十七个支部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都有斗争对象。

永青示波器厂于六月十日迁来贵阳,因为对市委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指示"贯彻行动较晚,工交一部通报批评该单位"不认真按党的政策办事",厂党委提出"不准打击革命群众",部里批评该厂"乱出点子"。

今日,自杀两人,均死。

六月二十六日

教育局文革办公室向丛亚凡汇报中学领导干部的排队情况,丛亲自和他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排队"。

两城区委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小教集训问题,他们提出在小教中要"捣黑线,倒黑旗","给予敌人毁灭性的打击"。

六月二十七日

解杰召开棉纺厂、化工厂等六个企业领导干部会议,总结前段"反击"的经验教训。解杰提出今后要"总结经验,鼓舞斗志"。"把一切牛鬼蛇神都挖出来","斗争面

是百分之一、二、三”，要“大会斗，小会斗”“面对面的斗，背靠背的斗”“不断收集材料，核实材料，不打消耗战”。

市委工交一部决定对“问题多”的单位“加派力量”。八八四二工地拘留一人。

财贸部召开工作组组长会议，解决工作队的右倾问题。

云岩区委召开文教系统干部大会，孙建修作小教集训的内部动员报告。

晚上，张一樵、丛亚凡与教育系统负责人总结前段“反击”的经验教训。

今日，自杀三人，死一人，“逃跑”一人。

六月二十八日

丛亚凡、解杰分别召开机关党委扩大会议和市委各部委、文化系统负责人会议，在这两次会上，确定要对机关干部立即排队。

华成胶鞋厂十一位革命工人组成战斗小组，揭发批判工作队的问题，工作队请示市委，解杰指示说：回厂后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和对策”，开始对革命工人进行镇压。

市委工交一部派工作组进入贵阳制药厂。

今日自杀三人，均死。

六月二十九日

张一樵、成克、丛亚凡听取了一中工作组在师生中揭发“牛鬼蛇神”的“经验”的汇报，三人认为这个“经验”很好，确定由前文革办公室主任赵德山亲自出马，立即把这个“经验”系统总结出来。

云岩区委召开机关干部动员大会，号召干部“要大胆揭发牛鬼蛇神……”

六月三十日

卫校411班革命学生对党支部书记万利贴大字报，工作组立即组织反击。

七月一日

各区、各“口”工作队进入整训，同时进行下步批判“重点”的准备工作。

工交二部重新进行排队，并加强了“重点对象”的内查外调工作。市委文革办公室继续总结一八五厂镇压革命群众的“典型经验”。贵阳酒厂召开斗争大会，工交二部文革办公室在《简报》上介绍了他们的经验。

贵师工作组挑动学生斗学生。

七月二日

市手管局新筑鞋厂职工贴出揭露党支部的大字报，市委诬蔑是“坏人闹事”，是“向厂领导进攻”，工作队立即进行镇压。

南明区召开千人大会，正式“动员”小学教师集训。

市委农林政治部召开农林系统领导干部会议，研究了市管干部的排队问

题。

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日自杀八人，死亡六人，“逃跑”一人。

七月三日

解杰召开工交系统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传达省委地书会议精神（主要内容是文化革命的有关问题）。

七月四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张一樵、成克、丛亚凡、解杰、韩子栋等参加了会议，在丛亚凡传达李大章的“指示”后，张一樵说：“今天谈的，回去再不往下传达了。”

教育系统各工作队根据市委《文革简报》第九期的精神，派人四处出动，大量搜集整群众的材料。

南明区委组织了一支庞大的“文教工作队”，加强了对小学教师集训队的控制。

市委城市基建政治部召开文革领导小组长会议，贯彻解杰的“指示”精神（具体内容不详）。

七月五日

丛亚凡主持召开了文革办公室办公会议，提出两项任务：(1)重点抓工交、财贸系统的情况；(2)在中学选择一两个突出的“重点对象”进行斗争。

七月六日

成克到川剧团、越剧团督战。

七月七日

市委工交一、二部总结“反击战”的经验，并统计了全系统共揭出“重点对象”一千一百零一人，其中开会斗争了一百零八人。

卫生局党委召开工作组组长和各单位支部书记会议，总结、交流“分化”革命群众的经验。

评剧团张守先等七位同志集体写了一张向当权派开火的大字报，工作组发现后，立即请示文化局党委书记武克彬，武克彬命令工作组把张守先同志关起来，由工作组看守。

七月八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张一樵、丛亚凡、解杰、韩子栋、杜竹林等参加了会议，讨论并决定了郊区工委领导干部的配备问题。

下午，丛亚凡召开文化系统工作组组长会议，由文化局、京剧团、川剧团、杂技团工作组长汇报他们镇压革命群众的情况。会上，丛亚凡强调指出：剧团的中心问题是“夺权”问题。

财贸政治部、城建部、农林政治部所属单位中，有三十一个单位开始大搞"对敌"斗争。

云岩区委训练了一百二十三名工作队员，为小学教师"集训"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七月九日

工交二部召开各局局长、工作队会议，决定在海光皮鞋厂、手工业系统、交通系统各选择一个"重点"，总结镇压革命群众的经验。

城建部文革领导小组召开干部大会，传播公共汽车公司、房管局等单位镇压革命群众的经验。

农林政治部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介绍水电局镇压革命群众的经验。

七月三日至七月九日自杀十二人，死亡五人，"进跑"二人。

七月十日

丛亚凡召集三中、四中、八中、女中、贵师等五个学校工作组组长会议，督促工作组抓紧进行排队，要求工作组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分化群众"，"深挖牛鬼蛇神"。丛亚凡说"排队工作要抓紧，赶前不赶后，要在八月底基本结束"。

云岩区委召开"动员"大会，小学教师开始"集训"。

七月十一日

上午，成克、丛亚凡召开卫生系统工作组长会议，会上，卫生学校和四个医院的工作组作了专题汇报。

下午，丛亚凡召开财贸系统工作组长会议，交流扩大镇压革命群众的经验。

今天，全市共贴出大字报四万二千一百九十二张，其中揭发批判所谓"重点人物"的有二万五千八百九十二张，占总数的61.4%。

七月十二日

张一樵召开工交系统文革领导人和工作队长会议，部署进一步加强"反击"的问题。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庚申召开党群"口"各单位负责人和工作队长紧急会议，批判市人委办公厅和统计局干部中的"厌战"情绪，研究下步工作的具体措施。

七月十三日

市委工交二部派人到针织厂、化工原料厂作"敌情"调查。

到今日为止，财贸系统共对四十七个"重点对象"进行了"对敌斗争"。

七月十四日

朱庚申再次召开党群"口"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布置加强机关的"反击"。

贵阳印刷厂革命工人揭发厂长冯殿阁的严重错误，但支部书记王安忠包庇了冯的错误，并与冯互相勾结，对揭发问题的革命工人进行压制。

七月十五日

市委召开全市基层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对外叫做"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会议），张一樵、成克、丛亚凡、解杰、韩子栋出席。这是一次继续动员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大会。会上，他们提出"要解放一批人，争取一批人"，说这样做对斗争"敌人"更有利。张一樵等人还提出，学校的"对敌斗争"，一定"要抓紧"，"要在八月中旬搞完"。各区、各系统分别召开紧急会议，贯彻"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会议"精神。

棉纺厂工作队提出：把干部的问题搞完后，就挖工人；外部问题挖完后，就挖内部。并说：一天总得挖一两个问题才行。

七月十七日

花溪区开始"集训"三百九十七名小学教师。

针纺公司保管员罗淑芬被迫自杀。

七月十八日

张一樵、成克、丛亚凡、解杰、韩子栋主持召开常委会议，批准工交一部成立十个工作团，六个工作队；工交二部成立七个工作团。会上，工交二部第一副主任郑玉侠提议立即撤销市总工会主席王志德的针织厂工作队职务，张一樵、成克等人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指示"工交二部先在工作队内搞两天，整理一个材料报给市委，然后再交给市总工会机关去整。

丛亚凡召开文革办公室人员会议，研究全市"转入大辩论（大斗争）的问题"，丛亚凡叫嚣说："教育系统要在八月十五日以前，把所有牛鬼蛇神（包括本届高中毕业生）都揪出来。"

解杰召开工交系统工作团长、工作队长会议，强调各单位的"对敌"斗争一定"要斗得准，斗得狠，不要草率收场"。

农林政治部召开基层领导干部会议，确定把农林局、水电局、三江农场作为这次文化革命的"重点"去搞。

今天，组织部、城建部也分别召开工作队长会议。教育局还召开文革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七月十九日

上午，丛亚凡到乌当区督战。

下午，丛亚凡召开各中学工作组组长会议。

农林政治部召开五个新单位的领导干部座谈会，会上确定对明显的"敌人"要立即开展斗争。

南明区委为了加强对小学教师"集训"的控制，决定再从各部门抽调一批干部，充实文教工作队。

七月二十日

卫生学校工作组把学生贴出的大字报，归纳为十三个大问题，一千二百五十四个小问题，并印刷成册，交给学生辩论，挑动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

七月二十一日

花溪区召开财贸系统干部大会，市文化局召开工作组组长会议，总结交流斗争革命群众的经验。

七月二十四日

成克、丛亚凡召开教育系统工作组组长会议，会上决定要在高中三年级学生中立即"清理反动学生"，并强调各中学的"对敌"斗争"要争取八月六日以前完成任务"。

七月二十五日

张一樵、成克、丛亚凡、解杰、韩子栋主持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新成立五个局的领导干部配备问题。

丛亚凡召开四个区负责人会议，各区汇报了小学教师"集训"中的"敌情"动态，丛亚凡指示：小学教师"集训"，要立即加上"开展对敌斗争"这项任务。

到今天为止，教育系统有十二个单位开展了"对敌"斗争，占全系统单位总数的77%。

七月二十六日

市委各部向市委汇报了"对敌"斗争的进展情况：

1.多数单位在做准备工作，少数单位进入斗争。市属三百五十五个单位中。七十七个单位开展了"对敌斗争"。

2.六月六日至七月二十六日，全市共贴出大字报一百三十万张，共有一万三千一百八十八人被点了名，其中"重点对象"三千一百九十六人。

3.六月六日至七月二十四日，自杀七十五人，死三十人；"逃跑"三十五人；拘留和逮捕二十人。

下午，丛亚凡召开文化系统工作组长会议，决定在全系统立即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

七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郊区区委文革领导小组决定：加强区公安分局、税务局、工商科、养羊农场、手管局等单位工作组的力量。

张一樵、丛亚凡、解杰召开工交系统干人大会，传播一二八厂、一八五厂、贵钢、房管局机关、邮电局机关镇压革命群众的经验。

七月三十日

我们伟大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命令立即撤销学校工作组。市委公然抗拒，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明撤暗不撤。张一樵等人提出：学校里的工作组，要把文革筹委会建立起来以后才"撤出"，但每个学校"还要留下联络员"。

七月三十一日

市委确定在一中、四中搞建立文革筹委会，留下联络员的试点。

（这份材料是从贵阳市委文革办公室、市公安局在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中收集的资料中摘编出来的）

第五章　贵州夺权前的“革”与“保”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在北京清华大学附中。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批准广播北大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全国上下为之震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从此在全国展开。就在这一天，清华附中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表示“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三个字后面有一百多人签了名。

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的思想指导下，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重申了他们的造反理论。7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首先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给斯大林祝寿时讲过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话被称为“最高指示”，很快被谱曲成为“语录歌”在全国传唱得妇孺皆知。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热烈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立即公布了毛泽东的这封信。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大中学校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8月10日，毛泽东到中央设立的群众接待站会见首都群众，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接受跑到天安门城楼上去的中学生宋彬彬(宋任穷之女)给他戴上的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

首次接见检阅了广场上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8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宋彬彬。’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我说：‘是。’主席亲切地说：‘要武嘛！’”

接受检阅的学生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挥动大手，用带湖南音的普通话高呼“红卫兵万岁！”

毛主席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首都红卫兵立即走出学校，走出北京，北上、南下、东进、西征，开始了赴全国各地“煽风点火”的大串连，而全国各地红卫兵则纷纷涌进北京城。到11月下旬，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1100万人。

8月下旬，首都红卫兵小将走出学校，涌上街头，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向旧世界宣战，扫除“封、资、修”。这一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贵阳市出现街道、店铺易名风，抄家打砸之风也盛行一时。[附录4]

9月5日，中央文革发出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做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这一数字官方公布为1772人。

7月29日，取名“鬼见愁”的《血统论》对联在北航附中出现，很快流传开来。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自此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和“黑五类”或“黑七类”，形成前一类对后一类的蔑视和歧视。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大字报坚持“鬼见愁”对联，很快成为《血统论》的代表人物。12月5日，《血统论》红卫兵成立“联动”即“首都红代会联合行动委员会”，斗争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六次冲击公安部。1967年1月，“联动”被宣布为反动组织，100多名“联动”分子被捕，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但中央文革小组重申“联动”是反动组织。1967年5月29日，以“联动”为核心的老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红卫兵万岁”大会。

与谭力夫相反，遇罗克针对《血统论》写出《出身论》予以批驳。《出身论》认为不管什么出身的人都应有平等的政治地位；而《血统论》者则认为这混淆了阶级斗争界限，是在搞阶级调和。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指责《出身论》是"反动文章"。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枪决。

（二）贵州最早的红卫兵组织

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贾启允8月22日就派人到贵阳医学院召开有各大专院校师生代表参加的上千人大会。应贵阳医学院红卫兵筹备组织的邀请，贵州大学师生代表当天从花溪步行进城也到会祝贺。会上宣布成立了贵阳医学院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红旗"。这是贵州正式公开成立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以贾启允为组长的省文革小组树立的样板。贵医"红卫兵·红旗"的群众基础是"六·六"事件中的受害者。省文革小组为他们公开平反，他们因此在社会上拥护以贾书记为首的贵州省委，在校内炮轰以陈远吉为首的院党委。8月27日，对贾书记不满的另一红卫兵组织"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在贵医成立。贵阳医学院于是在贵州高校中最早出现对立的两派。"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在校内保陈远吉为首的院党委，在社会上炮轰贾书记为首的贵州省委。

在此之前还出现过"自发"的"保"字号红卫兵，后称"号码兵"。在贵阳师范学院"六·六"事件之后，以贾启允为组长的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向师院派出以省委统战部长王林岗为首的工作组，改组了师院党委，同时在师生中大抓"反革命"黑帮等。到七月底八月初根据中央指示撤出工作组，同时在各院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运动。由于工作组仓促撤离，被打成"反革命"黑帮的师生没有得到一个说法，仍然受压。代替党委的文革委员会立即在师生中组建左派队伍，仿照北京红卫兵的"自发"形式，在八月初以后，一些大、中学校（包括贵阳师院）出现了最早成立的"保"字号红卫兵，他们上保"老干部"，下扫牛鬼蛇神，有时深夜悄悄集合出动对"五类

分子"抄家揪斗（当然有"公安"的指点牵线）；更多的是中学"红卫兵"杀向社会，砸烂旧式招牌，清除"四旧"服饰（如剪裤脚、挖鞋底之类），砸破旧封建建筑物，冲上贵阳市黔灵山等处，将旧庙观、神坛，统统推倒、砸烂，如黔灵山上的庙宇被全部砸毁成只剩几根梁柱子的空架子。在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全国各地百万红卫兵时，贵州是由各院校"文革"领导推选组织的"保"字号红卫兵上京，回来后在9月8日成立了"贵阳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因他们的红卫兵袖套上印有编号，后来被称之为"号码兵"。

（三）南下串连队与"八·三一"、"九·五"事件

8月28日，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二队16人到达贵阳，住贵阳医学院。此前到达贵阳的12人为南下一队，住省委招待所。南下二队后来发展到40多人。

南下二队张甦写出了"六问贵州省委"的大字报，提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继后又提出为贵阳"六·六"事件翻案。

8月31日晚，首都南串队和地化所、师范学院等200多人到《贵州日报》送大字报，质问《贵州日报》刊登毛泽东为《新北大》和《中国妇女》刊名题词为什么不套红，遭到数千人围攻、斗争，地化所有11人被打成"反革命"，支部书记被迫自杀。这一事件被称之为"八·三一"事件。

地化所全称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1966年2月从北京搬迁到贵阳。所里不少人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留学生，他们与北京联系密切，消息灵通，不少人来到贵州就在"文革"中崭露头角，孙昌德、徐英年、蔡秀成、郭其炳、卢焕章、成宗礼等均系活跃人物。

9月5日，首都南下串联队和省商校、省艺校、贵阳女中等校学生约3000余人到省委大楼前要求贾启允接见，回答"文化大革命"中有关问题。贾启允躲到省军区拒不见面。这批学生便在大楼前开展批判会，静坐示威。省公安厅出动100多名"机关红卫兵"保卫省委大楼。省文革领导小组如临大敌，以上街宣传"十六条"的名义，调动干部、工人、居民12万人，对这批学生进行分割、围攻、斗争，小

圈套大圈、实行车轮战、高呼"打倒牛鬼蛇神",最后强迫检讨。

这激起了更多中学生参加斗争(此时大学生们已上北京)。从9月5日至8日,贵阳市街头大街小巷、白天黑夜都在围斗本地造反派和南串队学生,到处都有穿着纸衣的"牛鬼蛇神"。这一事态被称为"九·五"事件[附录5]。

9月7日,南下串联二队在省委三楼会议室与省委领导张健民举行座谈会,张甦等就"九·五"事件追究省委的责任。

9月17日、中央文革贵阳记者组张子良等三人到达贵阳,以《光明日报》记者名义驻省军区了解贵州"文革"情况。

(四)大中学生上北京见毛主席、赴外地大串联

8月31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二次接见红卫兵50万人。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党中央认为革命串联好得很,大力支持革命同学进行革命串联。党中央决定让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全部和中学生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9月2日,贵州工学院上千人到省委请愿,要求省委准许学生到北京串联、见毛主席。贾启允接见了贵工学生,同意分三批赴京。9月3日,贵工学生除"黑五类"害怕尚在观望外,其余学生基本都到北京去了。

9月12日前,贵阳地区大专院校学生几乎全部上京,中学生也陆续外出大串联。

9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贵州学生光荣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在天安门城楼讲话:"红卫兵战士们……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周总理要求:"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机

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串联。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言的还有外地和北京红卫兵代表。

怀着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的幸福心情,贵州省各院校学生以这一天命名,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如贵州大学九一五革命造反团、贵州工学院九一五红卫兵团、贵州农学院九一五兵团等。贵阳师范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则定名为六六战斗团。贵州大学九一五革命造反团以历史系学生孙元书为发起人,于9月16日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宣告成立。贵州工学院九一五红卫兵团由刘明镜和贵工子弟中学孙笃强在北京钢铁学院南串队鼓动下发起、成立。

9月-12月,贵阳地区大中学生的大部分都到首都和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去了。

坐车不要钱,食宿到处有安排,大家都尽可能不放过这空前绝后的良机。以贵州大学九一五"硬骨头战斗组"为例。他们一行四人10月18日离开学校,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全国各地大串联,12月17日返校。他们串联的路线是:

贵阳—重庆—成都—西安—铜川—延安—西安—北京—天津—齐齐哈尔—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烟台—青岛—南京—上海—南昌—长沙—韶山—长沙—贵阳

他们这次大串联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火车,但从铜川到延安往返为汽车,从大连到烟台为轮船,从长沙到韶山70多公里为步行串联,返程为汽车。

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号召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赴外地大串联陆续返校的贵阳地区大专学生们积极响应号召,纷纷到工矿企业去,与工人老大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搞"文化大革命"。

(五)工人运动蓬勃兴起

9月-12月,贵阳地区大中学生大都到外地大串联去了。在南下串联队的帮助下,贵阳地区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九·五"事件诱发一

些革命工人开始起来支持造反派学生，并自发组织起来闹革命。

9月14日，工人第一个炮轰派组织"贵阳复员转业退伍军人战斗团"成立。后遵照中央关于复员转业退伍军人不宜单独成立造反派组织的指示，更名为"贵阳战斗团"。贵州新华印刷厂职工袁昌福为负责人。

接着，出现了"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后来号称有10万之众，以贵阳市人民会场为驻地。赤卫队头头黄世明是贵阳市建筑公司泥水工。

10月初，毛泽东思想工人红卫军、毛泽东思想红色工人战斗团先后成立。

至夺权前，红卫军迅速发展成势力最强大的工人群众组织，号称33万之众，总部设在贵阳医学院，后迁驻省总工会。其基层组织遍布贵阳地区两种所有制大小厂矿以及若干专州县。红卫军头头李铁乃是贵阳市一家集体小厂南明汽车修配厂工人，湖南祁阳人。当红卫军迅猛发展壮大起来时，省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李再含在公开场合公开支持红卫军造反。

南下串联队在贵阳带头"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煽动作用很大。他们支持和鼓励各工人炮轰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工人控诉省市委罪行大会主席团"。

11月25日，"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贵州分部成立，驻贵阳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这是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造反组织，旨在争取平等权益，成员3000多人。

(六)"革"与"保"的对立

9月7日，李井泉来到贵阳，向贾启允、李再含等传达了陶铸对贵州省委的评估："省委是'四清'后的新省委，大方向是正确的。"

为了应对炮轰派，按照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指示，9月8日成立了贵阳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9月28日又成立红卫兵纠察大队，因其红卫兵袖套上编有号码，被称为"号码兵"。李再含担任"号码兵"的政治辅导员。总部设在中华中路人民会场内。出版《红

卫兵报》。这是保派的总部，存在的时间很短。

10月9日，与保派红卫兵总部对立的"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成立，设在原省政协办公楼内（北门六广门外），司令是贵阳医学院"工尖兵"代表赵贵起(女)，副司令是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朱元礼，成员还有贵州工学院李承宗、贵州大学叶昌华、贵州农学院胡生贵等。

朱元礼推荐邱富伦到司令部创办和主编了《红卫兵》周报(比保派的《红卫兵报》少一个"报"字)，从第1期至第22期，直到1967年3月因为省革委打击学生中的"三股反革命逆流"，邱富伦退出红卫兵司令部回到贵阳师范学院，被中文系推荐到学院红代会任常委。由于观点不同，被排斥在省红代会代表之外。后来，邱富伦等成了"四一一"冲击省红代会的师院带队人(还有傅鸿烈等人)，并成为贵阳大中专学校"四一一"联络站的主要召集人。("四一一"联络站于1967年4月11日成立，地点在师院物理楼)

10月15日，为了对付炮轰派，按贾启允指示，成立了工人纠察队联络站，由省总工会主要负责人具体负责上下联络。后于11月15日正式成立了贵州省工人纠察队，其联络站设在贵州省总工会。

"号码兵"和工人纠察队是保守派组织，他们的口号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确的"；"贾书记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

工人运动两大派组织出现后，形成对立，贵阳地区就接二连三地发生大规模工人冲突和流血事件。

贵医"红卫兵·红旗战斗团"和"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的成立，在贵州高校中是最早出现的两大派对立的组织；贵医因在"四清"和"文革"中都是试点单位，这两派在校内和在社会上的"革"与"保"都表现出两面性并尖锐对立。

"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是炮轰派(即造反派)的代表性口号。

(七)向资反路线猛烈开火

《十六条》发布后，8月底9月初，南下串联队曾在贵阳地化所

和贵阳市省府路交际处小礼堂组织不大的内部批斗会，先后揪斗了贾启允和陈璞如。初次揪斗，火药味很浓。邱富伦参加了对陈璞如的批斗会。

9月29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十六条”决定在运动中不整学生的通知》。通知说这个规定也适用于工人。

10月1日，《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发表，指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

10月5日，中央批转军委关于平反问题的紧急指示。

10月6日，首都召开全国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和江青出席大会并讲话。

迫于形势，省文革小组先后三次发了平反通知和命令，但到10月6日仍认为“六·六”事件是“反革命逆流”。

11月2日，贾启允被揪到省人民委员会广场，被迫承认“六·六”事件是“革命事件”。

11月5日，贾启允在贵阳市群众大会上作检查。

11月6-17日，“贵州工人赴西南局造反团”前往成都“炮轰西南局”，途经重庆遭到当地保守派围攻，到成都后提出“打倒李井泉”。

11月中旬，炮轰派从贵州省军区的地下室揪出贾启允进行批斗，并提出“打倒贾启允”。“工纠”开车在红卫军总部门前出车祸，压死2名红卫军成员的“一二·三”事件发生后，红卫军还将贾启允扣押起来，要求解散“工纠”。

本章参考资料

1.江涛《红卫兵狂飙》
2.王友琴《已待的红八月》(《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3.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4.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5.《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6.当代贵州简史编委会《当代贵州大事记》1966年
7.贵阳市“文革”大事记(1966年6月6日-7月31日)

8.1966年9月5日部分学生包围省委办公大楼情况的简报(附录8)
9.黄大红缓枪《贵州“文革”全过程大事记(1966年5月-1967年8月)》
10.杨文华《那样的年代，那样的事儿——“文革”日记摘抄》
11.邓振新《“文革”年代的难忘经历》
12.邱富伦《给〈贵州风云〉提供若干补充资料》
13.张魁《我们与贵州“四一一”》

附录4　红卫兵破“四旧”时毁坏了中国多少珍贵文物？

伴随着“文革”风暴的出现，破“四旧”运动兴起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四旧”，中央没有说明。1966年8月18日，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

从这天起，受毛泽东接见的30万北京红卫兵“小将们”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他们的目光从店铺转向包括历史文物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目标。

红色的风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就有十万多户抄了家。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的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新闻舆论对于红卫兵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好得很》，社论指出：“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在红卫兵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账拿出来展览……”

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广阔农村。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抄家，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

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文物古迹，图书字画，成为破"四旧"的重点打击对象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了，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1958年第一批确定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竟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1966年的八九月间。

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新疆吐鲁番附近的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但它们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红卫兵却将剩下的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者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使这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

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也遭到清洗。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遭到红卫兵抄家厄运。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善本159本，唱片1083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善本4本。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私有，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请示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

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对于这个"致敬电"，毛泽东未予置词。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神州大地。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运。

"时髦"的改名浪潮

为了显示"革命"，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改名浪潮。

改名运动早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就已经开始了。这天，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把一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宋彬彬回答后，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

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礼、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在北京，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全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同仁医院被改成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被改成反帝医院，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道"，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所在的"光华路"改为"援越路"。

在破"四旧"运动中，位于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也受到红卫

兵的“革命”,8月19日晚,上千名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将挂在店门口已经70余年的“全聚德”的招牌砸烂,换上了由红卫兵事先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牌子。红卫兵把原来挂在店铺里的山水画全部撕毁,换上了毛主席画像,又推举出10名红卫兵当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长驻店铺。8月20日一大早,经过红卫兵小将“革命”的新型烤鸭店诞生了。门前贴着一张醒目的标语:“欢迎工农兵进餐”。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全国其他城市。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

风俗习惯大“改革”

破“四旧”中有破除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占了“半壁河山”,因此红卫兵对于这项事业投入了很高的热情。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举予以声援,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在上海,革命小将限令西餐店停业,服装、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装异服”,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被剪破一刀。与此同时,上海街头的许多西洋雕塑被砸毁,教堂被冲击。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红卫兵小将们提出,要求改变我国的现有交通规则,要变右侧行车为左侧行车,他们说右侧通行,不是革命规则,是右派分子们的规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该是左派处处通行。同时,他们还提出交通路口的指示灯也有路线问题,因为交通规则说明,红灯停绿灯行这也不符合左派的要求,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资产阶级,怎么能红灯一出现就停车呢,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对!

破“四旧”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肆虐神州的。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共400多万人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教育”去了,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衰落,破“四旧”运动逐渐烟消云散。

原题:《破“四旧”时毁坏了多少珍贵文物》
2013年08月08日来源:新华网 作者:佚名

附录5 “九·五”事件部分学生包围省委办公大楼情况简报

按:这份反革命《简报》,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资料复制。打印发省委各同志阅后再发。

贾启允
九月七日

中央并报西南局,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组:

我省九月五日发生了三千余学生包围省委办公大楼的事件。现将情况简报如下。

九月五日上午九时,北京南下串连队学生和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大部分干部,鼓动以贵阳女中、商业学校为主的部分学生,共有三千余人,包围了省委办公大楼。他们叫喊“打倒省市委”“活捉贾启允、张一樵”。他们设置几道封锁线,不准省委机关干部进出,并且冲进办公大楼,进行搜查,强占了一部分办公室,控制了一部电话机,劫走了一部汽车,砸烂门窗,破坏扩音器,割断通电线,破坏国家财产。他们围困、监视坚守工作岗位的省委机关干部,不让他们工作,不准他们吃饭、喝水,逼迫他们交出省委负责同志。当负责接待工作的省委副秘书长王立山同志向他们解释时,他们就把王立山同志推上讲台,进行辱骂、斗争。接着,在大楼前面举行“控诉省委罪行”大会。

当围困到下午七时许,省委办公大楼附近的贵阳九中的师生,见省委办公大楼被围,主动来到省委,给省委被围的干部送食物,他们没有进入会场,就被闹事的学生轰走了,市五金制配公司革命职工来宣传“十六条”,劝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也被他们赶走。到了晚上十时,有部分工人、学生纷纷前来,至十二时,越来越多。发现这个情况后,省市委负责同志立即组织大批干部,到各个路口进行劝阻,把陆续前来的工人学生劝回去了,已经进入会场的学生、工人,对于闹事的人搜查大楼、围困、辱骂干部,不准出人,不准吃饭喝水,破坏国家财产等行为,极为愤慨,一面和他们展开了辩论,一面宣传“十六条”、宣传人民日报《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并进入大楼把被包围的干部接了出来。机关干部也到会场,向群众劝说解释,并一再动员工人主动撤走。到六日晨五时,工人全部撤退以后,原来被鼓动前来围攻省委的学生,在了解真相以后也都纷纷离去。剩下一小部分人继续辩论。经过工作,于十时左右,即全部离去。撤走的工人,看到闹事是地化所的干部带头搞的,认为他们是干部,不应当同学生一起

闹事,他们就到地化所驻地(距省委办公楼很近)去质问,呼口号,要同他们辩论,后被劝说也撤回去了。

事后,经过查明,十时以后突然来的大批学生、工人,是接到九中的电话通知而来的。九中的革命师生到省委被他们轰走以后,气愤不过,用电话通知各厂、学校,来省委解围。九中高二(1)和交通学校的林应忠等五位同学,还发出"十万火急呼吁!!! "说"今天在贵州省委办公大楼前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事件!他们不准我们的省委首长吃饭,就连一般工作人员也不准吃饭,割断了省委与外部联系的电话线……情况极端严重!我们迫切要求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快出来!赶快出来!保卫我们的革命前辈!! "省公安厅接到九中电话又看到他们的呼吁传单,即向省委反映,我们才知道许多工厂、学校已经前来省委,当即进行了劝阻工作。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进入会场的工人队伍表现了高度的纪律性,严格地做到了动口不动手,除在辩论中间因争扩音器,争上讲台,一度发生拥挤,曾有极少数人被挤倒或擦伤之外,没有发生互相殴打和重伤事故。

对这一事件,各单位革命群众,正深入进行辩论,以明确是非,提高觉悟,并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按照《十六条》的规定,沿着正确的道路,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贵州省委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第六章 "全红总"贵州分部的兴亡

"全红总"[附录6]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简称。这个工人造反组织发展极为迅速,一个多月后就夺了"全国总工会"的权,进驻全总大楼。江青等人对他们表示支持,想把这股政治力量引向自己的政敌。但她很快发现这些工人们是在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号称30万人的示威游行,公开亮出自己的口号。"反解雇,反迫害,反欺压!""要平等,要同工同酬,要生活保障!"这样的宣传口号,就是"全红总"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全国有大量工人起来响应和参加的根本原因。这个工人造反组织很快发展成在全国多省都有分部的全国性组织,引起了最高当局的不安,自成立算起仅100天就被取缔。各地都有工人领袖被捕。刑期很长,几位主要领袖分别为20年、15年、10年。贵阳市建筑公司一名工人被判刑20年。

(一)一名贵州工人在京参与发起"全红总"

萧碧璜是贵阳市建筑公司工人,"六·六"事件时他在贵阳市乌当区洛湾小学代课。当天进城到贵阳市喷水池附近路过《贵州日报》社,因驻足看过学生张贴的攻击省委和党报的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他内心不服。学生们开始大串联后,他也赴京告状,被国务院接待站安排住进冶金部第二招待所。同住的人们来自其他省区,也都是进京上访的"三工",即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萧把自己在"文革"前就写出来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让他们阅读,读后大家深受启发。通过一番酝酿,1966年11月8日,"全国红色劳动

者造反总团"就在冶金部二招成立起来。发起人来自北京、江苏、安徽、广西、贵州等省市。蚌埠的杜某被推举为总指挥,无锡的季某为副总指挥,北京的王振海为秘书长,萧为副秘书长。成立大会过后,安排一些人回去组建各自的地方分部。

"全红总"成立后的当天就组织首批成员50多人到全国总工会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并给予注册登记。但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王志杰等不予理睬。因此,这一静坐就是10天,直坐到11月18日,人数则由50多人增加到300来人。王志杰等看这声势越来越大,不理睬不行了,连忙向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马纯古、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报告,马纯古又向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工交口的副总理李富春作了报告。李富春表态不要把事态扩大。11月18日,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在口头上承认了"全红总"是合法的造反组织。"全红总"成立后的第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12月4日,"全红总"发表宣言,宣布"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造现行临时工、合同工制度的反,彻底铲除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正当全国总工会党组及劳动部党组有关负责人汇报、请示和研究如何处置这一问题时,中央文革似乎又发现了一个可以进一步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新事物。他们在12月18日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时,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支持的声音。江青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主席要搞的,那只能说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工人服务,不让工人进到楼里(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像广播事业局就有500多个合同工,他们随时可以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

这次接见之后,"全红总"听闻了中央文革的支持,迅即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

(二)"全红总"在贵州率先成立分部

继"全红总"全国总部11月8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后,"全红总"的第一个地方组织贵州分部11月27日在贵阳正式成立。

萧碧璜回到贵阳后,联络到在水城修过公路的合同工毛胜年,23日一同到贵州省委,通过孙副秘书长得知省文革和省委常委11月25日晚要在交际处召开常委联席扩大会议。当晚他们到会上递交了要求省文革和中共贵州省委承认"全红总"贵州分部的报告。通过介绍"全红总"已得到全国总工会承认的情况后,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陈璞如(分管工交口)和张一樵(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在报告上签字承认"全红总"贵州分部。27日通过贵阳市总工会找到"工人联络站"负责人沈争真,由他出具公函给刊刻了公章印信,拨出贵阳市新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左侧的办公室给分部使用,并拨给额度1500元活动经费,实报实销。当天(27日),贵州分部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会议选举杨同春(中共党员)为总指挥、萧碧璜为副总指挥兼秘书长,毛胜年为副总指挥,李伯特为组织部长,邓德礼为宣传部长,杨爽秋为联络部长,赵琳为内务部长。到12月25日,贵州分部人数发展到3000多人。分部后改名为"贵州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

分部人数是通过说服单位的头头参加来计算的。头头加入,就等于他们那个单位全体加入。例如,贵州汽车修配厂的机修工人共产党员潘汉发加入了,他的那个只有几百人的小组织就算全体加入分部了。邬光顺、王秉忠两个都是共产党员,是贵阳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的,他们加入了,他们那个单位的人也就算全部加入了。谢朝锡是贵阳市甘荫塘工矿区共青团委书记,他的加入,也代表了他的手下一千多人全体加入了分部组织。

(三)江青进一步支持"全红总"

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当天是毛泽东73岁大寿的日子。当晚,江青会见了"全红总"的15个代表。参加会见的有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林彪的夫人叶群也在场。还有《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解放军报》的编辑邵一海先到,是他用车把"全红总"的代表接来的。

江青被那些中央大员们簇拥着走在最前面步入会场,所有的中央大员都在她的两边或后面。没有等邵一海介绍,她就向坐着的"全红总"代表微笑着招起手来,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好!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后面和两边的中央大员们马上就拍掌致意。当晚的那些临时工合同工的代表全部是"全红总"总部的主要负责人,会见的中央大员的人数超过了这些临时工合同工的代表人数,会见是在人民大会堂东会议二厅里,互相对坐在一起,后来被江青打电话叫来的劳动部长郗占元和全国总工会的书记王志杰反而不准坐,站到他们腿软。起码站了两个小时,最后才叫他们坐下。从晚上7点58分开始到第二天凌晨0点34分,会见长达4小时36分钟。

江青在情绪激动时发了脾气:"合同工也是无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工人,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就像包身工!""合同工在他们眼里简直就像后娘生的。"江青听了代表们控诉后流着泪说:"我流泪不是软弱,是因为看到了真正的同志!我感谢你们,你们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当代表们控诉到工人们因为被解雇后有不少投河上吊,卖儿卖女,都已经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的时候,江青哭着说:"同志们,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我对不起同志们啊!"以下也是她当场的原话:"他们都是老爷(指那些部长),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大意如下):1.

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2.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得解雇临时工合同工,必须照发工资。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上班,工资补发。3.现行反革命分子例外。"

江青最后指着这些临时合同工的代表对劳动部长郗占元、副部长李正亭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书记王志杰说:"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好好照顾他们。"

1967年1月2日,"全红总"与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签署的《联合通告》就是根据这三点来的,但第三点换了内容,前两点充实了内容。劳动部部长郗占元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书记王志杰在《联合通告》上签了字。

联合通告

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

1. 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

2. 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被解雇期间的工资。

3. 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

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郗占元签字)
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王志杰签字)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日
(以上三个组织都盖有公章)

（四）国务院宣布《联合通告》无效

《联合通告》送到北京工人印刷厂印了30万份后，正准备发到全国时，国务院来了通知不准发，江青也派了《解放军报》的邵一海到"全红总"说，最好暂时不要发了。很快，中央文革和国务院同时发出通知，叫"全红总"与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人一起将《联合通告》运到造纸厂去，全部销毁。

但萧碧璜很快将《联合通告》原件带到昆明，在昆明工人印刷厂印了4000份，从昆明发到全国。

顷刻之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在全国许多地方刮起经济主义歪风，不少工人闹转正，闹定级，闹福利待遇。一些人以江青的话为"尚方宝剑"，指着领导的脖子强令发款。一些单位，慑于江青一伙的淫威，把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甚至把1961年至1963年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资、夜班费、加班费等。

各地劳动局按照此文件的精神解决了成千上万被解雇了的临时合同工的复工复职问题，并补发了他们被解雇期间的工资。

1967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多次下令要"坚决抵制"、"反击"和"粉碎"这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并说它已经"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疯狂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元月4日，"全红总"总部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叫不准发出《联合通告》的同时，周恩来并指示"全红总"要"撤销总部，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

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通告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错误的……在中央未作出新的决定以前，仍按原来的办法进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

2月24日，中共中央宣布立即取缔"全红总"等非法组织。同

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部队逮捕了在京的"全红总"等非法组织的头头。3月2日，北京市几十个单位在钢铁学院召开了斗争"全红总"头头的大会。王振海等人受到惩罚了，而煽动他们造反的江青一伙，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依然无法无天。

（五）"全红总"贵州分部的结局

"全红总"贵州分部这一案，被抓捕26人，判重刑五人，最高刑期20年。但最后全部"无罪释放"。1967年3月4日凌晨，萧碧璜、李伯特、毛胜年、杨爽秋（女）被捕。次日，"全红总"贵州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潘汉发、邬光顺、廖蓉花（女）、王秉忠和总部成员张德明、余洪珠（女）等均被关押。

在所有被判刑的"全红总"负责人中，萧碧璜被判得最重——判有期徒刑最高刑20年，北京王振海被判刑5年，贵州籍的"全红总"成员毛胜年和石应宽被判刑15年，李伯特被判刑10年，欧阳林被判刑7年。其中除毛胜年在1969年提前"教育释放"，欧阳林坐满刑期7年外，其他几人均坐了10年以上的大牢，在"四人帮"被捕后先后平反。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三工转正定级的通知"，这三工，是指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应当说这仍是"全红总"的斗争成果。中央正式同意给全国各地的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转正定级了。"全红总"在贵阳的大本营贵阳市建筑公司的3000多临时合同工也全部转正了，萧碧璜坐牢七年出狱后回到单位受到全体工人的英雄式欢迎，党委书记对他宣布，从他还坐在监狱里的时候就转正成为了正式工，并且连升三级工资。由单位一次性给他补发了坐牢七年的全部工资。

本章参考资料

1.《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6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新高潮》

2.萧碧琪《铁窗生涯》

3. 柯云路《祖国十年》中"关于'全红总'典型事件的阶级分析"

附录6 柯云路:关于"全红总"典型事件的阶级分析

在这里,我们还将分析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出现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件。这个事件算不上"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事件之一,也常常被关注"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所忽略,然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事件。

它就是所谓"全红总"事件。

"全红总"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简称,是于1966年11月8日由部分合同工、临时工联合成立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也可以说是第一个全国性的跨省市的工人造反组织。"全红总"在北京成立,造反派头目是王振海等人。

1966年11月底-12月初,"全红总"近400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造反,占领了大礼堂,提出了他们的造反要求。12月4日,"全红总"发表宣言,宣布"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彻底铲除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正当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及劳动部党组有关负责人汇报、请示和研究如何处置这一问题时,中央文革似乎又发现了一个可以进一步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新事物。他们在1966年12月18日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时,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支持的声音。江青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主席要搞的,那只能说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里(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像广播事业局就有五百多个合同工,他们随时可以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

这次接见之后,"全红总"听闻了中央文革的支持,迅即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

1966年12月26日晚,中央文革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在人民大

会堂正式接见了"全红总"的代表。会见一开始,江青就阶级感情"充沛"地说:"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全红总"代表说:"合同工制度是劳动部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制定的。"江青立刻说:"什么劳动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让他们当科长去吧!"姚文元则插话说:"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非造这个反不可!这个制度就像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江青显得更为马列主义化地说道:"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工来减少资本的支付。"

"全红总"的代表汇报说:"我们昨天把劳动部办公地点全部查封了,今天把劳动部所属单位也全部查封了,并且向全国各地分团发出电报,把劳动调配部门全部查封。决定明天封全国总工会。"陈伯达立刻说:"封得好嘛!没有这个部照样工作!"江青更为激烈地说:"好!封得好!我赞扬你们!""你们把全国劳动分配部门全部扫掉!你们进京工人,全部住到总工会、劳动部去,让他们负责吃饭、住宿。"康生也紧跟着说:"制定合同工制度的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个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给他们解散!"

江青还以中央文革最实权人物的口气总结道:"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大意如下:1.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歧视。2.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3.现行反革命按《十六条》处理。"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负责人被临时通知到会,站在会场的一边。这时,江青对两个靠边站立的领导干部说道:"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们。"

中央文革的讲话,"全红总"立刻以大字铅印传单发向全国。

在中央文革的政治高压下,"全红总"以造反派的强硬态度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签发了1967年1月2日的《联合通告》。《通告》指出:"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1.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2.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全红总"的造反派开始揪斗领导干部,围攻领导机构,通告全国各分团展开要求补发工资和赔偿损失的造反活动。一时间,全国许多省市都刮起了被后来批判为"经济主义"的"歪风"。不仅属于《通告》内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要求兑现《通告》的规定,类似的"经济主义"要求超出这个规定扩张开来。很多地方将合

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有些地方将1961年－1963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资。

继而，大量的工人闹转正、闹晋级、闹福利待遇的纯经济目的的行为在运动中呈现出强有力的扩张冲动。这种突出工人现实经济利益的浪潮来势凶猛，立刻对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政治形势及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冲击。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意识到这是一个有着很大危险性的势头，任其发展，很可能破坏整个“文化大革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还在一线勉强维持局面的领导成员（例如周恩来）达成了共识。

政策调整后出台的一系列部署是性质明确的。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实质上就是针对“全红总”这样的潮流在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同年1月20日，周恩来在接见安徽省造反派代表时，又明确指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能取消，制度的改革要放到运动后期。”周恩来还说：“至今中央还没有批准过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的群众组织。”这里首当其冲指的是“全红总”。同年1月以及1968年的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两次发出通知，宣布“全红总”、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联合通告》无效。

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发出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又通告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但是，“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执行”。通告特别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

“全红总”在这一系列严厉的通告面前，仍然沿着本来的自发冲动顽强地活动着。

历史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局：196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明确宣布，立即取缔“全红总”等非法组织。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京市卫戍区逮捕了在京的“全红总”及其他一些所谓非法组织的头头。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1967年3月2日，北京数十家单位在钢铁学院召开了批斗“全红总”头头大会。

“全红总”的头目王振海等人当然地被法办了，这些人也很快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中被遗忘。更多的革命造反派高举着似乎是纯政治的斗争旗帜，踏着“全红总”这样的“经济主义”反动组织的残骸，继续前进了。然而，这段故事却留下了分析“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典型个案。

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无不记得江青等人接见“全红总”代表时的讲话，这些讲话在社会上流传之后，中央文革“首长”那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鲜明的

“无产阶级”立场和纯粹的“无产阶级”色彩，在激进的学生中、更在广大的工人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些讲话使得很多在理论上努力思考“文化大革命”伟大意义的造反派学生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

可以说，中央文革的这一举动在一些天内似乎给运动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然而，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共中央的声音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除了表明这种经济要求十分明确的工人造反活动如何迅速扩张、表现出它的不合理性外，同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在这里，我们延续上一节中得到的一个思路，从双边关系的性质上、从利益的结合上分析这个事件。“全红总”最初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支持，其实意味着中央文革作为毛泽东领导下的政治集团与“全红总”及其代表的社会利益形成了一个合作。

中央文革需要的是，“全红总”造刘少奇的反，造刘少奇所依据的党内“修正主义”力量的反。而他们给予“全红总”的利益，则是这种造反的特权：这些人可以进驻总工会大楼，可以发号施令，可以采取政治行动。

“全红总”这样的势力给予了中央文革所需要的造反能量的投入。当他们冲击劳动部、总工会以及各种劳动制度时，无疑加入了冲击刘少奇政治势力的斗争。而他们想要得到的造反权力，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充分地给予了他们。

然而，“全红总”们还要一些十分具体的经济利益。江青等人绝对没有看到这些要求的严重性，绝对没有想到它在一个月多的时间内对中国生产格局和政治格局形成的破坏性冲击。这里没有任何“反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有的是极为现实的阶级利益。

正像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进行这场大的政治革命有着十分具体的个人利益一样，“全红总”也有着非常具体的利益。作为他们的代表人物，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野心，而他们所代表的合同工、临时工等工人队伍，则有着完全经济性质的利益要求。这个经济利益一旦暴露出来，就远离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口号，也远离了中央文革这个政治集团的政治需要。

中央文革与“全红总”“合作”的双边关系超出了原有的限度，“全红总”被限制是必然的。当这种限制在逐步升级的过程都不能限制住“全红总”的狂烈趋势时（因为它代表的社会利益十分广大和强烈），极端的限制手段——镇压便开始了。

镇压是限制的最高手段。而包含镇压在内的限制，则是任何一个政权都有的职能。

二、如果超越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文革势力与“全红总”的双边关系这个范

图观察整个历史，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巨大的社会政治潮流中，表面看来，不同阶层的人一时间可能有着完全一样的政治口号，然而，在实际上只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反对现状"。当反对现状在一个时期内、在一个主要目标上暂时一致时，可能就有了浩浩荡荡、广阔范围的统一战线。而由于统一战线内不同的队伍、不同的阵营有着各个不同的利益，广大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又是必然的。

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斗争及运动都是如此。

包括民族间的斗争及战争亦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当然也不例外。在轰轰烈烈、一轮又一轮的革命中，无论是反对"黑帮"、"黑线"，无论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统一的旗帜下面有的是各不相同的社会利益。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依据他们各自不同的现实利益行动着，一切都可能随着利益的发展而改变。

现实的利益分化改组着一切。

三、关键是对任何社会潮流及统一战线内部利益的精确分析，包括对各种民族主义潮流的分析，也包括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所谓思想政治革命的分析。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这样极端的年代，还是那些相对而言显得平常的年代，社会总在一种潮流的状态中，不是这样的潮流，就是那样的潮流。无论是支配历史的总的潮流，还是总潮流中的某些分潮流，都是多种力量合成的统一战线，有着复杂的利益结构。对各种社会力量的全部利益做出无一遗漏的分析，则是判断社会选择的必要智慧。在这方面，无论对于历史学家，还是对于政治家，都无例外。

四、我们又要探究一下毛泽东的思想了。他在《红旗》杂志 1967 年第一期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在新中国建国之后乃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不止一次谈到取消等级制、恢复和实行供给制。这些说法因为在现实中太缺乏可行性而没有成为实际的部署。然而，它却引起我们对历史哲学的思索。

当他要工人阶级为共产主义而战斗时，工人阶级却提出了十分现实的经济目的。工人的全部行为，最终要从其现实的地位、现实的利益及现实提供的轨道进行。这是毛泽东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当他把注意力放在意识形态的高空

时，他无视经济大地上的山川河流。当他号召社会上各种阶层、力量与他一起进行大革命时，他却无法给他们提供任何超越历史的东西。"全红总"以坦露的方式暴露了它所代表的社会利益集团的现实利益。本质上是经济的，政治只是手段。

"全红总"被打下去了，更多的革命队伍，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还是农民，还是党内的干部，他们将自己的现实利益掩盖起来，而在光明正大的政治口号下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

五、只有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深刻透视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力量及其相互关系时，我们才能对什么是历史运动得出更为实在的结论。

在政治斗争中，表面看来，不同的力量只是不同的思潮；揭开它们的旗帜，才能看到他们脚下踏着坚实的利益基础。

有多大的利益，就有多大的冲动。当利益以无比巨大的诱惑出现在面前时，冲动可以达到疯狂的程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高利润可以使资本家冒着上绞刑架的危险。

这一点在"全红总"问题上，表现得更为典型。

中央文革势力与"全红总"的关系，显然是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他们短暂的蜜月和最后以镇压为极端表现的分裂，表明了一切相互关系的对立统一性质和限度。

中央文革和"全红总"共同要求反对旧的秩序时，他们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然而，超出这种程度，当他们的要求不一致时，相互就会斗争。倘若中央文革能够把"全红总"的活动限制在一个他们能够接受的框架内，譬如不在全国煽动"经济主义歪风"、而只在思想政治领域内开展对刘少奇的批判，那么，无疑还会允许"全红总"的发展。在能够限制对方的情况下利用对方，这是中央文革与造反派联系在一起的必要基础。（此文有删节）

（何云路《极端十年》）

第七章　贵州“文革”触及“贵州事件”

（一）“贵州事件”的发生和发现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年代，由于多种原因，“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贵州省农村发生饿死大量农民的严重事件，被称为“贵州事件”。该事件在1959年开始出现，又称“五九事件”。由于当时的遵义地区（现遵义市）是重灾区，饿死人又最早在遵义县的板桥、泗渡等地发现，故又称“遵义事件”。由于湄潭、金沙两县饿死人的情况特别严重，故又称“湄潭事件”[附录7]、“金沙事件”。

1960年2月6日，贵州省副省长、老红军吴实到当时在建的川黔铁路沿线慰问修路民工，到息烽县就发现饿死人现象。次日，在遵义地区专员何林陪同下，吴实到遵义县的板桥、泗渡后，发现一个大队死了六七十人，有的全家躺在床上不能动。到桐梓县后，又发现类似现象，意识到事件是全省性的、带普遍性的。他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党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请示省委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吴实打电话向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汇报，何林也挂电话给地委第一书记李苏波。因周林在息烽温泉疗养院养病，遵义派人去那里向正在打牌的周林汇报，汇报的人都等得不耐烦了，周林还说要打完这一圈后再说。听过吴实电话汇报以后，周说“血淋淋的事，还提它干什么？”

（二）贵工师生针对“贵州事件”兴师问罪

贵州工学院机械系65级学生张再兴，贵州省湄潭县人。“湄潭事件”发生时，他还是个中学生，父母亲和侄儿都被活活饿死。他们村民组（当时叫生产队）总人口75人，死亡近半，其中死绝两家。他家所在的村（当时的大队），穆和清家老小五六个，饿死后埋在一个堆肥坑里；杨银清家四口饿死后，抛在猪圈粪水池内。那时，沟死沟埋、路死路掩随处可见，因为活着的人也没有力气挖坑埋死人了。

在“文革”初期，1966年12月15日前后，张再兴以红卫兵的造反勇气，率先在贵阳市大十字中山西路路口南侧一堵山墙上，针对“贵州事件”贴出街头大字报，列举他家所在的村民组饿死人的数据和名单，认为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等是贵州饿死人的罪魁祸首，必须把这些走资派揪出来，为贵州数以百万计的饿魂亡灵申冤。看这张大字报的人很多。

这张大字报也张贴在贵州工学院校园内一份。工学院半数以上学生来自农村，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在广大师生中很快引起共鸣。冶金系教师童志权、学生袁昌新、李永复和其他许多师生积极拥护。于是诞生了“遵义事件调查团”，由张再兴任团长，童志权、李永复、袁昌新任副团长。调查团的活动宗旨是“弄清事件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揪出‘事件’责任人以谢贵州1700万人民，挽回党和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调查团铅印了《告全省人民书》，历数了周林、苗春亭不执行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六条，搞高估产、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捉鬼拿粮”、征购农民的口粮和兴办农村公共食堂，造成全省饿死大量农民的罪行。

“遵义事件调查团”本着清理历史旧账和既定宗旨进行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所到之处，广大干部及人民群众热烈欢迎，民心大快。各级文革领导小组及相关单位也大力支持。“遵义事件”的调查工作进展顺利，卓有实绩。当时觉得“调查团”这个名称还不够“火药味”，又改名称为“贵州事件造反团”。

(三)省地县当事人积极"说清楚"

在饿死人的"五九事件"中,李苏波是遵义地委书记、行署专员。调查团一开始就拿他是问。当时遵义地区共360余万人,死亡60万人左右,是贵州省的重灾区之一,因此认为他的罪恶最大。故要他先来谈"遵义事件"的情况。"文革"时李苏波任贵州省水电厅厅长,听说要他谈"遵义事件",他二话没说,就坐吉普车跟调查团到了工学院。1966年12月19日晚上7点,贵州工学院一两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念了毛主席语录之后,李苏波就"遵义事件"的情况作了一个小时的详尽介绍。为调查团留下了《"遵义事件"访谈录》第一份资料。后来,李苏波又亲笔写过一次稿,与记录稿相互补充印证。

何林在"五九事件"中是遵义行署副专员,1966年12月24日,何林第二位被调查团请到贵州工学院阶梯教室"说清楚"。同李苏波一样,他说的更多、更为详尽、更具条理性。这份访谈录是所有的《"遵义事件"访谈录》中最具价值的文章。以后,何林还先后三次给调查团提供了亲笔资料。

第三位是苗春亭。苗春亭在1959年时任省委副书记,实质上的二把手。"四清"时被停职审查。"文革"时虽已恢复工作,但未明确职务。对于调查"贵州事件",省财办主任李庭桂特别支持。由他牵线,1967年1月1日,张再兴到花溪碧云窝宾馆找到了苗春亭。次日早餐后,有一辆伏尔加小轿车进城,顺便把苗、张二人带到太慈桥。下车后,从太慈桥到工学院还有4公里泥石混筑的乡村马路,又不通公共汽车,但苗愿意步行,他人矮、腿短,走起来很吃力。走到一半处,就有探矿机械厂的工人"红卫军"正打着造反旗帜迎面走来,高呼着"打倒贺启允、活捉苗春亭"的口号。好在他们并不认识苗春亭,也就擦肩而过,就这样到了工学院"说清楚"。这就有了苗春亭为调查团留下的一篇《"遵义事件"访谈录》。这以后,1967年6月27日,苗又一次来到工学院,再次谈起了"遵义事件"的情况。他说,发生这样的事,责任不完全在省里,还有更高层次的原因。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够胆大的了。

除上述三人外,调查团的被采访者还有:

第四位,张玉环,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农林办公室主任,"贵州事件"时任黔东南自治州党委第一书记。

时间:1966年12月21日。

地点:贵州省农林办公室。

采访事由:有关1959年至1961年"贵州事件"情况。

第五位,李庭桂,时任贵州省财办主任。1959年被打成"常、夏、李反党集团"成员。

时间:12月24日上午。

地点:贵州工学院第二教学楼阶梯教室。

参加者:北京"32111"尖刀兵团、红卫造反团、"九一五"红卫兵战斗团爆破筒战斗队等共20余人。

内容:"遵义事件"。

第六位,杨用信,时任贵州省监委副书记。

时间:1967年元月3日21:30~23:30。

地点:贵州省委一楼接待室。

采访人:贵州工学院教师赵安国、陈昭琼、廖昌明。

事宜:了解有关"遵义事件"的原因及处理情况。

第七位,叶谷霖,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贵州工学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时间:1967年元月3日。

地点:贵州工学院5902学生宿舍三楼5号。

采访人:"遵义事件调查团"团员童志权、张再兴等十人。

内容:"遵义事件"。

第八位,谢兆生,时任贵州省粮食厅计统处长。

时间:1967年元月7日14:40~16:50。

地点:省粮食厅统计处。

采访人:赵安国、陈昭群、廖昌明、华国庆。
事宜:有关1958—1961年贵州及遵义的粮食情况及政策。

第九位,杨绍荣,时任贵州省供销社副主任,"遵义事件"时任遵义地委副书记。
时间:1967年元月7日19:00~21:00。
地点:贵州省供销社二楼办公室。
采访人:赵安国等四人。
事宜:有关"遵义事件"前因后果及处理情况。

第十位,明跃忠,时任贵州省人民银行副行长,"遵义事件"时任遵义地委财贸部长。
时间:1967年元月11日下午3:00~4:30。
地点:省人民银行办公室。
采访人:赵安国等三人。
事宜:"遵义事件"有关情况。

第十一位,欧阳元,时任贵州省人委秘书处工作人员。
时间:1967年元月13日下午。
地点:省人委值班室。
采访人:赵安国、华国庆。

第十二位,张一樵,时任贵阳市市长。
时间:1967年6月29日。
地点:贵州工学院学生宿舍5902-325室。
采访人:矿业学院东方红、人民大学三红等3人,贵州工学院"九一五"等数人。

1967年1月5日左右,调查团分为金沙分团、湄潭分团、遵义分团及遵义总部,各赴其地。这些地方都是"五九事件"的重灾区。到这些地方去的目的就是向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宣传,饿死人的

事件主要由周林、苗春亭、徐健生等人负责,不要记在党和毛主席的身上。这对挽救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确实是有作用的。当时,不少干部、群众为调查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遵义分团还在三合公社逐家统计了死人的情况。

"遵义事件"调查团总部,由遵义市文革领导小组安排在丁字口遵义饭店215号等四、五个房间,又给了一套广播喇叭,安放在丁字口百货大楼三楼,天天广播《"事件"真相》和《告全省人民书》。

1967年1月22日,原湄潭县委书记王卿臣,一大早就来到遵义饭店215房间。与调查团总部人员见面后,第一句话还未说完,他就哭了。他说,我亲自砍死了当汉奸的堂叔干革命,而到头来在我手上饿死了那么多人,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结果吗?当时,张再兴和何传训做记录,王卿臣的动情,也使他们眼泪汪汪。王卿臣说,来之前曾到过地委,地委不同意他同调查团见面。然而,他还是找上门来了,看来他是冒了点风险的,一定是心中有话要说而且是不吐不快,故而也就不顾风险了。

袁昌新率领的分团到金沙以后,去找1959年时在金沙任县委书记的赵广玉算账。赵这时候还在黔西农场。不想此举正合他的意。自"五九事件"发生以后,赵广玉受到开除党籍、判刑劳改的处分。他觉得处分他是应该的,但各账应各清。饿死人的事情是全省性的,省里一个人也没有处分,到底是谁的责任,在贵州省还是一笔糊涂账。旧省委以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手法,让下面的人全部把责任担了起来,而省委主要负责人一个也没有处理,逍遥法外,于理不公。因此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申诉。周林见他不听话,又是打、又是诓,手法使尽了,赵广玉还是不听话,非要省委说个所以然、分清是非不可。1964年"四清"以后,周林到西南局任书记处书记,就没有人管他的事了。贾启允来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又顾不上跟他扯这些闲皮,所以赵广玉是有话没处说,心情十分烦躁。"遵义事件调查团"的同学找到他以后,其实是为他安排了一次说话的机会,也就一吐为快。他先后两次写了十多万字的资料,又把1965年给党中央的《申诉信》也给了调查团。

1967年1月,原开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尹震环张贴"大字报"申

述他在“贵州事件”中的遭遇。尹震环先后给中央写的两封信被转到省、市委以后，周林在省三干会上点他的名：“开阳有个办公室主任，来了没有？你胆子不小，写信到中央告市委！”贵阳市委夏页文书记说：“朱庚申、尹震环你们串通起来和市委作对，哼，我倒要看看你们是啥子了不起的人物。”真是如临大敌。尹震环等在省三干会期间被斗了一二十天。回开阳县后又被斗了一二十天，最后给戴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劳动锻炼。

尹震环给中央写信不仅为自己惹了麻烦，也给原开阳县委闯了大祸，也给区、社、队的干部都闯了祸。县委书记朱庚申因此调离开阳，开阳县委改组。全县被斗被处理的各级干部不下一千人。

尹震环给中央写信虽然挨了整，但还是起到了好的作用，促成了干部们随后少犯错误，其结果是开阳县饿死人的情况不算很严重。

（四）中央文革、省委和省文革先后打招呼叫停

“贵州事件”是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但在“文革”中过问这件事颇有干扰大方向之嫌，因斗争矛头对准的是“死老虎”，而不是正在走的“走资派”。人们后来发现，“文革”中为大大小小走资派罗织的罪名中，都不见有饿死人这条罪名。

因此，遵义市（现在的红花岗区）夺权，就没有让当时驻遵义的“贵州事件”调查团总部的代表参加，说他们是近于“老保”的中间派组织。因为中央文革认为他们造反过头了。

中央文革对“贵州事件”调查团的活动非常关注，除了由中央文革办公室办事员打电话“打招呼”外，1966年12月25日，中共贵州省委给“贵州事件”调查团写信，叫“不要去翻作了结论的老案”。1967年元月19日下午2时在省长李立住地，贵州省文革小组组长李立又接见了“贵州事件”调查团联络员刘福一、廖昌明，当面“打招呼”，说是做了结论的历史，不要翻了。再翻就要犯错误了。1959年李立在河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洛阳市委书记，他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例，说吴也是在出了这事后调离工作的。李立还希望“贵州事件”调查团能改个名字叫“农村文化革命造反团”。

上面一再打招呼之后，“贵州事件”调查团的工作随后也就终止了。

（五）大饥荒中贵州全省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大饥荒中贵州全省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贵州事件”调查团从贵州“四清”三干会上得到的数字是160万人。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中国人口科学报》2005年第一期的《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的文章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000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10.23%。”

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以公安厅党组名义统计上报贵州省委的数字是250多万人。

公安部退休干部晏乐斌1959年至1979年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据他的同事、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作内勤、统计工作的XXX根据全省各专署、自治州公安处、局治安科报上来的数字汇总，全省1959年至1961年共饿死250万人，占全省灾前总人口的14.7%。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尽管各地、州、市、县上报时缩了水，但这是当时唯一信得过的数据，此数据还得到时任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长的xxx证实。他1980年代后期到北京同晏谈过这一事实。他说，1959年至1961年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这是1962年初，他们治安处根据各地公安机关的治安科上报省公安厅治安处，由治安处汇总，以中共贵州省公安厅党组名义，向中共贵州省委报告的绝密数字，后来得知省委上报中央时，只报了210万人，瞒报了40万人，省委让公安厅也以这个数上报公安部。

贵州省饿死人最多、最严重是1959年至1960年5月，当时，晏乐斌正在省公安厅办公室研究科工作，办公室主任刘世杰指派他到遵义专区的湄潭县和毕节专区的金沙县，调查饿死人的问题。当时的湄潭县是大湄潭县，由原湄潭、凤岗、余庆三县合并而成，1958年全县62万多人，1959年至1960年5月，除去正常死亡1万多人外，属于非正常死亡为12.5万人[1]，占全县总人口的20.16%，

还剩下49万多人，全县死绝户3001户，孤儿近5000人，外出逃荒5000多人，全县出现了人吃人、杀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县城时见贩卖以人肉充当的牛肉，吃死去的人就更多了。后来"湄潭事件"[附录7]的盖子揭开，省、地组织了庞大的工作组到这里夺权，"整风整社"，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在这里开展，都是以"左"反"左"，反"左"的结果是基层干部遭殃，被处理的基层干部，包括杀、关、管、集训、判刑和开除公职等，占60%以上，最为突出的是湄潭县委书记王卿臣判刑劳改，县长兼绥阳区区长容镜被处决。容镜后来被平反。

晏在湄潭县的调查工作有遵义地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和地区公安处二位工作人员配合进行。随后晏又赶赴毕节专区，专署公安处长朱广臣接待了他，并派秘书科和治安科二位同志陪同晏到金沙县调查。晏在安洛公社安洛大队了解到，该大队有一个生产队29户人家，共152人，除一人在贵阳钢铁厂当工人，一人在习水县习水造纸厂当工人外，其余150人全部饿死。后来到1961年底1962年初，金沙县饿死人的盖子揭开之后，那三年全县饿死了8万多人，县委书记赵广玉自己讲饿死了4.7万人。后赵广玉被逮捕法办，判处徒刑8年，投入劳改农场改造，后平反，被安排到铜仁地区工作；县长王国民后因骑马摔死，未追究其责任。

1960年12月至1961年5月，晏随公安厅办公室主任刘世杰到六盘水地区的水城县参加整风整社工作，经过工作队搜集了解，1959年至1961年5月，全水城县饿死8万多人。后来县委书记刘福臣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附录8]

[1]关于大湄潭县饿死人的数字，根据湄潭、余庆、凤冈三县《县志》数字叠加，应是145810人，而不是12.5万人。

（六）贵州饥魂亡灵有《墓碑》

针对"贵州事件"，贵工师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做了大量调研工作，采访了数十位当事人，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记录了人祸、黑暗和罪恶，由张再兴编撰，昆明陈安民先生印刷，形成了一本包括《"遵义事件"访谈录》在内的《贵州事件调查资料集》（上），26万字，这是凝固的记忆，虽尚未正式出版，但也可称之为贵州饥魂亡灵的《墓碑》。

《墓碑》，这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专业的新华社高级记者、著名学者杨继绳写的一本书，分上下卷共110万字，其副题是《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大跃进"年代的大饥荒，在全国是普遍性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都是重灾区。湖北省浠水农村出身的杨继绳，其父亲就是在"大跃进"大饥荒时饿死的。杨继绳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写出了这本在香港出版的书，书中确认"大跃进"大饥荒年代全国饿死3600多万人，他把他的这本书当作全国这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愿他们能因此得到安慰。

杨继绳2002年12月也到贵州省档案馆查过贵州"大跃进"大饥荒资料，并开列出一张30份资料的目录清单，拟带出但未获准许，他把这张单子也列入了《墓碑》书中。此书以《黑色的贵州》为题介绍了贵州。

早在1991年，另一名清华大学理工科毕业生丁抒在香港出版了《人祸：大跃进和大饥荒》。这是忠实记录那段历史的第一本中文专著。现任美国明尼苏达若曼学院教授的丁抒的一篇论文《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的下限》，认定其下限为3500万人。

1962年初，那场饿死人的惨剧已经过去，生命力似乎无限的中华民族又逐渐挺直脊梁的时候，中共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即将赴安徽就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

些，就立碑传给后代。”几十年过去了，在为尊者讳传统挥之不去的大陆，书没有问世，剧没有登台，碑更没有能竖起。由于接着而来的“文革”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那场人祸更被淡化了。

“文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同样应当永志不忘的是导致无数同胞在绝望中饿死的那场“大跃进”运动。如果想到那死亡的数目相当于、甚至大于日本侵华杀害我国同胞的人数，我们便会同意刘少奇“立碑传给后代”的意见了。

（七）花溪新建 601 工程的不解之谜

1964 年贵阳市“四清”运动中，贵州大学组织学生就近参观了“四清”中停建的 601 工程，包括 301 宾馆（现花溪迎宾馆）、302 别墅和万人大礼堂（现贵州省青少年活动中心）。这些项目的主体工程已完工，装饰工程已在进行中，302 别墅小歌舞厅水磨石地坪伸缩缝中已嵌入铜条。没有谁告知学生们，这些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花溪的豪华建筑物是为谁而建的。当时花溪景区已经有了西舍宾馆和碧云窝宾馆，在饿饭之年为什么还要修这么豪华的楼堂馆所，同学们看后心中充满疑问。参观时有规定，不准照相，不准记录，不要议论，成为不解之谜。

其实，这是毛泽东退居二线时，贵州为他建造的行宫。

（注：本章除第五节外已刊登在《炎黄春秋》2012 年第 8 期，第五节的内容见该刊 2012 年第 5 期晏乐斌《贵州的大饥荒年代》一文）

本章参考资料

1.张再兴《贵州事件调查资料集》
2.晏乐斌《贵州的大饥荒年代》（《炎荒春秋》2012 年第 5 期），附录 8
3.刘兴盛《贵州湄潭事件》（《炎黄春秋》2007 年第 11 期）
4.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5.丁抒《人祸：大跃进和大饥荒》（九十年代杂志社）
6.丁抒《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的下限》（“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

附录 7　刘兴盛：贵州湄潭事件

贵州省湄潭县，从 1959 年 11 月到 1960 年 4 月初，5 个月内全县饿死者超过 12 万人。1987 年，笔者参加了《湄潭县志》的编纂工作。在查看史料时，阅读了“湄潭事件”发生的经过及历史面目。

当时湄潭县是由凤冈、余庆和湄潭三县合并而成的大县。全县总人口 60.5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56.57 万人。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 1959 年 11 月到 1960 年 4 月初，历时 5 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 12.451 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 20%强，占农业人口的 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 2938 户，遗下的孤儿寡崽 4737 人，外出逃生的农民 4737 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悲剧已经过去 47 年，如今旧事重提，痛定思痛，把真实历史整理出来，供大家借鉴。

（一）事件前，全县农村经过 1958 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许多生产队除集体饲养的几头耕牛外，其他六畜濒临绝迹，森林严重被毁，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面临绝境。食堂以人定量，长期缺少油水，农民普遍吃不饱，以瓜菜相添。时间久了，对长期体力劳动的农民来说，实在吃不消。1959 年粮食只收了 3.22 亿斤，比上年减少 32.6%，其他农作物减产更为严重。然而，1958 年大跃进中膨胀起来的浮夸风，不但未止息，反而变本加厉了。当时，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把全县粮食总产定为 8.462 亿斤，虚报 5 亿多斤。数字虽可观，没有粮食等于零。为了兑现 8 亿多斤总产，一场骇人听闻的反对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的斗争，就在全县展开了。

（二）1959 年 11 月，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开始就称反出瞒产 1200 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

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秸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年12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禁粮断炊以后，对长时间口粮标准低、瓜菜代，不见油荤的广大农民来说，真要命了，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走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殍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打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

有的群众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窃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风风、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开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经批准的有65人），关死的就达200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三）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决定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实际集中7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万民工，农村已经大量死人了，还继续征调，有的农民拿点铜皮铁条，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到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

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些人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搭救我们吧！"

1960年2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党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委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操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后面的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未断气的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四）1960年4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天亮了！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250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2至3个，住院病号6300余人，免费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23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四是对失去儿女的孤寡老人，都接进敬养院，吃穿由集体包下来。

五是全县在事件中外出逃荒的农民4737人，由各公社通过亲朋好友打听下落，由公社派专人带钱带粮去接回来，帮助他们安排好生活、生产，重建家园。但也有些人至今音信杳无，可能永远长眠在他乡异地了。

六是全县7万多青壮年妇女，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有严重闭经、脱宫、腹痛等妇科病，组织医疗部门进行治疗，使她们很快恢复了健康，积极投入了生产救灾工作。

由于采取以上有力措施，劫难后的农村开始复苏了。许多农民说："共产党又回来了，人民得救了！"

（五）"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6个，占公社总数的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31个，组织不纯的51个，共82个，占管理区总数的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377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50%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年6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1960年8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3月平反）；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队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兜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做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后来，党中央发觉了这一问题，指出这类事件，主要是总结接受教训，一般不要追究个人责任，才停止了事态的继续发展，"湄潭事件"才算真正结束了。

（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第67-69页）

附录8 晏乐斌：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有人说饿死了120万人，有人说饿死了150万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文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10.23%。"

1959年至1979年我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据我的同事——一位在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做内勤、统计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况：根据全省各专署、自治州公安处、局治安科报上来的数字汇总，全省1959年至1961年共饿死250多万人，占1958年灾前全省总人口的14.7%。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尽管各地、州、市、县上报时缩了水，但这是当时唯一信得过的数据。

此数据还得到从1961年6月至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时为止当过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长的XXX同志的证实。他1980年代后期到北京同我谈过这一事实。他说，1959年至1961年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1962年初，治安处根据各地公安机关治安科上报省公安厅治安处的材料，由治安处汇总，以中共贵州省公安厅党组名义，向中共贵州省委递交报告，后来得知省委上报中央时，只报了210万人，瞒报了40万人，省委让公安厅也以这个数上报公安部。

全国饿死人情况严重，数量多，占人口比例高的有四川、河南、安徽、甘肃、贵州、青海、河北、山东、湖南、广西等省区，富庶之地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也饿死人不少。造成如此严重饿死人情况，与各地封疆大吏紧跟不紧跟极"左"的政治路线有极大关系。比如，四川省的李井泉，河南省的吴芝圃，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北省的刘子厚，贵州省的周林，甘肃省的张仲良，青海省的高峰，山东省的舒同等省委的第一把手，都紧跟毛泽东的脚步，跟得越紧，带来的灾难就越大，饿死的人就越多，这已经成了定律。

周林，贵州仁怀人，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50年6月任贵州省委常委，1956年7月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在"大跃进"年代，高举"三面红旗"，在全省掀起了共产风、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五风"肆虐，又以共产风为主，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这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据杨继绳先生的专著记载：周林"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当时贵州一些地方出现大量浮肿病人和饿死人的情况，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时候，"中共贵州省委在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主要内容是：1.粮食问题，说粮食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目前必须想

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收作物丰收”，“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2.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商业工作还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保守，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这一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1959年8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作了长篇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了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耍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与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政治帽子，从而加剧了人民的饥饿和死亡。

“另一个是，有大批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贵州省委于1960年2月16日至18日，召开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报告称：“我省农村公共食堂现有13万多个，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80%左右。”接着总结了5个特点：“巩固地树立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一律参加了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以人定量，节约归己……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有的已成为生产小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形成一个大家庭。这些地方，人民公社得到巩固……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确是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主要阵地……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贵州省委这一报告，毛泽东在1960年3月6日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一次下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在批语中说：“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写得很好，现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毛泽东还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却送上这样一份报告。这一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贵州省饿死人最多，最严重是1959年至1960年5月，当时，我正在省公安厅办公室研究科工作，办公室主任刘世杰同志指派我到遵义专区的湄潭县和毕节专区的金沙县，调查死人的问题。当年6月我来到遵义专署公安处，讲明来意之后，专署副专员兼公安处长毕贵显接待了我，一听说我是来调查了解湄潭县饿死人问题的，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向中共遵义地委书记李苏波作了汇报，也引起了李的高度关注。李指派遵义地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公

安处也派了二位工作人员，我们四人前往湄潭县。

当时的湄潭县是大湄潭县，由原湄潭、凤岗、余庆三县合并而成，这里地势平坦，山清水秀，是贵州的产粮区，也是富庶的县份，农作物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气候适宜，风调雨顺，正常年景，人民丰衣足食。可是自“大跃进”以来，这里的人民遭受严重灾难。据县委办公室负责人介绍，1958年全县有62万多人，1959年至1960年5月，除去正常死亡1万多人外，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有1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0.16%，还剩下49万人，全县死绝户3001户，孤儿近5000人，外出逃荒5000多人，全县出现了人吃人、杀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吃死人就更多了。

我们一行曾到原凤冈县绥阳镇绥阳公社驻地作了一些调查。据绥阳公社一位党委副书记介绍，有这么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1959年9月17日（即农历8月15日中秋节），遵义地委要在这里召开全专区各县“捉鬼拿粮”现场会，即反瞒产私分现场会，遵义地委书记、专员李苏波要到场。湄潭县委和绥阳公社为了开好这一现场会，将一些滞留镇里的群众，从农村来的一些饥民、饿汉，到餐馆、居民家讨饭、要饭，抓拿抢吃的人进行了多次清理、遣送，到9月16日傍晚还有48人仍滞留在镇里，于是公社党委一位书记，让将这48人暂扣押在公社供销社一间仓库里，其中一个瘦个子乘晚上从仓库门的铰链缝里逃了出来，还剩下47人在仓库里。现场会开了2天即散会了。后来过了半个月这位公社党委书记问起关押的人放出来没有，人们才想起这件事来，结果打开仓库门一看，47人全死在里面。这一事件震动湄潭，也震动遵义地委，贵州省委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此事。当时的一些人就是这样关心人民的生命和疾苦的，人性已经泯灭了。

后来“湄潭事件”的盖子揭开，省、地组织了庞大的工作组到这里来夺权，“整风整社”，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在这里开展，都是以“左”反“右”，反“左”的结果基层干部遭殃，找了一些替罪羊。被处理的基层干部，包括杀、关、撤、训、判刑和开除公职，占60%以上，其中，将湄潭县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容镜等人处决了事，容镜后来被平反。

随后我又赶赴毕节专区，专署公安处长朱广臣接待了我，他即派秘书科和治安科二位同志陪同我到金沙县调查。金沙县的地理条件比湄潭县差一些。这里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也是“五风”肆虐，干部违法乱纪严重，县委书记赵广玉、县长王国民（彝族）不但紧跟省委，而且还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将金沙县搞得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县委办公室一位主任接待了我们。赵广玉听说我们去调查死人问题，很紧张，他叮嘱这位办公室主任：不要讲得太多。这次我遇到了阻力。我们便要求到平坝公社、安洛公社去做些调查。因为一年前，即1959年6月至9月初，我随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宋留友等3人，跟随贵州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张叔

成率领的省委工作组到金沙县工作了两个多月，认识平坝公社党委杨书记。杨约略地谈了他们公社饿死人的一些情况。我们在这里没有停留多久，即前往安洛公社个别访问和调查。在安洛公社安洛大队了解到，该大队有一个生产队共29户人家，共152人，除一人在贵阳钢铁厂当工人，一人在习水县习水造纸厂当工人外，其余150人全部饿死。后来到1961年底1962年初，金沙县饿死人的盖子揭开之后，那三年饿死了8万多人，赵广玉自己讲饿死了4.7万人。后赵广玉被逮捕法办，判处徒刑8年，送到金沙县大水劳改农场改造，后平反，被安排到铜仁地区工作。县长王国民后因骑马摔死，未追究其责任。

1960年12月至1961年5月，我随刘世杰同志到六盘水地区的水城县参加整风整社工作，先是在该县的尖山坝公社，我在工作队队部工作。尖山坝公社地势平坦，是水城县的产粮区。“大跃进”以来，“五风”严重，干部瞎折腾，违法乱纪的也多，秋收过后就出现饿饭、反瞒产私分运动中搞得农村鸡飞狗跳，浮肿病人多，妇女普遍出现停经、不孕、子宫下垂三种病症。1959年至1960年全社饿死一万多人。我们省政法机关来的100多工作人员全部被派到全社各管理区、生产大队，我们没有按照省委的部署来“夺坏人的权”，而是采取“团结、依靠、信任”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靠生产自救，救治浮肿病人，清理、整顿公共食堂，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生产在恢复，浮肿病得到初步遏制，食堂恢复了生机。在这里我们除对几个违法乱纪致死人命的干部搜集、整理材料，上报水城县委去处理外，对其余干部我们一个也未动。1961年3月12日工作队全部撤离该社。我与另外二位同志留下来作巩固工作，直到3月20日我们三人经由县城到该县南开公社继续参加该县的整风整社工作。我们三人在去南开公社的途中，翻越了一座高山，坐下来休息时，便到路边一社员家讨水喝，发现一位40来岁的妇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尸体，这个小孩尸体的手脚被肢解，头部已砍下放在一边，尸体发出腥臭，我们询问她为什么杀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杀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饿死的，全家人饿饭，没有办法，为了救命，不得不拿来吃啊！”又说：“哪个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经她这一说，我们也无心讨水喝了，立刻退了出来。第二天我们赶到南开公社工作队所在地，将这一情况向工作队作了报告，工作队部的同志说，全社吃死人的情况还不止一起。后来经过工作队搜集了解，1959年至1961年5月我们撤离该社，饿死几千人，全水城县饿死8万多人。后来县委书记刘福臣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

后来得知，铜仁专区的江口县饿死近一半人。

周林和贵州省委那一班人的作为，给贵州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与伤害。后来周林慢慢有所醒悟，发现了一些问题，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放宽了一些农村政策，如恢复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三年免征公粮和默许包产到户等等，

使农村人民恢复元气。这又招致了中共中央于1964年9月，调整、撤换了贵州省委领导班子，撤换了周林等省委负责人，调四川省省长李大章、中央监委主任钱瑛、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国家计委副主任贾启允等人，组成贵州省委班子，说“贵州是当时全国滥掉的四个省之一”，并从中央、一些部队、一些省市抽调2000多名“支黔干部”到贵州来夺权和开展“四清运动”。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做出的决议指出：贵州自解放以来“三关没有把好”，“两个不彻底”，“一个根子不正”。所谓“三关没有把好”是指“清理中内层关没有把好，工商业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化关没有把好，审干关没有把好”；“两个不彻底”是指“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一个根子不正”是指“党的基层组织基础不正”。这就全盘否定了贵州省自1949年建立政权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文革”中周林受到批斗、批判，1975年恢复工作后，担任过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在任北大党委书记期间，为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马寅初先生平反，1997年去世。

（载《炎黄春秋》2012年5月第5期）

（作者系公安部退休干部）

第八章　红卫军与李再含

（一）李再含持“不同意见”由“保”变“革”

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因四川、贵州“文革”问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受到毛泽东批评。他从北京带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的指示，于1966年9月7日到达贵阳。他向贾启允布置：只要做到“五不动”，即军队不动，工人不动，农民不动，居民不动，干部不动，就会使“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李再含以政治辅导员身份向“号码兵”传达陶铸的指示：“省委是‘四清’后的新省委，大方向是正确的。”

在李井泉的启发下，9月12日至10月3日，李再含因“持有不同意见”，先后向贾启允写了六封信。

10月8日至25日，经李井泉推荐，陶铸点名，李再含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

11月2日，西南局同意调整中共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免去苗春亭的副组长职务，增补陈璞如、张健民为副组长。

11月2日，贾启允、李再含等在贵阳金桥饭店接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陈璞如在会上向红卫兵小将们介绍说：“这是军区的李同志，他是与贾书记有不同意见的，你们不相信贾书记，以后可以找他。”贾启允接着说：“在对待‘六·六’事件问题上，我们内部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从此，李再含便转向“支持造反派”了。

11月底，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发起，炮轰派成立了“贵阳市统一行动指挥部”，红卫军、地化所等所有炮轰派组织都参加了。这是贵州造反派革命大联合的最初形式。

12月3日，西南局同意增补李立和李再含为省文革小组副组长。李立是原省长。贾启允被揪斗后，陶铸来电：“同意撤销贾启允贵州省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职务，由李立同志主持，李再含同志协助。陶办。”

从李再含成为省文革小组成员以后，直至1967年1月，先后向中央发出18份反映省委情况的电报，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赞赏和支持。12月10日，李再含在给林彪转毛泽东、党中央的一份电报中说：“省委已完全瘫痪”、“全盘机器已完全失灵”、“有影响三线建设的危险”等。

《王力反思录》写道：“贵州出了一个特殊情况，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最早系统地向中央报告贵州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他个人署名，用正式电报发给中央，报告贵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包括：群众运动、红卫兵情况，揭露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省委搞不下去的情况。他经常发较长的电报，对毛主席有很大启发，认为贵州有李再含就行了，这也是毛主席考虑部队支左的一个现实来源。”

（二）“二李”由接近到对立

12月3日，贵阳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工纠”开车压死2名“红卫军”工人，市公安局未能及时出面处理。李再含为了取得红卫军的信任，公开表态罢了市公安局长的官，并带头签字同意在全市停产3天，游行追悼，还以省文革小组名义发出全市停产通知。次日，统一行动指挥部举行追悼会，李再含与贾启允联名送花圈，并致悼词，还追认这两名死者为“烈士”。会后佩戴大白花游行送葬。事后，红卫军要求解散“工纠”，把躲在省军区地下室的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揪出并扣押起来，轰动省城。红卫军声威大振。李再含和李铁乃被人们并称“二李”。“工纠”因面临解散危机，挟持李立上北京告状，被炮轰派截堵抢回。

12月17日，陶铸来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工人纠察队是群众组织。既然是群众组织起来的，就不要撤销。陶办。”

11月4日起，省三干会在省委党校召开，后转到市内交际处等

地，历时40天。会上，李再含宣扬“李铁乃是革命的”，“在革命组织中李铁乃是最有头脑的，他很冷静，我佩服他”。

九、十月间，西南局阎秀锋在贵阳时听说李铁乃“有问题”，便叫省公安厅作调查。李再含在省军区一次会议上看到省公安厅对李铁乃搞的调查材料后，当场替李铁乃辩护，质问：“是谁叫你们搞的？这是整造反派的黑材料。”并将材料转到李铁乃手中，引起李铁乃要揪斗公安厅的当权派。

12月5日，红卫军以查抄“黑材料”的名义，从贵州日报社抄出很多材料运回总部。李铁乃声称掌握了李再含的“钢鞭材料”，说“李再含比贾启允更坏”。“二李”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李再含对李铁乃的态度变为“一看、二帮、三警惕”。

12月27日，李再含找李铁乃和地化所徐英年到省军区商量大联合问题。李再含说：“老李，你以前领导红卫军很辛苦，但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以后由地化所领导是否有利一些？”李铁乃不同意，不久就宣布退出“统一行动指挥部”，另行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计有红卫军、赤卫队等74个大小组织参加，并举行了“打倒折中主义”大游行，矛头针对地化所。李铁乃说：“地化所他们知识分子想垄断贵州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老子三天就可以踏平地化所。”1967年1月初，李铁乃经昆明前往北京告状，并找曾在贵阳帮助过他的一位光明日报记者再寻求帮助。他在京刷出了“打倒李再含”的大标语，举办了记者招待会。李再含在贵阳则从红卫军中扶持另一个头头于1967年1月3日拉出另一个山头“红卫军造反联络站”。

1967年1月5日，陶铸被突然打倒的消息传到贵阳。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被定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1月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代表团”时宣称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自此陶铸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含冤去世。

1967年1月初，上海掀起“一月风暴”即“夺权”斗争，毛泽东公开支持。从1月15日起，上海的夺权斗争在贵阳市引起了连锁反应，贵阳矿山机器厂的造反派率先在厂内夺权。从16日至19日，

贵州日报社、贵州省公安厅、贵阳医学院、贵阳市人民汽车公司、省文化局、贵阳棉纺厂、贵阳钢铁厂、贵阳造纸厂、林业厅汽车场、省建一公司等单位的造反派都先后夺了本单位的权。

夺权后的《贵州日报》更名为《新贵州报》。夺权后的贵州省公安厅由“113”革命战斗总队掌权。“113”成立于1966年11月3日。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稍有不满的也被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革”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贵州红卫军头头李铁乃被关押15年就是一例。

（三）李再含“枪打出头鸟”

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1月17日下午，红卫军出动20余车人到省委大楼去夺以李立为组长、李再含为副组长的省文革小组的权，因大楼内无人，未达目的，绝大多数人走了，留下20多人守候大楼，至18日凌晨1点多钟，发现有2名武装流动哨兵。红卫军增派一车人来，并问：“是谁派你们来的？军委有命令，解放军不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你们为什么要保旧文革？”双方发生了冲突。红卫军抢了手枪1支，子弹24发和军大衣1件，并拍了照片，作为军队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证据，打电话要求李再含处理。李再含拒绝答复。

李再含向中央发出电报《对李铁乃总部一小撮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

1月21日，根据李再含的报告，中央文革派人在北京抓捕了李铁乃。赤卫队的黄世明、贵州兵团的施其利等工人群众组织的头头也在贵阳被捕。随后这些群众组织的总部相应被瓦解。

李铁乃在京被抓的情况，重庆“反到底”头头黄廉是见证人：

“贵州‘红卫军’团的李铁乃、云南炮派的范喜莲都派人到重庆来找我，约我一起去北京，想要通过我找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说我

在中央文革心目中还有点地位。

“贵州的情况是李再含明里支持李铁乃，暗地里支持地化所徐英年，李铁乃觉得不公平，就起来反对李再含，去北京也想找周恩来，把事情向上反映，寻求合理解决。

“在北京李铁乃请我在西四吃火锅，还告诉我那天晚上二点半，总理要在四马桥接见他们，他一定要我参加。晚上11点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屋子，门口站了一个解放军，我们进去之后他们把门全部关紧了。我看屋子里非常简陋，不像是总理会客的地方，就问解放军。他们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12点多的时候，进来很多便衣带枪的人，问谁是李铁乃，一下子把他铐起来。对于在场的人，他们说：首长说都要带去问清楚。我很纳闷，以为是‘联动’的出来绑架，最后才知道是被卫戍区管制起来了。等到第九天的时候，才有两个公安局的人找我，验证我到底是真黄廉还是假黄廉。又隔了两天才来一个军车，一个叫赵文成的干部告诉我，李铁乃犯了罪，把造反派开进送不得的地方。”

李铁乃押回贵阳在邮电大楼前广场批斗时，他站着挨批斗的台子就是他自己安排搭成用来批斗走资派的。

1月23日，中央公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毛泽东在决定中指出：“所谓不介人，是假的，早已介人了。问题不是介人不介人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1月26日凌晨，贵州某师部队和省公安厅“113”在群众组织配合下，查抄了红卫军总部和红卫军甘荫塘分部，抓了100多人。

1月26至27日，省军区宣传车在贵阳市街头和市郊反复宣传“红卫军是反革命组织”。

1月27日，在“红卫军是反革命组织”的舆论攻势下，贵阳煤矿发生“工纠”向红卫军反夺权，红卫军被捆绑吊打达54人之多。贵阳钢铁厂、贵州水泥厂、七冶公司、九化公司、红星拖拉机厂、贵州柴油机厂、市邮局等红卫军夺权单位也发生类似事件。“工纠”反夺权后纷纷到省军区报喜。

1月28日，中央首长第三次在京接见贵州代表团。中央文革代理组长江青问：“李铁乃是什么人？”听了军区司令员何光宇和代表们的介绍后，江青说：“李铁乃是流氓！他想当西南王。情况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是根据李再含同志掌握的情况和电报决定逮捕的。”

代表团中的南下串联队代表反映了红卫军在贵州“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和26日以来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遭遇。江青说：“红卫军当然不是反革命组织。对广大群众，不能这样说。主要头头已经抓了。”

李铁乃被抓后关了15年，没有查出可以定罪的罪证，因是李再含通过江青点头抓的，谁也不能说不该抓，否则就会按《公安六条》以反革命治罪。直到1981年1月23日江青被判刑后，李铁乃才以“取保就医”名义获得释放，至今总算相安无事。

以李铁乃为首的红卫军势力强大，在贵州造反派中是老大。李再含不“枪打”李铁乃这只“出头鸟”，怎能登上贵州政治舞台？

本章参考资料

1.贵大红缨枪《贵州文革全过程大事记(1966年5月-1967年8月)》
2.王力《王力反思录》
3.贵州人民出版社《当代贵州大事记》1966年
4.《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5.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修订版2004年11月

第九章　西南的春雷

(一)毛泽东批示召李再含进京,部署贵州夺权

1月21日,毛泽东对李再含的报告作出重要批示:

"总理: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一日

每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111]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统一行动指挥部"分裂后,地化所、红色工人战斗团、贵阳战斗团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等也组织成立了"贵阳地区革命造反联络站"。

1月23日,"贵阳地区革命造反联络站"在省图书馆开会酝酿抢先红卫军开展省市夺权斗争,会后请示省军区,省军区表示支持,并提出把逮捕红卫军的事一起配合起来,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1月24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周总理派飞机接李再含和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等贵州代表团11人到达北京。25-30日,中央首长先后五次接见贵州代表团[附录9]。第二次是在中南海,其余四次在人民大会堂。其中四次周总理亲自参加。其中三次谈到红卫军李铁乃

问题。30日晚上在最后一次接见之后,代表团连夜乘机飞回贵阳。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是:

叶友钧(省委办公厅)、余听南(省公安厅)、姚均如(红色工人战斗团)、张应保(贵阳师院教师)、杨再兴(贵阳师院学生)、徐英年(地化所)、张新考(贵阳市蔬菜公司)以及清华、北大赴黔学生各一人。此外还有昆明军区谭甫仁和陈康。

1月25日,贵州省和贵阳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行动,一举夺取了中共贵州省委和省人委、中共贵阳市委和市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名单如下(后9名为外地组织,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合肥、成都各地,占22.5%):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工人战斗团
毛泽东思想贵阳战斗团
贵州省省市毛泽东思想文化科研战斗团
毛泽东思想贵阳红色保卫战斗团
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新华社贵州分社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新贵州报》毛泽东思想并肩战斗联络站
贵州省广播事业管理局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中共贵州省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贵州省工交系统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贵州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财贸分部
贵州省宣教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公安厅113革命战斗总队
贵州省人委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总队
贵阳市市级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毛泽东思想财贸战斗兵团
贵州省誓死保卫毛主席"中南海"兵团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教工战斗兵团
贵阳市毛泽东思想小学教师战斗团
东方红文工团东方红公社

贵州省气象系统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冶金工业部贵阳铝镁设计院毛泽东思想"驱虎豹"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科委系统战斗团
贵阳医学院工农红卫兵
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
贵州工学院"九一五"红卫兵
捍卫毛主席红卫兵总部
贵州省体校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革命军工农战斗队总部
退休工人委员会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贵州野战兵团
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贵阳联络总站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号兵"战斗队
新北大驻贵阳战斗团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黔联络站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驻黔联络站
首都一司驻西南联络总站
首都三司驻黔联络站
中国科技大学南下串连红卫兵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附录10],向全省人民号召:

1. 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2. 抓革命,促生产;
3. 坚决反对经济主义;
4.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总指挥部共设21名常委,其中工人3名,干部7名,学生11名。总指挥部设7人核心小组,由李再含任组长,成员有耿铁(工人)、袁昌福(工人)、李承宗(学生)、蔡秀臣(地化所)、戚休(新华分社),1农民(缺)。

红卫军、赤卫队调人包围《新贵州报》社,阻止报社发布夺权"号外"。当日,《新贵州报》刊登了一幅题名为"粪土当年万户侯"

的漫画,以表夺权。大皮靴代表革命造反派,下面的小丑则代表贾启允等"走资派"。

1月28日,省总指挥部发出第二号通告,限令原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常委三日内到省总指挥部报到,听候处理。省、市各部、委和厅、局负责人,分别到省、市总指挥部报到。

1月30日,总指挥部发出第三号通告"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人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要求红卫军中队长以上骨干要到公安部门登记自首。

2月1日,《人民日报》以"西南的春雷"[附录11]为题发表社论,祝贺贵州夺权胜利。到1月底,全国以下六省市率先夺权,次序如下:

1月6日,上海市夺权;
1月14日,山西省夺权;
1月25日,贵州省夺权;
1月27日,山东省夺权;
1月28日,北京市夺权;
1月31日,黑龙江省夺权。

关于贵州夺权,王年一在《大动乱年代》中说:"在贵州省夺权之前,原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连续向中央发了许多电报,反映当地文化大革命情况。王力对此人颇为欣赏,认为他是部队中不多见的'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并向毛泽东作了推荐。李再含1月下旬到了北京,在江青处受领了回去夺权的任务。江青对他说,差不多的地方都要夺权。"

1967年10月17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撤销。1968年1月27日,贵阳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撤销。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194页。

(二)毛泽东亲笔批示,肯定贵州夺权《通告》

1月31日,毛泽东看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他提笔批道:

"恩来同志:这个通告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如何,请酌。"[2]

2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并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称贵州的夺权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2月3日,总指挥部发出《十项通令》[附录12],提出对领导干部实行"抓、罢、提、留、调"的五字方针。

2月10日,省革委筹备小组在省图书馆连续几次开会讨论省革委的组成人选。会上学习1月31日《人民日报》提前刊登的、2月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社论说:"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地化所徐英年宣读社论,在读到"革命的领导干部"时,略去了其中"领导"二字。贵阳师范学院的孙世政立即发言,当场予以纠正,并感觉到徐别有用心。红卫兵们很不熟悉贵州干部队伍,省委组织部王章宪认为原省长李立"可考虑",工交系统的王运荣推荐省物资局副局长张明[3]。会上同意由李再含任省革委主任。对常委名单分歧意见较大,同意由李再含圈定。

2月13日,"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在邮电大楼前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宣布,报经中央同意的省革委委员共20人,李再含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明为副主任。次日成立大会发出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告全省人民书》[附录13]。

2月15日,周总理接见贵州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关于区别对待干部问题,贵州提出"抓、罢、提、留、调"五字方针,总理说:"你们提了五个办法,抓的是少数,罢的是少数,多数调、留、提。调的是有

些错误,不能继续领导,调离领导岗位。留的是执行者,错误不大的。提的是少数。罢、留、提区别对待,主席对此很欣赏。主席看的前一个稿子,你们的文件27号送给我,我28号送给主席一份,他马上看了,他告诉我,你们区别对待是合乎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精神的,不要把所有的干部一棍子打死,不要把他们看得铁板一块。也有好的,不能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除了两面派、阴谋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对犯错误的干部,得允许改正错误,对他们区别对待,这一点主席很欣赏,当时林副主席也在场,也同意。"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15页。

[3]张明(1919—1985),四川平昌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分队长,副队长,政治指导员,中央情报部参谋、科长、情报员,政治教导员,县支队长兼副政治委员,师组织科长,卫生处政治委员,军卫生部政治委员,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贵州水电设计院党委书记,贵州省经委办公室主任,省物资局副局长,1967年贵州省革委会成立时任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1985年逝世。

(三)毛泽东批示简化临时权力机构名称

2月17日,陈伯达向毛泽东报送四份新闻稿,分别是:《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告全省人民书〉》[附录13]、《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陈伯达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贵州省四份材料,内容较丰富,关于三结合的经验也说得好。请主席审阅。如认为可以发表,名称是否简称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请批示!"

2月20日,毛泽东批示:"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4]

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第四篇新闻稿《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上述四份新闻稿中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一词,发表时均改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这在全国是成立最早的革命委员会,1967年2月13日成立。此后,以下几个省市均仿效贵州的称呼:

山东:2月18日成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上海:上海市人民公社2月5日成立,2月23日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山西:3月12日成立山西省革命委员会。

黑龙江: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于1月31日建立,3月23日改名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北京:4月20日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2月22日,经毛泽东审阅、陈伯达修改的《告全省人民书》在《新贵州报》上公开发表。

《新贵州报》由戚休分管。戚休是省革委第四号人物、分管宣传口的常委、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新华社贵州分社因有戚休进入省革委,提高了在贵州的知名度。

2月22日,省革委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举行10万人批斗

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在病中从成都被揪来贵阳批斗,并押在卡车上游街,轰动全城。此后在全省掀起了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高潮。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38页。

(四)中央台向全国广播"贵棉经验"

贵州省夺权并成立了省革委之后,贵阳棉纺厂跨车间、跨班组和走向社会的革命群众组织在2月20日宣布解散,实现了从班组到车间到全厂的自下而上按行政部门的大联合。贵阳市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为催生"贵棉经验"发挥了积极作用。毛泽东对"贵棉经验"非常重视,亲自决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贵棉经验"。

3月1日,《人民日报》在介绍"贵棉经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指出:"贵阳棉纺厂创造了大联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对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革命的促进作用。"全国各地来电、来信、来人学习、参观。这是毛泽东在"一月风暴"期间再一次关心贵州。

3月7日,毛泽东发表"三·七指示",肯定天津市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经验,《人民日报》发表《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

3月23日,李再含到贵州大学,受到热烈欢迎。他认为贵州大学九一五等造反组织宣布解散组织,实现回系归班大联合是个好经验,随后《新贵州报》推介了"贵大经验"。

(五)"上夺下扫,左右开弓"的夺权经验发人深省

2月14日,贵州"夺权经验"见报。夺权时红卫军总部被瓦解,夺权后"工纠"也在2月2日贴出《向毛主席请罪》的大字报,宣布解散。李再含总结的贵州夺权经验"上夺下扫,左右开弓",其含义就是:上夺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权,下扫李铁乃等牛鬼蛇神,向左打击红卫军、赤卫队,向右打击"工纠"。

3月8日,中央批转渡口驻军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上支持左派"的经验:"我们认为,部队只能在确实判明是反革命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时,才能出动坚决镇压。如在两派激烈争辩时轻易出动,哪

怕是少数部队,也危害很大:

(1)容易掩盖矛盾,使观点不能充分暴露,推迟左派大联合的进程。

(2)弄不好要被坏人利用,使部分群众认为部队镇压工人革命运动,挑起一些是非。

(3)还有可能长了保守派的威风,挫伤革命造反派的锐气。保守派往往自恃成分好,历史清楚,认不清大方向,把革命造反派的某些过激行动,统统说成是"牛鬼蛇神出笼了"。保守派还最容易误认为部队是他们当然的后盾,在斗争激烈时,便强烈要求出兵支持。

联系贵州红卫军的遭遇,渡口支左经验极为引人深思。4月13日在《人民日报》见报的"上夺下扫,左右开弓"的贵州部队支左经验与之对比,贵州的做法令人置疑。

本章参考资料

1.中央首长五次接见贵州革命派赴京代表谈话纪要(附录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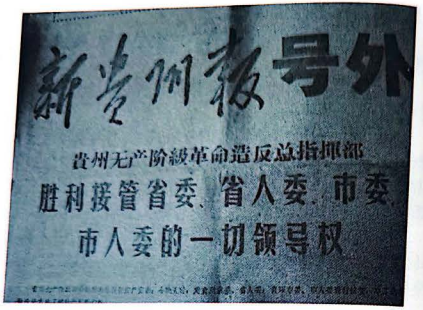
2.《新贵州报》1967年1-2月

3.贵州人民出版社《当代贵州大事记》196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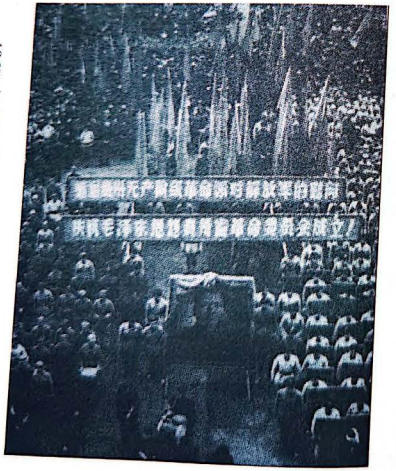
4.《人民日报》1967年4月13日

5.《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6.贵大红缨枪《贵州文革全过程大事记(1966年5月-1967年8月)》



《新贵州报》贵州夺权号外



1967年2月13日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召开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附录9 中央首长五次接见贵州革命派赴京代表谈话纪要

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接见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副政委李再含同志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晚七时三十分至九时四十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

(李再含传达时说:总理对贵州情况很关心)

李再含:(谈到文化大革命中三类人员外出比较严重时)。

总理:这还了得,他们是不是发钱?是在本省,是在外省?

李再含:本省有,到北京也有。主要是搞翻案。

总理:劳改、劳教人员闹翻案,就没有得完了。

李再含:(谈到省、市委中及厅局长中由郭xx发起组织战斗团时)。

总理:这样好嘛!这个更暴露了。

李再含:他们(即省、市委中顽固分子)本身在搞串连。

总理:他们本身搞串连倒可能。是否可以夺权以后宣布个命令:擅离职守,不假外出都要开除。是否开除严重了。请考虑。

李再含:他们本身去搞串连。

总理:所有科长以上人员都要留在工作岗位上。如果不假外出,要给予处分。他们搞串连是搞反串连。

李再含:(谈到李明远时)。

总理:曹狄秋就是指定工会主席组织上海赤卫队(注:上海赤卫队是保守派组织)。

何光宇:(谈到李铁乃问题时)李铁乃掌握几百辆车子。

总理:现在还是这样?

何光宇:现在不是了。李铁乃夺枪。

总理:夺枪是为了拿到所谓证据,不然他们就不会到北京来了。明天(元月二十六日)要宣布命令,出个布告公布说:奉中央指示逮捕红卫军头子,在北京捕了,在贵阳的也要捕,他们是反革命。但,群众是好的。

总理:并宣布造反派夺省市委的权,军区支持。那就大快人心了。具体怎么办?按主席指示,你们要确定政策,如对中层以上干部要限制,不假外出要处分。一个是逮捕的命令;一个是军队支持的命令,今晚(元月二十五日)你们要研究

好。明天再谈。

周总理接见贵州革命派代表时座谈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五十五分至二时二十五分。

地点:中南海。

一、首先总理详细问了贵州、贵阳工人、农民、学生、革命干部的发动、组织及左派大联合情况和代表所代表的革命组织与本人情况。

总理:对于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单独组织革命组织的问题,应严格遵守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三条指示。我一直都不赞成单独成立,只同意搞联络站,联系联系。在北京的人还在闹,对他们要做点工作。我们反对特权,所以不同意单独成立。

复员转业退伍军人战斗团能主动改名字是好的。

二、在谈到北京对待当权派采用的六种办法时。

总理:对待干部,在北京我们采取六种办法:

(1)甲、烂了的:就叫他们在本单位劳动、检查。其他单位谁愿意监督?乙、严重的:交军事方面看管(少数个别)。如彭真,不然群众见到他,会把他砸死。

(2)罢官劳动:但要根据身体状况,搞死也不好,根据主席思想来处理,后期看一看。

(3)撤职留用:三至六个月才能看出好坏,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因为他们对业务上还有用。罪恶不大,可以立功赎罪。立了功,撤了这个可以干别的,小一点嘛。

(4)停职反省:又好又不好,好的是到处可以批判,批判多了也没什么好批判的,打死老虎。

(5)监督留用:可以留用管他,这样公安系统可以多一些。

(6)留用。

以上处理,要群众决定,在省、市委夺权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由革命委员会来批准。对待基层干部要分别对待,分别提出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种。对那些没有参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要用推断的理论,而要看事实。

三、谈到成立全国性组织的问题。

总理:任何全国性组织我们都未批准过。全市性组织都没成立好,怎么能成立全国的?成立全国的一定要跑上层。我们一贯是反对官僚主义机器空架子,现在革命组织搞这一套还行吗?

四、谈到革命左派大联合与夺权。

总理:革命组织要分系统组织才有力,运动是工、农、兵、学、商、党、政、人民团体的大联合。

夺权应以内部左派力量为主体,外援为辅,外因只能煽风点火,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才能算条件成熟,夺权才能算成功。外援和内部都要多方面(指左派)才能算左派大联合。不能单方夺权。

当权派犯错误以后,表现好的就留用。

五、谈到一些非革命组织中的群众。

总理:逮捕李铁乃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后,要大量把受蒙骗的群众团结过来。

(请总理对造反派提出的通令稿指示时)

总理:对坏组织中起义的如何对待?(该稿中未提)要加以明确的政策。宣布李铁乃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被捕,不要用密码,反正电报到就要公布的(代表再次请示通令稿指示时)。

总理:先执行试试,一个文件不会一下子都很正确,都很完整,必须经过实践。当时是好的,以后对照不一定很正确,很完整,因为事情是变化的。

六、谈到学生的串连问题(当时有学生代表在场)。

总理:全国各地串连学生,不要都到八大名城去(如遵义、韶山、井冈山、延安、大寨、北京、瑞金等),如大寨只有三百多户,而去了几千人,又要安排生活,又要作报告、谈话、照相等等,所以忙不了。对生产也有影响,也不能把接待工作搞好。现在,北京的初中和小学考虑准备开学。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接见贵州革命派代表座谈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时五十分至九时。

地点:人民大会堂。

在座的有李成芳、李再含、何光宇等同志。

李再含汇报:介绍贵阳的红卫军现在情况,谈到有人讲江青同志说红卫军是反革命组织。

江青:现在谣言可多了。

总理:是反革命领导篡权,主要是头子反动,马上辟谣,有一个办法可以讲,我们反对苏修领导集团,但不反对苏联人民。

李再含:红卫军内部有所分化,有反对李铁乃的,成立了造反联络站,要区别两个情况,一个方面是以李铁乃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与广大红卫军战士应分开

(江青:必须),底下一些组织已分化,应承认是革命造反派(江青:红卫军当然不是反革命组织,对广大群众不能这样说,主要是头头反动)。

总理:欢迎分化,欢迎立功。

江青:分化有两种:一种向左的,一种向极右的,应该区别。

康生、江青:红卫军名字相当臭,得改名字。

李再含:(谈到贵阳工人纠察队任意抓普通红卫军战士的情况)。

江青:把李铁乃一小撮与红卫军普通战士应该区别开来,这也是毛主席一贯思想,全国范围的红旗军、红卫军、捍卫团、赤卫军这些名字臭死了,分化出去要改名字。

何光宇:(谈到红卫军分化情况,并谈到有一小撮人讲:逮捕李铁乃一小撮是军区和公安厅搞的阴谋,要冲军区)。

江青:唬人。

李再含、何光宇:有人保李铁乃,有几百人游行,准备冲军区(并谈了逮捕红旗军情况)。

总理:(一个个介绍了贵州革命派十一人及所代表的革命组织)。

江青:没有女将,应该有女的,大男子主义(众笑笑)。红卫军这个名字太长,别人记不到,红卫军名字要改一改,当然对红卫军战士不能像对待李铁乃那样。

陈伯达:清一色。

总理:那倒不一定。

你们两个文件都传着看了,想研究一下,明天再座谈这个问题。五个原则(按:对当权派处理的原则),抓一批、罢一批、调一批、提一批、留一批的方针是对的。这五项原则是好的。

(首长又问:你们夺了权以后怎么办)

代表:来之前有些准备,我们离开时夺的权(接着谈了些考虑)。

陈伯达:回去研究,再交上来。

代表:(谈三个机构问题,当前有些组织机构庞杂,谈到红卫军庞大总部时)。

总理:新的官僚机构,就像个省委机构。

代表:(谈关于公安机关保卫文化大革命的组织形式)。

江青:监督小组就是改革,成立保卫委员会是革命。

代表:(谈到三权问题)。

江青:三个权,还有一个军权,军队不是和你们站在一起了吗?

代表:(谈到生产情况和外出串连情况)。

江青:下命令叫回去,限日子。不回去就开除(指内迁工人返回原地)。

代表:(谈了贵阳目前斗争形势和政治力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情况,阶级斗争很复杂时)。

总理:你们把贾启允软禁了吗?

江青:城市街道怎么样,你们要摸点经验。

总理:官僚、地主都在街道上。

江青:这次要横扫。

代表:(谈到工人纠察队情况)。

江青:工人纠察队,是不是凌驾其他组织之上,像北京东城西城纠察队一样。

代表:(又谈当前工人纠察队的活跃情况)。

江青:纠察队要死灰复燃。

周总理与康生同志拉话:所有工会都是保守派的大本营,他们有钱有房子。

江青:钱还不是国家的钱?真够呛。

(代表们又谈到红卫军基层问题)

关锋:(谈苏联二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的关系)。

江青:那天晚上来三个人,李铁乃威胁我、陈伯达、康生要接见他,不见立刻要走。走就走。我们就是不接见。后来一查,还是没走,后来怕他跑,赶快把他抓起来。

康生:一般军字号都是有问题的。

江青:可以改为工人控诉造反团。李铁乃原是什么人?

(何光宇和代表介绍了情况)

江青:李铁乃是流氓,他想当西南王。对李铁乃一小撮,与广大红卫军不同,红卫军的名字臭透了,一定要改,西南王是流氓。

总理:他有五个秘书,我才五个秘书。

代表:(谈省委常委开会情况)。

江青:他们还在开会?这样还能工作。你们要回去,脱离太久太危险,一天几次大变。

陈伯达:你们回去宣布,昨天李铁乃又来了四个人,又抓起来了,我叫人抓的。你们回去赶快自己开会,在控诉团上做文章,名字改一下,叫工人革命造反团,你们就会主动,就不会被保字号利用。

戚本禹:你们和群众商量商量。

江青:这样就把大多数争取过来了,不然被保字号利用。

康生:从全国讲,军字号不高明。

陈伯达:红旗军的问题有反革命背景,他们吃香烟是中华牌,吃罐头,用钱如流水。

江青:很可能与外国有联系。

康生:你们文件总的精神是好的,文字上要修改,有些重复。注意革命有曲折,有几个回合。

陈伯达:你们回去好好搞,可以成为革命模范省,做群众工作,团结大多数,对保宇派分化,瓦解他们,捍卫团正土崩瓦解。

王力:红卫军有所不同,基层组织有很多是很好的,是起作用的。

关锋:对红卫军底下不是分化瓦解的问题,是要造李铁乃的反的问题。

伯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掌握毛主席的战略和策略,要争取大多数群众,要争取动摇不定分子。

康生:北京有个经验,左派要团结。左派内部夺权后不团结相互吵架,你夺我的权,我夺你的权。

伯达:要照顾大局。

康生:要协商,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风头主义都要注意。左派存在这个毛病,尤其是夺权以后,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北京、上海、哈尔滨都有这个问题。

王力:革命派夺权以后,地位变化了,有出现争权夺利的情况,这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意识反映到革命队伍中。

伯达:今天我到一个工厂去,少数派变为多数,矛盾就多了,要注意。

康生:你们(代表团中的)北大、清华要起这个作用,把大多数团结起来(指学生代表),工人纠察队不可怕,李铁乃不可怕,可怕的是内部不团结。

伯达:夺权了要特别注意,否则会走向反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看笑话。

康生:沿这个道路走下来,左派会成右派,搞不好会垮台的,今天重新发表主席的"古田会议"的文章,你们要好好学。

关锋:要为无产阶级而夺权,不能为个人夺权,为小集团夺权,否则会走向反面。

伯达:是整个阶级的夺权!

康生:(对学生代表)你们"三司"有人搞突出,考虑名字排在前面后面的。

代表:底下同志对上面要有意见。

伯达:不要像马铃薯、山药蛋一个一个的,要团结起来!

(代表向首长表示态度)

伯达:要好好团结,吸取教训。

代表:贵州人民非常渴望见到毛主席和中央首长。

(代表们介绍了纪念遵义会议三十二周年大会群众参加的情况)

康生:一定要作革命的左派,就能见到,以后一定要见的。

王力、关锋接见贵州革命派代表座谈会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晚十时五十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

关锋:省、市、厅、局长坏了,但科长、处长也有好的,还要靠他们搞工作。要团结好的干部。教育、团结较好的干部。

王力、关锋:夺了省、市委的权以后有何情况,与他们有联系没有?

代表:联系不多,情况还比较平稳,有的单位夺权有阻力,内部左派力量还不强,须靠社会上广大革命左派支持配合。有的单位只夺了印和钥匙,对生产和工作还不重视。

关锋:那样没有用。

代表:有的人大量转移黑材料。

关锋: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继续犯就不行了,没有犯还可以。

王力:你们有省委干部吗?

代表:有。我们是运动被打成反革命的。

关锋:越被打的地方,就越起来的多些吧!

你们对六四年的"四清"情况怎样看法,在你们的文件中提到这方面,我一点不了解。

(还互相交谈了对省、市委中一些负责人的看法)

本来总理要来,因为总理、江青等同志有事改期见。

李再含、何光宇二位同志要大家留下交换一下意见——对"四清"的看法。

代表:"四清"中二十三条发表后,被他们利用,而变成了形"左"实右,对省、市委中有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根本没有揪出来,也没有受到打击。只整了群众。

李再含:一大批首要分子没有被处分,而只被撤原职,作了几个组织处分算了事。大都整了群众。根本问题是按省、市委和西南局的调子办的,后来二十三条发表后调了贾启允去,贾完全否定"四清",实行形"左"实右的政策,保了一批罪恶分子,笼络一批人。这是李井泉派贾去的,也就是刘、邓的指示。在二十三条

前农村组织贫下中农还是好的。钱瑛在贵州搞"四清"向邓小平汇报后,而邓始终没有向主席汇报(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揭发)。当时刘、邓在四川。

代表:听说遵义还派了几千人(中央去的)。

李再含:有这回事,由中央派出去的。空军、总政、民委、贵州省军区都有。这个是刘、邓决定的。但,不向主席报告,一意孤行(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揭发的)。当时,我也在暗陡搞。

代表:我也参加了两期,后来搞大海战术,把当地干部和群众甩开了。

李再含:这个大家作些调查研究再谈。今天再把两个文件研究一下,康生同志提出是否长了些,有些地方重复。我看与原发表的十条有重复,可以精干简短些。

李再含、何光宇:不能完全否定"四清""。把刘、邓路线提出来不要含糊,至于上报(纸)问题,中央会考虑的。回去研究吧!

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同志接见贵州革命派代表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晚八点五十分至十点十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

代表:宣读《贵州省革命造反派通告和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令》初稿后总理作重要指示。

总理:主要靠你们回去商量,提点个人看法。你们提了五个办法,抓的是少数,罢的是少数,多数调、留、提。调的是有些错误,而不能继续领导,调离领导岗位;留的是执行者,错误不大的;提的是少数;罢、留、提区别对待,主席对此很欣赏,主席看的是前一个稿子(按:此稿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改动)。你们的文件二十七号送给我,我二十八号送主席一份,他马上看了。告诉我,你们区别对待是合乎党中央的政策的,不要把所有的干部一棍子打死。不要把他们看成铁板一块,也有好的,不能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除了两面派,阴谋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对犯错误的干部,得允许改正错误。对他们区别对待,这一点主席很欣赏,当时林副主席也在场,也同意。这是我要转达的第一点。

第二点,现在马上提出人民公社,巴黎公社在我国就是人民公社,是否早了一点。巴黎公社精神主要是直接选举,工、农、兵、学、商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选举。

现在还是革命派夺权,革命造反派在政治上是优势。但人数不超过半数,不能等到人数超过半数再夺权。因为来不及了,我看几个地方都是这样,政治上

是优势,人数上不是多数。但因为中央有号召,条件成熟,夺权形势已成,变成为文化革命第二阶段,连锁反应很快,左派不夺,右派就假夺权,保字派就夺了。当然夺权会有反复,如果是右派,保字派夺了的,我们要反击它,我们还要夺回来,这就看解放军支持谁了。右派、保字派夺走了的,查清楚了,我们解放军要帮助再夺回来,要抓他们的头子,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右派夺权的,经过一段看清楚后,还要夺回来。左派夺权后人数就会逐渐增加。浙江一下子夺了几个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厅、党校,一下子左派占了百分之七八十。我觉得值得注意,我问他们对省委如何看法,他说有两派斗争,举了十多个人,只有两个算左派,这些人你们不知道,我们中央的几个人知道。

革命造反派一开始,政治上占优势,因为中央支持,数量上不一定占多数。夺权后多数是会来的,看怎么个来法?看你们怎么对待?不要猛扩大,要逐步扩大。猛了容易把中间的、保守的吸收进来了,这样权容易被夺过去。这得有个相当时期工作。现在不管叫什么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夺权委员会,都是临时性的。领导权要掌握在坚定的左派手里,可能经过一个时期,一段工作,真正成多数了,才能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公社。现在还是左派夺权,左派掌权,好像四九年军事管制一样。那次是军队打江山。这次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自下而上群众性的夺权。

对原有的干部要区别对待,原党政领导要加以分别对待,总会找出几个人来的,好的留用。如果一个好的都没有就推翻。总还能找出几个人可以监督留用,监督他们做工作。

至于什么时候建立新的省委领导?暂时不提这个。

现在有许多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有些不是党员。不是党员也不要紧,工作也能搞好。你们这次来很注意,尽量是党员,是不是党员没有什么,但得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如果省委能找出一两个,你(指军区李再含副政委)不是参加省委的么?(李再含答:我没有参加省委、参加了文革小组、何光宇同志参加省委了)中央意见:李再含、何光宇同志要参加省委,革命委员会。恐怕你(指李再含同志)还要负责任:没有别的人了嘛!当然这是临时的。将来革命委员会中央也赞同你(李再含同志)参加,监督省委。这次我们找到了一个监督党委的好办法,过去找不到。党代会一年一次的时间太长,难以监督。只有用工作会议,也还是不行。监委会自己都监督不好,人大几年一次也监督不了。主席说过,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才能真正监督。这次我们成立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监督省委。现在政府机关,须要留多少人办事?怎么办好?你们回去创造一个典型,我们提出几点意见,不作任何决定。

除了你们两个文件外,我们提这点补充,你们回去研究创造点经验。

现在全省范围内,地、县还没有夺权,先有个省的革命委员会就好办了,全省一个一个的夺,就可以支持下面革命造反派夺权了。夺权以后要把农业工作抓起来,要不然农业工作就不好搞了。所以先要搞好全省的革命委员会。

除了转达毛主席的两点外,其他都是我们几个人商量的,或者是个人意见(江青同志插话:我们尊重你们的首创,我们说不了什么)。

总理:我们说不了什么,依靠你们首创。首创的东西总会粗糙一些。但不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复认识,反复实践。你们要搞个典型,山西一个、你们一个,往后还会有其他的典型。(对康生同志)康老!你还有什么?

(康生同志讲话。对清华、北大赴黔同学)

康生:你们两个学校,一定要团结,千万注意这个问题,夺权后只要大方向相同,其他问题都好说,可以协商。(总理插话:民主协商很重要)常常是夺权以后分裂。

总理:几乎成了规律,患难时可以团结,夺权后分裂了,这一点,李再含要多帮助他们,你年纪大一点,帮是要帮,但不要包办代替啊!(夺权以后工作机构怎么搞?各种机构需要多少人?你们考虑。)

(江青同志插话)

江青:回去好好研究,不过你们的情况主要是军队支持你们嘛!

总理:何光宇你们考虑人力够吗?因为贵州的特点是:地、富、反、坏、反动会道门一大批。劳改犯、牛鬼蛇神一大批,还有合同工,临时工,六五年毕业生。又是三线建设,如果武装保卫力量不够,可以逐步调整(何光宇回答:够了,问题不大)。只要武装力量够了就好办。不能统统一口吞,堡垒要一个一个夺取(对清华、北大同学),你们这部分力量要好好使用,在那里帮助人家,不要包办代替。当然,你们搞好了,人家让你留下,也可以留下,人家才欢迎,没搞好就不留了。

(代表提出在京设立造反派联络站问题)

联络站可以搞一个,不超过十个人。我们可以给地方、房子和一些方便。夺权以后要统一起来。我们意见:大省不超过十人,中等省不超过八人,小省不超过五人。当然现在刚开始,可以多一点,你们可以有十人。将来有什么文件,可以公开的,我们也可以抄送一份给他们(联络站)。不要老是跑到街上去抄大字报。大字报虽然有好的,也有坏的。有时分辨不清。

(江青同志插话)

江青:来京联络的,必须是彻底革命派。不然,他们又搞特务活动。

总理:你们回去审查好,把现在的调回去。贵州原来是个落后地区,现在搞好了。事情常常是这样,落后的走到前面去了。

代表:(串连学生提出要在成都设联络站的问题)。

总理:贵州搞好了,你们(学生)可以搞云南、四川。

代表:(提文件发表问题)。

总理:可以照发,你们自己的事。将来的领导形式不一定是省长、市长。要集体领导,夺权以后,你们要取消前省委、市委、西南局一切不合理的制度规定。

代表:谈到训练红卫兵和中、小学问题时。

总理:(对江青同志)小学、初中开学问题解决了没有?

江青:没有。现在不好办。教员都走了,高中学生是肯定不同意的。

总理:初中、小学可以开学,总比在外边好。搞不好会被坏人利用。你们在夺权以后搞些试点。数、理、化找几个原来的教员讲。政治课找《毛著》学习好的红卫兵担任。语文课就学主席著作和诗词。

现在有些人发了钱、衣服、塑料雨衣等六大件。每月六元,延大街,许多学校都是这样。还有人拿了钱和东西就躲在家里。你们夺权以后,要动员他们返校参加学习。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工人战斗团赴京代表整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

(未经本人核对、有错误整理人负责)

附录 10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权通告

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风暴,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夺权!!夺权!!!把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大权,统统夺回来!

贵州省委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下,十七年来忠实地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祖师爷的旨意,在贵州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这一小撮人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一批反革命分子、叛徒、蜕化变质分子,给他们挂上"马列主义"的招牌,塞进我党政机关各部门。这一伙人串通一气,连成一条线,上瞒中央、下欺群众,把贵州省搞成一个"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的修正主义独立王国。

这一小撮人,十七年来一直骑在人民头上,欺压迫害敢于坚持无产阶级原

则的革命干部,欺压迫害敢于同他们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一小撮人是压迫贵州人民的大上皇。

这一小撮人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大搞反革命的反攻倒算,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大力鼓吹单干风,把贵州省搞得乌烟瘴气。这一小撮人不顾人民的死活,大肆兴建其修正主义的宫殿,腐化堕落,荒淫无耻。这一小撮人是剥削贵州人民的吸血鬼。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贵州人民起来造反了!一张张大字报像一把把匕首插进敌人的心脏,捅了这个马蜂窝。这一小撮混蛋跳起来了,他们歇斯底里大发作,对革命群众实行疯狂的镇压。他们一手制造"六·八"、"八·三一"、"九·五"事件,把成千上万的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甚至私设监狱,动用专政机器,非法逮捕、刑讯我革命造反派战士,对人民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其时间之久,范围之广,手段之毒辣,在全国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

这一小撮混蛋,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仍然死心塌地地追随其修正主义头子,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混蛋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口口声声说"认罪、认罪",但时时刻刻却在密谋策划,至今还在转移黑材料、排列黑名单,准备反攻倒算,对革命造反派下毒手。

他们一手炮制的工人纠察队、工人敢闯团这样的保皇组织,对付革命派,挑起武斗,制造事件,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

当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被革命造反派粉碎以后,又使出更加毒辣的手段——经济主义。这些混蛋粪土国家钱财,挥霍人民血汗,用金钱来腐蚀我革命造反派队伍,收买工贼叛徒,破坏国家财政经济,破坏生产,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抹黑。这一小撮人已经完全与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美帝国主义站在一条线上了。

这批混蛋们最近又在策划新的阴谋,他们退居幕后指挥,使全省的工作瘫痪。保皇军化整为零,把黑手伸向农村,妄想挑动农民与工人的矛盾,破坏农业生产,其用心何其毒也!

贵州省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十七年来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是清算这一小撮混蛋罪行的时候了!

是砸烂这个修正主义独立王国的时候了!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为保证贵州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向全省人民庄严宣告:

自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五日起,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我们向全省人民号召:

一、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每个人必须在当前这场大风大浪面前经受考验,决定弃取。一切革命者应该毫无保留地支持这次革命行动,拥护和服从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领导。如果谁胆敢破坏我们革命造反派夺权,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

二、抓革命,促生产

所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企业工作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守岗位,坚持生产,不得有误!革命造反派不但要成为革命的闯将,还要成为生产的模范。我们号召全省革命群众努力工作,积极生产,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争光!

三、坚决反对经济主义

所有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上海革命造反派以及贵阳地区革命造反派发出的反对经济主义的通令。立即恢复生产,恢复交通,冻结一切流动资金,取缔投机倒把。如果有意违犯,我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完全有权处置。

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立即逮捕。凡破坏生产、挑动武斗,破坏文化大革命者,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凡把矛头指向我人民解放军,动用武器、弹药,盗窃或泄露国家机密者,依法查处。

五、上述各条希各革命组织宣传、执行。如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由革命群众及有关部门协助监督查处。

夺权斗争的号角吹响了!不管前面有多大的狂风暴雨,我们都要迎上去。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要大踏步前进。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一切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浩浩荡荡地冲决一切障碍,奔向胜利的前方。

一切革命的同志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抓革命,促生产!

打倒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五日

附：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参加单位名单（见正文）。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附录 11 《人民日报》社论《西南的春雷》

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从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这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我们欢呼！欢呼毛泽东思想在贵州省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是对整个大西南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沉重打击。这个胜利，将引起连锁反应，使西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乘风破浪地前进。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建立一个为群众所拥护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领导，是无产阶级的权威。它有威信，有能力，统一地集中地领导夺权斗争。这是夺权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核心领导的权力机构，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集中群众的革命要求，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就是这样一个纲领。它向全省人民发出的五项号召，好得很！好得很！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战的关键时刻，一切革命的干部，都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应当拿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魄力和勇气，应当在群众中亮相，应当振臂高呼，应当亲临前线，和革命群众结合，并肩战斗。只有这样，才能号召广大群众，才能组成一支有集中领导的、有组织纪律的、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胜利地完成夺权斗争的任务。

贵州将彻底变革。贵州在前进。夺权，这仅仅是彻底变革的开始。我们预

祝贵州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沿着毛泽东思想的光明大道胜利前进！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无产阶级！

上海、山西、青岛给我们作出了榜样，贵州又树立了一个榜样。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派！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附录 12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

一声春雷，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当家了，贵州省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完蛋了。真理总是要战胜魔鬼的，全中国、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一定要站到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来。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发出如下通令：

一、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把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夺过来。

二、夺权以后，在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持下，应很快建立毛泽东思想贵州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的产生，由革命造反派民主推选。这个委员会在新的党委尚未建立以前，是全权领导机构，所属单位和人员都应听从革命委员会指挥，逐步建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革命新秩序。

革命委员会应根据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设立若干执行机构。

夺权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夺权以后，革命造反派应充分发挥国家机器的职能，革命造反派必须模范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抓革命，促生产。"

三、夺权以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必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领导和监督，听候处理，不许乱说乱动，必须努力完成革命造反派交给的任务，争取立功赎罪。

凡逃跑在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者，应立即回本单位报到。自动返回者，可以不加重处分。凡拒不报到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处分。

革命造反派必须提高警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决不会甘心失败。他们必然会采取软硬兼施、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等种种手法制造分裂，破坏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待机反扑。我们必须提防这一手。

四、对待当权派，应从他们的具体情况出发，区别对待，作不同的处理。主要看他们对待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对待群众的态度，采取一抓、二罢、三提、四留、五调的方针。抓，就是抓十六条中指出的第四种干部中的罪大恶极分子和死顽固分子。这是个别的。罢，就是罢十六条中所指的第四种干部。这是少数的。提，就是提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一种干部和部分第二种干部。留，即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二种干部和第三种确有悔改的干部。调，即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三种干部，调离他们的领导岗位，分配适当工作。总之，通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对干部要重新排队。

五、"保"字派的一小撮顽固分子，你们听着：你们的祖师爷已经"寿终正寝"，大势已去，你们还保什么呢？难道你们硬要抱住他们的僵尸不放么？赶快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向真理投降是光荣而不是耻辱。革命造反派可以宽大和优待。如果执迷不悟，死保到底，那就是自绝于人民。

凡发生右派和保守派夺权的地方和部门，他们的行动是非法的，一律无效。

六、还有少数观潮派，他们是"保"字号的分店。直到现在，他们还不表示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政治态度。他们貌似公正，不偏不倚，实际上他们向右偏得很。他们是墙头草，风吹两边倒，一旦革命胜利，他们照样"革命"。这种人可谓精通资产阶级的"生意经"。时不我待，该表态了。只要真正向左倒，革命派还是欢迎的。

七、特别要提请人们注意的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反坏分子，收买少数工贼，篡夺了个别群众组织的领导权。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盗用中央名义，发号施令，欺哄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拒不执行十六条和各项政策，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大搞经济主义、宗派主义、挑拨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关系。他们野心勃勃，招兵买马，招降纳叛，大量吸收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把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甚至指向人民解放军，妄图夺取贵州和西南的大权，以便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实际上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积极推销者，是资产阶级当权派的直接同盟军。对于他们，必须实行专政，坚决镇压，否则就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我们的政策是：(一)首恶必办；(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三)反动集团中的小头目，凡自动投诚报到，不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四)凡受欺骗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要求他们起来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五)各群众组织必须彻底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以整顿，把牛鬼蛇神一概清洗出去；(六)凡属反动组织，应予取缔和解散，其主要成员应由革命造反派严加审查，罪大恶极者应逮捕法办。

八、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搞思想革命化，实行民主集中制，破私立公，坚决反对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极端民主化，从思想上消灭私有制度留下的一切余毒。

九、由于西南局和前省、市委积极地执行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总指挥部郑重宣告：对西南局和前省、市委所发出的一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宣布无效，并呼吁西南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西南局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把持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

十、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的一切通告和通令，必须坚决执行。

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若有违反以上各条者，一律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查处。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附录 13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告全省人民书》

新华社贵阳二十一日电　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彻底打碎反革命修正主义旧机器的条件下，按照政治标准第一，实行"三结合"，兼顾代表性的原则，建立起的新的临时权力机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于二月十三日正式宣告成立，并且发表了《告全省人民书》。

《告全省人民书》全文如下：

(一)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的积极援助下，实行大联合夺取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的省、市大权，一举成功。贵州人民重新走上了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道。

十七年来，贵州省委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盘踞下，忠实地推行其祖师爷的旨意，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罪恶滔天，恶贯满盈。现在，这些修正主义分子被人民推翻了。

(二)现在，我们向全省人民庄严宣告：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行使大权的临时机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下的红色政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酝酿和协商，按照政治标准第一，实行“三结合”，兼顾代表性的原则，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由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学生、干部、省军区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由李再含同志担任主任委员，张明同志担任副主任委员。在新的省委尚未建立之前，这个革命委员会是全权领导机构，负责行使贵州省的党、政、财、文各种大权。

无产阶级革命派有权监督革命委员会，不称职的委员，可以随时提出罢免。

从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日起，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机构和监督机构。凡是总指挥部发布的一切通告和通令，继续有效。特别是一月二十五日的通告、一月三十日《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的通告、二月三日的《十项通令》，十分重要，必须坚决执行。

在此，我们要严肃指出：实行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当地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革命领导干部的三结合，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是极为重要的。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判断真夺权还是假夺权，还是过“左”夺权的标准。不认真实行三结合，即使夺了权，也是绝对不能巩固的。谁反对这一点，谁就不是真正的毛主席的战士。

（三）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

一、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二、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到首要位置上来。我们不仅要进行改造客观世界的大革命，还要进行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灵魂的大革命。破私立公，树立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

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按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把这个委员会建成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机构。

三、把无产阶级夺权斗争进行到底，不要半途而废。坚决实行革命大联合，坚持实行三结合。

四、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和“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坚决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

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贵州夺权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掌握了领导权和主动权。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已经被打倒；“保”字派的所谓“纠察队”及其附庸，已经土崩瓦解；

李轶乃、黄世明之流的牛鬼蛇神，受到了坚决镇压；观潮派、中间派纷纷向左倒。在一派大好形势下，对全省当前的革命和生产问题，我们作出下列决定：

一、奋勇前进，彻底、全面夺权，巩固和行使已经夺回的大权，坚决打退无产阶级的敌人的任何新反扑。

坚持文斗，反对武斗。

夺得权，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无产阶级革命派万万不可松懈革命的斗志，必须及时识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保”字派的一切新阴谋，继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流毒，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凡贵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了权的部门、单位，迅速按系统、行业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组成临时权力机构。各级的革命委员会须报经上级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凡发生右派和“保”字派夺权的单位，一律无效。

各专区（州）和县的夺权斗争，正处于严重的决战阶段，各阶级各派政治势力都在争夺。省革命委员会将派出观察员，坚决支持和援助各地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各地革命派夺权以后，也必须建立“三结合”的无产阶级临时权力机构，报经上一级革命委员会批准。

二、立即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

最近要重点学好《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党的作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光辉著作。

三、按党的政策做好干部处理工作。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毛主席一贯强调的我党的传统政策。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必须打倒外，我们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很好的经受考验，改造自己。在当前夺权斗争中，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派接管，在左派监督下搞好工作，立新功、立新劳，对于各级广大干部，不能一律排斥；对于犯一般错误的干部，要允许和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将功补过。正确贯彻我们在《十项通令》中提出的一抓、二罢、三提、四留、五调的方针。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下，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四、为进一步发展大联合，建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革命新秩序而斗争。

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就没有夺权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大联合是阶级的联合，不是大杂烩、俱乐部。目前，跨行跨业的“总部”名目繁多，有一些“总部”常是先有“司令”，然后招兵买马，这类组织往往成为反坏分子、社会渣滓的防空洞。原来的一些革命造反派组织，他们在同原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但是,在夺权以后已经暴露出许多矛盾,比如一个车间、工厂,同时存在分属几个总部的组织,各搞一套,互相磨擦,妨碍基层的联合夺权,不利于"抓革命,促生产"。因此,我们提倡按单位、按产业、按系统,实行条条与块块相结合的联合,真正做到革命在一起,生产在一起,完成本单位、本系统斗、批、改的任务。在这种形式的联合基础上建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它具有伟大的生命力,是一件了不起的创举。

原有的总部应立即停止发展成员,逐步整顿组织,归口参加大联合。凡新建的"总部"一律解散,其成员参加本单位革命组织。

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克服当前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有这种思潮的人,他们怀疑一切,反对一切,打倒一切,甚至对红色政权,采取藐视或敌对态度。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抱这种观点的人,最后势必连自己也被打倒。

提请人们注意:目前劳动纪律松懈,无故擅离工作、生产岗位,无故缺勤的现象相当严重。吃人民的饭不干活,是十分可耻的。对屡教不改者,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采取纪律措施,由停发工资直到开除。

还有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和小偷、流氓、投机倒把分子等社会渣滓,近来猖狂一时,他们是革命新秩序的破坏者,对这些坏家伙要有必要的惩办。

五、冲破阻力,大力地推进农村的文化革命和生产运动!

农民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多数地区还是阻力很大。有些地方,贫下中农的革命派即使暂时力量还小,但是,他们是革命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他们那里,存在着巨大的、胜利的力量。

农村的阻力,主要来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近来,这一小撮人在农村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滥发救济粮、救济款,还把种子、储备粮分了,收买群众;许多地方组织农民的"纠察队",围攻贫下中农革命派,为自己保驾;制造谣言,诽谤革命派,欺骗蒙蔽群众的更为普遍;特别严重的地方,刮单干风,破坏集体经济,或者制造民族矛盾、派别斗争,挑动武斗。革命委员会对这一小撮人破坏农村文化大革命和农业集体生产的罪行,决不会等闲视之。"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我们号召广大的贫下中农革命派,迅速大造特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大造特造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的反!经过奋斗,冲破阻力,把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统统掌握在贫下中农革命派手里,以利农业生产的发展。

六、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根据国家计划的安排,今年我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任务很大,工

业、交通、基本建设、财贸等各条战线都要来个大跃进。

革命的工人不仅要成为革命的闯将,而且要成为生产的模范,应该超额和提前完成生产计划。

目前,农业战线上的问题突出。"一年之计在于春",做好备耕工作是当务之急。贫下中农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把备耕的领导权夺过来,掀起积肥、兴修小型农田水利等生产高潮。农村的各级干部,都要参加集体劳动,在做好春耕工作中立功。凡躺下不干者,定予严办。

各地应当切实安排好灾区群众生活,关心人民生活,开展生产自救活动。

各地应当发动群众开展春季造林活动。严禁砍伐、破坏森林,违者依法论处。

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农村。我们革命派要为今年农业大丰收贡献力量!

(五)"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今朝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凭着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凭着这个舞台,一定"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

(原载1967年2月22日《新贵州报》)

第十章 “西南春雷”激起的学生运动

(一)从“二月抗争”到“二月镇反”

1967年2月前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一批老同志,先后在怀仁堂碰头会和军委会议上对“文革”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特别是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本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但被诬为“二月逆流”。当时康生、江青、张春桥、陈伯达说“二月逆流”的主角是“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两帮凶”指余秋里和谷牧。毛泽东听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2日至3月18日,这些老同志被批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直至“九大”后撤销。

成为“二月抗争”导火索的主要是四件事。一是1967年1月4日陶铸被突然打倒,二是野战军是否要像地方一样搞运动的问题,三是把各地20多位老干部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的问题,四是关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毛泽东批评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把这个名称改过来,老同志们得知后认为这是个抗争时机。

“二月抗争”的内容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是“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的问题,二是要不要稳定军队的问题,三是要不要保护老干部的问题。谭震林在“二月抗争”中起了带动作用。

1968年7月,李再含对安顺代表说:“说贵州有‘二月逆流’,三月黑风,这些都不符合实际,在贵州都不存在。谭震林跟我们贵州

根本沾不上边。”

但据不完全统计,1967年二三月间,全省各地有52万群众的218个革命群众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有2000多人被关进监狱。这是“二月镇反”。

(二)三股“反革命逆流”

1967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社论说:贵州夺权胜利“这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附录11]

2月3日,在“西南春雷”的激励和鼓舞下,贵州省大专院校革命造反联络站即“八大院校联络站”成立。联络站组成人员是:师范学院庞守忠、李可仲,贵州大学王玉林,贵州工学院田子明、赵永康,贵州农学院李俊平,贵阳医学院郑黔源,中医学院朱春生等。

“八大院校联络站”的红卫兵们到贵阳棉纺厂宣传和动员各革命群众组织实现按部门、车间、班组的归口大联合,催生了“贵棉经验”。

“八大院校联络站”成立时,力促贵阳医学院两派大联合,吸收了运动初期的受害者贵医“红卫兵·红旗”为联络站成员,并要求贵医“工尖兵”与对立派搞好大联合,“工尖兵”头头王斌不同意。贵医“工尖兵”没有被吸收为“八大院校联络站”成员。

在北京“二月逆流”影响下,省总指挥部和省革委错误地看待“八大院校联络站”,视之为洪水猛兽,严重地挫伤了学生们的积极性。

2月9日,省总指挥部在《新贵州报》登出《二·九通令》,将西南学生)开除出总指挥部,并勒令该兵团主办的《主沉浮》小报停刊。原因是该小报上的一篇杂文《理水拾遗》,影射总指挥部某些人。“八大院校联络站”认为,这篇杂文有错误应予以批判,但不应开除该兵团。“八大院校联络站”同中科院贵阳地化所出现意见分歧。

2月13日省革委成立这天,李再含打电话给“八大院校联络站”成员、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团长杨再兴:“对贵阳医学院两

派该支持哪个组织要慎重。”

2月24日，已进入省革委领导班子和办事机构的中科院贵阳地化所孙昌德、徐英年、郭其悌等人，写出向《主沉浮》应战的大字报，将“八大院校联络站”、“贵医红卫兵·红旗”和《主沉浮》一起列为三股“反革命逆流”。次日，《新贵州报》开始批判《理水拾遗》。

2月26日，李再含和省总指挥部出动2000余人，其中有三个连的武装部队，调集卡车、指挥车、宣传车共数十辆，对“贵医红卫兵·红旗”进行反夺权，开创了省革委和省总指挥部打砸群众组织的恶劣先例。当天，在原“红卫兵·红旗”的基础上，以这个日子命名的“贵医二二六兵团”成立，举办了被打砸的现场展览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同情。

3月3日，《新贵州报》发表社论，标题是《政权，就是要行使镇压之权》，针对学生中所谓的“三股反革命逆流”，充分表现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不懂得如何运用联合、统一的办法去团结人，仍然是沿袭了旧班子旧统治的老一套，继续专制独裁，只会斗争镇压。所谓的“人民民主”只是骗人的幌子和装饰而已。

3月5日，与北京“二月逆流”相呼应，省总指挥部在有省军区负责人参加的大会上宣布，《主沉浮》是“反夺权的舆论准备”，“八大院校联络站”是“反革命复辟的组织准备”，“贵医二二六”是“反革命复辟的急先锋”。

3月7日，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几个战斗队在“千钧棒”79号寝室开会，决定就夺权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去找李再含”反映，因一位与会者的记录笔误，“找”写成“抓”，结果被戚休等人诬为“去抓李再含”。李再含对此很在意，并在一次会议上说：“有人要打倒我，我是打不倒的。”

（三）“乱”与“治”的大辩论

3月7日，首都“红三司”驻黔联络站针对三股“反革命逆流”问题，在贵阳市街头贴出两篇大字报：《大辩论，大联合——对贵阳大专院校学生运动的粗浅看法》，《点把火——大学生必须大乱》。清

华井冈山一个战斗队也贴出《真正的反革命逆流来自何方》的大字报。三月间在贵阳市大专学生中掀起了一场“乱”与“治”的大辩论。

3月16日，中央下达(67)117号文件，指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绝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组织攻击另一个革命组织的工具。

3月26日和3月30日，《新贵州报》先后发表两篇社论《评“大学生必须大乱”的口号》和《再评“大学生必须大乱”的口号》，公开提出在革命群众组织中划分主“乱”派和主“治”派。

“乱”与“治”的大辩论尚未停息，省红代会随即召开，激发了贵州省一场独特的学生运动——贵州省大中专院校居多数学生在夺权后抵制李再含严重错误的斗争。这就是“四一一抗争”。

本章参考资料

1.王年一《大动乱年代》

2.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3.《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4.《新贵州报》1967年3月

5.贵大红缨枪《贵州文革全过程大事记(1966年5月-1967年8月)》

第十一章 省红代会召开与"四一一抗争"

(一)急于求成的办会动机

上海市"一月夺权"之风刮向全国。继山西省夺权之后,贵州省成为全国第二个夺权的省份。红卫兵是"文革"的闯将。贵州省夺权和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李再含为了在全国率先突出政绩,争做"模范省",否决了先召开贵阳市红代会的方案。因为全国虽有了首都红代会,但还没有省红代会,李再含要在全国抢先成立全省的红卫兵组织,决定召开贵州省红卫兵代表大会。

李承宗作为总指挥部核心小组成员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代表,先后两次到省军区向李再含郑重提出意见:大联合还未搞好,尤其是贵医两派还没有联合起来,省红代会不宜匆匆召开。李再含没有接受,他认为在全国争先尽快召开省红代会是大局。他的秘书牛甫作了记录。

1967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倒无政府主义》。

(二)"贵医二二六"被拒之门外

贵阳医学院在贵州高校最早出现了对立的两大派组织。一派是贵医"红卫兵·红旗",其群众基础是"六·六" 事件中的受害者,但因"文革"初期"内革外保",他们对贵医夺权后去给贵州省军区送喜报,省军区拒收。另一派是"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其成员多属"红五类",但因他们"内保外革",在社会上获得造反派身份,参加了贵州省夺权。在"一派掌权"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筹备省红代会

时,贵阳医学院被允许参加省红代会的只有"工尖兵"的代表,而另一派"红卫兵·红旗"的化身"二二六" 兵团则被排斥在省红代会之外。由于不公平,当省红代会召开时,"贵医二二六"便最先冲击了省红代会。

省红代会,不仅贵医"二二六"被排斥,在各大中学校内,凡是反对在学生中"打三股反革命逆流"的红卫兵都被排斥,不能选为"红代会"代表。

(三)"4·11"行动和"4·12"对峙游行

《新贵州报》贵阳讯:"……4月10日下午,贵州省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大会在贵阳隆重召开……来自全省各地的三千名革命红卫兵代表……同声朗读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绝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和贵阳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张 明、吴荣正、陈捷弟、田化一、薛光、朱德兰等同志出席了大会。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杨木生同志(省卫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致开幕词。"

当有2593名代表参加的省红代会于4月10日在贵阳市六广门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时,会场被"贵医二二六"兵团、贵医"东方红"战斗团和贵阳六中"狙击兵"冲击。这使与会的代表们认识到,召开红代会是急于求成,开会的条件尚不成熟。场内许多代表建议暂时休会。贵州工学院、贵阳师范学院等七大院校的代表向主席团提出建议,并就如何开好省红代会的问题与省革委负责同志先后协商四次不予采纳,4月11日在军队刺刀掩护下继续开会。于是,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工学院、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贵阳市六中等主张暂行休会的红卫兵们,支持"贵医二二六"的行动,当天吹起冲锋号,又把会场冲了。在省体操队配合下,扯下了主席台上方的会标。会场顿时混乱,代表们纷纷离场举行游行集会,并通过致省革委、省军区的公开信,要求省红代会暂时休会,有关负责人拒绝接受。

4月11日冲散红代会后，要求休会的各校队伍未解散，决定游行从六广门到邮电大楼前广场开大会。这是“四一一”首次大游行，有5000多人参加。在会上签到的有77个单位，主要是贵阳市各大中专学校。大会宣读通过了“公开信”后，决定成立贵阳大中专学校“四一一”红卫兵联络站，并定期在师院物理楼阶梯教室开联络会，由此形成了“四一一”派并组织了多次“造反”维权活动。

《新贵州报》4月11日发表题为《百万雄师过大江》的社论，肯定省红代会的召开。

4月12日，要求休会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在贵阳市举行了加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人数达一万多人。贵州工学院三千师生排四路纵队，从蔡家关步行到六广门体育场，冲击会场。学生在前、教师在后，走在最后的是工学院党委委员、五十多岁的土木工程教授熊胤篤。会场内代表呐喊抗议，会场外旌旗卷动、军乐震天。

4月12日晚，省革委调动了解放军、公检法、机关干部、工人、居民等几万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口号有：“红代会，好得很，坚决支持开下去！”“打倒无政府主义！”“誓死保卫红色政权！”游行队伍中红卫兵和学生为数很少。

4月13日和4月17日，省红代会第三次、第四次被冲。

省红代会连续被冲很快成为贵阳市街头的舆论中心，并迅速传到四面八方，传到贵州大学和贵州农学院，同学们议论纷纷，许多同学从花溪进城了解情况。大家参加了各大中专院校的红卫兵示威游行队伍，一起高呼口号：“红代会，大杂烩，不能开，快休会。”

（四）省红代会成为“派代会”

省红代会在4月20日宣布结束，产生了45名委员，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常设委员会，但都是从红代会的支持者中选出来的，要求暂时休会的代表被完全排斥在外，省红代会成为“支红”的“派代会”。省红代会主办的小报《红卫兵》，成了“支红”的派性小报。所谓“支红”，有支持红代会和支持红色政权的双重含义。他们的首次大活动是在4月12日，但联系到将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他们忌

讳“四一二派”这一称呼。

（五）王力支持“派代会”，李再含初露两面派嘴脸

省红代会开会期间，李再含应邀赴北京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他在北京民族饭店接见了由师院杨成勋、庞守忠、张成坤，贵工李承宗、田子明、卿启尤，贵大戴玉祥、赵思俊，贵医张方正、黄光明，省体校邓蓉等人组成的“四一一”观点的赴京代表团。听了汇报后，李再含表示回来要调查处理，并说“红代会看来分两步走比较好，先开贵阳市红代会、再开全省红代会比较合适，因为有些县夺权没有搞，情况难掌握。”

4月17日赴京的“四一一”观点代表去北京的目的，除了向李再含反映情况外，还有一个意愿是要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不要报道贵州省红代会召开的消息，但没有达到目的。因为李再含在北京打通了与王力的关系，得到王力的支持。须知王力此时的身份：陶铸被打倒后，毛泽东1月8日召集会议，研究宣传口由谁接替的问题，江青、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人民日报》总编）、胡痴（《解放军报》总编）等出席会议。毛泽东指定王力为中央宣传组组长。这相当于中宣部部长。

“四一一”观点的群众静心等待李再含回来解决问题，统一认识，搞好团结，消除分歧。不料李再含回来后，5月4日在贵阳市六广门体育场为纪念“五四”青年节48周年而召开的大会上讲话时说：“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我在北京啦，听说你们吹起冲锋号，冲啊！好热闹啊！”接着说：“吹冲锋号冲击红代会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付新生的红色政权。”

他的公开表态使不同观点的红卫兵们大失所望，导致红卫兵队伍从观点分歧到组织分裂。人们开始感到李再含这个人变化莫测，要两面派。

实际上在红代会被冲后，4月15日李再含从北京打电话给省革委在筑常委就已定调说：“‘四一一’是以走资派为核心、牛鬼蛇神为基础、保守派为外围的，与‘四一一’斗争是路线斗争。目前这

场斗争，是左右派的较量。冲红代会的头头，请调查清楚，提出一个逮捕名单。”

（六）李吉杰事件和静坐公安厅

4月18日，贵州省公安厅“113”总队拘留了贵阳医学院教师李吉杰，其罪名是“贵医二二六冲红代会的黑后台”。从4月24日至5月上旬，红卫兵代表们多次走访省公安厅，要求释放李吉杰。经过调查，李吉杰这位教师并非冲红代会的黑后台，拘留是对他本人和冲红代会的红卫兵小将们的政治迫害。省公安厅非但拒不放人，还节外生枝对来访者另加“冲击机要室”、“抢走机密材料”等莫须有罪名。

5月13日，由17所院校组成的红卫兵代表200多人前往省公安厅，要求解决李吉杰问题，毫无结果。代表们便进入公安厅礼堂，开始了静坐示威。几位身强力壮的红卫兵和随队人员抬着大饭甑穿行大街给静坐示威者送水送饭，惊动了贵阳市民群众，使这次行动成为山城贵阳人人关注的舆论中心。一时间公安厅里里外外，人山人海；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5月16日，省革委开出宣传车广播通告，“对冲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的专政机关的首恶分子，定要依法惩办”。“五·一三”事件发生后，李再含先后发出两封公开信，给参加静坐的学生扣上“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为右派翻案”等罪名，指派省学校工作小组组长陈捷弟坐镇公安厅对面的独立师，对参加静坐的学生做分化瓦解工作。省公安厅“113”也从省监狱、基建队、通用机械厂等单位调人围攻，截至7月28日，先后达52次78车人。在公安厅的静坐示威行动持续了80多天之久，直到7月下旬李再含对“四一一”问题降调，8月1日才撤出来。

本章参考资料

1.《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2.《新贵州报》1967年4月
3.《四一一战报》（1967年1-9期，1969年23-24期）
4.《411·六六战报》（1967年1-11期，1969年第11期）
5.《四一一工人》贵阳版第2期，1969年3月20日
6.贵大红缨枪《贵州文革全过程大事记（1966年5月-1967年8月）》

第十二章　李再含大刮“十二级台风”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它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

(一)“地化所一兵”贴出公开信

李再含从主持省革委工作开始,就对地化所孙昌德、徐英年、郭其悌等人言听计从。但地化所也不是铁板一块。1967年5月中旬,出现“地化所一兵”(即朱梅年,还有省花灯剧团李少华参与)的公开信,说贵州的夺权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而是(俄国的)“二月革命”。李再含认定这就是“四一一”的“黑纲领”。5月19日,他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的万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宣布对“四一一”要刮“十二级台风”,扬言要在半个月内,将“四一一”彻底摧垮。其主要措施包括大搞舆论攻势;在学生中重新划分左、中、右,组织“支红派”队伍;原来是“保守派”的只要“支红”就是左派;在各大院校组建支红派一派掌权的革委会;在省革委办事机构、省总指挥部办事机构和省文化革命展览馆中清除有“四一一”观点的工作人员;部队支左和军训工作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支红派”等。

5月26日,地化所支红组织“侦察兵”的铅印长篇文章《“四一一”与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面世。长篇大论掩饰不了地化所头面人物的权力欲。比如早些时候讨论省革委会的班子应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其中应有“革命领导干部”,地化所徐英年读报就省略成为应有“革命干部”;大家提名让李再含当省革委会主任,徐说李

当当顾问就可以了。

(二)《新贵州报》上首现支红组织

早在省红代会召开期间即4月13日,贵阳师范学院就最先出现了“支红串连会”。4月16日,《新贵州报》头版头条的报道中出现三个支红组织: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坚决支持全省红代会串连会、贵州工学院保卫红色政权联络站、贵阳中医学院“卫红战斗团”。这些组织的出现,是对“贵棉归口大联合经验”的否定。

“四一一”学生静坐公安厅后,李再含在已成立革委会的地区和单位普遍成立“捍红中心组”、“保卫红色政权联络站”、“卫红兵团”等等。并建立了通讯联络和组织指挥关系,形成了遍及全省的、自上而下领导的、跨行业的支红派队伍。

5月22日,贵州工学院支红派成立“新贵工九一五战斗团”。26日,省红代会宣布开除贵州大学红代会和贵州工学院红代会。因这两个红代会是“四一一”观点。27日,贵州大学成立“保卫红色政权联络站”。28日,贵阳地区支红派217个组织联名发表《形势分析》,动员一切力量围剿“四一一”,并由省总指挥部出面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提出“‘四一一’是反革命逆流”。

5月24日，省军区的宣传车和支红派的宣传车开始在贵阳市的大街上一路传播“四一一所谓好,牛鬼蛇神跟着跑”,并制造“走资派”贾启允、陈璞如申请参加“四一一”,苗春亭操纵“四一一”等无中生有的舆论。

6月24日,贵阳市首批学生军训结束举行示威游行,军代表带队一路高唱“说打就打,说干就干,不打垮四一一不是好汉”的战歌,高呼“誓死保卫红色政权”的口号。截至6月17日止,用于对“四一一”刮十二级台风的街头宣传车由原来的10余部增至64部,街头高音喇叭由原来的30多个增至172个。省革委的喉舌《新贵州报》在5月至8月间，矛头指向群众的文章和社论达160余篇,占同期所发表的文章和社论的80%。广播电台、有线广播在三个多月内批判“四一一”的广播达300多次。5月7日至9月5日,

贵州新华印刷厂受命印刷的批判"四一一"的资料达548700本，占同期总印数的80%以上。这些资料包括《"四一一"言论集》、《"四一一"罪行录》、《粉碎"四一一"的大阴谋》、《剥开"四一一"的画皮》等，散发全省城乡各地，在毕节地区和仁怀县农村，这些资料还成为小学生和民兵的政治课教材。这些舆论宣传"四一一"的"要害在于反夺权"、"攻击红色政权"、"要搞垮省革委"。

（三）重新划分左中右

4月15日，李再含说："目前这场斗争，是左右派的较量。"省革委、省军区负责同志提出"重新划分左中右"，并贯彻到"三支"、"两军"工作中去。要求支左部队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支红派"，把"四一一"革命群众置于对立面，破坏了军民鱼水关系。在军训中对"四一一"观点的学生搞围攻辩论甚至排斥。

在"重新划分左中右"错误口号指导下，"四一一"观点工作人员，从省革委办事机构、省总指挥部、省文化革命展览馆中一一清除出去；各大中学校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进行重新登记，凡"四一一"观点的一律取消红卫兵资格；动员学生家长劝说子女改变"四一一"观点，否则身为领导的家长就"有可能成为走资派"。

5月24日，省军区和支红派宣传车在大街上开始宣传"'四一一'所谓好，牛鬼蛇神跟着跑"的口号，并编造"走资派贾启允、陈璞如申请参加四一一"、"走资派苗春亭操纵四一一"等谣言惑众。

从5月中旬起，对"四一一"学生扣发助学金，对"四一一"工人扣发工资，遭到大多数群众和干部的坚决抵制。

6月24日，贵阳市首批学生军训结束，上街举行示威游行，在支左部队带领下，一路高唱"不打垮四一一不是好汉"的歌曲。

7月26日，省总指挥部负责人说：对"四一一""在军政训练上，在升学问题上，在毕业分配上，孤注一掷"。

（四）在三院校炮制一派掌权的革委会

1967年5月的一天，李再含在家中与徐英年、张应保商讨对付"四一一"的办法时说："他们把人拉到社会上来，这是聚零成整，他们跑出去了，我们就在他们单位成立一派掌权的革委会，就会把他们吸引回来，这叫化整为零，只要他们一分散，我们就好办了。"

5月26日，按照李再含的意图，由"工尖兵"一派掌权的"新贵阳医学院革命委员会"在武力保护下首先强行成立，省革委调动了公检法等外单位人员和部队一万多人保卫成立大会会场，"贵医二二六"奋勇反抗，双方发生冲突，不同观点的群众有200多人挨打，其中90人受伤，3人重伤。

5月27日，在贵阳师范学院，李再含如法炮制，强行成立第二个一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布置了两个假会场作掩护，调动公检法等外单位人员4万多人保护成立大会，"四一一"群众在军号声中造反，双方又发生了冲突和打斗。

6月2日，李再含紧接着又在贵州大学炮制第三个一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调来公检法等外单位人员3000多人"保护"成立大会会场。同样布置了两个假会场作掩护，均被不同观点的群众一一识破，后来是在宣传车上草草开完成立大会。"四一一"群众先后三次造了成立大会的反，双方发生了冲突和打斗，"四一一"群众中有11人受伤，4人重伤。

省革委常委孙昌德，这位平时文质彬彬的波兰留学生，此时在主席台前挥舞着拖把，迎面横扫"四一一"到主席台抢话筒的学生。贵州大学总人数1300多人，当天列队参加成立大会的"支红"派仅有97人，只占7%。这种倒行逆施的成立大会，学校80%以上师生不以为然。一位正直的支红战士、中文系62级李登信义愤填膺，火线宣布加入"四一一"。

上述三所高校一派掌权的革委会的成立，通过《新贵州报》的报道，成为省革委认可的既成事实，成为全省各单位、各县市如法炮制一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的样榜。

(五)从省文革展览馆中清除“四一一”

6月5日,省革委决定,贵阳地区“文化大革命”展览馆停止展览。其原因是该馆内的工作人员中的多数是“四一一”观点。这一决定遭到馆内外包括支红观点在内的群众抵制,于是在6月12日又继续开馆。但省革委并未就此罢休,到6月26日,改由省总指挥部总指挥卢焕章(地化所)出面指挥,从贵阳医学院和贵阳市六中调动支红派学生,到展览馆把“四一一”观点的工作人员一个个拉出馆外,发生了打斗流血事件,打伤多人。由于全市人民群众闻讯赶去制止武斗,形成了人民战争,武斗的挑起者纷纷逃跑,武斗的指挥者被群众捉住,被赶出去的工作人员又继续回馆工作。省革委仍不罢休,当天下午又调动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3000多人到展览馆门前示威游行,抗议“四一一”挑动武斗。

(六)制造一系列流血事件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七条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6月26晚,贵阳医学院内也发生了两派武斗流血事件,“工尖兵”居高临下,从楼上丢石块、摔玻璃瓶、撒六六粉,受伤住院者28人。“二二六”进行了反攻,攻占了“工尖兵”占领的学校行政楼。当晚,贵阳地区“四一一”也采取相应行动,派出一个小分队潜入省总指挥部,抢出一批整“四一一”的黑名单和批判“四一一”的黑材料。

7月14日,贵州工学院革委会应邀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赴开阳特区作文艺演出,省革委在18日和20日先后两次从息烽等地调集45卡车不明真相的工人进行围攻,发生了多起流血事件。

李再含对“四一一”的武力围攻,仅在贵阳地区从4月18日至8月16日的4个月内,就先后调动受蒙蔽群众2万多人进行了13次之多,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

本章参考资料

1.《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2.《新贵州报》1967年4-8月
3.《四一一战报》(1967年1-9期,1969年23-24期)
4.《红卫·六六战报》(1967年1-11期,1969年第11期)
5.《四一一工人》贵阳版第2期,1969年3月20日
6.贵大红缨枪《贵州文革全过程大事记(1966年5月-1967年8月)》

第十三章 “四一一”迎着风暴 英勇战斗

(一)“四一一兵团”和“工人支持四一一联络站”成立

从4月13日贵阳师范学院出现“支红串连会”开始,引发了“四一一”观点的学生组织伴随出现。“四一一”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率先成为“四一一”组织。

贵州工学院的革命委员会是在“四一一”出现之前成立的,成立于3月30日,李再含到会祝贺并宣布承认。不久,由于贵工革委会是“四一一”,李再含以省革委和省军区的名义扶持支红派成立了“新贵工九一五战斗团”。于是,贵工“四一一”于5月24日恢复和重建了“贵工九一五兵团”。

5月29日,贵州大学“四一一”恢复重建“贵州大学九一五革命造反团”。

5月30日,贵州农学院“四一一”恢复重建“贵州农学院九一五兵团”。

6月8日,在4月11日临时组建的各大中专学校“四一一”联络站的基础上,迫于形势的压力,成立了“贵阳市大中专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四一一兵团”。“贵阳地区工人支持‘四一一’联络站”同时宣告成立。当天在贵阳市主要大街上举行了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前头的军乐队,沿途一遍又一遍吹奏着振奋人心的《四一一战歌》:

英雄的四一一,
吹响进军号,
迎着风暴英勇战斗!
结成铜墙铁壁,

汇成革命洪流。
冲破阻力,排除万难,
迈开大步向前走!

英雄的四一一,
是山城骄傲,
迎着风暴英勇战斗。
头可断,血可流,
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谁敢反对毛主席,
就砸烂谁的狗头!

英雄的四一一,
红旗永不倒,
迎着风暴英勇战斗。
永远跟着毛主席,
革命到底不停留。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看曙光就在前头。

迎着风暴,英勇战斗,
迎着风暴,英勇战斗,
战斗!战斗!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造反到底,就是胜利!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把修正主义根子彻底铲除,
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
战斗!战斗!
让革命烈火燃遍全球!

由贵阳师范学院署名“反修战士词曲”的《四一一战歌》自此广

为流传，唱响山城贵阳和全省各地区，让“支红”派们也暗中赞赏。

《四一一战报》也在贵阳师范学院面世，开始时为油印版，王润深等刻写，共出版3期，每期260-300多份。报上还创作出了“四一一”火炬，很快广泛流行。5月16日创办铅印《四一一战报》，石尚儒主编，至8月5日共出版9期，每期印发2万多份，总发行量20多万份。

贵州大学物理系王启杨等先后组织了“四一一”宣传车和“四一一”广播站，广播站先在贵阳市喷水池纺织品公司楼上，后转至大十字理发店楼上，每天进行宣传，师院附中数人合作。每天傍晚大十字广场听众云集，成千上万。这样的热烈场面一直持续到“八月踏平”之时。贵州工学院的宣传车也持续进行街头宣传。

由贵阳医学院“226”张曼诚、冷厚珍等20人组成的宣传队，是“四一一”宣传队中的一支骨干力量。他们的足迹和节目遍布省城贵阳和遵义、安顺等外地。

“四一一”兵团委员会由7名常委组成，其中师院2名（孙世政、邱富伦），贵工2名（田子明、卿启尤），贵大1名（戴玉祥），中医学院1名（孙定隆），六中1名（刘立可）。为增强代表性，常委人数后来增至12名，增加农院1名（陈XX）、贵医1名（张方正）、红交校1名（傅红）、九中1名（高星）、女中1名（高英）。

（二）工人、干部、居民风起云涌支持“四一一”

5月至6月初，贵阳市南明区委三名干部先后两次写出大字报支持“四一一”，指出把斗争矛头对准学生是错误的。

6月7日，贵阳棉纺厂成立支持“四一一”联络站。

6月21日，贵阳钢铁厂成立支持“四一一”联络站。

6月21晚，省火电建设公司100多人上街示威游行，不承认一派掌权的公司革委会。

6月22日，省公安厅13名干部张贴公开信支持“四一一”，指出省公安厅“113”逮捕贵医教师是错误的，把斗争矛头对准学生是错误的。

6月24日，《新贵州报》成立支持“四一一”联络站。

6月25日，军训后的贵阳女中成立“四一一”兵团。

7月13日，“省市文化新闻系统四一一联络站”成立。

7月14日，由省委组织部王章宪、郭振楚等4人牵头支持“四一一”的“省市机关干部‘714’串连会”成立。

7月23日，已宣布解散的“贵阳战斗团”恢复重建，接着“贵州红色工人战斗团”恢复重建，这两个工人组织都先后发表了支持“四一一”的声明。

7月24日，“贵阳地区公安系统支持四一一联络站”成立。

7月29日，“红卫军平反联络站”成立，并发表支持“四一一”的声明。

8月中旬，支持“四一一”的各个工人组织联合筹建了“贵阳地区四一一工人兵团”。

以上局面的出现是李再含鼓动其可操纵的力量，对“四一一”极尽歪曲事实、造谣诬蔑和无限上纲之能事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不符合事实的宣传，群众不愿听，它不但不能说服群众，恰恰相反，它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赶到另一面，使“四一一”的队伍越来越大，同情支持者越来越多。《四一一战歌》极具鼓动效应，在省城贵阳传唱得妇孺皆知。《四一一战报》群众排队购买，争相传阅，多付钱不用退，支持办报。“四一一”的宣传车和广播站听众云集。“四一一”的集会游行，群众踊跃参加，夹道欢迎。这样，在机关厂矿出现了上班时“支红”、下班时是“四一一”，白天“支红”、晚上是“四一一”，在单位上“支红”、在社会上是“四一一”等奇特现象。有的工人甚至还提出了“不要工资不要命，支持四一一闹革命”的口号。

（三）搬迁贵工印刷厂的较量

“四一一”成立后，贵州工学院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师生都是“四一一”，贵工俨然成了贵阳地区“四一一”的大本营。贵工《春雷战报》就成了贵阳地区“四一一”的舆论阵地，贵工印刷厂成了贵阳“四一一”的舆论加工厂。虽然在4月11日事件后大约两星期，贵阳《四一一战报》也相继发行，但当时的贵工《春雷战报》发行铅印

版，涵盖贵阳地区，火力甚猛，特别是李再含“五·四”讲话后，《春雷战报》火力更为集中，言辞更为激烈，因此为李再含所嫉恨，力图控制或端掉贵工罗汉营印刷厂。

5月22日，贵工支红派在李再含支持下成立“新贵工九一五战斗团”与贵工“四一一”对峙。为防止印刷厂落入“支红派”手里，贵工革委会决定将印刷厂从罗汉营搬入蔡家关院本部，以便控制。而贵州省军区也闻风而动，派了2个连队军人电驻在罗汉营工读师专校舍，由陈捷弟指挥，阻止搬迁。工读师专与贵工印刷厂在同一个大院内。

6月7日左右开始拆机装车。同时搬了部分设备带回蔡家关。在搬迁印刷活字版时，军人封锁了大门，车不能开出来。一连两天，装活字的小道奇车就停在朝北的大门边，双方僵持对峙。一连两三天，军人人困马乏，在小树上或凳子上憩息，十分困倦。

罗汉营印刷厂大门的东侧有约三米高的台地，台地的外侧是围墙，围墙外是浣纱路。而台地与大门间是个斜坡。6月13日凌晨三四点钟，贵工“四一一”以一大批学生聚集在大门处，摆出强行破门的阵式，将军人的注意力吸引在大门处；又以一批学生连抬带推，将车从大门处逆斜坡推上台地；聚集在围墙外侧让军人们隔墙看不见的另一支力量，是“四一一”兵团两个中学分团和部分工人群众，他们几乎同时奋力推倒围墙，道吉车就随即推到了浣纱路，迅即发动。等睡意蒙眬的军人们明白过来时，车子早跑了。

这件事在11日晚上有过策划。会议是在环城南路贵阳钣金社（后改为鼓风机厂）开的，贵工学生李永复和钣金社姜敬善等十余名学生和工人共同参与了策划，贵大邓振新也在场。看来，这次成功，大约也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策略和“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典故的现实版吧。印刷机顺利搬回院本部，保证了《春雷战报》的印刷出版。《四一一战报》原在师院印刷出版，此时因师院支红派革委会成立后强占了印刷厂，《四一一战报》便改由贵工印刷厂印刷出版。

对此事件，省军区事后说，至少有一个团级军官在给工学院“四一一”出谋策划，并力图抓出军内这个仲进“四一一”的黑手，以便给“四一一”戴上“有军内走资派控制的反动组织”的帽子。但因

总是找不出钢鞭材料而作罢。

6月28日，《春雷战报》刊登长篇文章《贵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刘修的门徒戚休》，署名“新北大公社‘红七一’”。该文以《共产主义的新课题》为主要内容，表达了“四一一”人的心声，被人们公认为“四一一”斗争的纲领性文章。此文的作者是北京大学贵州籍学生张甦[附录14]。

（四）大方事件和静坐绝食斗争

6月29日，贵阳师范学院“四一一”·“六六”战斗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一行38人应邀前往毕节参加“七一”庆祝活动，省革委指示毕节地区革委加以阻挡，宣传队途经大方县城时被大批农民阻拦和围攻达两天一夜，断水断粮，并砸烂汽车，宣传队开展绝食斗争以示抗议。在当地“四一一”战友支援下，到7月5日才解围前往毕节。

7月3日，贵阳“四一一兵团”闻讯派出300名学生乘坐贵阳市人民汽车公司10部公共汽车前往营救，车队驶过黔西县城，却在林泉一带被蜂拥而来的当地农民分段阻截，死死包围。十辆公交车无一幸免地遭到惨重袭击。车上所有学生纷纷下车与其理论，但面对着抱持“反对红代会就是反对省革委，反对省革委就是反对毛主席、党中央”这一逻辑的受蒙蔽者，有理说不清。突破围追阻截，纷纷退至黔西县城的半数学生，由师院的姚德仁、贵工的谈善达组织，在当地“四一一”学生和群众支持下，固守黔西电影院，并一日数次、连续几天在县城进行示威游行。在派出代表与黔西县革委进行谈判的桌面上，双方频频捶桌，互不相让。幸好是当时的县人武部部长易才学及时调停，谈判才没有演变成一场拳脚大战。

7月10日贵阳人汽公司一名实习司机驾驶公交车前往大方，车上有沿途搭便车农民十余人，车子从高数十米悬崖翻入鸭池河中，造成驾驶员和搭车农民等9人死亡，1名修理工、1名售票员和1名省建一公司姓金的工人获救。

据不完全统计，这次调动农民群众共达2600多人。在鸭池河、

大关、黔西、林泉、黄泥塘和大方之间，沿途共设有18道关卡。

7月3日下午，贵阳“四一一”群众100多人集队前往省革委要求处理大方问题，未获答复。7月7日，“四一一兵团”委员会提出书面要求，请省革委、省军区立即制止事态的发展，将被围困的“四一一”群众全部接回贵阳，并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仍不予理会。

7月8日晚8时，“四一一兵团”1,300多人在贵阳市大十字广场开始了静坐绝食斗争。到7月9日上午，参加人数猛增至4000多人，下午再增加到5000人。一队队工人高呼“不要工资不要命，支持‘四一一’闹革命”的口号，慷慨激昂地加入静坐绝食斗争队伍。据不完全统计，中途参加进来的共有58个单位的队伍。7月10日，绝食静坐的人数再增加到5000多人。安顺运输公司“红旗战斗团”开来84部汽车，停放在贵阳市喷水池四周，声援静坐绝食斗争。

因李再含陪同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去解决云南、四川问题，“四一一兵团”派出代表前往成都找李再含。后由贵州省军区派出汽车将受困的“四一一”群众300多人接回贵阳。

绝食斗争至7月12日凌晨2时宣布复食，共持续78小时之久。先后共昏倒409人，被送医院抢救。

这次绝食斗争受到群众极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山城贵阳群情激昂，人心沸腾。据不完全统计，前来声援的单位达到600多个，收到慰问信400多封。北京、西安、郑州、成都、重庆、济南等外地在黔红卫兵组织共40多个单位声援和支持了这次绝食斗争。清华“井冈山”、首都中学红代会在黔红卫兵参加了静坐绝食斗争。

（五）围攻师院“四一一”的“七·一三”事件

《四一一战歌》出自师院，《四一一战报》在师院编印，师院的“反修战士”和“千钧棒”战斗队被誉为“四一一”的理论权威。这便是李再含们要力图围攻和踏平师院“四一一”的根本原因。趁大十字静坐绝食斗争刚刚结束，“四一一”群众体力虚弱之际，李再含们部署了围攻师院“四一一”的“七·一三”事件。

1967年7月13日下午4时左右，师院支红派广播站提前开始

广播，以抗议“四一一”非法绑架省革委副主任孙昌德以及姜德久、廖定文等（实际上他们都不在师院而在贵州工学院）为借口，调动六卡车外单位群众来到师院，分两路分别包围了物理楼和印刷厂。不久，贵阳六中“六二”兵团、贵医工尖兵、贵阳女中等校几百学生不约而同地冲进师院，杀气腾腾，加强了两股包围势力，扬言要“踏平师院‘四一一’”，情况十分危急。

恰在此时，贵州大学驻师院的“奔腾急”战斗队成员朱应长、王怀富、李国祥、周丕应一道从贵阳市中华路一带了解大字报动态返回师院，见状迅速跑步数百米到喷水池，借用当时还在喷水池静坐的安顺汽车运输公司红旗战斗团的宣传小车，通过车上喇叭，沿中华路一路高喊：“紧急呼吁！紧急呼吁！贵阳女中等数百人正在贵阳师院物理楼围困打砸‘四一一’广播站，情况危急。请广大‘四一一’战士和革命群众赶快援救，赶快援救！”听到求救广播，不计其数的“四一一”战士和广大群众一路飞奔，迅即赶往贵阳师院。短时间内，里三层外三层，把围攻“四一一”广播站的女中等校学生围堵在内层，水泄不通，使“四一一”广播站得到保护，女中等校学生也进退不得。

晚上9点后，前来围攻师院“四一一”的有011厂、302厂、七冶、九化、清电、轴承厂、小河电机厂、贵州水泥厂、贵钢、铁二局102厂、林汽119总队等37个单位支红派工人数千人，乘黄河牌大卡车等大小车辆89辆，车到师院门前沿宝山路一字长蛇排开停放，工人们下车迅速进入师院内。此时师院紧连物理楼的大操场已挤满上万人，已分不清谁是支红派，谁是“四一一”派，骂的骂，闹的闹，乱成一团。连师院后侧照壁山森林内都人声鼎沸。至次日凌晨三时左右，各路人马方渐渐散去。“七·一三”事件告一段落。

在“七·一三”事件中，师院两派发生了舆论工具争夺战。结果，印刷厂被支红派占领，广播站和总机室被“四一一”占领。此后，《四一一战报》改在贵州工学院印刷。

由于卷入事件中人数众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某校支红女孩在照壁山被人“强奸”。事后该女孩拿着“受辱”短裤作物证，到各学校各单位做“受害报告”，栽诬系“四一一”分子干的，在不明真

相的群众中给“四——”造成负面影响。

期间、因车辆众多，惹恼了愤怒人群和小“四——”们，小孩子们纷纷将这些汽车轮胎放了气，使几十辆汽车有来无回，瘫痪在公路边十数日。

“七·一三”事件是李再含们挑起学生斗学生，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恶性事件，但在整个事件中，他们没有占到便宜，倒是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省革委副主任张明认定，这一部署是省革委委员、省总指挥部核心小组成员袁昌福走漏了消息。袁昌福从此被清除出省总指挥部和省革委。

袁昌福宁愿不当省革委委员，不当总指挥部核心成员，坚决站出来支持“四——” 的正义斗争，在贵阳地区广大群众中引为美谈。

（六）“热烈欢迎孙昌德、康岩中、姜德久光荣回到省革委”

7月11日，省革委召开群众大会，请大方县的“贫下中农”在会上揭发控诉“四——”在大方“犯下的滔天罪行”。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大会上发言的大方县“贫下中农”代表，是由省革委秘书处的姜德久、廖定文伪装的，姜德久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推荐来贵州的。还有一位伪装的、“贫下中农”打扮的代表坐在小轿车内，他竟是省革委新增副主任孙昌德。于是，孙、姜、廖被“四——”群众送到“四——”的大本营贵州工学院。次日，省公安厅的康岩中去贵州工学院要人，也被贵州工学院扣留下来，要求他们说清楚后再放回。

在7月1日至4日召开的省革委全会上，省革委成员由20人增至80人，增加副主任2名，增加常委3人。

8月2日，李再含仿照武汉“七·二〇”事件后首都百万军民举行盛大集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毛主席身边”的做法，也在贵阳市举行了万人示威大游行，李再含亲自领队，“热烈欢迎孙昌德、康岩中、姜德久光荣回到省革委”。《新贵州报》在显著地位报道了大会消息。李再含后来说“四——就是乱揪，揪到我们省革委头上来了”，指的就是这回事情。

（七）支红派和“四——”的阵容

由李再含主持工作、有地化所孙昌德、徐英年一批知识分子支招的省革委，几个月来对付“四——”的一系列错误做法，在省城贵阳的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中实在不得人心。“四——”获得极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四——”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贵州大学物理系63级共有36名同学，其中30人是“四——”，并承认自己是“红缨枪”战斗队的成员，其余6人中，4人“支红”，2人中立。在贵州大学全体师生中，“四——”与“支红”的比例约为80:20；在贵州工学院，这一比例为93:7；在贵阳师范学院为70:30，但中文系63级全班58人，其中“四——”49人，支红8人，中立1人；在各中学约为60:40；但在开展过军训的中学里，“支红”的比例较大，如贵阳女中等。

在贵阳地区的机关事业单位、厂矿、街道居民中，“四——”有着极为深厚的群众基础。以公交车驾驶员为主体的贵阳市人民汽车公司，“四——”观点的达9成，贵阳棉纺厂达8成，新添光学仪器厂约占7成。

贵阳地区支红派的中坚力量有：地化所的几个战斗队，省红代会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新贵工“九一五”战斗团，新贵医“三七”战斗团（工尖兵），贵州大学“保联”，贵州农学院“保联”，贵阳六中“六二”兵团，贵阳棉纺厂“三一”战斗团，贵州省公安厅“113”总队等。其中，地化所是“笔杆子”，“113”是“刀把子”。

（八）李再含降调，支红派不满

7月13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再含在四川张国华、刘结挺陪同下到达重庆。次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从重庆赶往武汉。此时毛泽东南巡。14日和15日，毛泽东在武汉两次召集会议，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武汉各地问题的汇报，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和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参加。王力代表中央文革明确表态支持“工人总部”，激怒了有武汉军

区背景的“百万雄师”。王力被“百万雄师”痛打致伤。毛泽东从此不再说支持左派或革命派，改说两派都是群众组织，要求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

7月15-20日，李再含在重庆活动几天后回到贵阳。他陪同谢富治等解决云南、四川问题回来，降低了关于“四一一”问题的调子，由“反革命逆流”降为“革命造反派犯错误”，提出对“四一一”要进行“三引导”，组织上引导归口大联合。他在7月23日和24日的讲话中都说：“‘四一一’从整体、主要部分，起主要作用的大体是师院‘六六’战斗团几个战斗队，贵工‘九一五’，贵大‘九一五’，农院‘九一五’也还有一点。从历史上看问题，‘六六’、‘九一五’是革命造反派”，“几个月来，以军队出面，查来查去，‘四一一’与走资派没有什么联系，没有就是没有嘛！实事求是。”同时批评了“不打垮‘四一一’不是好汉”的错误口号。由于这明明是把责任往下推，当场引起了支红派头面人物的强烈不满。他们有的要卷起铺盖回家，洗手不干了；有的甚至要“炮轰李再含”。

7月28日，李再含作了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的动员报告，号召两派群众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

（九）戚休被迫公开认错

7月30日和31日晚上10点至12点，分管宣传口、排名第四的省革委常委戚休，在新华社贵州分社先后被贵工和师院学生“请”到贵州工学院和贵阳市大十字广场的群众大会上作了检查，承认过去抓“三股反革命逆流”和“不打垮‘四一一’不是好汉”的口号都是错误的。戚休在大十字广场当众签字确认。[1]大十字听众人山人海，数以万计。一时间在两派广大群众之间似乎缓和了矛盾，出现了团结的气氛和联合的曙光。但这只不过是假象！实际上一场彻底“踏平‘四一一’”的阴谋活动正在酝酿中。

戚休1967年4月27日起还兼任《新贵州报》革委会主任。1970年4月调往新华社福建分社，后又调往广东分社，在新华社记者岗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

[1]戚休签字内容：对“西南贵野”的开除，总指挥部的做法是错误的；对《主沉浮》当作反动小报批判也是错误的，当时以总指挥部名义又还缉拿黎尚武同志，这也是严重错误的。“二·九”通令和通缉令都应收回。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戚休（签字）（原载1967年8月5日《四一一战报》第三版）

(十)"四一一"兵团委员会扩大会议

1967年7月25至30日,在"四一一"掌权的贵州工学院召开了贵阳地区"四一一"兵团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今后行动的方针政策,贵阳市各大中专学校都有代表参加,代表约三四百人。由于此时江青在河南发表了"文攻武卫"的讲话,导致会上出现极左和右倾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最后在兵团核心小组的坚持下,发表的《十项决议》[2]比较右倾:1.明确"四一一"与以李再含为首的省革委、省军区的矛盾仍然属于人民内部不同观点的矛盾;2.委托工学院立即组建"四一一"赴京控告团去争取中央的支持和调解,在北京地质学院设"四一一"联络站,并争取首都三司和清华、北大的支持;3. 相对集中力量在有条件的重点大中专学校构筑防守据点,做好文攻武卫的自卫防守准备,并制订争取群众及时支援的办法。

[2]贵阳市大中专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四一一兵团委员会扩大会议《公报》及《关于目前贵州形势的十项决议》,见1967年8月5日《四一一战报》第一、二、四版。

本章参考资料

1.《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2.《新贵州报》1967年4-8月
3.庞守中《关于"四一一"产生的几个问题》
4.《四一一战报》(1967年1-9期,1969年23-24期)
5.《411·六六战报》(1967年1-11期,1969年第11期)
6.《四一一工人》贵阳版第2期,1969年3月20日
7.贵大红缨枪《贵州文革全过程大事记(1966年5月-1967年8月)》
8.王启杨《文革期间的"四一一"广播站》
9.曾宪治《战斗的号角,时代的强音——忆"411"战报》
10.邱富伦《给〈贵州风云〉提供若干补充资料》

附录14 张甦: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课题

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战略家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创举,意义比伟大的巴黎公社、伟大的十月革命都要深远。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已进入一个崭新的纪元,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问题,是世界共产主义者从未遇见过的新课题,吸引着共产主义战士最大的注意力。

同时,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为我们展开了一个无限光明的共产主义新天地。我们感到,中国的社会向前飞跃,待这次文化大革命结束,那时的社会将是世界历史上迄今为止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会。那时的中国政权,将是共产主义史上迄今为止最完美、最革命、最坚固的无产阶级专政。那时的中国将作为世界革命中强大的根据地,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一个更深入、更伟大、更广阔的新阶段。这无限光明的前景,将使中国整整一代年青的革命者欢欣鼓舞。

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必然要产生一个世界共产主义史上迄今为止最完美、最革命、最坚固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由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深刻的规律所决定的。如何建立一个这样一个最完美、最革命、最坚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如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继承下来,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课题,在这样一个严肃的革命问题上,贵州"四一一"革命派和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中的个别人(例如戚休)发生了尖锐的原则分歧。在"四一一"革命派看来,必须严格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调动千百万革命群众,高度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坚定不移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从而建立一个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而在省革委的个别人(例如戚休)看来,则完全不是这样,"革命已到一个阶段了",下一步就是要恢复革命的正常秩序,即戚休所谓的"治"。在实际工作上,则完全背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行了一条迎合资产阶级、投降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所谓的"恢复革命的正常秩序",就是恢复到文化革命以前的那种状态,其结果仍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这是问题的全部实质。

围绕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权,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四一一"为代表和省革委内以戚休那样的机会主义者,展开了严肃的不调合的斗争。这个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后的继续,一切革命的同志不可掉以轻心。

省革委前阶段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庄严成立，是西南上空惊天动地的第一声春雷，她把李井泉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窃踞的大西南打了个缺口，极有力地推动亿万群众"解放大西南"革命运动的发展，并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起了伟大的示范作用。这一切不容抹杀。

但是，从前一阶段(尤其是从四月十一日)以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其表现如下：

第一，在对待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问题上

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这次革命的对象，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如果背离了这个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要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在前一阶段，省革委恰恰犯了这种性质的错误。

在前阶段，贵阳的学生要求把《主沉浮》的问题、贵医问题、八大院校联络站问题交群众讨论处理，这本是符合情理的，但是省革委的某两三个人把这些正常要求看作是"反夺权的信号"，视为"反革命逆流"。在后来，他们又要求按照广大红卫兵的意愿，有步骤地筹备和召开省红代会，但是遭到拒绝。省革委内某两三个人一意孤行，导致了省红代会的大分裂，事物走向了他们的反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四一一"派杀出来了。面对这种情况，省革委的领导同志只要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可以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他们并没有这样做。首先，他们极端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他们认为，"'四一一'想在省革委内打开一个缺口，想搞反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四一一'内有五类分子，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当参谋"，他们迎合了"牛鬼蛇神"。基于这种估计，他们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措施：一、加强巩固革命队伍，防止被分化；二、做好分化瓦解工作，"抓一小撮"；三、对"四一一"组织工作要针锋相对，总结经验，提高水平；四、对各单位革命组织要专门组织宣传组、大字报组、辩论组，对"四一一"进行揭发；五、对"四一一"战士区别对待，首要分子要专政。

一句话，把"四一一"看成当前最危险的敌人，不刮"十二级台风"，不"主动进攻"，不"分化瓦解"掉，就不能前进。

于是在贵阳就出现了"九·五"那样的场面。干部、工人、居民、学生莫名其妙地调来向"四一一"示威，甚至动武，围剿"四一一"的高音喇叭响彻全市，30余辆宣传车围、追、堵、捕。绝大多数单位清理组织，开名单，排左、中、右，整材

料。对"四一一""查祖宗"、"追后台"，挥舞谭氏大棒，公安人员出动监视群众，在群众中大抓"一小撮"。对"四一一"观点的工人、干部经济封锁，扣发工资。甚至还出动了武装示威、军人出面打人的严重现象。整个运动的大方向完全被扭转了。以前的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又出现了。贵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了严重障碍，几乎停滞不前。

第二，在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问题上

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大方向。在那些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但是，不能把坚持错误不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不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的人，更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在群众头上，硬塞到"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中来。如果背离这些原则，也要犯方向路线错误。

省革委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

在贵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面夺权的条件已经成熟，完全可以一举完成贵阳市各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任务。但是，由于出现了"四一一"，省革委则背离毛泽东思想阶级分析的原则，把非"四一一"作为划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准，以实现夺权。在贵阳大中学校、工厂企业、机关单位也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排斥占大多数的"四一一"派(相当部分是造反派)，由造反派中少数为核心，纠合保守派和亮相不好的当权派组成"大联合"，实现夺权。于是，许多铁杆保皇分子、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和个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便乘机大反特反"四一一"，借以亮相；有的则借机打击革命小将，削尖脑袋钻进"三结合"的权力机构。这种现象，在贵州大专院校最为典型。例如，贵阳师范学院只占全校三分之一的群众(其中相当数量为保皇派)组成"大联合"，排斥了左派组织"六六"战斗团的大多数群众，在外单位数千群众的保护下成立了一个没有群众基础、没有革命权威的革委会。在贵州大学，也是如此炮制，致使参加革委会成立大会的本校群众不到100人。据说至今还挂不出牌子。对贵州工学院则否认有群众基础、有革命权威的革委会，实行分裂，组织了一个以保守派为主体的"新贵工九一五"，准备成立革委会。

在专州各县，则是另外一种现象。在那里，省革委在夺权问题上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更为突出。可以说是一条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代替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导了夺权斗争。

第三，在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

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建立

省、市权力机构后，如何强化这个机构？一方面必须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另一方面必须有力地打击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尤其要防止资产阶级代理人篡夺革命领导权、搞资本主义复辟，否则就将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弄不好将发生资本主义复辟，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在这个问题上面，省革委严重丧失警惕性，显得软弱无力，给贵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痛心的损失。

省革委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自下而上地来自‘四——’”，因而放过了主要的真正的敌人——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有的已被识破，有的尚未被识破）以及社会上的反动势力，把矛头指向“四——”革命群众，削弱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客观上大大援助了反革命复辟势力。其次，没有纠正和批判那条指导专州夺权的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使许多单位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局面。

第四，在对待人民解放军的问题上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唯一的宗旨。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工具，他只能对人民的敌人而绝不能对人民实行专政，如果颠倒了这个关系，把人民军队调去镇压群众，那将犯极大的错误，那就是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要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方向路线的错误。

前一阶段，省革委内的某几个负责同志，轻易调动部队武装游行，向“四——”革命群众示威，出动军队去贵州工学院，阻拦贵工革委会搬迁印刷机，造成军队与学生的冲突。指使军训人员整“四——”同学的材料；在各专州县如凯里、铜仁、兴义等地派军队武装逮捕革命组织负责人，吓唬贫下中农。这些都颠倒了人民和人民军队的关系，都是方向路线的错误。

综观上述，不难看出，在这四个关系者目前贵州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上，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都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其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原因大概有三个：

一、要指导这样一个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为省革委的大部分负责同志还缺乏经验。

二、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省革委负责同志的指导思想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分析的学说，错误地主观唯心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毛主席告诫我们：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三、已经被广大群众识破和正在被识破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混进党、政、军各部门），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勾结社会上的反动势力，利用保守势力，搞阴风点鬼火，极力转移斗争大方向，极力把他们的影响施加于省革委内部。在这里，混进革命领导机构里的机会主义者，例如戚休之流，是他们最理想的助手。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以后，是不是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差不多”了？如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底”在哪里，在完成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又如何把革命推向高潮——这些问题都要强迫革命阵营内部讨论来作出鲜明的回答。

于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愿望的、在无产阶级阵营中最先进的一支力量——“四——”派杀出来了！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勇猛无畏向前冲锋！他们痛击革命阵营中的各种机会主义见解，要坚定不移地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迎头痛击出现在贵州各地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批评省革委的错误，要求省革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断革命！

一句话，“四——”派是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他们的方向就是贵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他们的大方向完全正确。

决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四——”。如果继续以前的错误，不但“要刮十二级台风”，还要刮“二十四级台风”，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给贵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极为痛心的损失。

李再含同志又处在关键时刻

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原省委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的关键时刻，李再含同志挺身而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带领贵州解放军极有力地援助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西南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李再含同志在那个关键时刻，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为人民立了大功。李再含同志获得了党中央、中央文革的信任。这是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

现在李再含同志又处在一个关键时刻。

如何对待“四——”革命小将，仍然把他们看成“反革命复辟逆流”或是“无政府主义思潮”，从而加以打击？还是把他们看成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

一支最积极、最先进的力量，从而依靠他们？也就是说，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个问题尖锐地摆着，逼着李再含同志回答，这大概是对李再含同志有生以来最严肃的考验。

我们诚恳地希望李再含同志挺身而出，按照毛泽东思想正确地解决上面那个问题，从而把贵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更高阶段；我们向李再含同志建议：

一、省革委必须立即开门整风，掀起四大高潮，和群众一道认真总结前一段经验教训。

在经过充分整风的基础上，认真改正省革委的工作作风，向广大群众作一次诚恳的认真的检查。

二、在整风过程中，按照巴黎公社原则，由群众罢免那些不称职的工作人员（包括常委）。

三、全面检查工作，纠正在专州推行的形"左"实右的路线，按照党中央的文件释放拘留的群众组织负责人，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革命群众组织认真平反，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来协助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

四、上面那些工作都必须依靠"四——"去做，要大胆地依靠他们，并把他们中间坚定的左派吸收进各级革命委员会，健全领导骨干。

（摘自1967年6月28日贵工《春雷战报》刊载《贵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刘修的门徒厮杀》）

第十四章　血腥的"八月蹈平"

（一）变联合为镇压

李再含对"四——"释放善意，招致"支红"派头头们的反对。1967年此时的中国，派别斗争遍布全国，武斗形式不断升级。在国内一连串"血洗"事件的影响下，李再含面对"支红"派头头们骑虎难下的现实，很快转向另一极端。他把地化所头头和公检法头头找到省军区密谋策划，变换戏法。

7月20日，湖北省发生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〇"事件。

7月22日凌晨，江青在接见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时讲话，首次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冲击军队、抢掠武器的事件不断发生，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7月27日，河南郑州发生了"二七公社"血洗郑州烟厂的惨案。

7月29日，李再含在省军区召开的拥军爱民座谈会上讲话时，对"四——"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调子突然升高了。他说"个别党内走资派利用'四——'错误兴风作浪"，"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钻进'四——'"，"我们根本没有承认过'四——'"，并将贵工学院党委副书记达昭、党委委员熊胤笃教授定为"四——"的"黑后台"。

8月2日，李再含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出动了全副武装的部队，会后他领导部队示威大游行，并高呼口号："热烈欢迎孙培德、康岩中、姜德久胜利回到省革委！""打倒贵工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坚决揪出四——坏头头！""揪出四——黑后台！"

8月3日，《新贵州报》开始公开点名批判"四——"。

8月4日，王洪文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制造了攻打上海柴

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大规模武斗事件，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带领10多万不明真相的工人，血洗"上柴联司"，打伤、关押650多人，用武斗消灭了另一派。

（二）向行将垮台的王力求赐尚方宝剑

8月4日，李再含派出一个5人小组乘机赴京，向中央宣传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汇报请示。这个小组由李立领队，姜德久、郭其悌、余听南、王斌参加。到京后住华北招待所。主要汇报"四一一"问题。由李再含为他们拟定的汇报提纲是：

甲、夺权后省革委做工作的成绩。

乙、关于"四一一"问题：

1. 这个组织怎样产生；

2. 这个组织成立以来的活动情况；

3. 有"走资派"操纵（达昭、熊胤笃）；

4. 要打倒李再含、改组省革委；

5. 告新华社记者谷峰的状，告他支持"四一一"活动。

王力被毛泽东封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后，已经不知道天高地厚。8月7日，王力在北京外语学院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夺陈毅的权。8月22日，外事口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周恩来忧心如焚，派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并带去王力的"八·七讲话"。8月25日，毛泽东听取了杨成武的汇报，经过一天思考，于8月26日决心把王力、关锋、戚本禹驱逐出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他要杨成武告诉周恩来，把他们抓起来。王力和关锋被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这三人被称为"小爬虫"。[附录16]

王力在垮台前10天，不失时机插手贵州问题。8月16日，王力带秘书1人，在京西宾馆单独接见李立等5人。李立按提纲作了汇报，郭其悌又专就"四一一"问题作了详细补充。王力在听完汇报后所讲的话，都是针对"四一一"的。事后姜德久在当天就打电话给李

再含、省革委，传达了王力的"指示"。[附录15]

8月18日，李再含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在贵阳市和全省各地大力宣传王力的三点"指示"：

1. "四一一"的大方向是错误的；

2. 李再含是好同志；

3. 新华社驻贵州记者凡支持"四一一"的一律撤回北京。

这三点"指示"以"中共中央来电"、"中央来电"、"王力同志代表中央来电"为题，用大字报在贵阳市到处张贴，为踏平"四一一"制造舆论。

（三）鼓吹"群众出面方便"，组织专业武斗队

8月3日，在贵阳六中"六二兵团"会上，李再含说："现在你们要做好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你们要武装起来，要拿起枪杆子来。""贵州军队人数少，同时军队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五不'政策，出去制止武斗尽吃了亏。还是群众出面方便。对方要打，我们也可以打。"

8月6日，李再含初试"文攻武卫"锋芒，从阳关砖瓦厂、七冶公司和302厂调动工人武装，踏平了贵州省冶金工业学校。

8月14日，李再含在学校基层座谈会上鼓吹"文攻武卫"。随后，贵阳各中学出现了"飞虎队"、"卫戍部队"、"红警司"等武斗组织。

为了在工人中组织专业武斗队，李再含颇费心思。8月上中旬，贵阳地区正在筹建"四一一工人兵团"和组织"红卫军平反联络站"，贵阳本地的工矿企业工人群众同情支持"四一一"的太多，很不可靠。从外地新来贵州搞三线建设的职工不熟悉情况，可以得心应手，服从调配。于是他从011系统、302厂、七冶公司、九化公司抽调了2000人，组成"0379"专业武斗队，加上贵州柴油机厂和贵州水泥厂等26个单位共3895人，用梭镖、藤帽、钢钎武装起来，后称贵州省"八一八"兵团。组成武斗指挥核心组，组长郁昌峰（011系统），副组长张德茂（林业汽车场）、郝素珍、兰荣沛等。李再含还选定了两个突破口。在贵阳，选择了贵州工学院；在专州，选择了铜仁。在贵阳市和全省各地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踏平

四一一！”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与贵州“四一一”挂起钩来。

“四一一”擅长“文攻”，但手无寸铁，又无部队支持，没有武斗能力。贵州“八一八”专业武斗队不是在搞武斗，而是在搞“踏平”。换句话说：贵阳当时只有“踏平”，没有武斗。

（四）踏平贵州工学院，颠覆院革委

由于贵工革委会是“四一一”，贵州工学院成了贵阳地区“四一一”的大本营，支红仅80人左右，不足7%。8月16日，李再含开会策划决定“要端就先端老窝，打贵工。”武装起来的工人队伍，每100人中有一名军人领导。还出动部队4个连队，全部穿便衣，化装为工人。设立了一、二线指挥部，第二线指挥部设在电管局楼上，由杨再三指挥；第一线指挥部先设在独立师一团团部，后转移到省军区司令部楼上，由省军区六号首长王彦才与011系统郁昌峰任正副总指挥。8月17日晚上在公安厅开会，决定当晚12点前兵分两路至蔡家关包围贵工，一路由三桥方向进去，另一路由太慈桥方向进去。当天下午5时在工交联委楼上，由郗素珍布置攻克策略，以“贵工‘四一一’在行政楼放火烧楼”为借口，派消防队去救火，主攻队伍由军代表施忠生领队紧随消防车进入贵工。随后，领队又换为7611部队白天明，再后又换为詹之光。

在开阳磷矿有一支后备队伍，一旦贵阳进攻失利，两三小时可赶来支援。太慈桥去贵工的路口，由从小河、中曹司、甘荫塘、太慈桥调来的“支红”派把守，负责保证队伍顺利进场并狙击“四一一”的支援力量。一线指挥部通知电管局切断贵工电源，贵工顿时一团漆黑，院革委修筑的防护电网也失效。主攻队伍连夜攻打，并火攻办公大楼。18日晨发起总攻，用刺刀、木棒等武器对付学生，乱抓乱打，2000多名师生员工被迫赶出校外。下午3时攻占。不少学生被迫跳楼。“四一一”在抗暴斗争中被抓100多人，打伤91人，其中重伤23人。田子明、张海东、牛荣智从二楼跳下被捉，关进监狱。家住贵工的贵阳九中学生俞昌宁（66年高二）8月17日晚被打死。

“四一一”兵团1967年7月在贵州工学院举办“贵州‘四一一’

革命斗争史展览”，贵阳九中派出绘画高手李颂今（66年初三）和俞昌宁（66年高二）去参加工作。俞昌宁被他们用胶皮包着的钢棍打得颅内出血，当场死亡后，遗体被送到二桥铁路医院。

8月18日，贵阳九中朱召留、周俊、李维金、汪义培、雷进等同学听到俞昌宁被打伤，在二桥铁路医院抢救的消息后，赶到铁路医院，才知俞昌宁已经于昨晚被打致死。同学们怒火冲天，当即通过工人袁朝荣弄来汽车，将俞昌宁遗体抢出。8月19日，九中“四一一”战士100多人，抬着俞昌宁遗体，举着控诉李再含残杀俞昌宁同学的大幅标语，从九中沿新华路、大南门、中华南路，一路喊着“打倒李再含！”“为俞昌宁同学报仇！”等口号，抗议李再含的血腥镇压。沿途群众群情激愤，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口号。游行队伍到大十字，有群众赶上来通知，有两辆大卡车载着戴藤帽、持梭镖的工人，正从大南门方向开来，叫大家尽快撤离。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游行队伍撤到省府路小学内，把含冤而死的昌宁遗体暂寄放在小学男女厕所之间的夹道里。由于从8月18日起，刚成立的贵州“八一八”兵团在贵阳全市搜捕“四一一”战士，冤死的俞昌宁同学遗体连正常火葬都成问题，最后还是在群众的帮助下，于8月20日晚偷偷将俞昌宁遗体送到大营坡火葬场火化。李再含绝灭人性的罪恶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就这样，贵州工学院革命委员会被李再含武装颠覆。随后还举办了“‘四一一’罪行展览会”，无中生有地造谣污蔑“‘四一一’是帝、修、反的别动队”。

到次年1月24日，李再含又支持该院的“支红”派重新成立“新贵工革命委员会”。

（五）对贵阳地区“四一一”的全面踏平

8月18日，一部分“四一一”学生到省军区，要求省军区制止武斗，当场被抓17人，被打伤数十人。当天，李再含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中央要求正确对待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67）117号文件过时了。现在有了革命委会，革委会有权取缔群众组织。”

当晚，李再含等人在省军区司令部楼上会议室给郁昌峰等人布置全面踏平贵阳地区“四一一”的任务和作战计划，连夜出动在省军区吃住的011系统武斗队，武装踏平了驻省财经干校的“贵阳市大中专学校四一一兵团”。同夜，出动油榨片区武斗组织与011武斗队配合行动，踏平了贵阳棉纺厂“四一一工人兵团”，并抓捕了王长宽等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几个月来李再含扶持一派、压制一派，不得人心，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赶到自己的对立面。现在又武装一派、消灭一派，很自然地激起贵阳市内广大群众更加强烈的抵制和反抗。市区内连日出现了群众性自发的抗暴斗争，专业武斗队的车辆和人员一经在街头出现，就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8月18日早晨，遵义的潘少炎坐车到贵阳，在市中心喷水池看到这样的场面：

手持梭镖、头戴藤帽、身穿劳动服、脚穿劳保大皮鞋的一批011产业工人队伍，正在控制喷水池局势。他们在与比他们矮半截的小孩们打仗。手无寸铁的小“四一一”们拖拉他们的梭镖，拿石头打他们，弄得“八一八”的彪形大汉们往回跑，继而又组织起来追赶小孩子们。这些小学生们不怕，边退边打。一直打到延安路小学，学生们关上了大门，爬上了房顶，用瓦块砸下来。“八一八”无法，半小时后撤走了。

正当群情激愤、怨声载道、李再含窘迫难堪之时，“小爬虫”王力的“三点指示”如尚方宝剑，胁迫民心，群众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出动专业武斗队，扫荡了贵阳市中心大十字。

8月19日至24日，掀起了踏平高潮，对贵阳地区“四一一”实施全面踏平，先后冲击“新华社贵州分社”并绑架、殴打支持“四一一”的新华社记者，攻占了贵阳钢铁厂、新添光学仪器厂、电工总厂、人民汽车公司、贵阳发电厂、清镇电建公司等厂矿，以及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医学院、贵州农学院、贵州大学[附录17]、贵阳八中、红色交通学校等。按8月18日圈定的抓人范围，“贵阳市大中专学校四一一兵团”的12名常委都属被抓之列。贵工的田子明、师院的孙世政、贵大的戴玉祥等被关押。

在全面武装踏平中，大批抓捕学生和群众，连日成批挂黑牌、衔稻草游街示众。专政机关变成了关押群众的集中营，贵阳地区6个看守所就关押了500余人，此外还在省军区礼堂、省公安厅车房和六处办公室、市公安局礼堂、第一监狱营建队等处共关押900余人。被强迫衔稻草游街者不计其数。

8月24日，在全面武装踏平之后，李再含操纵下的省革委、省军区发布了一个制止武斗的决定。但实际情况是当时贵阳地区只有武装踏平，并非武斗。全省也是这样。

(六)在全省各地武装一派、消灭一派，营造独立王国

8月5日，经李再含批准，铜仁军分区发放枪支弹药(子弹500发)，调动数千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并利用数百名劳改人员，用大刀、梭镖、步枪、机枪等武器，武装镇压了铜仁“三红派”。造成重大伤亡，被打死21人，被抓住关押、挨打、强迫衔稻草游街的数以万计。

8月15日，武装踏平安顺运输公司“红旗战斗团”和安顺地区“一一七”派。

8月19日，黔南州“四一一”被武装踏平。

8月21日，遵义地区“四一一”被武装踏平。私设监狱127个，被关押、捆绑吊打和游街示众达12000多人，重伤521人，致终身残疾11人，被活活打死的工人和农民3人。

8月26日，毕节地区“四二”派被武装踏平。

9月5日，黔东南州“红总”被武装踏平。被抓捕600多人，被关押500多人，强迫衔稻草游街示众的800多人次。

9月13日，“兴义造司”和“八八经风雨”被武装踏平，并抓捕了所有主要头头和群众数十人，五花大绑衔稻草游街示众。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各地被专业武斗队抓捕、关押、捆绑吊打、衔稻草游街和揪斗的共达26万余人次，被迫外逃的达到6万多人。

在省城贵阳和全省各地武装一派、消灭一派的进程中，王力已垮台的消息在贵州被严密封锁；中央发布要求收缴武器的“九·五”命令，李再含不但不收缴专业武斗队的武器，还在继续发放武器。随

后，中央要求全国各地的两派不要势不两立，要搞革命的大联合。

9月20日，周总理提出要“跑步大联合”。李再含要求“四一一”的则是“认罪”、“反戈”、“退出‘四一一’”。

10月1日，毛泽东号召“要斗私、批修”。李再含后来(1968年4月21日)说“支红无大私可斗”，只叫“四一一”斗大私。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李再含把学习班一是办成一派管训另一派的“集中营”，二是办成专业武斗队的集训队。从1967年9月至1969年3月，“八一八”兵团就先后办过12期这样的学习班，参加学习的达到25000人。他在后来的一个会上总结说：“夺权后打了两个歼灭战，一个是打垮了‘四一一’，一个是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在1967年12月8日至24日的全省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搞武装踏平者被评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王力在贵州犯下的血腥罪行被极力掩盖。李再含此时的种种作为，其明显特征是阳奉阴违，要两面派，在贵州营造独立王国。

10月17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撤销。

12月2日，中央关于正确对待犯错误的老造反派的(67)367号文件下达。

李再含蓄意歪曲要“帮助、批评、联合”的文件精神，对“四一一”否认其组织，招降和收买个别。他物色贵州工学院“四一一”学生董大权为典型，12月3日胁迫他在邮电大楼前广场的万人大会上认罪反戈，然后吸收他进了革委会。

1967年12月9日，中央下达(67)379号文件，要求对公检法实行军管。李再含为便于利用公检法对付“四一一”，对中央文件拒不执行。

(七)“四一一”兵团紧急会议

贵工被踏平的第二天(8月18日)晚上，“四一一”兵团在临时总部省财经干校召开各分团紧急会议。会上“打”与“避”两种意见争论激烈。由于形势紧迫，兵团主要负责人作出决定：“避其锋芒，

撤出据点，保存实力，待机再起。”这虽被指为“右倾机会主义”，但各分团仍然尽力执行了这一指令。兵团战士刚撤离财经干校，全副武装的“八一八”兵团工人队伍就大批涌入占领，并在此设立了“八一八”兵团总部。

(八)贵州“八一八”兵团成立和两名消防战士之死

8月19日，李再含在参加了踏平战斗的头目会上说：“工人的力量不要散摊子，要集中起来，保持下去，捏成一个拳头。要稳定局势，防止‘四一一’的反扑。”

为了震慑民心，显示专业武斗队的威力，踏平“四一一”的专业武斗队选择在贵阳市中心大十字召开成立大会。由消防大楼的消防兵组成的支红武装先到大十字广场四周清除“四一一”的大字报大标语，为成立大会准备会场，“四一一”张贴的“打倒李再含，改组省革委”之类的大字报大标语一律清除。

综合师院杨文华和贵工张再兴两位目击者(当时还互不相识)的各自现场观察，场景如下：

8月19日晚8点前，一支消防兵队伍头戴消防帽、脚穿长筒胶鞋、挥舞着消防斧、铁棒、大刀，气势汹汹地高喊着“打倒刘邓陶，踏平四一一！”从醒狮路消防大楼冲出来，然后沿中华南路朝大十字冲去。马路上的行人先是退到人行道上、市府路和都司路口方向，然后尾随消防兵涌到大十字附近。消防兵驱散看大字报的群众后又撕大字报。这时群众愤怒了，不知是谁带的头，大家齐喊“打‘八一八’！打‘八一八’！”有些群众向消防兵扔石头。这时人越聚越多，黑压压的人群，震天的叫打声。消防兵害怕了，往小十字的汉湘街退回消防大楼。但是有一个撕大字报的动作慢了一点，被四个路口涌来的人群堵住了，他跑进市公安局大院无处藏身，又折回大十字到中山东路口被群众堵住。当时中山东路口的“小上海”餐馆正在维修，搭有脚手架，地上砖瓦石头很多。群众就拆下脚手架的木方，捡起地上的砖瓦石头围打消防兵，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里一层的人打一阵出了气挤出来，外一层的人挤进去再打，轮番反

复。不到一分钟将其打倒在地，微微动弹。

消防兵回消防大楼后，发觉少了人，又重新从中华南路向北冲击民众，同时搜索同伴。在中山东路找到了同伴，一人就背起往汉湘街口，其他人自顾自地仓皇逃向消防大楼。背人的士兵被手提柴块的市民堵住。他甩下已断气的伤员准备脱逃未果，被当场打死在汉湘街口。

后据宣传，这两个被愤怒人群活活打死的战士名叫李光灿、黄旭柱。查不出究竟谁是凶手，不幸成了李再含踏平政策的牺牲品，后被追认为烈士。

张再兴次日晚上还见证了贵州"八一八"兵团的成立过程：

8月20日晚20~21点，武斗队在贵阳大十字四个路口，同时封锁戒严。将所围困的群众堵在大街上，并逐一询问所持观点。将那些嘴壳子特硬的"四一一"或看不顺眼的人捉拿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同我哥哥也被手持梭镖棍棒的工人武装围困在大十字。我身上揣了一把钢丝钳壮胆，还有许多工学院食堂饭票。我趁我的周围人多赶快蹲下，将钳子和饭票扔掉，以免亮出工学院和"四一一"的底牌来。大约22点，一个穿军大衣的中年人站在大十字中心交警指挥台上，宣布"贵州八一八兵团"成立。声称"八一八兵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踏平"四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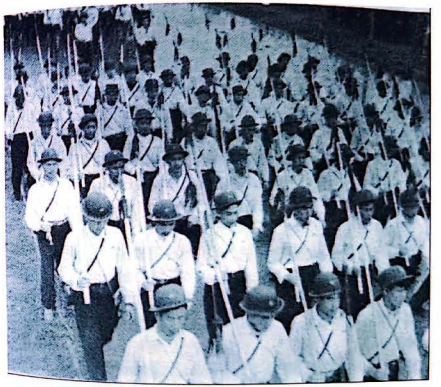
仪式结束，又一一询问群众。我已经先与我同伴的大哥设计了口径，说是到贵阳出差的。他们又去问我大哥，也如是说，这才放我们回家。我们到中华北路的哥哥家时，已经是21日凌晨2点左右了。

专业武斗队"贵州八一八兵团"由郁昌峰(011系统100厂)任司令，彭先胜(七冶公司)、张德茂(省林业厅汽车场)任副司令。7611部队政治部副主任赵怀忠任政委。

本章参考资料

1.《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2.王力同志接见李立同志时对若干问题的指示(附录15)
3.贵大红缨枪《贵州文革全过程大事记(1966年5月-1967年8月)》
4.《新贵州报》1967年7-8月
5.杨文华《那样的年代，那样的事儿——文革日记摘抄》
6.张再兴《我的文革与红卫兵运动史观》
7.邱富伦《给〈贵州风云〉提供若干补充资料》



"八一八"专业武斗队在贵阳市遵义路游行示威

附录15 王力同志接见李立同志时对若干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王力同志接见了李立同志，对若干问题作了如下指示：

王力：你们来了多少天了？

李立：十来天了。

王力：挨不上你们，挨不上号。现在的中心是武汉和武汉周围。像陈再道这样干的，各大军区只有一个。到处抓陈再道是不对的。(当汇报到所谓"411"提出

要改组省革委等许多口号时)

王力:那些口号都不对。

(当汇报到北京学生在贵阳串连时)

王力:我们是不赞成串连的。现在的情况不是过去,要煽风点火,不是大串连的形势,各个地方群众自己会起来,现在大串连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是最高指示,不是我的意见。清华走了七千,去了有的也不是小学生的态度,而是指手画脚,忘记了过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当汇报到所谓"411"打人时)

王力:群众团体要文攻武卫,和军队不一样。

(当汇报到北京在贵阳办报纸时)

王力:我们反对北京任何一个学校在外地办报纸,不管哪一派,北京的学校在外地办报的,我们坚决反对,让他们立即停刊,立即回来。这一条是中央老早定了,不发给他们纸。我们也不赞成北京红卫兵报纸出航空版在地方上印刷。

(当汇报到新华社谷峰等记者在贵阳公开支持所谓"411"时)

王力:他们的这种作法不对,记者没有这种权利,只有了解情况,向上反映之权,不能表态,公开支持一派,反对一派。

(当汇报到所谓"411"说李再含到北京检讨时)

王力:造谣!李再含是很好的同志,老早就揭露了贾启允、李井泉。

王力:要坚持作政治思想工作,相信大多数人是好的。错误的口号要批评。严重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如西单商场事件,不管为头的是什么组织,都要处理。这是另一个问题。破坏国家财产本身就是犯法,要处理。打死了人么!要处理。特别要保护重要的工厂,到那里去有意打、砸、抢的,绝对不是好人。犯人暴乱的要开枪。事先要告诉犯人,搞暴乱不行。不搞文化大革命时,犯人暴乱也要开枪嘛!

(当汇报到对一些重大的打、砸、抢等进行调查后要向群众公布材料时)

王力:公布材料很好,应该公布,才能发动群众,但要证据确凿。现在有人把派别利益放在第一,把革命利益,无产阶级利益,社会主义利益放在次要地位不管,这就糟了。那就要走到邪路上去,迷失大方向。

(这时新华总社王唯真同志、赵启同志赶到会场)

王力:谷峰是什么时候去贵州的?谁派去的?

赵启:是六月份去的。

王力:记者有什么观点这没有什么,可以如实地向中央反映情况,但不能表态。这样的记者……不能贴大字报,散发传单,更不允许用新华总社赴黔记者组这么一个官方的名义。

王唯真、赵启:谁派去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新华公社的,可能是他们派去

的:

王力:他们怎么有这样的权利!

赵启:他是调了山东、山西、上海、黑龙江的记者,说是开什么现场会议。

王力:开现场会议也不报告我们。他有什么权利调外省的记者去贵州呀!我们派去的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的记者,他们在那里都没有表态,就是这个谷峰这么厉害。

王唯真:他是反我的,几次要把我拉下马的。

王力:是谁派去的呢?你们往各省派记者也不告诉我们一下!是否以他们的派别去的?

赵启:我们回去查一下,他是宇宙红战队的,是属于新华公社的。

王力:啊!他是新华公社的,开始不知道,只叫了你们俩人来。他是否认为他在贵州搞得很得意!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不能采取旁台的态度,有错误、缺点,可以向他们提,也可以向中央反映么!不把矛头对准贾启允,而对准李再含同志,大方向错了。这个赴黔记者组立即撤回。要派,要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再派。你们要向我们报告。他们在贵州的这些表态不能代表新华总社,更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小组。

原省委办公厅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义会议"战斗队
贵州大学"红战鼓"
《新贵州报》井冈战斗联络站　翻印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

附录16　杨永兴:王关戚被打倒之谜

"王、关、戚"指的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他们都是因为其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被重用,尤其是"文革"初期。1966年后,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开始踏入他们人生的最高点。陶铸、刘志坚被打倒后,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还担任毛泽东、江青的秘书。他们三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为"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

武汉"七·二〇"事件

1967年下半年发生的"王、关、戚"事件，却使他们的人生由顶点降到底点，受到隔离审查，政治生命业随之结束，其转折点就是7月20日武汉"七·二〇"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是"文革"研究中众多谜团中的一谜。虽然当事人陈再道、杨成武和王力都相继对此作了一些回忆性的叙述。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王力因为这一事件而名声大噪，受到江青等人机场迎接和召开百万人大会的待遇，成为"英雄"。对此，王力在接受访谈时曾指出："对于在机场的迎接和百万人大会，我当时是反对的。我提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搞？机场迎接，过去只有反修斗争时才这么搞过。也没有这样的规模。我更不赞成开百万人大会。反对的结果，只反掉一条：原定由谢富治和我乘敞篷车绕场一圈，后来不搞了。这一系列的做法是林彪主持的，当时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做不是为了你（王力），而是为了主席。 这样说，我当然不好反对了。"（董保存《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然而就是这位"英雄"，在仅仅相隔40天的时间后，却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八·七讲话"、"火烧英代办处"等事件而被"隔离审查"、"请假检讨"，后被关进秦城监狱。就这样，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囚犯"。与王力同时隔离的还有关锋、林杰等人，戚本禹停职写检查，不久也被"请假检讨"，直接投进秦城监狱。从此，他们三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就是有名的"王、关、戚"事件。

杨成武的回忆

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当前存在着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当事人杨成武的回忆，他认为虽然最后是毛泽东下决心处理"王、关、戚"的问题，但是其中周恩来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杨在接受访谈时讲道（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关于处理"王、关、戚"的问题，8月24日中午，我乘专机由上海返回北京，立即驱车赶往钓鱼台参加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会后，周恩来找我单独谈了话，并要我直接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谈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一事，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周

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后说："就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我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此人书生气太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力大些，关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稍停，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个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回去请总理马上办。"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往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召开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

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这件事对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是个重大打击。但江青、陈伯达摇身一变，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宣称："王、关、戚是我们自己端出来的。"继续欺骗迷惑群众。

在抓起王力、关锋的第二天，我奉周总理的指示，飞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我汇报完毛泽东、周恩来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后，林彪感到很震惊，只微微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说。我随即告退回北京。这就是处理王、关、戚的全过程。

王力为自己辩解

另一种说法是王力为自己的辩解。他说自己是被江青打倒的，原因是自己一直同江青对着干，只听毛泽东、周恩来的，不听江青的，与周恩来走得比较近，被江青视为“眼中钉”。

王力称：我早已是江青的眼中钉，留用我，只是怕人们讲“清一色”。没有早除掉我，只是怕人们说“文革不稳定”，还说是要“顾全大局”。这次下毒手了。她用毛主席最忌讳的话陷害我，说“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王力以为天下不是毛泽东的，是他王力的了。”江青和康生的密谈被我亲耳听到，我的轮椅在十六楼门后，他们两个近视眼没有看到。

1967年8月30日下午，在整我的会上，总理一句也未批评我，只是有两次发言。一次是杨成武发言说逼总参向香港派一个营这件事，要王力负责。总理说这事王力不知道。第二次是吴法宪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王力搞的。总理说：48小时最后通牒王力根本不知道。总理自己承担了责任，而且，即使没有这个通牒，因为香港问题激化了，也可能在别的事情上爆发出来。

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后，主席着急了。还有一个什么“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问题，主席把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了，当时总理忙得焦头烂额，身体状况很危险，心脏病也犯了，江青他们才逼着总理把那个未经我本人核阅的八·七讲话又一次送给主席，要抛出王力当替罪羊。本来毛主席早已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八·七”讲话的传单，这里边许多话就是他自己的原话的重复。所以他们逼着总理送了那个“八·七”讲话，主席原来只不过是一笑而已。

两天后为什么又变了呢？如前所说，是因为江青告了恶状，主席才说了一句“要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王力是个坏人。”康生连夜查了档案，说王力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还查了家庭关系、社会关系，说我的老伴、岳父、岳父的子女是“一窝黑货”……正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毛主席犹豫了两天以后，才下决心把王力打倒一下。于是，8月30日下午就在钓鱼台开所谓生活会批斗我。外面许多谣传，都是江青散布的。

吴法宪的回忆

对此，吴法宪基本上同王力持有相同的看法。他首先在回忆录中讲了导致王、关、戚倒台的几件事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来”；“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后，关锋向毛泽东告康生

的状”，然后提到：“9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很快就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就王、关、戚的问题打了个招呼。王力等三人的命运也就基本上决定了。这几件事情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我至今仍不怎么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情固然是王、关、戚本人的问题，但是那时候许多问题同中央文革是扯不清的。既然如此，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就再一次顺水推舟，把王、关、戚推出去当了替罪羊。”

另外，吴还提及了戚本禹被隔离的事情。他说：到了11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讷，以致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讷有非分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

毛林之争的初次交手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关、戚被打倒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一次警告。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申晓云在其文章《文革中毛林之争的初次交手——武汉“七·二〇事件”真相》中指出：“王、关、戚的被抓，对林彪来说，犹如断其臂膀，林彪完全明白，这是毛给他的一个警告。”在这时，申教授这一论点的前提是王、关、戚是受林彪重用的“笔杆子”，她在注释中称“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穆欣，掌握《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大权，为林彪集团的主要‘笔杆子’，也是‘揪军内一小撮’舆论的主要制造者”，指出：“在毛、林这些政治人物看来，所谓‘笔杆子’，都只有可供利用的价值，1967年8月中旬以后，‘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被作为一项错误遭批判，而王力、关锋被抓，使这项错误有了‘替罪羊’。”

“林一伙在毛发起反击后，为掩护退却，把‘大抓军内一小撮’说成是王力、关锋私自搞的，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等‘笔杆子’身上，于是江青宣布‘把王力、关锋逐出中央文革’。与王力、关锋几乎同时被拿下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赵易亚（8月23日），他是《解放军报》副总编辑，穆欣（9月1日）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这些‘文革’以来专门制造冤假错案的刀笔大吏，不幸也被‘莫须有’罪名所诬。

“其实，这些‘秀才’，包括迟3个月倒台的戚本禹在内，下台的直接原因无它，乃策划、参与了‘揪军内一小撮’，本想再立功，不料马失前蹄，跟错了人，立马翻船。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5月16日成立时，连同顾问一共有21个成员。经几次清

算，到了1967年9月，随着王、关、林、穆等被撤职，仅剩下7个人。”她还认为：“1月23日，《红旗》在出了16期后还是被下令停刊，直到1968年6月才复刊。《红旗》是中共中央最高理论刊物，一贯被视为党的喉舌，但该杂志实际操纵在林派人物手里，这一时期被清算的王、关、戚、穆欣、林杰等全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前都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职务，总编辑是陈伯达。它的停刊，反映问题的严重，和上层斗争的激烈。”

当然，申教授关于“王、关、戚是受林彪重用的‘笔杆子’”这一观点还是有待商榷的。王力在提到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的起草过程时，曾说到“十条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叶群记录的，由秘书送关锋斟酌文字，关锋历来害怕江青怀疑他背着江为林办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个人”。

陈再道在讲述武汉“七·二〇事件”时也提到：“7月20日上午，事件刚刚发生，林彪便亲自写信给毛主席。当时周总理在北京，但林彪不找总理，叶群叫秘书把信送给戚本禹修改，并特别交代秘书要告诉戚本禹，这封信是林彪的意思。戚本禹看了信，觉得‘这是大事’，不敢做主，于是找到陈伯达和关锋一起修改，最后，落名又不知怎么签上江青的名字。”

（董保存《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作者杨永兴 原载《长江周刊》2010年3月5日A12版）

附录17 贵州大学踏平“四一一”后的公告

贵州大学革命委员会公告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晚上十一时左右，我校所谓“四一一”人员全部撤出他们非法强占作为据点的物理楼。撤走时将一批国家财产私自转移。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中央“六六”通令，保卫红色政权，保证革命大批判的正常进行，特公告如下：

（一）所谓“四一一”个别坏头头，顽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党、对人民已经负债累累。他们欺骗和蒙蔽一部分群众，恶毒攻击省革委、省军区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搞打、砸、抢。他们的大方向是错误的。

在我校，他们一手制造“六·二”、“六·三”事件。挑动“八·四”、“八·一九”武斗，是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事件。这些恶劣行径造成的损失，应由所谓“四一一”个别坏头头负责。

（二）广大所谓“四一一”同学，是受蒙蔽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学认真总结教

训，触及灵魂，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与个别坏头头一刀两断，反戈一击；与全校革命师生一起，共同投入革命的大批判，搞好学校的斗批改。

（三）所谓“四一一”中广大受蒙蔽的同学，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全校革命师生员工要主动热情耐心的做好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严格区分并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既要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又要团结同志。热烈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四）凡离校的同学，我们热情地希望他们立即返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投入当前的大批判运动。

（五）在所谓“四一一”兵团操纵下，为了达到他们搞反夺权的目的，贵州大学所谓“四一一”在各系非法成立的指挥部及其他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

（六）全校教职员工应当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迅速返校，坚守工作岗位。凡未经革委会同意离校者，应于八月三十一日以前返回学校，否则坚决扣发工资。

（七）所谓“四一一”中个别坏头头如果胆敢继续与革命人民为敌，继续蒙蔽群众，组织力量，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那就绝没有好下场。我们坚决继续采取强大的文攻武卫，对来犯者，给予毁灭性打击。

此告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原载1967.8.31.贵州大学革委会主办《贵州大学校报》第二十一期）

第十五章　李再含独立王国的专政工具

李再含独立王国对付“四一一”的专政工具是“三位一体”，这就是省公安厅“113”的“刀把子”，“八一八”专业武斗队的“枪杆子”和地化所“侦察兵”等“笔杆子”。

（一）专业武斗队

这个专业武斗队成立于1967年8月20日，以8月18日武装颠覆贵州工学院革命委员会成功的日子命名为贵州八一八兵团。开始按片区分设10个分团，1969年2月扩大到17个分团。有各种枪支1002支。1967年12月5日还成立了有200多人的直属连，配备60炮2门，冲锋枪36支，步枪158支，机枪12挺，手枪及子弹若干。并有摩托车队。是跨行业的专业武斗组织，专门用于踏平和镇压“四一一”群众组织。

继省城的“八一八”兵团成立后，全省各地州也成立了相应的专业武斗队，同样也以踏平不同观点群众组织的日期命名，如铜仁的“八五”兵团，遵义的“八二一”兵团，安顺的“八一五”兵团等。

（二）“飞虎队”

“飞虎队”是支红派的学生武斗组织，专门对被踏平的“四一一”学生搞打、砸、抢、抄、抓，由李再含于1967年8月3日在贵阳六中发起。“八月踏平”前后，贵阳每个中学都有“飞虎队”，突出的是五中、六中、九中、一中、八中的“飞虎队”。省公安厅专门训练过

他们的骨干。他们使用的武器有大刀、匕首、梭镖、小口径步枪等。

活动范围主要在贵阳市，各专州县也去。他们经常出入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经常昼伏夜出，搞跟踪、盯梢、打人、抓人、抄家、拦路打劫。活动方式分点、分片、分协作区，并在贵阳市的制高点设岗哨，一发现情况就打电话、照相。他们多次挑起武斗，仅“八月踏平”前后挑起和参与的较大规模的武斗在贵阳市就有9次。他们私设监狱搞刑讯逼供，审讯时使用宽皮带、皮鞭、铁链条打人，甚至用老虎凳、跪钉子板、电刑等法西斯刑罚，关着电灯打、蒙着眼睛打。他们随意打死群众。仅被五中“飞虎队”打死的就有3人，被一中“飞虎队”打死的2人，被六中“飞虎队”打死的6人，被打伤打残的未能统计。“飞虎队”中的凶手逍遥法外，有血债的，李再含便送他们去参军。

1967年8月，六中“飞虎队”对抓住一名姓施的“四一一”学生动用电刑：蒙上眼睛，站在水桶里，桶底放着一块砖头，人站在砖头上，把钥匙挂在通电的铁丝上，逼他取钥匙，施被电击昏倒，然后泼冷水让他清醒过来，把他扔出去了事。

（三）“四一一专案办公室”

设在省公安厅，下设动态、行动、审讯等组。

动态组又称“省保联合动态组”，组长郑义田（省保某处处长），副组长刘祖新（省保工作人员），成员崔美琪（中医学院学生）、谭自新（省保工作人员）、郑文学（省保工作人员）、罗谦懋（省工代会）、吴有芳（八一八兵团）、赵靖宇（八一八兵团）。由康岩中直接指挥。工作人员最多时达12人，少时5到6人。联合动态组与“508调查组”联合行动。

（四）“508调查组”

对外叫“文史调查组”，是专门搜集“四一一”内部情况的情报机构。成立于1967年6月，开始有5人，再加以原省人委单机电话号码08命名，后在文史馆办公，配有专用电话和军用小车，由省革

委保卫领导小组领导，康岩中直接指挥。主要成员有10多人，是来自社会各方面和各种职业的人，组长是通用机械厂一名干部，政治指导员是公安厅干部，副组长是东方红歌舞团成员，其他人员来自省宣传办、原省民委支部、011系统、省政协、省财政局、二十中、新华印刷厂、贵阳轴承厂、省一监狱、省邮电局、省五金交电公司、永胜电表厂各1人，还有2人来自派出所。他们这些人又在社会上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物色了一帮人，进行单线联系。"508"的主要活动手段有：

1.利用亲戚、朋友、同志关系，了解"四一一"组织内部情况；

2.装成"四一一"打入"四一一"内部；

3.绑架"四一一"骨干搞逼、供、讯。

"508"经常派人甚至坐飞机到外省了解"四一一"在外地的活动情况，然后把他们从外地一个个抓回来。如1967年11月，康岩中指派2人先后到湖南、上海、郑州、北京等地，指派1名机要通讯员多次到昆明、柳州等地摸索"四一一"动态。

（五）强制性学习班

在1968年3月6日发生的"三·六围捕"中，"四一一"地下组织在贵阳市郊华家山开会，被抓捕170多人。李再含对被抓捕的"四一一"举办强制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为"四一一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规定了若干个"不准"：不准读、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和"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等毛主席语录与语录歌；不准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准保留或烧毁检查交代底稿；不准排队走路时抬头；不准亲属未经检查批准送任何东西等。

每天早上要"向毛主席请罪"；集合时勒令大家喊"四一一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要齐声背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最高指示"军队出了个李再含，地方出了个王效禹"[1]等；上厕所、打水、打饭要排长队，前后有持刀枪的"八一八"看押。

在集中营里，强迫个个检查、人人过关；强迫"反戈"转变观点，

违者随时都可能惨遭揪斗、毒打和施以刑罚。

集中营里还设有专案组、建立秘密档案，对"重点人物"由公检法人员直接审讯，对有的甚至拘留或逮捕。

1968年6月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经过群众性的据理斗争，管制才稍有放宽。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在集中营里，"四一一"们不畏强暴，成立了秘密组织"三六战斗团"，开展反迫害、反镇压的斗争，并写出材料秘密传递出去，向中央反映"学习班"内幕。

---

[1]贵州和山东都是"文革"初期全国夺权最早的六省市之一。夺权后成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李再含是军队干部中的造反派，夺权后成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王效禹则是地方干部中的造反派。毛泽东说"军队出了个李再含，地方出了个王效禹"这句话是对他们的肯定。李再含"文革"初期任贵州省军区副政治委员、贵州省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贵州夺权后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10月中发(69)71号文件后靠边站，1971年5月撤职后下放辽宁盘锦垦区的西安农场劳动，而王效禹也刚来到这里，两名"文革"早期的老干部造反派走到了一起。

王效禹，1967年2月3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在济南的省体育场召开大会。中央文革支持的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在会上讲话，宣布山东省夺权。5月9日，根据中央决定，山东省革委会发文公布：王效禹任革委会主任。他在这个职位上胡作非为两年多下了台。1971年4月14日，中央通知：批准王效禹下放辽宁盘锦垦区的西安农场填鸭厂监督劳动。四人帮倒台后回到山东，1979年2月开除党籍。1995年3月2日，在山东青州因病去世。

(六)舆论暴力

当时还没有电视台,主要媒体《新贵州报》和"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从1967年8月3日开始对"四一一"点名批判起,至1969年3月被中央暂停刊播地方新闻时止,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四一一"的攻击。此外还有《红卫兵》、《贵州工人》和《新贵工》几家小报,对"四一一"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李再含还组织了三次报告团游说全省各地,对"四一一"极尽诬贬之能事,第一次是在"八月踏平"之前,第二次是在"八月踏平"之后,第三次是在1968年冬季部队换防之后。

1969年10月26日中央下达的中发(69)71号文件限定:"《新贵州报》和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目前只刊登新华社电讯和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不准继续对"四一一"进行舆论攻击。

本章参考资料

1.《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2.《新贵州报》1967年7-8月
3.贵大红缨枪《贵州文革全过程大事记(1966年5月-1967年8月)》
4.潘少炎提供本章照片

由011系统、302厂、7冶公司和9化公司组成,号称0379部队的专业武斗队

第十六章 “四一一”转战首都和全国各地

(一)“四一一”抵京后的示威游行和静坐绝食活动

“八月踏平”被迫外逃的“四一一”学生、工人和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全省达到6万多人,分别战斗在首都北京、上海、武汉、郑州、徐州、长沙、株洲、衡阳、桂林、柳州、昆明、重庆、成都以及乌鲁木齐等全国各地。通过向中央反映贵州问题、向所在地公众揭露李再含在贵州武装一派、镇压一派的罪行等方式,坚持同李再含独立王国作斗争,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逃到首都北京的不计其数。

1967年8月30日,“贵州‘四一一’赴京控告团”在北京地质学院成立。

9月上中旬,贵州“四一一”赴京群众在北京先后举行了两次示威游行和静坐京西宾馆活动。贵大历史系朱应长、唐怀永等8月30日从贵阳出发,到京后组织先期抵京的“四一一”群众100多人于9月初举行了第一次街头示威游行,并静坐京西宾馆一天,参加者主要是贵阳市各院校学生,也有一些专州群众。9月16日的第二次街头示威游行活动,参加者数以千计,游行后静坐京西宾馆揪李再含,以阻止李再含国庆节登天安门,六七百人绝食5天。经北京卫戍区张副政委一再劝阻,保证李再含当时的确不在京西宾馆后大家才复食。

1967年冬至1968年春,贵阳师范学院陈茂昌、廖德钊、刘秀霞与贵阳师院附中、贵定师范学校学生等在北京航空学院组织了贵

州省大专院校“四一一”驻京联络站,并编印出版了《四一一战报》。

1967年11月,贵大“红缨枪”战斗队9月份在成都写的《贵州向何处去》油印传单被湖南“湘江风雷”以大字报抄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城墙,阅读者众多,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影响很大。贵州“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筹备组委托蒋冀(明珠)通知贵大“红缨枪”战斗队邓振新从衡阳赴京参与大会筹备工作。

(二)“首都红代会支持贵州‘四一一’联络站”鼎力相助

“八月踏平”逃到北京的贵州“四一一”,从吃饭住宿到开展活动,得到首都红代会的强有力支持。他们还成立了“首都红代会支持贵州‘四一一’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由北大、清华、北航、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石油学院等首都院校学生张甦、张惠泉、王学文、程祖山、李乾宽、颜家庆、雷祯孝、何邦惠、曹友志、谢石隆、杨康中等组成,为到京的“四一一”难友解决种种问题。他们支持“四一一”抵制李再含的错误,给了在京“四一一”群众以极大鼓舞和信心。

10月7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了“贵州‘四一一’兵团北京扩大会议”,围绕斗争大方向究竟是否正确这一主题,在校园草坪展开了为期三天的充分讨论,总结了几个月来在省内斗争的经验教训,讨论通过了会议纪要。成立了“‘四一一’驻京联络站”。

1967年11月下旬,张甦、张惠泉、王学文接受邀请,到北京左家庄一处建筑工地参加了“‘四一一’驻京联络站”核心领导会议。会议由邱富伦主持,与会成员有彭孟祺、潘少炎、李少华等。会议决定召开全省“四一一”代表大会,并立即进行筹备工作。

当时各地“四一一”组织的骨干,逃亡到北京的越来越多。建立一个全省性的统一组织,协调各地反对李再含的行动,已成为大家的迫切需要。同时,贵州局势也在变化。李再含插手昆明军区“文化大革命”,于1967年11月22日接见云南“八二三”,发表“肃薄”(肃清薄一波影响)讲话,加剧了昆明军区内部的两派对立,进而影响到云南全省。李再含的政治野心由此大暴露,因而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李再含在加速走向自己的反面。

这就是"左家庄"会议召开的背景。

"左家庄"会议之后,"'四一一'驻京联络站"下属的资料组、组织组和联络组,紧张而有序地忙碌起来,工作颇有成效。

第一,各地州"四一一"观点组织的负责人、骨干,陆续会聚北京,比如铜仁"三红派"廖笃甫等,毕节"四二"派的吴胜祥等,都匀的顾汶光等,凯里的黄昌培、龙明泉等。特别引起轰动的,当是全省"四一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曾任贵州第二大工人造反组织主要负责人,同时又是"贵州夺权总指挥部"七人核心之一的耿铁一行三人(叶小波、肖成文),来到北京。那时,耿铁刚被李再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与此同时,贵州省革委领导小组、公安厅"113"战斗总队直接操控的联合动态组、也闻讯派出披着"四一一"外衣的情报人员来到北京,大肆搜集"四一一"组织的活动情况,尤其是窃取"四一一"领导核心的决策机密。当时一心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四一一"最高决策层,毫无半点察觉,更无任何防范。人们也常说:"四一一"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这也就为后来"贵州'四一一'总司令部"所策划的一切行动几乎全部失败,"四一一"在贵阳、遵义、毕节等地的核心领导和骨干,几乎被一网打尽埋下祸根。

第二,"四一一"的舆论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四一一战报》在北京恢复出版,从1967年12月至1968年2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出了七八期,主要发往贵州各地,对于凝聚"四一一"人心,鼓舞"四一一"人斗志,起了极大的作用。"四一一"刻印的各种传单,也在北京广为散播;大字报、大标语在天安门广场,在中央文革接待站附近大街,也屡见不鲜。大大提高了贵州"四一一"在北京的知名度。

张甦、张惠泉、王学文、程祖山参与"四一一"核心领导决策工作:一是参与决定即将建立的"贵州省'四一一'总司令部"的核心领导名单。最让人头痛的是确定"一把手"。当时广泛征求意见,得出了三个候选人:袁昌福、郭平、魏志将。群众反映最好的,是郭平:斗争坚决,精明能干,能团结人,组织能力强。对袁昌福呢,群众反映工作作风简单粗暴,不善于团结人,缺乏政治头脑。魏志将是新

光厂工人,出身好,中共党员。核心组反复斟酌,先倾向于选择魏志将。石油学院程祖山力排众议,他跟袁昌福同屋住了两个多月,对他了解得比较透彻,他认为袁对李再含的本质认识得透,斗争坚决;更重要的是,袁是参与全省夺权的贵州第三大工人组织的负责人,唯一公开反对李再含的省革委委员。把他树起来,可以影响全省。大家再一比较,郭平"当时的家庭出身有问题",魏志将又缺乏足够的威望。于是最终确定由袁昌福来当"司令"。

二是张甦受"大会筹备小组"委托,起草大会政治报告《贵州文化革命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当时领导小组的几个成员,只有邱富伦具备写作能力,但他忙于事务,抽不出身来,于是他委托资料组邓振新执笔。邓刚到北京,不熟悉全局,吃不透核心层的意图,写了一部分就推辞了。最后筹备小组郑重地委托张甦起草。张甦采纳了邓写的部分内容,初稿先交张惠泉、李乾宽看、改,再着正交邱富伦。邱审定后,交主刻《四一一战报》的田越涛(安顺二中老师)刻印了十几份,分发给核心小组每个成员,征求意见。最后,这个报告被核心小组通过了,准备提交全省代表大会讨论。

《形势和任务》中有一段话,小标题是"贵州问题的要害",是写李再含参加了"二月兵变"。这段话当时没有任何人质疑,更不消说要求删掉。这是最明显的败笔。

(三)贵州"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

1967年12月上旬,"四一一"负责人通过国防科委七机部的帮助联系,并通过北大张甦给江青写信后得到通知,杨成武接见"四一一"代表李树林,进而接见原"红卫军"工人张国荃。当时"四一一"负责人邱富伦没有识破张自称有"二月兵变"绝密材料是一个骗局,便也紧随张到达京西宾馆,并通过张转交"四一一"申诉材料,终于得到杨成武关于"四一一"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明确表态。陪同杨成武接见的还有邱会作。几天后清华井冈山的脚大富转变态度,由"不公开的支持"变为公开支持,委派其作战部长会见邱富伦,答应借给小礼堂和几间教室等支持"四一一"在清华大学召开

全省代表大会。

"贵州省'四一一'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大会"于1967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这一天在清华大学小礼堂隆重而庄严地召开了。会议由李少华主持、会议程序如下：一、邱富伦致开幕词，宣读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二、北大学生张惠泉代表"首都红代会支持贵州四一一联络站"宣读贺言，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三、潘少炎代表核心组宣读《形势和任务》报告；四、地区代表廖笃甫、邱汶光发言；五、袁昌福讲话；六、潘少炎在大会上介绍李再含从在山西决死队到任遵义速成中学校长等历史情况；七、大会筹备组提交"贵州'四一一'总司令部"及其下属组织部门的领导成员名单。贵州"四一一"各地代表二百多人出席会议，"首都红代会支持贵州'四一一'联络站"的全体成员列席会议。接下来就是分组讨论。

在大会进行中，还不断有人赶来，比如川师西南贵野负责人黎尚武。会议既开得热烈，又非常民主。令与会者难忘的是这样四件事：

第一件，根据贵阳地区代表提议，大会增选老知青陈贤作为农民代表进入"总司令部"领导核心，担任参谋长。陈贤是名校贵阳一中高中部的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1964年高中毕业就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报名上山下乡，被安置在贵阳花溪孟关插队落户；因为表现突出，被评为贵阳市知青的先进典型。"文革"初期孟关知青成立了贫下中农造反组织，"四一一"出现后同情"四一一"，"八月踏平"后陈贤也到了北京，同邱富伦一道住在七机部地下室，待了几天就又返回贵阳搞斗争。因他还没有参加"四一一"，不认识"四一一"的人，于是邱富伦就要他回贵阳后去找贵阳六中温思源，这才同"四一一"联系上了。

第二件，就是贵阳师院中文系学生陆光武，拿出了自己写的《形势和任务》当众宣读。明确要求以此取代潘少炎宣读的政治报告。但没被采纳。

第三件，"'四一一'贵阳前线指挥部"指派贵阳师院中文系陈茂昌（学生）专程赴京，向大会汇报贵阳地区严峻的斗争形势。核心小组安排他在大会上发言，他呼吁"总司令部"的领导成员、骨干，绝大多数都要回到贵州本地，作耐心细致的群众发动工作，聚集力量，等

待时机。他的发言引起大家共鸣，也被"总司令部"领导核心采纳。

第四件，对耿铁的安排。耿铁出狱没多久，就来到北京，要求加入反对李再含的斗争。大会核心小组开始有所疑虑，但和耿铁深入交谈，又听取了代表意见之后，决定吸纳耿铁进入领导核心，但在职务安排上却带有伸缩性：任代参谋长（因陈贤未到位）。

大会历时十二天，于1968年1月6日结束。闭幕大会进行了这样几项内容：一、举行表决，选出了"四一一"总司令部的领导核心。二、主要当选领导人表态。三、邱富伦宣读由他起草的《大会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大会决议，决心要"揪出李再含"，提出了"八月踏平必须全盘否定"等口号。

1968年1月7日，袁昌福、邱富伦等率领着"贵州'四一一'总司令部"的各地代表，顶着凛冽的朔风，冒着零下十多度的严寒，精神抖擞地来到中南海国务院文革接待站。国务院文革办公室赵副主任闻讯后亲自出来接见。李少华先上前说明来意，相互介绍之后，赵副主任和袁、邱等人热情握手。袁、邱展开写成大字报的《给毛主席的致敬信》，李少华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地念起来。信的中心内容是：一、向毛主席报告"贵州'四一一'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司令部"成立了。二、历数李再含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宣告贵州"四一一"将同李再含斗争到底。

赵副主任收下了《致敬信》，说："一定转给毛主席！"代表们一阵欢呼。李少华又领呼口号，赵副主任和代表们一道呼喊。代表们高呼"打倒李再含！"赵副主任没有举手。

离开接待站，代表们分组在中南海外面的红墙上、在东西长安街大街上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打倒李再含！"的大标语分外引人注目。

会后，大部分人员各自返回贵州第一线开展斗争，并留下部分人员在首都和外地支援和配合省内斗争。

（四）贵州"四一一"总司令部在清华大学成立

12月26日至1968年1月6日在清华大学主楼小礼堂举行的

"贵州'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贵州"四一一"总司令部,确定袁昌福(工人,复员军人)为司令员,邱富伦(师范学院)为政委,陈贤(老知青)为参谋长,耿铁(即贺志强,省植物园工人)为代参谋长,铜仁廖笃甫为副司令,潘少炎(遵义市革委委员)为副政委,李永复(贵州工学院)为副参谋长,彭孟棋(贵工革委会主任)为政治部主任,李少华(省花灯剧团)和顾汶光(都匀)为政治部副主任。

"总司"确定了以贵阳为中心,铜仁、毕节两地配合,带动全省运动的工作方针,分设三个"前线指挥部"。而这三地"四一一"的干部群众基础都比较好,领导也比较得力。在人员安排上,也做了分工:

贵阳前线指挥部,由邱富伦、耿铁负责,北大张惠泉协助;

东线指挥部,以铜仁为中心,辖长沙联络处,廖笃甫负责;

西线指挥部,以毕节为中心,辖兴义、遵义,由袁昌福、潘少炎、吴胜祥负责,张甦、王学文协助。

"贵州'四一一'代表大会"的胜利举行和"贵州省'四一一'总司令部"的正式成立,标志着贵州全省"四一一"观点的群众组织实现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它宣告:支持李再含和打倒李再含的两大对立政治派别,在贵州全省形成了!这为李再含在政治上的彻底垮台完成了组织准备。

"四一一"总司令部驻京联络站1968年1月起设在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和清华大学10号楼。驻京联络站继续出版油印的《四一一战报》,从1968年2月至7月,又出版了十多期。王云生(息烽一中)、田越涛(安顺二中)、赵松(邮电器材厂)、许定科(贵阳聋盲哑学校)负责编辑出版工作,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提供办报条件。每期报纸都寄呈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图书馆、贵州省革委会以及北京一些高校图书馆等。

(五)"四一一"代表大会之后的总司工作

大会一结束,"总司"就分别派出李永复(北大李乾宽随同),王明佐、赵新环(北大张惠泉随同)打前站,先回到贵阳传达全省代表大会的精神,为邱富伦、耿铁返回贵阳做准备。

但是这一切安排都被贵州省革委控制的"508"情报组织侦悉,

李再含他们因而预作准备,只待"四一一"组织的头头与骨干"自投罗网"。

邱富伦和耿铁离京三天,又返回北京,原因是邱说耿不可靠。当时因张甦在"四一一"决策层中说话有影响力,就把袁、耿、邱请来,并将所了解到的他们三人中间的矛盾都公开出来,请他们坦诚交换意见,不要再闹矛盾。他们还都这样做了,初步达成谅解。这样,耿铁、邱富伦又一道返回贵阳。看来,大学生出身的学生领袖同工人组织的头头共事,真得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

邱、耿走后,经李少华联系,袁昌福代表"四一一"总司令部同来京解决云南问题的昆明"八二三"组织的负责人黄兆祺,在黄的住地北京西颐大旅舍座谈。李少华、曾廉溪和张甦参加。座谈进行了两小时,达成了相互支持,共同反对李再含的口头协议。

大约在二月中旬,"'四一一'西线指挥部"才兵分两路,离开北京。首先是第一路袁昌福、李少华、王学文和张甦,先到成都做争取四川两大派支持"四一一"工作。

在成都,川师"主沉浮"黎尚武大力协助,袁等同川大"八二六"兵团负责人交换意见,又在川大做了两场贵州形势报告会,扩大了影响。然后,李少华到重庆做"八一五"派工作;袁、王和张甦大约在三月一、二日同按期抵达成都的潘少炎、吴胜祥等人会合赶往宜宾,再赶到叙永县城,相机进入毕节。

毕节运输公司是毕节"四二"派的中坚力量,吴胜祥等人同毕运司的"四二"派客车司机搭上线,才对毕节的最近形势有所了解,毕节的支红派最近加强了力量,对"四二"派的骨干盯得很紧,要开展斗争非常困难,而且贴了布告通缉吴胜祥等人。于是经过商议,决定派潘少炎,王学文和张甦先进毕节,了解情况,再决定袁、吴等人的行动。

潘、王和张甦搭乘毕运司的客车,经过崎岖蜿蜒的山间公路,来到雨雾笼罩着的毕节山城。潘为一路,张甦和王学文为另一路,分别跟着预先约好的联络人员,一前一后,离开客车站,进入毕节。引导张甦和王学文的,是位四十多岁的大姐,毕运司的司机家属,叫葛发仙,本地人。她引着二人在毕节城里转了两三个地点,最后

安排他俩住在城郊一处菜农的家中，菜农姓王，是葛发仙的亲戚。第二天，王学文和张甦在毕节城里兜了几圈，看不到“四二”派的任何活动痕迹。又过了一天，张甦和王学文找到潘少炎商议，决定潘返回四川叙永，通知袁昌福等人撤离，因为毕节来不得，来了也没法开展活动；张甦和王学文到贵阳活动。于是在第四天，由葛大姐安排，张甦和王学文以毕运司职工家属身份登上开往贵阳的客车。途中在大方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到达贵阳。

张甦不敢回家住。王学文讲他在串联时，认识了贵工学生吴培根，于是他俩便住到了吴家。一住下，他俩便看到了“四一一”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形势和任务》。那是一份铅印件，是省革委印发全省供批判用的。张甦在1968年2月2日信中委托谢慧金代为翻印、广为散发的任务，已被李再含捷足先登，圆满完成了。当时他俩并未思考为什么李再含他们这样快就得到了这份政治报告！这时，贵阳市已发生了“三·六”事件，“四一一”的活动受到了沉重打击。贵阳是无法再待下去了，吴培根便为张王俩找了一部货车，悄悄离开贵阳，来到息烽火车站，再转乘火车，到达重庆。

在重庆的“四一一”联络点，张甦和王学文同逃离叙永的袁昌福、逃离贵阳的张惠泉，以及在重庆活动的李少华会合了。不久，受“‘四一一’前线指挥部”陈贤指派，六中学生余孝颖、师院附中学生韩中治也来到重庆汇报“三·六”事件情况。

各方面的情况都清晰了：第一，西线指挥部除袁昌福事前察觉，提前两小时逃走外，其余成员都被从毕节赶来的两卡车支红派武斗队抓获，捆绑押回毕节。吴胜祥被投入监狱(后来以莫须有的强奸罪判刑五年，直到1973年才平反出狱)。第二，1968年2月底，先是“贵阳前线指挥部”的领导成员贵工李永复，在贵阳市街头被抓(遭到毒打)。接着便是由叶小波出卖，耿铁被诱捕，投入监牢；张惠泉识破机关，虎口逃生。张惠泉同王明佐、赵新环回到贵阳，先在赵新环家向九中“四一一”骨干，又到师院中文系找到“四一一”蔡永刚等，传达了北京代表大会精神，再秘密进入贵州工学院活动；还碰巧进入贵工新革委成立大会会场，看见李再含正在作报告。张惠泉讲，3月初一个晚上，叶小波找到他，要带他去见耿铁商量要事。

他俩来到《新贵州报》社后面的一条小巷，刚来到一户人家门口，张就发现情况不妙：楼上在翻动物品，发出声响；门边站着两个人，神情紧张。张惠泉谎称小便，迅即离开，叶紧紧跟着。叶对张讲：“看来这个联络点出事了。”又叮嘱说：“明晚你在家里等着，我再带你去见耿铁。”张感到叶非常可疑，当晚就没有回家，而是住到亲戚家了。不久，“三·六”事件发生，抓获“四一一”百多人。总司政委邱富伦、师院陈茂昌被投进监牢，风声很紧，张惠泉便搭乘货车，逃离贵阳，再由遵义乘火车到达重庆。韩中治、余孝颖两名中学生闻讯也从贵阳赶到重庆。

根据如此严峻的斗争形势，袁昌福主持召开了“‘四一一’总司令部”重庆会议，对贵阳地区的斗争作出五点决定。主要内容有：在政治上，坚定不移贯彻“四一一”代表大会精神，把反对李再含的斗争进行到底。斗争策略上，一定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组织上，任命陈贤为代政委，全权领导贵阳“四一一”的地下斗争。随后，袁昌福将这五点书面决定交给韩中治、余孝颖带回贵阳，亲自交给陈贤执行。

在重庆期间，袁昌福、李少华还走访了重庆54军警备司令部，并同重大“八一五”总部负责人交换意见，对李再含的问题取得了共识。贵州“四一一”终于明白，自己在四川的政治同盟军是成都的“红成”，在重庆是“八一五”派，在云南是“八二三”组织。

不久，袁昌福、李少华、王学文、张惠泉和张甦离开重庆，经过成都，于3月24日回到北大。而李乾宽先期回京。他到贵阳后，李永复派贵工学生吴再顺(外号“狗子”)、刘菲菲(女)协助行动：早晚出去都要乔装打扮；三天两头，时常变换住宿处。李永复被抓，他还在同各校“四一一”联系，收集资料，直至“三·六”事件发生才返回北大。接着又接到贵阳传来的消息，潘少炎于3月中离开毕节到贵阳的途中，在响水镇被支红派检查站查获，被毒打左耳致聋，押回遵义批斗后又送到贵阳“八一八”学习班关押。

至此，“四一一”总司令部派到贵阳、毕节领导斗争的负责人，大部分都落入李再含的魔掌。“四一一”在省内的斗争暂时落到底谷。而李再含又将魔手伸到北京，企图将“四一一”骨干斩尽杀绝。

1968年5月下旬，贵州省革委办事组负责人、地化所郭其梯坐镇北京，串通北大校文革聂元梓，以聂元梓接见贵州“四一一”代表，替“四一一”向中央送材料为诱饵，由新北大公社专业武斗队出面，诱捕了逃到北京半个来月的“四一一”前线指挥部负责人陈贤，同时也抓捕了北大化学系六三级学生李乾宽，并将“四一一”从北大第二教学楼里全部赶走。于是，“四一一”驻京联络站便转移集中到了清华大学10号楼。

抓了陈贤不久，北大校文革便派出专案组（内中有北大中文系六三级新北大公社成员王维阁，孙丕任，北大化学系XXX，共三人）奔赴贵阳，住进省公安厅招待所，由公安厅“113”总队人员陪同，在监狱中提审了耿铁等人，在“八一八”学习班提审了相关人员，重点搜集张甦、张惠泉、李乾宽“反对李再含、颠覆红色政权”的所谓“反革命罪行”材料。六月底，北大校文革的高音大喇叭便广播了通缉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分子”张甦等人的《通告》。而早在5月24日，张甦应邀率领北大代表团赴四川万县市参加了万县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庆典，离开了北大。到六月下旬，新北大公社居然派化学系六五级学生张同密带人来到万县市，企图绑架张甦回北大。结果反被当地“主力军”总部撵走。

到1968年10月，六十三军为主体的“北京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开进北大，贵州省革委还将北大化学系六三级学生李乾宽的材料寄给北大，李被“军宣队”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继续关押。直到毛主席亲自派出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宣传队进住北大之后，才被平反释放。前后历时108天。

（六）贵州“四一一”战斗在外省

在徐州、郑州、武汉、长沙、株洲、衡阳、桂林、柳州、昆明、成都和重庆等地，组建了“贵州‘四一一’联络站”，散发了传单，向当地人民群众揭露李再含在贵州镇压群众的罪行。

贵州“四一一”郑州联络站有郭平、王明佐、陈刚、郑黔源、高国芬、柴生、冯光中、高筑花、张桂英、张远识等。他们在郑州办《四一一战报》，潘少炎向北京七机部高处长求助，将得到的50令宣纸交由曾廉溪乘火车送到郑州，支持出报。每期报纸都要分送到北京和武汉联络站。在京出售《四一一战报》的收入，支持了“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的召开。

贵州“四一一”徐州联络站设在徐州地委党校期间，魏凤英（贵阳十七中）、邓国贞（十七中）和杨道明（贵阳五中）三位女生天天为该校招待所洗被服，为10多口人换饭吃。贵州省二工校的吴正还多次偷偷卖血为战友谋生。

贵州“四一一”武汉联络站组织大家挖土方、拉板车挣饭钱。

贵州“四一一”长沙联络站有王克非、欧阳贵、王正金等，得到湖南“湘江风雷”支持。

贵州“四一一”成都联络站有梅泽光、周开榜、周朝汉、陈角等，得到川大“八二六”司令江海云的支持。

贵州“四一一”株洲联络站有王云生（息烽一中）、周俊（贵阳九中）、冯平原（红交校）和贵阳木材加工厂陈光中等，活动时间约两三个月。

贵州“四一一”衡阳联络站，由贵阳水泥厂工人谢忠诚发起，最初设在衡阳市建筑工程公司，后搬迁到衡阳市交通局，以后因参加土石方劳动为了靠近工地，又搬迁到衡阳水泥厂，大家与拉板车的搬运工人们吃住在一起。贵大邓振新到衡阳联络站后，没有谁明确，在大家心目中成了事实上的站长。常在联络站的约有10余人，人多时近20人，其中有工人、干部和学生，多数来自贵阳，还有铜仁万山汞矿的曾云和万山中学的张老师等。

衡阳联络站的工作包括接待来往的“四一一”人，编印和叫卖《四一一战报》，与当地群众组织和支左部队联络，组织文艺宣传小分队到衡阳一些单位做宣传、演出等。邓编辑过几期《四一一战报》，谢忠诚联系出版印刷。贵阳民族商店王玉珍、贵阳水泥厂谢忠诚和贵阳塑料二厂“大博士”余祖全等数人自告奋勇到衡阳火车站和衡阳市街头叫卖《四一一战报》，但其收入不足以维持众人生活。为此，1967年11月，联络站组织大家参加土石方劳动两个星期，在衡阳西站附近一个山头上开挖一座粮食仓库的基坑，平均工资每

人每天2元。

贵州省公安厅六处干部宋家鹏、贵州省地质局老周、小河贵州电力器材修造厂女工张崇莉和贵阳川剧团未成年的小男孩“小四川”,在此次搬迁前也先后来到联络站,也都参加了土石方劳动。淘气的“小四川”劳累后写信寄到贵阳骂李再含,竟将身上生的几个虱子也装进信封里。后来据说李再含在一次报告会上还提到这封信和虱子,引起在场人一阵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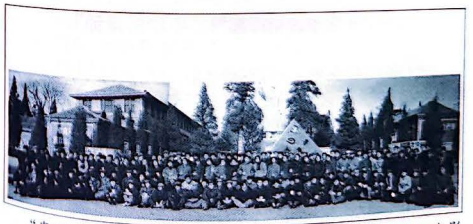
1968年2月29日,贵大中文系蒋冀(明珠)从长沙专程到达衡阳联络站,通知赶快转移,说李再含已开始对逃亡省外的“四一一”下手了。当晚,联络站全体成员正在开会商讨如何转移时,他们所在的小楼已被两卡车军人团团包围。邓和宋家鹏二人被抓,限定其他人24小时内必须“全部滚出衡阳市”。

邓宋二人被关进解放西路衡阳警司后,进行了80小时的绝食斗争,以示强烈抗议。直到在审问中明白这是李再含搞的“借兵抓人”,衡阳警司是出兵帮忙的。他们才宣布复食。接着贵州从公安厅、省红代会、贵大共派4人,把他们押回贵阳。宋家鹏3月7日深夜被关进贵州省公安厅看守所,邓3月8日被送回贵大,因“坚持错误”,3月18日,又被贵大送进了市内省财校“八一八”强制性学习班。

本章参考资料

1.《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2.《新贵州报》1967年9月-1968年4月
3.贵大红缨枪《贵州文革全过程大事记(1966年5月-1969年3月)》
4.王云生《魂断清华园》
5.刘代祥《刻骨铭心的逃亡与囚禁》
6.潘少炎、李少华、邓振新、邓国贞等口述文革亲历
7.潘少炎提供本章照片
8.张甦《陈贤同志访谈录》
9.张甦《我们与贵州“四一一”》

“贵州‘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在清华大学主楼小礼堂举行(1967.12.26-1968.1.6,北京)



“贵州‘四一一’”在清华大学参加全省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合影
新华社记者 摄影

第十七章　不畏强暴的地下斗争

1967年7至9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认为“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号召各地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但贵州省的“四——”已被踏平，斗争转入地下。

李再含的踏平政策是无法使受压群众屈服的。正如毛泽东语录中所说：“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一）“贵阳前线指挥部”和“中学指挥部”

1967年11月，陈贤从北京回到贵阳，经邱富伦介绍与温思源联络，逐渐联系上了贵工、贵大、师院以及各中学的部分代表，成立了“贵阳四——前线指挥部”，组织开展地下活动。参加的有师院庞守忠、姚德仁，贵工彭孟棋、李承宗、李永复，中学生有梁森权、韩中治、温思源，工人有伍昆宪等。

11月26日，前线指挥部在贵阳市东山召开秘密会议，分析了形势，安排了地下斗争活动，决定以纪念贵州省夺权斗争一周年和纪念贵州省革委成立一周年为契机，先后组织开展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强烈抗议李再含踏平“四——”、镇压革命群众的暴行。

1968年2月8日，“贵阳四——兵团中学指挥部”成立，由贵阳一中、五中、六中、八中、九中、十七中、十八中、二十一中、师院附中、有色校、二工校、机校、农校等13所学校各派出1名代表组成。

2月10日在贵阳九中开展了反踏平斗争活动。

（二）接二连三的地下斗争

1967年11月24日，师院中文系开会批判“四——”千钧棒战斗队。支红人士主持会议。会议一开始，支红派喊口号“打倒刘邓陶，踏平‘四——’”，“四——”则高呼“打倒刘邓陶，打倒王力！”张成坤在得到发言机会后，首先要求对“千钧棒”定性，然后一一批驳支红派给“四——”定的“罪”，又批评了省革委对“四——”的错误处理，最后拍着桌子骂支红派：“你们歪，歪不了几天了，歪过火是要垮台的！”“你们要我们考虑前途，你们才要好好考虑前途！”

12月10日，中央关于正确对待犯错误的老造反派的(67)367号文件贴上贵阳市街头，贵阳师范学院的“四——”学生们冲破重重阻力，上街示威游行，热烈欢呼(67)367号文件下达和毛主席关于对老造反派要“帮助、批评、联合”最新指示的发表。人们源源不断地自发加入游行队伍，群众夹道欢迎。

12月15日，师院“四——”开会学习(67)367号文件，并邀请不同观点者参加辩论。会上群情激愤地血泪控诉李再含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在中央(67)367号文件精神鼓舞下，贵阳市街头经常出现“四——”的大字报，揭露和批判李再含的错误。贵州工学院内大字报很多，两派都有，调子最高的是“打倒王力，解放‘四——’！”

12月28日，杨成武、邱会作在京接见“四——”代表李树林(遵义人汽公司驾驶员)的消息传到贵阳，令人振奋。

1968年元月7日，“四——”从贵阳市大十字百货大楼之上撒下万份传单，内容为杨成武、邱会作接见“四——”遵义代表李树林，轰动一时。

元月初，贵阳街头还出现了揭露李再含插手云南、反军乱军罪行的中央首长讲话转抄和大字报。

1968年元月23日，各大中专学校“四——”学生1000多人不畏强暴，在贵阳师范学院举行集会，会后举行庆祝贵州夺权一周年大游行，无数群众如滚滚洪流紧随游行队伍，势不可挡。游行队伍从师

范学院出发，经喷水池、大十字到邮电大楼，一路上红旗飘扬，战歌嘹亮，口号高亢，沿街夹道欢迎的群众中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1968年2月4日至6日春节假期，“四一一”在贵阳市街头张贴了许多大字报，有给解放军的慰问信，有给贵州“八一八”兵团的公开信等。一大批革命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保护大字报。

（三）抗暴游行、闪电游行和飞行集会

2月11日，“四一一”学生1000余人提前两天在贵阳师范学院集会庆祝省革委成立一周年，大会的口号有“誓死捍卫红色政权”和“打倒独立王国”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孟关知青64个大汉当游行先锋，8个一组共8组，抬着8个大标语牌，从贵阳师范学院出发，后面跟着学生，一路高唱战歌，经喷水池到大十字，一路游行，队伍越来越大。“八一八”慌了，急令邮电兵团就近拦截；他们钢钎藤帽，一出来，群众就报以一阵砖头瓦片，把他们砸回去了。出得街来的，又被群众前后左右挤压得连身子都转不过来。游行队伍高唱战歌和国际歌，昂首挺胸，在群众的掩护下，完成大游行，回到师院。这就是震惊全省的“二·一一”抗暴游行。《新贵州报》在2月15日发表杀气腾腾的编辑部文章《今日的贵州是无产阶级的天下》。

2月24日晚，“四一一中学指挥部”数百名中学生举行了“闪电游行”，参加者还有贵阳师范学院几个战斗队的大学生。

由于前线指挥部“二·一一”这一仗打得漂亮，又组织第二次，即“二·二五”飞行集会。

涂光禄（师院）在大十字会场吹军号，师院附中张远超（女）作简短演讲，省冶金技校周立掩护撤退。“八一八”的邮电卫红兵团和财贸卫红兵团改变了对付办法，他们不再派武斗队，而是各组织了数十人的突击队，身着便衣，匕首笼罩在衣袖里，埋伏在小十字一带和市公安局内，等到“四一一”游行队伍一到大十字，他们从东西两个方向一溜烟冲进人群，看到在大十字看游行听演讲的，就用匕首刺，这次吃了大亏，好多人手臂和背部被刺伤，鲜血直流，并抓走

6人。事后到处抓陈贤。于是陈贤和温思源就到北京去了。

“三·六”事件邱富伦被抓后投降了，还宣布改了名字。消息传到北京，袁昌福宣布永远开除邱富伦，由陈贤担任总司令部政委，去掉在重庆会议上定的代政委前头的“代”字。

（四）“三·六”围捕

1968年3月初，李再含通过“508调查组”的情报活动获知，3月6日“四一一”地下组织要在贵阳市郊华家山（现智慧龙城）开会，安排从北京返回的政委邱富伦同大家见面。李再含如临大敌，立即开会研究对策。他要求“八一八”兵团“行动要迅速，注意保密，不要让他们发觉我们的行动跑了，把他们包围起来，一锅端。”当天上午张德茂等先去华家山看了地形，画了草图。3月6日下午，“八一八”兵团出动了近1000人，其中武装连140余人，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把华家山团团包围，由山脚往山顶搜捕。“四一一”群众到会200多人，除少数人突围外，被抓住170多人。“中学指挥部”的13名常委，被抓10人。在这次大搜捕中，凡属包围圈内的人，无论十二三岁的小孩，或是在山上劳动、打柴的社员，乃至检查附近铁路线的几名工程技术人员，都一起抓了。

事后，“八一八”兵团立即上街宣传“三·六大捷”。当晚，李再含派刘安民（省革委副主任）慰问了“八一八”兵团，表扬了专业武斗队的功绩。这次被捕的170多名“四一一”群众，全部被关进了省财校“八一八总部”的“强制性学习班”，成为“四一一集中营”。

邱富伦被关进公安厅看守所。事前陈贤当面劝阻他，贵大王正贤递字条劝阻他，师院姚德仁和涂光禄也在事前专程赶到华家山附近的市建一公司，当面动员他立即撤离均未遂。姚涂二人无奈，转身下山进城，行至紫林庵就听到“八一八”兵团高音喇叭宣布“三·六大捷”。

(五)强制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这个强制性学习班办在“八一八”专业武斗队的大本营省财经学校内,是在“三·六”事件后因抓了一大批“四一一”而专门举办的,学习班实际上就是“四一一”集中营,里面关的全是“四一一”学生、工人和干部。前后被关的有200多人,包括省机校陈庚甲、省冶金学校曾祥美、省水利学校印木刚、省二工校梁森权、贵阳水泥厂强承怡、老知青濮振远、安顺二中何连栋、贵州工学院向玉昌和李永复、贵阳市交通街林忠凯、贵大历史系朱应长、贵大物理系邓振新、省运输公司司机杨长明、黔东南州医院大夫王琦、黔东南车辆监理所黄昌培、遵义市革委潘少炎、遵义市人汽公司李树林、开阳磷矿唐金生等。

从被关进去时起,三次调换关押房间,是进学习班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专案审讯,第二阶段是检查认错,第三阶段是学习提高。专案审讯中梁森权、强承怡、印木刚等多人遭到凶狠毒打,印木刚被用刹车管抽打。

1968年4月11日,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举行15万人大会,狠斗所谓“四一一黑后台”,强令受到杨成武接见的李树林也在大会上作了检举和检查。当天把“四一一”头头邱富伦押到会场时,大会主持人决定,鉴于邱已放弃“四一一”观点,可以不上台挨斗,只押在后边听批判发言。但邱富伦背叛“四一一”以后,在1968年内经常被揪到“八一八”总部的“四一一”学习班和师院、六中等地大小会上坐“喷气式”挨批斗多达七十多次,说是要“接受改造,教育群众。”

在清华大学召开的贵州“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上,由于遭受镇压,又受邻近几省武斗的影响,来自省内各地的“四一一”代表群情激愤、冲动,极“左”的倾向占了上风,给大会要发布的决议定了很高的调子,主要提出了“四一一”与李再含的矛盾已上升到敌我矛盾性质;必须开展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反夺权;向周边的湘、川、滇联络争取武器支援等。作为《大会决议》的执笔人邱富伦,虽然写了上述大会“一致讨论通过”的意见,但是个人持保留态度,坚持有

顾。他不愿意因李再含少数人的错误,导致“四一一”与“支红”两派群众武斗,造成无辜学生、工人的流血牺牲。由此就发生了1968年3月底邱政委从狱中发出“公开信”宣布背叛“四一一”的事件。此时刚发生的杨成武倒台事件,促使邱识破“二月兵变材料”骗局,这也是一个诱发因素。邱富伦放弃“四一一”立场,要求停止武斗。但这种狱中背叛,“四一一”群众并不理解也不接受。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在3月24日被打倒。余立金、傅崇碧原职务分别是空军政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后悔地坦言:“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杨、余、傅事件”在1979年3月28日彻底平反。

(六)悲壮的“五·七”事件

1968年5月7日,贵阳城中心手榴弹爆炸,数百名知青受到牵连,有的被逮捕拘押,有的被办学习班,这就是在“文革”期间轰动一时的“五·七”事件。

“四一一”农民造反司令部成员由知青组成。1968年初春,其主要骨干、孟关知青邓金生和沙文知青黄金鑫到四川搞武器。3月6日,“四一一”在华家山开会,170多人被捉,皮鞭下有人变节,地下活动被暴露。5月7日下午,邓、黄两人身藏手榴弹和短枪从四川回到贵阳,刚出贵阳火车站即被盯梢、跟踪,沿遵义路到大十字,直到河东路,由于发现被人跟踪,双方亮出武器,邓金生甩了3颗手榴弹,最后一颗是与抱着他的“八一八”大个子在河东路的桥上同归于尽的。围观的人们听他们的对话都说“是两条汉子”。邓说“放开,可怜你有家有室。”那人说:“敢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邓金生是贵阳十八中1965年上山下乡到孟关谷立大队的知青,落户在牛王阁生产队,他出身好,劳动积极,“四清”运动中斗争性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当时贵阳市有八九百知青,仅二三人入党。

“五·七”事件,在《贵阳地方志·贵阳百年》和《贵阳大事记》中有二百余字记载。《贵阳百年》曰:5月7日,贵阳“农民造反司令部”领

导成员,下乡知青邓金生、黄金鑫,被"飞虎队"追踪,至河东路桥上,邓无法脱身,引爆随身携带的手榴弹,当场炸死三人(邓在其中),炸伤十余人。当晚至12日,"八一八"对"农民造反司令部"成员大搜捕,50余名知青和家属被武装拘押在贵州农学院,百余名知青由公社和大队强行管制,举办"学习班",市郊几百名知青受到牵连。1970年11月,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军管会陆续为这次事件的受害知青及家属平反。年底,所有在押人员得到释放。

老知青陈贤从北京被抓回贵阳后,他和张国荃在省财经学校礼堂被批斗。"五·七"事件中被抓的全体知青被押去观看。几个彪形大汉用梭镖挽住张、陈手臂,又另用梭镖撑在他们的臂窝下,逼迫他们踮起脚尖,他们被斗得死去活来,呼天喊地,但没有一人讨饶。几个押斗的大汉松开陈贤后,陈拖着身子双手撑地站起,硬声对主持人说,不关他们的事,要搞就冲我来。他转身面向知青们跪下,说连累你们受罪了。陈贤是1964年贵阳一中高中毕业生,放弃保送北大的机遇,自愿插队到孟关当新农民。1965年被评为贵州十大杰出青年,"文革"中成了"四一一"的头头。批斗会主持人介绍张国荃,说张是坏工人,对张要与知青有所区别。

本章参考资料

1.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2.《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3.刘凯《三·六事件》

4.王木《手榴弹和411——我所经历的五七事件》(《贵阳文史》2010年第3期)

5.邱富伦《给〈贵州风云〉提供若干补充资料》

6.张姓《陈贤同志访谈录》

第十八章 夺取"文革"全面胜利之年的省内国内大事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1月10-17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全委扩大会议制订并通过夺取"文革"全面胜利的《规划》。

2月10-15日,贵州省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成立贫代会常设委员会。

2月19日,毕节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4月7日,六盘水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6月26日,贵阳地区军民举行"砸烂公检法"大会,提出"狠抓狠斗公检法中一小撮"。

(一)贵州的"三反一粉碎"和"全省一片红"

1968年3月27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大会,正式宣布中央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处理命令,李再含随即在贵州省开展"三反一粉碎"斗争,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对已结合到革委会的干部进行"回炉"、"补课"。全省县以上被"回炉"的干部达64.2%。在两个多月内,就推翻了两个地区革委、28个县革委,使20多个县革委处于瘫痪状态,平坝县革委流亡在外,榕江县及区、社37个革委会统统被武装颠覆。

在“三反一粉碎”和“清理阶级队伍”期间，贵阳医学院先后揪了所谓“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等106人，“深挖掘”所谓“四种阶级敌人”35人，加上其他受迫害的教职工(不含学生)共309人，占教职工人数1448人的21.4%。全院24位正副教授有22人遭难，院务委员会15个委员无一幸免，正副教授和处级以上干部遭受迫害的达71%。

贵州大学围绕校长陈希文问题，支红派一分为二，一是曲(沐)派，一是麻(吴会祥)派。学校对陈希文组织了足迹遍及全国的专案调查。花了一大笔经费，最后是没有什么问题。

4月14日，《新贵州报》头版头条套红宣布“贵州高原一片红”，全省85个县市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李再含随后大兴土木，在贵阳市遵义路修建红太阳展览馆和春雷广场(现人民广场东区)，并在广场上建巨型毛泽东全身塑像。

6月19日，《新贵州报》第三版刊登岳雄关文章《评党内另一个最大走资派两次贵州之行》，矛头直指邓小平。大意是刘少奇已被整死了，又该轮到邓小平了。

8月13日，省革委会决定将原省工会干部学校改造为贵州像章厂，制作毛泽东像章，总投资暂定20万元，年产2000万枚。要求年内基本建成投产。

(二)“北航红旗”在贵阳街头贴出公开信

1968年7月14日，北京航空学院在小河电机厂实习的40多个学生的大字报上街，署名“北航红旗”。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他们给省革委写了一封公开信，对贵州“文化大革命”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公开为贵州“四一一”翻案。次日贵阳市满街都是反击“北航红旗”的大字报、大标语。

1967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中央解决云南、四川问题代表团的组成人员中，除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再含外，还有北航红旗4名红卫兵代表，包括北航红旗二把手井冈山等人。因此，李再含对北航红旗的公开信，不敢怠慢。

1968年7月17日，省革委发出通知，低调肯定“北航红旗”的公开信，但对大字报有关省革委的结论则“不同意”。师院和许多单位贴出支持这份公开信的大字报、大标语。其中不少是支红派人士，因为省革委表态了，马上跟风。

7月17-19日，全国多省市20多个造反派组织在北京航空学院召开“全国文革形势分析会”，与会人员约有八九十人，其中有黑龙江“炮轰派”、辽宁“八三一”、锦州“糟派”、镇江“三代会”、青海“八一八”、贵州“四一一”、桂林“老多”、广西“四二二”、广东“旗派”、武汉“钢工总”等的头头和代表，还有清华井冈山头头蒯大富和鲍长康、北京六中的两个中学生代表。北航红旗韩爱晶因病不在校未与会，二把手井冈山、常委侯玉山以及作战部、“红一连”、“全国动态组”的一些学生约20多人参加了这个会议。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派人参加了头一天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筹备会，在北航正式开会时没人与会。在这次会议上，有些人主张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请求中央批准，地点设在北航，由北京“五大领袖”轮流执政；有人甚至提出要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自己救自己。总之，感到造反派的大限将至，若再不联合起来自救，只有死路一条。由于发言者的许多言论非常出格，很快受到中央批评，这次会议被称之为“北航黑会”。 在京的贵阳师范学院姚德仁、贵州工学院曾廉溪代表贵州“四一一”出席了会议。与会的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代表联名签字支持贵州“四一一”，支持声援书在会后出大字报贴上北京街头。

(三)红卫兵魂断清华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清华大学两派从1968年4月23日开始“百日武斗”，双方千余人披坚执锐，从原始的长矛短剑、攻楼云梯、发石机、毒箭到现代化武器手榴弹、燃烧弹、穿甲弹，一个个学生死于自己同学之手，学校革命委员会迟迟不能成立。

7月27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3万多人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死5人，伤几百人。

次日凌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紧急召见北京高等院校五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聂元梓（北京大学）、蒯大富（清华大学）、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谈话五个多小时。毛泽东批评他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毛泽东对蒯大富说，“你们不是要抓‘黑手’吗？黑手就是我。”他提出处理高校红卫兵的四种办法：“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工人统统撤出去，让你们闹。”毛泽东最后说：“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红卫兵从此正式失去了御林军的政治地位，注定了退出“文革”历史舞台的命运，贵州“四一一”的斗争也更为艰难了。

从此，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学生按“四个面向”分配离校。全国的红卫兵运动拉下帷幕。

1969 年 1 月，上海到贵州省农村的上山下乡知青达 2 万人，其中分配到遵义地区、黔东南州、黔南州各 5000 人，安顺地区 3000 人，铜仁地区 2000 人。

贵州省包括“四一一”中学生在内的贵阳市 15000 名中学生，从1968 年 10 月至次年 1 月上山下乡，大学生进军垦农场，大大缩小了李再含的对立面。

位于清华大学西北部的清华 10 号楼，是四层砖混结构学生宿舍，被打出来的广西、湖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黑龙江等多省造反派的上访联络站都设在楼内。清华“7·27”事件后，各省联络站撤离清华 10 号楼，贵州“四一一”联络站也撤离该楼，撤离人员有袁昌福、李少华、郭平、莫伏麟、曾廉溪、温思源、杨道明、余孝颖、李青、庞新、魏凤英、王云生、许定科、戴碧玉等。工宣队、军宣队围攻清华 10 号楼时，袁昌福扔过一颗手榴弹，实际上这是没有拉线的教练弹，它不会爆炸，也没有爆炸，未造成伤亡。

1968 年 8 月 23 日，贵州省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5000 人，开进贵阳 80 个大中学校和老大难单位。到 10 月中旬，全省已有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 万多人进驻 400 多个单位帮助斗、批、改。

1968 年 9 月 5 日，《人民日报》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

利万岁》为题，欢呼新疆、西藏两自治区同一天最后成立革命委员会，至此，“全国山河一片红”。

（四）贵州铜仁地区武斗和遵义“赤水事件”

1968 年 8 月 2 日，针对铜仁地区江口、石阡、沿河等县两派夺权发生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贵州省革委会、省军区作出了处理决定。1.立即全面停止武斗；2.各群众组织应立即将用于武斗的一切凶器和物品送交军分区；3.放回互相抓、扣人员；4.占用的生产车辆一律送回生产单位；5.不准拦路、拦车、拦船，不准破坏交通工具，打死人的要偿命。6.罢工、停产的煽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要负政治和经济责任，应受到国家法律制裁。

12 月 15 日，赤水县“二五”和“反二五”两派群众发生武斗，开始双方各被打死 1 人。1969 年元月中旬的一次会上，遵义的同志介绍xx地区驻军是按“一碗水端平”的原则处理两派问题的。李再含说：“两派掌权是名义，一派掌权是实质。xx省不就那样，xx省他端平啦？端不平的。”李再含调动八县民兵攻打赤水，打死群众 131 人，伤残 422 人，2460 人被抓被毒打，数万群众流离失所。据不完全统计，群众在逃中生小孩 120 人，由于环境恶劣，死去的产妇、婴儿、老人、小孩达 30 多人。

1969 年元月 18 日李再含在贵阳地区工宣队大会上公开说：“不能笼统讲‘一碗水端平’。‘一碗水端平’没有阶级内容，不能到处都‘一碗水端平’，这是个原则问题，立场问题。”

元月 19 日零时，李再含把《新贵州报》、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的头头叫去，对他们讲：“什么‘一碗水端平’，人家要搞垮革委会了，还能端平吗？”接着他要求他们开动一切宣传工具，大造舆论，把所谓“右倾翻案妖风”打下去。

(五)擅自动用支左部队开枪镇压群众的"龙广事件"

1968年9月18日,李再含、徐英年、康岩中等调动在兴义支左的7611部队两个连、一个排和"八一八"兵团以及兴义、兴仁、安龙等县武装人员共计600余人,大小汽车10辆,土坦克一台,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龙广事件",打死9人,逼死1人,重伤致残14人,700多人被关进强制性学习班,200多户贫下中农被抄家。

兴义县在"文革"中形成了"卫东彪"战斗兵团和"工农造反总司令部"两派群众组织,前者是支持李再含的一派,主要势力在兴义城内,后者则主要掌握了农村基层政权。为了控制兴义这个重镇,后者从农村调集了上万名支持者,占领了兴义县城。龙头山支队参加围城行动的农民就有800多人,每人每天工分照记,吃饭还不要钱。"卫东彪"被迫撤离兴义县城后,火速向省城贵阳求援。李再含如临大敌,违背了在"文革"中调动一个排以上的现役部队必须经过中央军委批准的规定,在西南地区开创了私自调动部队对另一派进行军事镇压的先河。部队从与兴义毗邻的安龙县龙广一路打来,"工农造反总司令部"在大量伤亡后无力抵抗,只得撤退到农村,"卫东彪"进入兴义重掌大权。

(六)奇特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它的奇特之处在哪呢?按规定,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因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或受审查,被关在监狱或牛棚中,所以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这在中外执政党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恰恰是这个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的全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的最大冤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初期,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行累累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59位正式代表和74位列席代表中,只有陈少敏(女)一人不畏高压,坚持自己的意见,当别人高举双手的时候,她把脸俯在桌子上表示反对。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同时,邓小平被毛泽东保留党籍,安排在汪东兴手下做资料工作。

本章参考资料

1.贵州人民出版社《当代贵州大事记》
2.《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3.贵大红缨枪《贵州文革全过程大事记(1966年5月-1969年3月)》
4.《新贵州报》1967年9月-1968年10月
5.杨文华《那样的年代,那样的事儿——文革日记摘抄》
6.王云生《魂断清华园》
7.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8.田湘黔:《一位归国医学博士的怀旧青春》第十一章
9.顾保孜《中南海人物春秋》(中共党史出版社)

第十九章　子虚乌有的“二月兵变”波及贵州

（一）“二月兵变”的源头

捕风捉影的所谓“二月兵变”的源头在北京大学，发端于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所谓“兵变营房”又涉及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不仅是出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地方，1966年7月，又一张震撼京城的大字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也在北京大学出现。写这张大字报的是共青团北大团委的一位同志，他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只是在参加校园串联会时，听到有人说起“二月间要在北大住一个团”的事，就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动这么多军队，很明显是搞政变。这样，名为“二月兵变”的大字报就出现了。大字报中声言：北京卫戍区要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驻一部分军队，这是彭真、刘仁企图搞政变的准备。

北师大一位学生看了这张大字报后，回校也马上写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已调到北师大的原人民大学书记郭影秋：彭真要搞兵变，要在人民大学驻兵，这事你知不知道？

康生看了这两张大字报后如获至宝。他在北师大群众大会上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一个营的军队。陆平、郭影秋帮他们修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

本来是无中生有的“二月兵变”经过康生的肯定，便成了“千真

万确”的事实，其矛头所向，先是所谓的“彭真黑帮”，继而就是贺龙元帅。

1967年初春，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街道上贴出“贺龙彭真阴谋发动‘二月兵变’！”“贺龙企图逃往苏联！”的大字报。

（二）“二月兵变”波及贵州

由于贵州红卫军李铁乃被李再含抓捕，红卫军中有人也跟风制造舆论，说贺龙是湘西人，湘西邻近贵州，贵州是“二月兵变”的大后方，李再含与“二月兵变”有关。红卫军中的张国荃（贵阳钣金社工人）和杨延昭（贵阳小罗街砖瓦厂工人）暂住北京大学时，他们声称握有可以打垮李再含的“钢鞭材料”。后来因交不出“钢鞭材料”，“四一一”驻京联络站派王云生回贵阳市，按照杨提供的埋放地点，在石板坡和弘福寺等处挖掘仍然没有，杨延昭在众人面前进退维谷，于1968年5月的一天在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跳楼身亡。新北大公社通知贵州省革委。省革委办事组郭其悌到京处理后事，同时趁机要求新北大公社聂元梓协助抓捕陈贤。聂元梓以愿替“四一一”转交材料给中央为诱饵，说要接见陈贤，陈贤一到新北大公社总部即被抓。当郭其悌问“郭平来了没有”时，在场的郭平当面机智地回答“没有来”，因郭其悌并不认识郭平，郭平幸免于难。

1968年5月，陈贤在北大被抓后，被郭其悌安排乘飞机押回贵阳。以“协助调查”为名同机带回贵阳的还有张国荃和贵大外语系女生施莉莉。张、施二人也被送进了“八一八”强制性学习班。学习班还对张国荃编造“二月兵变”材料组织了批斗。

张国荃、杨延昭和施莉莉三人是由郭平从郑州带到北京大学，李乾宽安排食宿。

有关“二月兵变”材料，贵州大学邓振新还有另一番经历：

贵阳小河电力器材修造厂女工张崇莉参加过红卫军。在邓振新应邀从衡阳动身去北京参加“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头天晚上，她在衡阳贵州“四一一”联络站交给邓一份很简短的手抄材料，说这是“二月兵变”的绝密材料，与李再含有关，请邓到北

京后设法交给中央。邓接到手看后，里面的人和事是贵州西部某地农民反饥饿方面的，从中看不出与李再含有什么关系。但出于她对邓的信任，邓答应了她的要求。她反复叮嘱妥善携带，切勿弄丢。

邓穿着从衡阳铁路工程学校老同学处得到的破棉衣，这件对襟棉衣外层左下摆有一个破口子，他把材料从破口子塞进下摆深处放好，以为这是安全的。

“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在清华大学开幕的第二天，主持大会的贵阳师范学院邱富伦突然来了个插曲：严重警告阶级敌人蓄意破坏大会。邓在会场内听后机警地摸了摸破棉衣下摆，发现塞进去的那个材料不见了。散会后他赶紧向邱富伦说明情况，原来这个材料掉落在清华大学主楼的楼梯上，被拾得的人交到大会主席团。

大会主席团请来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同志，邓向这位同志如实汇报了情况。由于有“508”分子潜入大会活动，邓后来在衡阳被抓，可能同此事有关。因为此事北京与贵州两地公安部门会沟通的。1968年3月邓从衡阳被抓回贵阳，关进强制性学习班后，审讯他的专案组成员陈力就来自省公安厅，邓照实向他陈述了事件经过。陈力听了邓的陈述后没再过问此事。但次年春天“双红五条”下达后，邓在省公安厅大院偶遇陈力时，陈力主动告诉邓：这是早已破过案的一起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张崇莉也因此遭受关押数年，1972年春才释放。

（三）“二月兵变”材料与杨成武、邱会作接见

“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提出的口号之一是要“大揭贵州十七年阶级斗争的盖子”，这也包含对贵州可能是“二月兵变”大后方的怀疑。

遵义公交公司驾驶员李树林“八月踏平”后到北京时，获知贵阳钣金社的张国荃声称握有李再含参与“二月兵变”的“钢鞭材料”，便通过七机部战友关系向上反映。遵义市革委委员潘少炎将这一消息告诉北大张甦，张甦也信以为真，写信报告中央文革。1967年12月初的一天，中央文革派人派车到北大，通过张甦找到

了李树林。在“四一一”在京召开全省代表大会之前的同一天夜晚，李树林和张国荃在北京一前一后受到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接见，陪同接见的还有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李树林推说材料要向张国荃，张国荃又推说材料还在贵阳。杨成武的接见一无所获。

但是，杨成武的接见却促成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司令蒯大富公开支持贵州“四一一”，为贵州“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提供了会场、食宿等方便条件。

次年3月杨成武被打倒，使他的接见对中央解决贵州问题起了负面作用，李再含们视杨成武为“四一一”黑后台并布置追查，被关押的邱富伦因此彻底绝望，“四一一”运动至此陷入绝境。

（四）“二月兵变”纯系讹传

1974年9月29日，经毛泽东圈阅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说：“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1980年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调查，在一份文件中指出：“1967年7月前后，在北京市搞得满城风雨的所谓‘二月兵变’，纯系康生企图打倒彭真、贺龙同志而捏造的谣言。”

事实证明想借“二月兵变”来打击李再含、引起中央重视贵州问题的想法是上当受骗，误入歧途。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王力被抓后向中央充分揭露王力一手遮天插手贵州的极左罪过，包括他对首红代会问题的表态和“八月踏平”时的“三点指示”。由于李再含在贵州极力封锁王关戚被打倒的消息，王力在贵州助纣为虐的罪行至死都未受到应有的揭露和批判。

本章参考资料

1.晓地、致武、天逸《文革之谜》
2.邢振新《文革年代的难忘经历》
3.《贵州大学》小报编辑部对“红缨枪”的批判（1967年8月24日第21期）

第二十章　部队换防“四一一”迎来胜利曙光

（一）“龙广事件”与部队换防

1968年11月21日，中央军委向全国各大军区发出通报，批评李再含制造贵州“龙广事件”。通报中说：“更为严重的是……不请示，不报告，擅自将在兴义支左的部队调到安龙县龙广区向贫下中农开枪，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严重地影响了军民关系。”并指出：“以上问题，必须立即追究，严肃处理。”李再含将责任推给在当地支左的7611部队（49师）[1]，遭到7611部队的反对。随后部队换防。7611部队调到云南蒙自去，0276部队（41师）[2]从云南调到贵阳来。

7611部队离筑时，有几辆军车夜间绕经贵阳市区，高呼“打倒李再含”的口号。11月30日夜，贵阳街头贴出了不少针对7611部队的大字报，署名的有独立师（7578部队）、省军区、贵阳军分区、七冶、贵柴、贵州工学院等单位。贵州工学院革委成员何兴无挑开了这个矛盾。7611部队一直是支持省革委的。为什么调动时突变，要打倒李再含呢？“四一一”人感到不可理解。1969年春夏“双红五条”下达后，贵州大学中文系蒋冀（明珠）偕同袁昌禄、李增福，贵州工学院李承宗偕同吴再顺，先后前往云南开远十四军[3]军部和蒙自7611师部，了解7611部队呼喊“打倒李再含”的原因，从而对“龙广事件”作了专题调查。他们受到部队热情接待，并派人派车护送蒋、袁等回到贵阳0276部队。蒋冀（明珠）写出《“龙广事件”真相》，通过贵州大学印刷厂印出传单广为散发。

一年前即1967年11月22日，身兼昆明军区副政委的李再含在贵阳接见云南“八二三”代表团时发表关于彻底肃清“大叛徒”薄一波[4]的流毒的讲话，矛头指向十四军和昆明军区，引起包括0276在内的云南驻军的强烈不满。0276部队来了，很可能会支持“四一一”，这给“四一一”带来胜利曙光！

[1] 49师原属贵州省军区，换防到云南后，1969年重建11军时改为11军31师，1985年归属第十四集团军。

[2] 41师原属14军，1985年14军改编为第十四集团军时，归属第十四集团军，1996年改为武警机动师。

[3] 14军的前身是抗日战争的山西新军，后编入太岳集团军，其中的40师的前身是薄一波的“抗日决死旅”。

[4] 薄一波，山西人，1908年生。解放战争中任华北军区政委，建国后任副总理、中顾委常务副主任等职。1931年6月被捕后，他和安子文等六十一人被关在北平西域区草岚子胡同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为营救他们出狱，中共中央北方局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他们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1936年9月出狱。薄一波1939年后担任过山西决死队第一纵队纵队长兼政治委员。“文革”中他们被诬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为“六十一人案”平反。2007年1月15日薄一波在北京逝世，终年99岁。

(二)部队换防前后的斗争场面

0276先头部队来筑，经打听是乘火车在贵阳南站下车，“四——”中学指挥部暗中组织一批学生前往欢迎，一部分学生被李再含的专业武斗队抓走，其中有十七中女生邓国贞、魏凤英等。不等部队整理内务，有幸脱逃的“四——”立即向0276部队报告。群众欢迎部队何罪之有？部队闻讯意外地吃惊，立即向省革委、省军区要求放人。“四——”们人心大快。

从此，0276部队的来访接待站忙个不停，天天都有到访的“四——”学生、工人、干部和居民。部队换防后，为加强与0276部队的联系，“贵阳地区四——兵团”很快在张德才家开会恢复重建，由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陆光武负责。贵大邓振新、姜青舫、贵州农学院张德才、贵阳九中朱召留、周俊、赵新环等都是活动骨干。1969年元月上中旬，邓振新不畏严寒，躲在市北路陈克久家楼上数天，写了1万多字的汇报材料，向0276部队反映贵州“四——”遭受踏平的情况，请部队如实报告中央。

李再含强烈地意识到部队换防后的形势对他不利。通过“508”同读情报活动，安排一些人作内奸，如叶志伟等，打入“四——”兵团内部，掌握了陆光武的活动动向，于1969年元月22日晚上8点左右，省工代会和“八一八”兵团出动10余人，在贵阳市服务大楼酒店抓捕了陆光武。陆光武被关押一年多，直至1970年元月底，根据中央(69)71号文件精神，才由省公检法军管会释放。陆光武被关押期间被打伤致严重脑震荡后遗症。

陆光武被捕后，贵阳地区“四——”地区兵团的工作由邓振新接替主持。叶志伟又将目标转向了邓振新。

叶志伟是贵阳发电厂职工，原来也是“四——”，“八月踏平”之后，还参与了“四——”地下活动，与陈贤有联系。但在“三·六”事件后，他灰心了，觉得没有希望了，就停止了“四——”活动。他的厂里的锅炉工罗锡康，因为出身好，贵州夺权时作为贵州红色工人造反团的代表，进入省革委后一路攀升，由委员、常委直到不久后召开

“九大”又当上中央候补委员。厂革委主任罗锡康以给叶志伟的老婆解决农转非户籍问题为诱饵，将叶志伟转变为“508”成员，叫叶志伟打入“四——”。

叶志伟利用“四——”的老关系，先与贵阳水泥厂龙明昌、强承怡以及贵阳六中袁立铮等人一起，成立“四——工总司”，然后与“四——”地区学生兵团搞联合，从而与陆光武相识。

陆光武被捕后，叶志伟的内奸嘴脸尚未被识破。他又通过强承怡介绍同邓振新认识，邓安排叶参加兵团勤务组工作。目的达到后，强承怡不久被捕，被关押近一年之久才释放出来。

为了取得邓的信任，叶志伟得知邓是外地人，在贵阳举目无亲，便邀请邓去贵阳发电厂过春节。他说他们厂里的护厂队有半数是“四——”的，住在厂里可以得到暗中保护，比较安全。2月17日春节之前几天他领邓到了厂宿舍区，由一位报称姓田、实际姓张的人安排吃住。邓住了两天感到过分“安全”，觉得可能有问题，就找个借口离厂进城脱险。

2月19日，正月初三，“四——”地区兵团决定在火车站附近刷一批拥军标语祝贺春节。叶志伟告密。当第二天几名“四——”学生在火车站广场地面刷标语时，预先得到情报的铁路大修队“八一八”数百人前来抓捕学生，火车站军管会0276部队军人为了救护革命群众前去制止，这批“八一八”又将刘连长等40多人围困了2个多小时。最后“四——”被“八一八”抓走2人，其中贵阳九中学生汪义培被抓时挨匕首刺了7刀，屁股、手掌等处重伤，部队送到昆明军区医院医治了2个多月。

2月24日至3月6日，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贵州问题的“二月会议”，革命形势向好。3月7日，地区“四——”兵团勤务组开会，定于次日走访0276部队支左办公室，叶志伟参加了勤务组会议，会后就去告密。次日上午，邓振新从都司路王玉珍家出发，抄小路去0276部队，行至兴关路贵阳棉纺厂背后，被两个个子高大的男子抓住，压“喷气式”，边走边打，先押到贵阳棉纺厂群众专政室，搜走了粮票20斤、布票15尺和钢笔等私人财物，用绳子反捆住双手，用邓自己的手绢捆蒙双眼，强迫面壁而立，拳打脚踢。一个多小时后，用吉普车

押送到省财经学校“八一八”专业武斗队。又过了两小时，又用吉普车押送到30公里外的清镇九化公司。当晚，又从贵大开来一部卡车，将邓转移到贵大，关了五天五夜。到3月13日晚上，又从省学办开来一辆车号22-00141轿车，将邓转移到贵州农学院综合大楼，在四楼的一间处理胶卷的暗室内关了四天四夜，省学办从贵阳十六中调来4名工宣队员轮流看守。到3月17日，邓又被22-00141号轿车转移回贵大，又关了两天，到晚饭时刻他趁人多之机要求上厕所便跑了，抄3个多小时小路，返回市内张德才家中，再经过居民委员会严委员安排，住进雪涯路4号张秀珍家中。

“四一一”地区兵团打听到邓被关在贵大后，找了一辆车，决定3月14日凌晨1点对邓实施救援，叶志伟参加了会议。会后他立即告密，于是邓被提前转移到贵州农学院。救援工作失败。

（三）“九大”前后中央两次解决贵州问题

在中央2月24日至3月6日在北京召开解决贵州问题的“二月会议”[附录18]上，关于“八一八”，中央明确指示是跨行跨业的组织，要撤销；关于“四一一”革命群众组织，中央明确指示要承认。省军区何光宇司令员回答周总理提问时说，全省对立面群众有二三十万。总理批评李再含：几十万人你镇压，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是大问题，不能检查一次就算了，你走向反面的危险并未取消。关于铁路问题，中央明确指示交由四十一师负责军管。上述各点李再含在会上一一承认。

可是回到贵阳后，3月7日开核心小组会正式传达时李再含就一一推翻了中央的指示，反复多次耍花招，不让四十一师参加省革委核心小组会；当传达中央关于撤销“八一八”跨行业组织时，李再含站起来气急败坏地说：“‘八一八’跨什么行，跨什么业？我在改正错误的时候，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唉，我没坚持。”当传达到中央关于承认“四一一”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指示时，李再含就说：“关于‘四一一’问题，只是邱副总长一句话，‘政治上要翻身’，其他没别的。”

3月25日深夜，李再含从北京指使秘书牛甫给在贵阳的孙昌

德打电话说“撤销‘八一八’不是中央精神”，“对李再含一批、二保、三看根本不是中央方针”。

3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出“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给贵州部队的指示”，指示内容各有五条，人们称之为“双红五条”[附录19]。人们看到，通过李再含在京的活动，“双红五条”变得原则化了，已经没有上述实质内容，省革委4月20日发出的贯彻通知，对“二月会议”精神也大打折扣。

“双红五条”下达后，李再含被迫把“四一一”头头邱富伦、田子明、孙世政、耿铁等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但他就是不放袁昌福和陈贤，这两人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政委，前者是工人，后者是农民，放出来影响大，不得了；贵州“八一八”兵团被迫解散，其设在省财经学校的总部虽不见了，但只是变相解散，又改名为“捍三红”，其一部分力量被转移至省革委会和省工代会，还在省工代会增设了“群众工作组”，下分内勤、外勤和动态三个组，仍然专门用于对付“四一一”群众组织。

“八一八”专业武斗队从省财经学校撤销后，“四一一”地区兵团进去办公，因空荡荡的财校食堂没有伙食，又搬到贵阳师范学院物理楼办公和住宿。从此地区兵团的集会活动由地下转为公开。

《四一一战报》恢复出版，编辑有师院石尚儒、李可仲，贵大姜青舫、崔玉祥，贵医郭大衡，农院刘广楠以及贵阳一中孙自强等7人。石尚儒任总编。

师院《六六战报》也恢复出版。贵大历史系朱应长、唐怀永、物理系李紫森（李鸿）等编辑出版《挺进报》，在贵阳师范学院印刷厂出报。贵工《春雷战报》恢复油印版。

“八一八”与“四一一”的斗争日趋尖锐。

4月19日，“七冶”“八一八”上街游行示威；

4月22日，“八一八”攻打林业厅汽车场；

4月25日，在春雷广场召开的省市革命群众庆祝“九大”胜利闭幕的大会上，联席会议组织“四一一”的庆祝队伍举旗入场，一名“八一八”头头竟从主席台开枪，“四一一”队伍中一人中弹，屁股受伤；

4月28日，“八一八”更名，宣布成立“捍三红”。4月30日，“捍

三红”把贵州汽车制造厂“四一一”打出来，还组织10车人上街游行，被打出来的“四一一”只好在汽车三场住下来；

4月13日至5月10日，“捍三红”连续多次进行武装镇压和武装游行，在贵阳市六广门开枪，先后攻打贵州水泥厂，攻打贵州橡胶总厂；

5月4日，“捍三红”攻打遵义卫校；围攻0278部队；

5月11日，“捍三红”发现贵阳钢铁厂“四一一”有手雷，抓去9人审问，5只手雷被收去，冉龙伟被“捍三红”的副组长捅了一刀；

5月15日，“捍三红”攻打汽车三场，次日凌晨严淮海被乱枪打死；

5月16日，彭先胜指挥七冶“捍三红”再次示威游行，打死三个不满20岁的小孩；

5月23日，“捍三红” 在紫林庵打死市饮食公司正新街小吃店梁志平。

“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已撤销。由于“双红五条”在贵州仍未贯彻落实，“九大”闭幕后，中央于5月5日至25日又召开第二次解决贵州问题的会议。

5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69)25号文件[附录20]，又一次解决贵州问题，要求贵州省革委和省军区广泛宣传“双红五条”，纠正各方面所犯缺点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

5月24日，李再含在京召集开会，大家都认为：“再不承认‘四一一’不行了，回去要承认，不管怎么样，这条得办。”大家表态完了，一直没有吭声的刘安民说：“‘四一一’嘛，我们承认是得承认，但公开宣布我认为有问题。我的意见是‘总体上承认，主动权交给基层革委’；因为各单位的‘四一一’情况不一样，笼统承认不行；他们的情况，他们本单位最了解，让他们回到本单位去，是什么算什么，是什么承认什么。”李再含对此极为赏识，立即举手赞成。5月25日中央首长再次接见时要求表态，李再含敷衍地说回贵州后一定要承认“四一一”是革命群众组织，而且要到据点里去做工作。5月26日李再含等回到贵阳。

6月7日，省革委增补副主任5人：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0276部队(41师)政委张琦、7578部队(独立师)师长刘金池，以及张健民、罗锡康，他们也都是省革委核心小组成员。

(四)“四一一”联席会议和它开展的斗争

在“双红五条”精神鼓舞下，“四一一”各系统、各行业的地下斗争都转为公开，但各战斗组织仍带着地下活动时隐蔽和分散的色彩，山头林立。

一是学生组织“四一一”地区兵团，活动地点在贵阳师范学院；

二是由郭平、伍昆宪、袁昌富、王明佐等组建的“工建交指挥部”，地点在省建工大楼；

三是由交通运输系统“四一一”工人杨长明、汤仲全、蒋明龙、连华清等在汽车三场设置的交通运输兵团；

四是财贸系统叶仁忠、廖光杰、李德明等在省供销社设立的财贸兵团；

五是贵阳师范学院庞守忠、贵阳医学院汪东炯、林业厅汽车场戴宗祥、冯唐以及孙文彩、杨山华、刘代祥等在省工商联大楼组成的“四一一”工人兵团；

还有市房管系统张仁树、省植物园肖存文等组织的归口联络站；省林勘院寿云夫、贵阳煤矿朱少彪等组织的“五大系统”(农林、水电、煤矿、地质、石油)等。

“九大”以后，“四一一”不再沿用“总司令部”的组织形式。为了促成各个山头协同战斗，经田子明、孙世政、姚德仁等磋商，由杨文华写报告，得到0276部队支持，各山头经过反复协商，形成了“贵阳地区‘四一一’联席会议”，以紫林庵“黑大楼”为驻地，常驻人员有姚德仁、金光祥、涂光禄、谢垂泉等，杨文华任秘书。联席会议进驻“黑大楼”，得到大楼内省属各业主单位的支持，他们欣然让出办公场所。

联席会议以勤务组为核心，于1969年4月19日成立。勤务组最初由11人组成，他们是：耿铁(省植物园)、王长宽(贵阳棉纺织厂)、宋达山(铁路物资转运站)、李少华(省花灯剧团)、汪润生(清镇发电厂)、田子明(贵州工学院)、孙世政(贵阳师范学院)、梁森权(省二工校)、曾祥美(省冶金学校)、方守廉(省运输公司)、魏志将

(新添光学仪器厂)。

5月1日,联席会议勤务组在十三公里0276部队礼堂召开扩大会议,推举宋达山(原贵阳战斗团团长)为勤务组组长,耿铁(原红色工人战斗团)和田子明为副组长。勤务组下设机构有:办事组:组长王长宽,副组长郭平、王普庆;政宣组:组长孙世政,副组长姚德仁;组织联络组组长方守廉,副组长郭玉珍、苏达仁。

从4月25日至7月27日的三个多月内,联席会议勤务组围绕内部团结和文攻武卫等问题,先后组织学习和召开会议50多次,勤务组成员先后两次扩充,冉龙伟(贵钢)、郭玉珍(贵烟一厂)、邓振新从6月10日补充进入,郭平(贵州胶鞋厂)、连华清(人汽公司)从7月19日补充进入。宋达山告退(7月16日),耿铁被抓(7月6日前后),新添光学仪器厂王润身与魏志将交换,魏志将回厂,王润身为联席会议勤务组成员。

7月19日起,勤务组增至15人:组长方守廉,副组长田子明、林和芳。其余成员:王长宽、王润身、汪润生、李少华、郭平、郭玉珍、冉龙伟、连华清、孙世政、邓振新、梁森权、曾祥美。拟吸收进入勤务组的还有贵阳医学院戴碧玉和省运输公司叶仁忠。

勤务组下设政宣、组织、办事、后勤四个小组,分别由邓振新、李少华、郭平、林和芳负责。

"双红五条"下达后,斗争的焦点是怎样搞好大联合。李再含在"九大"后借口消除派性,对群众组织只承认"三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坚持要"四一一"先倒旗再联合,而"四一一"则坚持要先联合才倒旗。

4月26日,在"四一一"联席会议勤务组安排下,在贵阳市六广门广场自行举行了庆祝"九大"闭幕的数万人盛大集会和街头游行,人们来自各厂矿企业、近郊农村、各系统单位、各学校机关,还有许多专州县工人。游行队伍前头的仪仗队400多人,广大群众人心极为振奋。

4月29日,省革委、省军区和0276部队的代表徐明礼、王光银、陈义、杜振山出面,到联席会议做说服工作,要求"四一一"参加次日庆祝"九大"文件发表的群众集会时只打党旗国旗,不要打"四

一一"旗帜。联席会议要求严惩4·25凶手,坚持在大联合实现之前决不倒旗。

4月29日,贵工"四一一"借在春雷广场集会、庆祝"九大"闭幕的机会,组织示威游行,显示"四一一"的实力。为防止被武装暗算,所有的标语牌手柄都用铁棒做成(田径栏架的铁杆子),外包彩色纸,让人看不出是铁棒。工学院的队伍刚好站定,由省建四公司的"捍三红",挥舞梭镖匕首直指工学院队列,杀伤冶金系学生白瑞卿,幸好杀在皮带上而入肉仅1厘米,同时划伤另一学生的手背。工学院的学生扯下标语牌手柄(铁棒)反扑,"捍三红"亦心虚退去。工学院"四一一"将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作为"挡枪牌"抬到广场毛泽东塑像平台上,并不停地挥舞语录本,防止真枪"走火"。工学院"四一一"头头亦怕血流在主席像下,于是带领队伍经箭道街、转新华路至军区大门而散,脱离了是非之地。

5月10日,联席会议为解决归口联合问题,召开了贵阳地区各系统"四一一"代表的联席会议,参加单位有省建工系统、省机械系统、邮电系统、石油指挥部、建工部四局、柴油机厂、汽车大修厂、耐火材料厂、贵阳制药厂等;

5月11日,联席会议对文攻武卫作了分工,文攻由田子明、孙世政、梁森权负责,地点在和平路云岩区教育局一个小院内。武卫由耿铁、汪润生、曾祥美、魏志将、方守廉负责,地点在汽车三场。后来这个分工有调整变动。

就怎样搞好大联合问题,联席会议在5月23日中央(69)25号文件下达后接待了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安一长、张新民的专访。田子明、李少华通过记者提出要求:一是要求公开表态"四一一"是什么组织,为"反动大杂烩"摘帽;二是收缴"捍三红"的武器,制止武斗,惩办凶手;三是释放被关押的"四一一"学生和工人;四是举办两派学习班,解决归口联合问题。

5月26日,省军区、贵阳军分区和7578部队(独立师)的代表王光银、汪胜永、陈俊林、左从清来到联席会议,要求撤出据点,收缴武器。联席会议回答,缴武器"捍三红"应先兑现,杀人凶手要严惩,"四一一"是什么组织要定下来。这三条兑现了,"四一一"撤出据点。

6月9日，召开了全省各地州市“四一一”代表的联席会议，到会的有都匀、施秉、凯里、兴义、盘县、毕节、安顺、平坝、遵义、铜仁的代表；

7月12日，省军区参谋长王彦才、0276部队青年科科长陈匡来到联席会议，就收缴武器和撤出据点问题听取和交换意见，表示今后多来联系。

7月16日至18日，举办了贵阳“四一一”各个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三天，参加人员20至28人。联席会议勤务组在学习班结束时又作了调整扩充。

（五）“四一一”的据点策略

“双红五条”下达后的“四一一”，大学生大都已毕业离校，中学生大多已上山下乡，工人们分散在各自厂矿，斗争实力今不如昔，贵州汽车制造厂等“四一一”工人被打出来，要求省革委、省军区安排吃住，不予解决，大家只好找汽车三场等几个点住下来，这就成了据点。据点策略因而成为斗争策略。既然有了据点，李再含势必想方设法拔除。因拔除“四一一”据点而制造“7·29”事件，最终导致李再含垮台。

“四一一”在市中心延安路一带自西到东的据点有汽车三场、建工大楼、黑大楼、供销大楼以及工商联大楼等处。另在贵阳钢铁厂和新添光学仪器厂内也有据点。各据点几乎都没有什么武器装备，都不具备进攻能力，因此都定下一条原则：搞好自我防御，决不主动出击。针对李再含给“捍三红”发枪和鼓励造枪，“四一一”各据点也不得不想办法搞了一点自卫武器。

交通系统的“四一一”为了自我防卫，在汽车三场将一辆依发车用钢板围装成笨重的“土坦克”。

驻建工大楼的工建交指挥部伍昆宪等带一车人从乌当区水田公社武装部弄来2挺机枪、25支步枪，但只有12发子弹。省军区参谋长王彦才前来问责。郭平回答说：“不能只许‘捍三红’造枪造炮，也要允许我们自卫。”王参谋长无言以对。

联席会议驻黑大楼姚德仁带2车人从龙洞堡仓库中弄到24箱炸药，返回途中经省冶金厅背后，在车上坐在姚德仁身边的王海被贵阳制革厂“捍三红”人员开枪打死。郭玉珍从盘县弄来两支手枪和两箱炸药。

本章参考资料

1. 姜青舫《贵州将彻底变革》载《四一一工人》1969年3月20日，此文由姜青舫撰写，以编辑部名义见报。
2.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9年3月27日。
3.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给贵州部队的指示》，1969年3月27日。
4.中共中央下发(69)25号文件(1969年5月23日)
5.《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6.孙昌德：《彻底揭发两面派的反动典型李再含》
7.邓振新《文革年代的难忘经历》
8.杨文华《四一一联席会议记录》
9.姚德仁《音乐专题剧本〈歌声·枪声〉》
10.康宁提供本章照片

“四一一”欢呼双红五条下达的示威游行

1969年4月恢复出版的《四一一战报》编辑部

后排左起　孙自强 袁开忠 李可仲 刘广楠 李源清 曾宪国

中排左起　朱莉 袁世莲 傅 扬 康 宁 李俊玲 xxx xxx

前排左起　郭大衡 廖仕裕 石尚儒 姜青舫 崔玉祥 欧阳贲

贵州工学院“四一一”庆祝“九大”的游行队伍

附录18　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二月会议”精神

1969年2月中旬至3月6日，中央召开解决贵州问题的“二月会议”，3月19日，省军区副政委田化一在团以上军队干部和部分军代表会议上，首先传达了中央首长讲话精神，随后传达了省革委、省军区贯彻落实意见。

周总理：这次会议解决军队关系问题，从解决贵州问题开始，联系到云南问题，重要是贵州问题。这次会议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的。解决贵州问题，首先从军队问题解决起。毛主席讲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还告诉我们要做军队工作。解决问题是这样，解决效果更好。军队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巩固两省领导。军队之间、两省之间、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关系也就好了。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最后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评，基本上达到了目的。自我批评程度虽不同，但有重点，贵州问题就是重点，李再含同志就是重点。现在贵州出现了落后现象，我们是有发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就知道，没找来谈，这次出了事才找来。李再含同志骄傲自满，沾沾自喜，站在一派很不好，应该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但你不是，搞多中心论，以我为核心，以我为中心，支持我就好，有了不同意见就是错的，对中央是报喜不报忧，甚至不请示不报告。我们有责任，但不能减少你李再含同志应当承担的责任，这一点李再含同志作得很不好，更多的是把责任推给下边。你看在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为徐海东问题都承担责任。对的全是你的，不对的全是下边的。你也不对嘛！毛主席总是给下边承担责任。从你李再含同志的发言就可以看到，说自己的错误时声音很低，勉勉强强，说到成绩和别人反对你时，声音很高，声声有理。你的问题康老谈了，还是一批二保，担子还是你担。李再含同志的中心问题是缺乏党的生活作风。你也承认你水平低，不称职，担负工作很吃力，的确是这样。但你昏昏然，骄傲自满。要求你回去要传达中央精神，要有步骤，要逐步传达和群众见面。首先军区党委和省革委传达。何光宇同志的检查态度明朗。何光宇同志要互相监督，不要一团和气，有问题吵一吵，吵完了就轻了。总要集体领导，不要个人说了算，要集体商量。军区党委、省革委核心小组都应这样。我们从贵州的报纸、文件看到你李再含同志总是个人说了算，就连你的插话也当成指示下发，要下面学习。毛主席的指示还要再三考虑才形成文字发表。你们那里有国防师，要参加革委会，国防工业、三线建设也要参加。首先希望你们要加强集体领导，中心问题是党的生活问题，要形成集体领导，在林副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在贵州军区形成集体领导。要多听取不同意见，不要有了不同意见就是“四一一”，姿态要高。李再含同志，对你有不同意见就压，这是不对的。

情况是在不断变化，不能说哪派革，哪派保；哪派好，哪派坏；要以哪派为主，哪派为次。毛主席指示，到一个工厂、学校、部队去，不要急于表态，什么保啊！到去年情况就变了嘛！李再含同志的电话是错误的。为什么要站在陈康一边？你了解情况吗？你不应当干涉云南的事。既然云南问题解决了，就不应该开开会议。部队为什么气那么大，当然要解决问题，就不应提不适当的口号。但陈康同志、李再含同志也不应该听到喊几句“打倒”就那么计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江青：我们这些人也有人要打倒、油炸、火烧）反动的多中心论，这是李再含的主要错误，李再含同志要作自我批评。不仅李再含同志，我们在座的都要注意这个问题。以我为核心，不能自封核心，自己一切都对，自以为是，不请示报告，就要犯错误。军队有党委领导，有政治委员制度，要集体领导，军队有首长制，西南离中央远，更要警惕这个问题。

二是军队问题。军队关系一定要搞好。在延安以谭震林名义发表的政治工作报告，其实是主席的。谈判要处理各种关系，地方军、省军区、分区，地方性要放一些；野战军住久了也受地方影响。这个问题，贵州的关系更紧张。不仅当地关系紧张，就连过路的十三军、五十四军的关系也紧张。你们“八一八”发枪是否轮训？（李答：没有多少枪，是轮训）你李再含同志不要文过饰非，真实情况你不了解吗？首先解决军队问题，要学习古田会议政治工作决议，今后只要是北京发表的号令，不是小道消息，就要坚决执行。

三是对待群众态度问题。三年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发展的，不能把原来造反的都看成响当当的左派，把原来保守过的都看成保，北京有名的五大领袖，现在就不出名了。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物总是发展的，李再含就不懂这个问题，犯了错误，要帮他改。你们都要有这个认识。（康老：其他地方也有这个问题，山东就有。李再含，谁要提打倒你，就是“四一一”，还提“军队出了个李再含”，你有多大功劳啊！没有毛主席，你什么也搞不成。）就算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老本就那么一点点，靠吃老本，就要发昏。对李再含不仅一批二保，还要看，不能谁一反对你就压，就是“四一一”，这怎么能行！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李再含检查不深，你压人家，你说这个问题你检查，你没检查，你总压对方。据何光宇说，全省对立面群众有二三十万。（江青：毛主席对几十几百人都他重视）几十万人你镇压，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是大问题，不能检查一次就算了，你走向反面的危险并未取消。人家有意见，毛主席讲不能清一色，只要是内部矛盾，就想法吸收到革委内部来。还有你随便定一个组织为非法的，把革委会翻过来，这都是很错误的。过去你就是倾向一派掌权。四十一师，有群众问你们，你们可以答，支持革委会，支持李再含同志，但不支持他的错误。李再含应

当了解，中央是不准这样定的，这是多中心论。因此不能过多地责备它。方针还是归口大联合。（姚文元：主席从贵州发现归口大联合，可你们就是不执行）云南问题解决了，贵州问题还差得远。你李再含还是两种可能性，你还有"八一八"，走向反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前警告你一下，你检查你的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很严重，调部队不请示就发枪，相当严重，不符合林副主席的三性，你不要辩护，你的报告由军委办事处严格审查。

最后，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你们在边防，面临帝修反，还有蒋介石，对敌斗争很重，同时又面临三线建设，贵州任务很重，六盘水任务，粮食西南还未过关，运输任务重，现在还在滇黔线上搞武斗，铁路要由四十一师管好，应有步骤地做好群众工作。

康老讲话：同意总理全部讲话，同解决浙江的一样，开始都是气冲冲，后来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当然有深有浅，是个良好的开端，证明一个真理，一切按主席思想、方针政策，那就能解决的，证明主席指示完全正确。希望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主席说群众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的确如此。浙江、云贵的问题都证明了。在座的都是高级干部，都要学毛主席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按林副主席指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下功夫。学习毛泽东思想总要和实践对照。接班人的五条：一，干部要读马列主义，我们讲话做事要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李再含同志进行自我批评我们欢迎。我看了你的信，你讲话引用马恩列斯的话，但引得很不高明，引得荒唐，你学好了没有？以马列主义吓人！二，为大多数人服务，你不能支持一派压一派。三，团结大多数，团结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李再含同志、陈康同志，你们要想想，十三军、十四军为什么要那样反对你。四，民主集中，贵州是李再含说了算，很危险，为什么听不得一点意见呢？五，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次看出，只要进行自我批评，什么事都好办，否则，就不好办。要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五条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两省是兄弟关系，这就是要顾全大局。李再含的电话是错误的。你看12月11日评论员文章多么恶毒！你是本报评论员。云南还客气些，是以"古田红"名义发。（江青：以后各省的报纸都不准有攻击别省的文章）总之，大家要以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

谢富治副总理讲话：这次会议开了个好头，是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方针、路线、指示、方法办事的。云贵是国防前线，既是前方又是后方，是三线建设重地。这个地方又远离中央，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很重要。现在的形势很好。遇到一些困难，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好办。部队换防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要陷入派性。你们无论如何不要管外省的事，云南不要管贵州，贵州不要管四川。李再含同志不要管别人的事，但回去怎么工作，要逐步地把中央

精神贯彻下去，不要一下子搞下去，不要叫资产阶级派性牵着鼻子走。多中心论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顾全大局，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先把军队统一起来就比较好办了。向去要搞好，多做艰苦工作。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你们的关怀。千万要注意顾全大局，贵州要不就是大乱。千万不能大反复。

江青同志讲话：云贵同浙江不一样，没有啥讲的。主席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主席从来是亲者严疏者宽。大军区对陈康问题要做工作，创造条件，李再含同志也是如此，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前面有许多新鲜事物要学习，李再含同志讲很多话，要注意。

黄永胜：昆明军区，包括两省军区、两军，重点是把拥政爱民搞好。拥政爱民就是信任、尊重、支持革委会，执行革委会的决定，要很好教育群众，不能合胃口的支持，不合胃口的不支持。因为革委会是个新生事物，要支持，这是大局；爱民就是爱工人、爱广大贫下中农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群众，不能只爱一派。军队与革委发生矛盾，军队要作自我批评，批评自己。主席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军队问题解决好，群众问题就好解决了。要更好地进行工作，勤勤恳恳地检查缺点。开几天会，同志们有了点觉悟，回去先解决军队问题，作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毛主席的思想下团结起来，不要各搞各的。主席说军队干部心急像打仗一样，问题还未弄清，就轻易表态。文化大革命三年了，群众运动发展了，群众组织也变化了，不能一成不变。从这次会议开始，都要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

贵州省革委、贵州省军区关于落实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几点意见

毛主席、林副主席：

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关怀下，我们来到毛主席身边，经中央首长苦口婆心地教育，确定了解决贵州问题的决定，我们保证迅速传达，坚决贯彻执行。

1. 遵照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一定要以大局为重，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政策、计划、指挥、行动，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鉴于贵州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建设任务重，因此我们决心局部服从整体，小局服从大局，去掉私心杂念，坚决执行中央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方针，保证既要解决存在的问题，又务必稳定贵州局势。顾全不顾全大局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现实表现。

2. 一定要搞好团结，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统一认识，坚决执行中央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通知，对敌狠，对己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军内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上下一致，保证不再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有话当面讲，不搞小动作，不当两面派，不讲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

不利于团结一致的事。发扬互相尊重、相互学习的优良作风，对群众多做工作，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搞好大联合，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阶级敌人的挑拨破坏。

3. 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团以下作好正面教育，采取内部解决、不搞到社会上去的办法，时间预计在二十天左右，常委会要认真进行传达，正确领会中央指示精神，在此情况下，统一认识，统一指挥，同时各级革委会要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具体办法另定。

4. 加强各级革委会，增加不同观点的同志到革委，吸收四十一师10名参加省革委，1至2名常委。

5. 坚决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迅速收缴枪枝弹药和一切武器，严禁打、砸、抢和行凶。

6. 无证据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不应抓的群众组织头头，给群众做好工作后，立即释放。

7. 进一步搞好归口大联合，撤销群众组织，不许再拉出山头，另立组织，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

8. 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活动，省革委、省军区要在群众中进行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和向解放军学习的教育，要相信和依靠四十一师和驻贵州的部队，各级革委会要主动征求部队的意见，同时要认真作好军区工作，作好复员退伍军人工作，对四十一师和原四十九师的复员退伍军人要和其他部队一视同仁。

部队要支持、尊重革委会一元化的领导，用毛泽东思想帮助革委会不断巩固和完善，在革委会领导下完成三支两军任务，在部队中进行拥政爱民教育，主动征求革委和群众的意见，改正自己的工作。四十九师要做好部队家属和复员老兵的工作。通过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工作，使部队、军政、军民之间出现一个大团结的大好局面。

9. 请中央批办贵州学习班。

10. 抓革命，促生产，保证铁路畅通，加强军管的集体领导，铁路军管由四十一师全部接管，军管的各项工作与军管各方的问题，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

（据谢慧金笔记，来源：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

附录19　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两个红五条"

1969年3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出《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给贵州部队的指示》，简称"两个红五条"。

《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一)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已有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二)要坚决支持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拥护新生的红色政权。

(三)驻贵州部队要坚决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政爱民"的指示。

(四)贵州各级革命委员会和一切革命同志要爱护自己的子弟兵人民解放军。

(五)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给贵州部队的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一)一定要顾全大局。

(二)军队内部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三)军队一定要拥护、支持、帮助革命委员会，走拥政的路。

(四)军队一定要认真做好群众工作，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五)要加强对复员军人的教育。

附录20　中共中央处理贵州问题的中发(69)25号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9］25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贵州省各级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各军分区、各县、市人武部，各地驻军，贵州省"九大"代表，各地革命群众：

中央同意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关于落实"九大"提出的战斗任务和毛主席批发的两个"红五条"的意见和贵州省军区对解决贵州问题提出五条措施的报告。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学习林彪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加强部队内部、群众之间和军政、军民的团结，广泛宣传中央两个"红五条"的指示，纠正各方面所犯的缺点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贵州局势，搞好抗旱斗争，加快三线建设，实现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部署，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贵州在京开会代表的意见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耐心教育下，在"九大"精神鼓舞下，我们贵州省全体党代表、省革委、省军区以及四十一师、独立师的领导干部，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发的极为重要的对贵州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红五条"，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建议，起草了一个贯彻"九大"和两个"红五条"的意见。是否妥当，请中央批示。

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贵州省"九大"代表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贵州省军区
陆军第四十一师
贵州省独立师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关于落实"九大"提出的战斗任务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发的指导贵州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红五条"的意见

（一）关于认真贯彻"九大"精神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全国人民的这一伟大号召，给我们指明了继续革命的方向和道路。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继续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的总方针。是核心，是灵魂。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会议上极其重要的讲话，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创造性地、深刻地阐明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科学地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明确地提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

大纲领。

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表示，完全拥护，坚决照办。

为此，我们要坚决做到：

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个空前规模的深入持久的学习、宣传、执行、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其重要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的群众运动：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报纸、广播都要集中地长期宣传这个唯一的政治中心内容；广泛组织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广泛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级革命委员会、部队各级党委、各级三代会，都要对照自己的工作，找出差距，落实措施。总之，全省军民动员起来，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最大的政治上来。

二、"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没有革命的团结，就没有革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就一定胜利。各级革命委员会、各级三代会和全省革命群众，都要本着这个极其重要的精神办事。不讲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时候，闹无原则纠纷的时候，都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务必执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务必做到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小局服从大局；加强党内生活，有话当面讲、及时讲。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开展谈心互助活动，互相帮助，互相安慰，风雨同舟。认真地、反复地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光辉文献，每个同志都要自觉做到不搞小宗派、小山头、小团体主义。一切革命的同志、务必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和粉碎敌人的挑拨离间，破坏我们革命团结的阴谋。

三、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党、政、军各级领导要搞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完成斗、批、改的各项任务。"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要认真执行毛主席规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根据贵州省的情况，尤其要注意对待群众的政策和对敌斗争的政策，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为此，各级革命委员会、部队各级党委，都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真正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上有典型。

（二）关于落实两个"红五条"

一、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指导贵州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红五条"，以

及中央负责同志最近多次给我们的亲切指示，是对贵州全省军民的最大关怀，最大教育，最大支持，最大鞭策，我们坚决拥护，坚决照办。

二、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我们也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中央及时纠正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诚恳接受中央的批评教育，坚决检查，坚决改正。

三、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大敌当前，一切革命的同志要团结起来，要共同对敌，要准备打仗，要争取更大的胜利，用革命和生产的新成绩，回击苏修叛徒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为此，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部队各级党委、全省革命群众，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动员起来，务必以大局为重。准备打仗，团结对敌是大局，实现"九大"提出的战斗任务是大局，完成工业生产和三线建设任务是大局，搞好抗旱斗争和农业生产是大局。顾不顾大局，是忠不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现实的考验。我们要和一切不顾大局的思想作斗争，将贵州的局势迅速稳定下来。

四、"红五条"指出："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已有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任何另拉起'山头'的一切分裂行动都是错误的。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认真搞好斗、批、改。'"为此，全省革命群众，要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一切另拉起"山头"的群众组织，应说服他们，迅速撤消，广大群众应迅速回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工厂、机关、学校、事业单位，各公社、大队、生产队，一定要正确对待他们，欢迎他们，团结他们。

五、"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红色政权，人民解放军是政权的支柱。全省军民要坚决走"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道路，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人民解放军要坚决尊重、信任、支持、帮助、保卫革命委员会，做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坚强后盾；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广大群众要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破坏军政、军民团结的一切阴谋诡计。

以上意见当否，请中央指示。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贵州省军区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

1969年5月20日贵州省军区在京常委对解决贵州问题提出五条措施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怀下，我们来到北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在"九大"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重新学习了两个"红五条"。我们和两师领导同志受到了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对我们前一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看得更清了，方向明确了，信心更足了。

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正确方针，指导思想有错误，把贵州存在的某些问题看重了，要求太急了。省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没有很好贯彻毛主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的教导和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在毛主席亲自批发的"红五条"下达后，我们仍没有深刻领会中央精神，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落实"红五条"。当革命委员会工作处境困难时，我们没有积极支持帮助革命委员会，反而对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有埋怨情绪，影响了军政、军民的团结。

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头脑中的私字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作怪。我们的错误影响了贵州局势的稳定和三线建设，影响了"九大"精神的贯彻，干扰了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的落实。回想起来，我们的心情非常沉痛。我们诚恳地接受中央首长对我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党的"九大"精神为纲，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全面落实中央的两个"红五条"，把贵州问题解决好，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

我们的决心是：

一、一定要顾全大局，搞好军队内部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只见局部，不看全局；强调小道理，不管大原则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一定从中吸取教训，坚决搞好省军区党委内部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认真组织部队学习毛主席在"九大"所作的极其重要的指示和"古田会议决议"，认真学习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新党章和"九大"重要文献，认真学习两个"红五条"。加强部队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教育、组织纪律性的教育，促进部队思想革命化，保持部队的绝对稳定，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和赫鲁晓夫的战争挑衅。

二、坚决稳定贵州局势，坚决拥护、支持、帮助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这是贵州的大局。提出“打倒李再含”的口号是错误的。我们坚决尊重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组织部队大张旗鼓、深入持久地向群众宣传“九大”精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大力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坚决维护革命委员会的威信，大力帮助革命委员会工作的正常进行。

三、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认真向八三四一部队学习。部队分别找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开谈心会，主动作自我批评，增强团结。引导群众组织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认真搞好斗、批、改。”坚决反对任何另立山头的分裂行为。为此，我们将相应调整部队的“三支”、“两军”任务，由驻贵州各部队按系统，按地区，分别担负起“三支”、“两军”任务，尽快把贵州局势稳定下来。落实“九大”所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四、积极做好复员退伍军人工作，省军区、军分区，各县人民武装部要认真作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并同有关部队联系共同抓好他们的教育。要正确对待持有不同观点的复员退伍军人。加强民兵教育，使复员退伍军人和民兵都成为执行“红五条”的模范，坚决支持革命委员会，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

我们坚决响应中央负责同志的号召，发动部队和民兵积极投入抗旱斗争，夺取今年农业大丰收。

我们的决心是：

(一)一定要顾全大局，搞好军队内部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二)坚决稳定贵州局势，坚决拥护、支持、帮助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这是贵州的大局。提出“打倒李再含”的口号是错误的。

(三)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认真向八三四一部队学习。

(四)积极做好复员退伍军人工作。

五、为了有效地解决好贵州问题，我们建议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带办贵州学习班。

当否？请中央给予指示。

最衷心地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中共贵州省军区委员会在京常委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

第二十一章 开枪杀害无辜群众的“七·二九”事件

(一)“七·二九”事件背景

党的“九大”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林彪作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在总纲中把林彪定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贵州的李再含和罗锡康在“九大”当上候补中央委员。1969年5月20日，贵州省军区在京常委对解决贵州问题提出了五条措施，为了稳定贵州局势，向中央表态，坚决拥护、支持、帮助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认为提出“打倒李再含”的口号是错误的。李再含因此更加有恃无恐，负隅顽抗，以为他是打不倒的“不倒翁”(见附录22)。他把李立推上第一线。

6月8日至13日，李再含在花溪301小别墅召开“支红”钢杆的绝密交底会，会上拟定了一个绝密文件，把对“四一一”“总体上承认，主动权交给基层革委”的方针用文件固定下来。他还要孙昌德找一个典型。孙昌德选择了贵州汽车大修厂的一个“四一一”战斗队“丛中笑”为典型，以省革委黔发[69]77号文件向全省推广。“丛中笑”头头裴建华宣布解散组织同支红派搞“联合”，而后被吸收进厂革委。通过花溪会议，李再含把贵阳地区八个片区和主要厂矿都控制起来。

在6月15日至25日召开的磊庄会议上，李再含又要李立传达贯彻了对“四一一”“总体上承认，主动权交给基层革委”的绝密文件。

6月28日，“捍三红”攻打并踏平安顺运输公司。

7月4日，开完核心小组会后，李再含派刘安民到安顺，几天后调动支红派武装攻打普定县，杀死县革委主任王福林等，死伤数十人。

7月6日，李再含从昆明军区关于收缴、修理、整顿武器的通知中断章取义，提出组织民兵，发放武器，成立了发放武器小组，批准发放枪支2400多支。有人提出发枪要向中央请示报告，李说：“边报边发，发错了，昆明军区负责，我们是执行昆明军区文件。”

7月9日，李再含背着核心小组向省工代会布置“要工人立即进城，稳定局势。”并对“四一一”据点要求“无论如何不能拖到八月”。具体办法是：“1000人戴袖套在外面维持秩序，1000人拿武器在后面藏着，见‘四一一’的人出来就捉。”10天前就拟定了的这个办法，李再含直到7月中旬才在核心小组会上明确提出。

李再含听到孙昌德等汇报工厂已造出冲锋枪时哈哈大笑说：“以前陈璞如搞枪搞了几年也没搞出来，现在才几个月、几天就搞出来了，工人就是有办法。”他支持“捍三红”在贵阳地区25个工厂制造武器。据贵阳市机械办许浔生的不完全统计，共造枪炮1292支(门)，手榴弹1840个。

7月23日，“捍三红” 攻打清镇电厂，7月25日清电据点被踏平，死6人，伤70余人。

此外“捍三红”还攻打水城铁路机务段，并在铜仁地区制造“朱端富”事件。

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和恢复生产与工作。10月1日是建国20周年大庆，李再含要在8月份之前拔掉“四一一”据点迎国庆。山西省是先于贵州夺权的省份，“九大”后仍然武斗不息。毛泽东在“九大”时提出了“团结、胜利”的口号，周总理抓住时机，首先解决了山西问题，并向全国发布了有名的“7.23布告”，要求无条件地收枪，解散专业武斗队。

7月25日踏平清电据点后，对贵阳市延安路据点的攻打就在

眼前。中央在五月会议上确定四十一师张琦等同志参加省核心小组会。李再含怕四十一师走漏消息，对李立、张明、孙昌德和刘安民说：“现在情况复杂，变化也大，有些事情要随时研究，看来像以往隔好几天才开一次会已经适应不了这种形势。现在定下来，两天开一次。参加的人嘛，有的看病，有的不在家，就这些同志，不是核心组会，我们学中央的，叫做‘碰头会’。”他要通过“碰头会”把张琦同志“碰”出去。

李再含在谈完“碰头会”之后说：“大家看看，据点问题怎么办啦？我们是5月26日回来的，两个月了，还是乱糟糟的！‘接见’几次了，有五六次了吧？”(有人答：“五次了。”)李接着说：“是啊，已经五次了，像‘四一一’那个样子，叫他们回去，就是不干。而且要求越来越高！哈哈，怪事情！现在人数不多了，剩下的都是些有问题的。……虽然人数不多，但占着据点哪，拖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已是相当耐心了。”(有人提出要打)李再含说：“我郑重声明：打据点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请示中央。啊，我再说一遍，我郑重声明：打据点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请示中央。”

李再含部署拔据点的力量，他幕后布置独立师一个连队在省计委大楼内，省射击队的枪手在省政法大楼楼顶、紫林庵百货大楼和喷水池百货大楼楼顶等处设攻击点，以端掉“四一一”据点为目的。险峰机床厂“捍三红”还在延安小学教师宿舍向省工商联大楼的“四一一”工人兵团射击。在17公里外的大山洞还部署了“捍三红”的主力，旨在到时听候进城拔据点。

“七·二九”事件后李再含在北京学习班作检查时说：“我认为‘九大’后解决‘四一一’在贵阳据点的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不能拖过八月。我主张工人进城，要警司告诉‘四一一’撤除据点，首先撤出省革委办公的大楼，我讲了如果‘四一一’拒不执行‘红五条’，一定要坚持据点，就要采取‘南宁道路’的办法，并且讲过少数人要走‘南宁道路’是不可避免的。对支红派造枪，我是同情和默许的。”“当独立师连队开枪后，就要工代会调动工人队伍占领政法大楼，支援计委大楼。我表面上说，打掉‘四一一’据点要请示中央才行，真正的思想是端掉就端掉了。‘七·二九’前后我退居幕后，假装不知道，后来

打了以后，我非常高兴，说打得好，打得有理，打出了一个大好形势。还说要因势利导，彻底整顿贵阳市，限三天之内把贵阳焕然一新，这就是我对待群众的恶劣态度。”(见附录25)

(二)目击者描述“七·二九”事件现场

“捍三红”以贯彻“7·23布告”为由，拔掉“四一一”的据点，孤注一掷，制造流血事件。到7月29日早上6点多钟，一场大规模流血事件终于在贵阳市紫林庵广场发生了。

据省工代会郗淑珍在北京学习班揭发，7月29日的头天晚上，“捍三红”连夜开会，决定布置了一支冒充“四一一”的武装小分队，凌晨驾车驶过紫林庵，向驻有独立师连队的省计委大楼开枪后离开现场，制造借口向中央汇报说“四一一”开枪了，引发独立师连队从省计委大楼向黑大楼和紫林庵广场的“四一一”宣传车和围观的无辜群众开枪。

贵阳师范学院孙世政，当天在紫林庵亲历“七·二九”事件，是一位现场目击者，在40年后的2009年8月通过认真回忆，作了如下描述：

1969年7月28日晚似从黔灵山方向用冲锋枪向三场停车场射击，打得地上冒火星。我们的方针是，只要不直接攻打三场，我们决不主动出击。那天晚上我睡在三场办公楼里。第二天，即7月29日早上，我刚起来不久，就有人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我报告，说计委大楼里向外开枪打死人了，并说其中一位卖纸花的老太婆中弹后还没死，就一起被拖进了计委大楼门洞里。

我立即与其他人一起奔向紫林庵，然后顺着计委大楼东侧墙根往大门口摸过去，想看看门洞里的情况。刚一伸头，突突突几连发子弹从门洞里射出。过了一阵，我蹲下去试着再伸一下头，又是几连发子弹射出。当时我裤子口袋里一边揣着一枚拉火手榴弹，但是我向后面的人示意，沿着墙根退回去。此时紫林庵周围已集聚了许多人。那里当时好像是一个换乘公共汽车和一些厂矿班车接人的地方。为了搞清情况，我绕到计委大楼前的一片柏树林里，从一棵树

躲到另一棵树，来到大楼前离大门较近的一棵树背后往门洞里看。但是门洞里光线很暗，黑糊糊地看不清楚。

正在这时，一位中年解放军军官从楼的东侧向大门走去。他斜背着军用挎包，一边上台阶一边举起右手向门里喊话：“老王(黄)不要开枪！”话音未落，突突突几连发子弹从门洞里射出。只见这个军人右手还未放下，左手捂住胸部，大声喊着转身往回大步走来，我迎上去，他正好倒在我身上。我把他反背着拖进树林。又来了几个人，我们一起把他抬上一部公共汽车送医院抢救。我顺手摸了一下他的挎包，凭手感好像里面有支手枪。这位军人是7578部队(独立师，支持李再含)的一位营职干部，名叫左从清。据说他被送到部队医院时已经不行了。当时我穿一身蓝色工装衣裤，上面满是这位军人的血迹。这时候紫林庵周围已有数千人围观。

此后有人通知我去我方建工大楼据点开会，与会者有田子明等人。会上决定把我方自行改装的“土坦克”开出来。它是利用一部大依法拖车头，用角钢和钢板焊了个防弹外壳，顶上焊有一个圆形交警岗台，四面各开有一个小窗口。车内带有五支中正式老步枪和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当时我在会上明确指出，开出这部“土坦克”不是去攻打计委大楼，而是停放在计委大楼外的路口上，用来维持现场场面，以壮群众之声威，扩大事态，拖的时间越长，李再含犯的错误就越严重，中央肯定会表态；车内的枪支是当楼内武装人员冲出来攻击“土坦克”时用以反击的。现在来看我说的这些话，可以说是残忍的阴谋诡计，可在当时不能不这样想。把这一切交待清楚之后，我和几个人一起上了“土坦克”，按计划将“土坦克”开到紫林庵，停放在计委大楼大门百米外的路口上。大楼内7578连队的火力向“土坦克”射击，但是钢板很厚，只听见子弹击中钢板的叮咚声，车内很安全。机枪手说机枪的两条腿无处架放，枪口搭在岗台窗口上不行，我就要他把两条机枪腿架在我双肩上试试。正在这时，忽听车引擎发动起来了，声音特别大，我用力拍打驾驶台顶棚，大喊不要开车。但是车里除了引擎的轰鸣声，什么也听不见。这部“土坦克”就摇摇晃晃地开上了马路牙子。事实上，这部“土坦克”只是做来装装样子，根本不具备进攻作战能力，在从计委大楼前经过时，楼上密集火力向

"土坦克"射去，并扔下手榴弹。幸好钢板厚，一点事都没有。根据我的模糊印象，好像是有手榴弹掉在车旁地上还在冒烟，"土坦克"钢板壳与地面有一定间隙，车往前移动，手榴弹由间隙进入车下发生爆炸，驾驶台有人受伤，好像轮胎也受伤。车继续前行一段距离，在紧靠延安照相馆的修鞋铺旁一歪就停下了，车内人员开始撤离，驾驶台出来的人好像身上有血。由于我们总共只有两挺轻机枪，十分珍贵，我要机枪手把枪交给我，让他先行撤离。待我把机枪弹匣卸下来装进衣袋里，再把枪检查一遍，然后翻下车时，"土坦克"内只剩我一个人了。当把它开上马路牙子时，由于焊接质量差，在边上碰掉了一块钢板，形成一个缺口。从缺口向外窥探，我看清了车所在的方位，看好了冲出去的路线，等了一小段时间，听枪声已向别处射去，抓住这个空隙，我提着机枪冲出了"土坦克"，向延安中路口猛跑，一个翻滚就打进围观人群中了。不一会机枪手赶到我面前，我把机枪和弹匣交还给他，要他马上把它们送回建工大楼，嘱咐他人在枪在。这个时候事态似乎进入高潮，成千上万人围在紫林庵周围。一阵枪响之后，在人群骚动中又有人中弹倒地。

我自知不能在此独自久留，正考虑是去建工大楼还是回汽车三场时，有人过来告诉我，说是新华社记者老夏在延安中路口另一侧的省供销社楼上要见我。以前我只听说过有一位叫老夏的新华社记者在贵阳，但没见过。于是随之进入供销大楼内，上楼来到一个临街房间，进房间前我将裤袋里的手榴弹取出交给身边的人。进入房间见一位留着小平头的人坐在一张床边，那就是新华社记者老夏。他要我讲述当天我所看到的情况，并凑近拉着我沾着左从清血迹的衣襟看了看，然后就离开了。

当时紫林庵一带的情况是，四个路口堵满了围观的人群，人群之所以自发集中在路口，是因那里可进可退。后面的人为了看清情况慢慢往前挤，特别是小孩子们总往前钻，于是整个人群逐渐往前移动。这样移动的结果，引起计委大楼上一梭子弹扫向人群前面的空地上，人群又如退潮般向后跑。当另一路口的人群往前移动时，大楼上又向那个路口扫射，而这个路口的人群又会自发地慢慢往前移动。子弹并没有扫进人群，但是有的流弹由地面反弹起来的子

弹击中了围观的人。由于我惦记着汽车三场，后来我就回到汽车三场去了。

当天，停放在汽车三场的"四一一"的一辆由公交车改装而成的广播宣传车，车上有男女播音员中学生王云生、田成琴、程明珠等人。宣传车开到紫林庵广场后，播音员的现场喊话，垄断了现场的舆论宣传，成为李再含武装力量的打击对象。但宣传车停在一堵语录牌旁，有这块砖砌的语录牌掩护，挡住了计委大楼的射击。但是，在计委大楼斜对面的省政法大楼(现省高级人民法院)楼顶上，也部署了李再含的武装力量：省射击队的一批射击手。他们居高临下，"四一一"宣传车成了他们无遮挡的射击目标。贵阳七中女生田成琴被打死在宣传车下，贵阳七中另一女生程明珠被打死在车上。这是我到汽车三场后发生和听到的情况。大约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听到不知来自哪里的高音喇叭大声广播中央下达的两条命令，内容大概是：一，"四一一"不要包围计委大楼，立即撤走。二，独立师开枪是错误的。命令立即执行，违抗者法办。此后事态很快平息，围观人群很快散去。

现场目击者伍昆宪、姚德仁和涂光禄等也有类似描述。

当天"四一一"开到紫林庵广场有大小两部宣传车。在人汽公司大公交车上的广播员是八中女生高筑花和师院附中女生卢冬至；另一部较小的宣传车是从汽车三场开来，车上的男女广播员分别是息峰中学王云生和贵阳七中田成琴以及七中程明珠。两部宣传车并排停置处有一块砖砌大语录牌，可以挡住来自计委大楼据点的子弹，但却成为北面省政法大楼(现省高院)屋顶上射手的攻击目标。宣传车先被射中的是轮胎，高筑花左肩中弹，额头和腿部也受伤，抢救8个多小时。田成琴被打死在车下，程明珠被打死在车上。

在政法大楼开枪的是省射击队的"捍三红"射击手。他们的攻击目标是驻黑大楼的"四一一"联席会议、驻建工大楼的"四一一"工建交指挥部和汽车三场。

省射击队队长宋国信后来在北京学习班告诉省体委的邓蓉说，1969年7月29日，宋的射击队被安排在喷水池百货公司楼上，打击目标是驻省工商联大楼的"四一一工人兵团"，他们看到邓蓉

和马英从民族商店门前向紫林庵方向行进，队友的枪口已对准邓蓉正要开枪，因宋与邓同一单位，被宋制止了。

攻击驻省工商联大楼“四一一工人兵团”的还有险峰机床厂“捍三红”十多人。他们未经主人周瑞麟（省机校学生）同意，就闯入延安小学周（他母亲是延安小学教师）的家中（教师宿舍二楼），将两挺机枪架在周的床上，打破宿舍窗户，枪口对准东面的省工商联大楼嘟嘟嘟开枪射击，打得宿舍地面子弹壳一大摊。后来这些子弹壳周卖得二三十元。

“七·二九”事件的第二天，“捍三红”又更名为“群众专政指挥部”。

（三）“七·二九”事件伤亡情况

经新华社受周总理委派调查核实，“七·二九”事件共打死54人（其中军人1名），伤108人，仅停放在汽车三场的就有14具尸体。被打死的除7578部队1人，“四一一”广播员2人、1名七冶工人、1名煤矿工人外，其余都是无辜百姓，除卖纸花的老太婆外，以下再列举部分受害者：

乔国亚：贵阳市建筑公司工人，男，40多岁，挑开水去工地，在“土坦克”后被打死；

卜长生：头桥房管局修缮三社工人，男，23岁，因抢救乔国亚被打死；

唐文兴：同福小学毕业生升贵阳五中尚未就读，男，16岁，家住合群路154号，上午11点半去紫林庵看热闹，刚走过皮鞋店被打中，子弹从眼眶进，后脑出，送0276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尸体停放汽车三场；

熊荣华：贵阳市食品公司职工，男，41岁，上午上班路过紫林庵时被打死；

李正先：贵阳玻璃厂工人，男，30多岁，带着4岁男孩骑在肩上，上午上班路过紫林庵，男孩先被打死，接着李腿被打伤；

王小惠：贵阳玻璃厂工人，女，20多岁，家住六广门体育场，因结

婚陪同母亲去看新房路过紫林庵，因躬身帮母亲捡鞋子时被打死；

丁二毛：中学生，因在现场抢救伤员被打死。其父外号丁瓜，系贵阳市理发中心店职工。

目击者贵阳阀门厂职工周瑞麟当天在去上班时路经延安路西行，看到一位孕妇中弹倒在省农业厅门前人行道上。子弹系从紫林庵百货大楼顶上射出。

被打死的人全部被李再含派人派车拉到粑粑坳挖个大坑埋了。据说其中一个未死的妇女爬出来报信，0276部队王贵和副师长带侦察连，将尸体又挖出来一个一个照相。这些照片送到中央交给周总理，成为李再含开枪武装镇压群众的罪证。

（四）周总理紧急指示

“七·二九”事件发生后，周总理看到新华社贵州分社观点和材料各不相同的两份内参。他很快派出专机到贵阳，把6名新华社记者接到北京，其中分社4名，总社2名。在听取了情况汇报后，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要带资产阶级派性了。你们的观点一时改不了不要紧，但反映情况时对事实一定要核实，事实要搞清，我们这样相信你们，你们一定要把事实告诉我们。”“你们要尽可能地听取双方的意见，还要听听第三者的意见，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让我们来判断。”周总理相信新华社记者，7月底通知新华社派出记者到贵州作调查。

新华社指定由国内政治组组长宫策负责带队，于8月1日乘飞机到贵阳后分为两个小组，一组在贵阳，另一组到铜仁，分别进行调查研究。当时铜仁地区武斗也很严重。

为了保护受害革命群众的安全，周总理安排0276部队为贵阳地区革命群众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拨给人民币5万元，粮食5万斤。

(五)中央委托0276部队举办贵阳地区革命群众学习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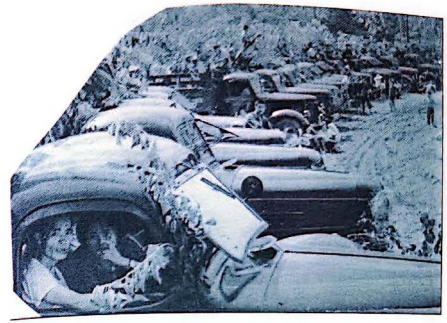
学习班设在贵阳市望城坡0276部队通讯营,定名为"中央批准的贵阳地区革命群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受保护的受害革命群众有一千多人,实际上都是"四一一"的学生、工人和干部。通讯营房屋不够用,还就近借用了马路对面的贵州省城市建设学校大礼堂。

学习班以一公里外进出贵阳火车站的铁路正线为安全边界,部队要求大家的活动不要超出这条界线。学习班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师领导到会讲话。学习班的工作由师首长直接领导,下设办事机构,办事机构划分几个小组,邓振新、杨同庚、石尚儒、李可仲、张清林、张兴荣、邓康民、刘荣敏等被安排在资料组。资料组的工作主要是准备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材料。邓的任务是收集资料编写贵州"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省公安厅宋家鹏摆脱牛棚生活,离开了沙子哨农场,也进了这个学习班并参加资料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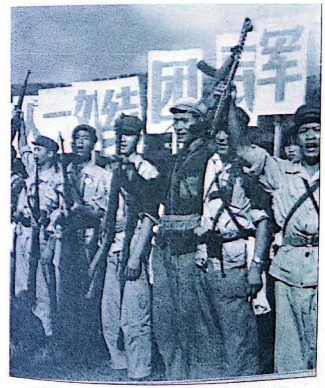
学习班从8月初开始,到10月下旬才结束,历时两个多月,大家学习生活在一起,增进了团结和友谊,也增进了军民团结。

本章参考资料

1.贵州人民出版社《当代贵州大事记》
2.《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3.孙昌德:《彻底揭发两面派的反动典型李再含》
4.孙世政《关于七·二九事件》
5.刘回年《参与解决贵州问题——文革中的一段难忘往事》
6.邓振新《文革年代的难忘经历》
7.潘少炎、康宁提供本章图片



"七·二九"事件在艳山红广场待命的"捍三红"专业武斗队



"捍三红"专业武斗队九化公司分队

群众示威游行向李再含讨还血债

中央批准的贵阳地区革命群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部分成员

后排左起　石尚儒、朱梅年、杨长明、XXX、XXX、袁开宗、邹沧萍、XXX、郭大衡

前排左起　张兴荣、赵永康、姚德仁、谈善达、杨同庚、邓康民、XXX

第二十二章　中央解决贵州问题 李再含靠边

(一)中央在京西宾馆举办贵州近百人学习班

1969年8月下旬,新华社调查组完成了贵州问题的调查。周总理在看过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材料后，便决定下一步行动：将贵州省、地区的头头87人统统调到北京进学习班,由中央直接领导解决问题。这实际上是个解决问题的工作会议。

周总理主持。具体工作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领导,下设的工作班子由陈华堂牵头。陈华堂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原是福州军区空军政委。学习班从8月31日开始,到10月18日结束,历时49天。学习班和工作班子都在京西宾馆,实行封闭式管理。新华社记者刘回年是赴铜仁调查组组长,参加了学习班的工作班子。

9月2日晚上,学习班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总理首先讲话,讲了形势与大局,讲了这次学习班的要求。然后,由各派头头发言,汇报情况,表示态度。汇报时间持续到半夜,总理一直认真听,并不时插话发问。当一些头头在发言中攻击对方时,总理严肃地说:“我们有些同志陷入派性,特别是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宁做派头头,大搞无政府主义。”他说这话时,激动地站了起来。总理一席话,把那些人镇住了。这次会议一直持续到下半夜。

9月20日晚，周总理在京西宾馆再次参加学习班的全体会议[附录21]。学习班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和揭发,总理对解决贵州问题更胸有成竹。他在讲话中已明确批李再含了。他说:“不说实话,

变成两面派。”“占了领导地位后,滑到危险的边缘了。”他还批道:“李再含在贵州自封小红太阳,搞多中心,封建意识。”

贵阳六中一位“四一一”头头后来向张甦摆了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经过。她先摆了14军41师师青年科科长陈匡讲的情况。41师得悉中央将把“四一一”头头接到北京解决贵州问题消息后,指示陈匡出面做了细致安排:决定让田子明代表“四一一”主讲。他说:田子明是大学生,农村家庭出身,很纯朴;而且还交待他汇报时,就讲贵州话。那样,周总理一看就知道是学生,一听就知道是贵州人:给总理的印象就很好。她还说,中央解决贵州问题,周总理主持会议。当问到贵州“四一一”代表,田子明就站了起来。总理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头头袁昌福是什么人?”田子明却回答:“我不了解他。”周总理就没有再问袁昌福的情况了。田子明在9月20日周总理接见后所作的记录,也略去了这一过程。

以后几天,总理不时向工作班子要材料,听纪登奎和陈华堂的汇报。政治局还专门就贵州问题进行研究,并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解决贵州问题的方案。

9月22日,学习班给贵州省发回急电,提出七条意见,要求全省各地无条件收缴一切武器,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武斗队。

9月2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呈送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李再含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使省军区领导人之间长期以来分成两派,41师和独立师,军分区、人武部内严重对立,各支一派,这是贵州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10月16日,学习班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周总理主持,并作了详细的结论性讲话。周总理宣布中央的决定:任命蓝亦农、张荣森领导贵州省的工作；李再含等七位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暂不回去,留下继续学习、检查。周总理围绕学习班产生的两个文件《关于贵州问题的情况报告》《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检查》讲了意见。他指出,贵州问题的根子在领导,在省革委会,主要是李再含同志,并论述了李再含的主要错误及其性质。对李再含留下继续检查和会后改正错误,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希望。周总理最后说参加学习班的同

志回去后要认真贯彻中央的意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迅速稳定局势，把生产促上去。

在10月20日的小组会上，李再含在发言中说："我完全接受中央的批评、坚决照办。实践证明我是两面派，抗拒中央。"至此，经过近3个月，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贵州问题得以胜利解决。

（二）周总理安排贵州不同观点代表赴京参加建国20周年国庆观礼

1969年10月1日是建国20周年大庆。周总理发现贵州省赴京观礼代表团105人中没有不同观点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立即决定补充20人。要求贵州省革委和0276部队落实人选。补充的代表除0276部队连长王保新、玉屏县亚鱼公社舒从枝和兴义下午屯公社苟兴培、贵阳市许浔生、张谏外，其余15名均为"四一一"代表，包括贵钢陆廷邦、贵棉王长宽、电工总厂温天祥、贵阳化工厂颜亨友、贵州水泥厂袁朝荣、汽车制造厂李绍荣、人汽公司林和芳、省工农文艺团李少华、铁二局尹临曙、贵阳医学院李仁福、贵州大学邓振新、新光厂李俊德，302厂陈厚、矿山机器厂蒋达顺、清镇电厂杨天富等。

补充观礼代表一行共21人，其中1名工作人员是省革委办事组叶友钧。大家在省军区招待所集中食宿，9月29日乘周总理安排的飞机到北京，与先到的贵州省观礼代表团同住东单大街的北方饭店。当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主任、国庆节筹备组组长吴德来住地看望大家。9月30日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分配后到的这批代表两个名额，大家推荐贵阳钢铁厂陆廷邦和贵阳棉纺厂王长宽出席国宴。10月1日，大家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观建国20周年大庆集会游行盛典；当晚，又在观礼台上观看了天安门广场盛大的焰火晚会。

国庆节后，安排全体观礼代表参观了六个斗、批、改样板单位：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郊木材加工厂、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和首都钢铁厂。

10月5日，安排全体观礼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看革命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

10月6日晚在北方饭店安排了一个半小时会议。李再含向贵州省国庆观礼代表团传达两个紧急文件并作检查。陈华堂主持会议，当众批评了李再含要两面派搞独立王国等错误。李再含开始检查时，李少华带头呼喊针对李再含的口号，被陈华堂立即制止。传达的两个紧急文件，一是立即在全省范围内收缴武器和制止武斗的紧急电报，一是关于要求贵州的报纸电台立即停止派性宣传，当前不传播地方新闻，改为只转载转播中央新闻的通知。

10月8日至17日，贵州省国庆观礼代表团转移到北京西郊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安排集中学习10天。

10月11日下午5:28—5:32，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万名观礼代表。他和林彪先将董必武请到主席台前，二人站立在董老左右，毛泽东带头鼓掌先向董老表示敬意。然后是毛主席会见全国万名观礼代表。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等激动人心的口号。

毛主席接见后，贵州省全体观礼代表在解放军政治学院连夜召开庆祝大会，会上通过一份报喜电报，让全省各族人民共同分享受到毛主席接见时的喜悦。电报稿由邓振新起草后，在叶友钧陪同下，乘专车到京西宾馆面呈陈华堂审定。他强调突出两个紧急文件的精神。

观礼代表团回去如何传达汇报，中央解决贵州问题领导小组要求准备好一个统一的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由邓振新负责起草，然后又让孙昌德从京西宾馆来到解放军政治学院看过，作了小量修改。定稿后的这份汇报提纲，经打印分发给各地州市的观礼代表。要求大家回去后都要按照这个提纲的内容汇报。

10月17日傍晚，贵州国庆观礼代表团离开北京，乘火车返回贵州。临行时听说林副主席当天下达第一号命令，当晚北京市内要戒严。刘少奇就是在当晚被担架抬上飞机从北京转禁至河南开封的。

观礼代表离京前，贵大蒋明珠（蒋冀）等人也住进了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还要在这里为贵州两派革命群众举办一个规模更大的学习班。他们是提前来报到的。

贵州国庆观礼代表团回到贵阳后，在六广门体育馆向省市干部欢迎大会作了北京观礼情况汇报。代表们住在金桥饭店。按照中央要求，各单位对不同观点群众组织的观礼代表要组织群众队伍热烈欢迎。一批批、一个个代表先后被各单位接走，邓振新是最后一个被贵州大学来车接回学校的，贵大校革委在校门口安排了一支夹道欢迎队伍。

（三）中央解决贵州问题，李再含靠边

10月26日，中共中央下达(69)71号文件[附录22]，对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批示决定：

(1)调昆明军区副政委蓝亦农[附录25]兼任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李再含在京学习期间，蓝亦农代理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主持贵州工作。调43军军长张荣森担任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并统一领导全省驻军支左工作。

(2)调6908部队进驻贵州，担负支左工作。

(3)中央为贵州举办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将省革委会办事机构工作人员，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部分干部，省工代会及三线重要厂矿、各大学两派组织的部分头头，调来北京学习。

中央(1969)71号文件指出，李再含"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逐步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搞两面派，搞'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总理觉得李再含不称职，要求邱会作推荐一个好的干部，邱向总理推荐蓝亦农。邱是蓝的老领导。

1971年5月经毛主席批准的贵州省关于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也指出了李再含曾经同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勾结在一起，进行了反党、乱军、篡权的阴谋活动。毛主席批准了撤销李再含在贵州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李再含执行的那一条路线，就是林彪、陈伯达的路线。

（四）中央在解放军政治学院举办贵州两千人学习班

这个学习班从1969年11月至1970年4月在解放军政治学院举办，全省共有2019人参加。八机部山地农机所伍昆宪将赴京学习机会主动让给永青示波器厂刘振柏，在中央压力下刘得以从监狱中放出来参加了北京学习班。

学习班全体成员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69)71号文件，多次听取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积极踊跃地揭发批判李再含的错误和罪行。在大量事实面前，李再含不得不向贵州人民低头认罪[附录23]。孙昌德针对李再含搞两面派写出揭发材料[附录24]。

在此期间，那些受李再含毒害最深并参与策划镇压群众的人，也在大会上交待了自己的严重错误，并进行自我批判。"七·二九"事件受李再含的独立王国师长刘金池到贵州大学中文系学生蒋明珠家登门赔礼道歉。

坚决反击革命群众组织的大学生代表，贵州工学院李承宗、贵州师范学院孙世政、姚德仁等人，也在大会上作了"斗私批修，克服派性"的发言。

周总理先后两次在学习班作报告。他那感人肺腑的声音，令人受教育和鼓舞；他那和蔼可亲的笑容，令人对他更加爱戴和崇敬。

学习班圆满结束，李再含再也没回贵州。

（五）蓝亦农批准成立"善后清理工作小组"

原"四一一"联席会议为了贯彻中共中央(69)71号文件、贯彻"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在主动撤销组织时，于1969年11月5日提交报告，经蓝亦农批准成立了善后清理工作小组。

善后清理工作小组由林和芳(人汽公司)、周维金(贵阳汽车场)、杨世洲(汽车三场)、李可仲(师院)、袁开宗(师院)、杨文华(师院)、张清林(贵工)、张新荣(贵州艺校)、李少华(贵州花灯剧团)、

邓振新(贵大)共十人组成，由省革委政工组领导并安排了办公室。人员大致分工如下：

清理粮食、被服、毯子、肉油菜及其他物资账目由林和芳、袁开宗、周维金、杨世洲负责。

清理武器、弹药、现金等项由李可仲、李少华、张清林负责。

调查登记因"四一一"问题而被关、押、打死、打伤、开除工作籍或其他情形，由邓振新、张兴荣、杨文华负责。

善后清理小组工作期间的经济、总务由袁开宗负责。

由于原"四一一"组织存续期较长、账目繁多，混乱不清，大部散失，头绪凌乱，工作量大，清理工作不够扎实，大约到1969年底结束。

(六)38名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补发工资

1970年5月，根据省革委会政治部政发(1970)10号文件，对因遭受李再含迫害延期分配的38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按照"四个面向"原则(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边疆，面向基层)，进行了毕业分配。其中包括：

贵阳师范学院　孙世政、姚德仁、陆光武、梅国材、石尚儒、李可仲、王明媛、庞守忠、邱富伦；

贵州工学院　田子明、谈善达、郑力高、吴再顺、李乐勇、李承宗、李永复、陈美花、向玉昌、张海东、刘明镜、张清林；

贵州大学　邓振新、姜青舫、蒋明珠、施莉莉、朱应长、梁发书；

贵阳医学院　戴碧玉、李仁福；

贵州农学院　郭建中；

省机校　陈庚甲；

省水校　丁可贵、印木刚；

省工管校　周明华、曾新民、严光荣。

(以上名单缺2人)

1976年5月，省革委会为因遭受李再含迫害延期分配的38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补发了延期分配期间的工资。此事得到省革委、

省军区领导鲁瑞林、何光宇和刚恢复工作的老同志徐健生、秦天真等的关心和支持。

本章参考资料

1.贵州人民出版社《当代贵州大事记》
2.《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3.刘四年《参与解决贵州问题——文革中的一段难忘往事》
4.邓振新《文革年代的难忘经历》
5.杨文华《那样的年代，那样的事儿——文革日记摘抄》
6.李乾宽、潘少炎、阿麻照相馆提供本章照片

国庆20周年贵州省国庆观礼代表团中的“四一一”和0276部队代表

前排左起　贵州水泥厂袁朝荣、清镇电厂杨天富、贵阳钢铁厂陆廷邦(布依)、新添光学仪器厂李俊德、电工总厂温天祥、贵阳市人民汽车公司林和芳

二排左起　贵州汽车制造厂李绍荣、贵州大学邓振新、贵阳医学院李仁福、0276部队王保新、贵阳棉纺厂王长宽、贵阳矿山机器厂蒋达顺

三排左起　贵阳化工厂颜亨友、302厂陈厚、铁二局尹临曙、省工农文艺团李少华

田子明、袁昌福等1970年初春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前

后排左起　邓振新、xxx、耿铁、袁昌福、田子明

前排左起　林和芳、xxx、方守廉、李少华

原贵阳市大中专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四一一”兵团成立三周年部分成员合影

附录21 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全体贵州赴京人员

时间:1969年9月20日晚9点20分入场。

地点: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1969年9月21日凌晨2时12分,周总理、康老、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等中央首长进入会场。

总理:今天见一见大家。你们是两批来的,先来了一批,考虑解决问题要扩大一些,又来了一批。“九大”以后本来我们要按“九大”的精神、“九大”的文件办事,响应毛主席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九大”以后,我们把贵州的代表留下来解决贵州问题,规定了一个文件。那次我们解决四个省的问题,湖北有点反复,不大;贵州反复太大,没有按照“九大”精神办事。你们的“九大”代表,回去那样不通,才过6月,7月,就出了“七·二九”事件,当然还有铜仁事件。铜仁事件有历史因素,“七·二九”事件是“九大”以后发生的,情况不同,“七·二九”以后还有武斗,并没有扭转局势。

贵州最大的一个风气是不像一个共产党的风气,不说实话。当然压制群众是错误的,但那群众都看见,你跑不了,刘少奇反动路线就是镇压群众,你镇压群众就是反动路线,群众要抛弃你。你不给中央——“九大”后的党中央说真话,是更严重的问题。我们相信这是少数人处到领导地位,广大党员、广大群众是要听党听毛主席的话的。会议中把欺骗中央的话揭出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绝大多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绝大多数人觉悟了,说真话了,当然这中间是经过一个过程的,用内部矛盾解决还是用敌我矛盾解决呀?当然多数是走了邪路。我们总社的记者派下去调查,又把分社的记者叫来问一问,然后下了决心,把你们叫来。

这次经过讨论,你们要写一封信或电报给各级革命委员会、军分区、人武部、贵州广大群众,告诉他们,中央的“7·23”布告、“8·28”命令要坚决执行。你们提出七条意见,我们经过政治局讨论,认为基本上是好的,叫何光宇同志来了,我们和他谈了,现在家里武斗基本上停下来了,工农业生产搞得好一点了。

贵州省这三年的工作,开始造反是对的,推翻了李井泉、贾启允,这是成绩,是按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办事的,后来也有好事要肯定,如归口闹革命,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归口,一月风暴之后,贵州叫“西南春雷”,伟大领袖毛主席首先在你们那里推动了典型贵阳棉纺厂,但是你们自己把它否定了,把好

事变成了坏事，就是说，即使有成绩，也没有坚持下去，我们中央也抓得不紧，今年抓了二月一次，五月一次，但是后来有人说，好像是中央抓坏了，不抓反而可以搞好。其实不是这样。走资派打倒了，内部发生不同意见，用群众的话说是不同观点，这要用毛主席的指示来解决，不能拉一派压一派。压不垮的，不解决问题。铜仁最严重。不是中央抓坏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中央抓得不紧应该负责任，但主要是你的错误。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肯定了革命委员会的成绩。只要把中央的精神这样和群众见面，结合起来，春雷就可以再响。现在要准备打仗，贵州是三线。贵州问题不能再拖了，时机成熟了，大家认识了，贵州出了那些问题，独立王国，个人主义，两面派呀，都是错误的。消灭一派，镇压群众呀，都揭发出来了。

我们同意这封信。大家都同意。何光宇同志回贵州去贯彻。何光宇同志表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执行这封信，还推荐了六个同志和他一起去，有张健民、罗锡康、赵琴、徐英年、朱德兰。你们都是革委会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嘛！七位同志回去贯彻，一切要按党性办事，党性高于一切。你们回去先把七点意见落实。其他继续留在这里学习，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多做自我批评，揭发一些问题，主要是政治的，还有组织的，这些都要检查的。然后给中央作个报告。时间不能耽搁。贵州的经济生活、三线建设都很不像话。

中央支持你们这封信。你们是不是看过这封信？（答：看过）都同意呀？（答：同意）真的同意呀？（答：同意）你们在这里，也不要干扰家里，在这里好好学习检查，总结经验。那么多基本建设在你们贵州，要赶上来嘛。不要搞小道消息回去。过去对立得简直不成话了。后来的"捍三红"和"四——"同志现在能不能对话了？（答：能）在贵阳不行了，见到就打。这次无论如何把问题解决，主要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这是毛主席的话。当然有的人错误要重一些。铜仁的杨平凡、康XX都要作自我批评。

工代会罗锡康是组长要负责，但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罗锡康是个表面人物，实权不在你手里，实权在几个知识分子手里。徐英年这次检查很沉痛，要求回去考验一下，给改正机会。知识分子有动摇性，不要信任他，但又有保留。

军区刘安民同志检查就不好。他是李再含信任的，有点装疯卖傻，要继续检查。独立师刘金池硬是向我们说假话，对吴法宪副总长说假话，现在稍微好了一些。军委负责人问你怎么不说真话呢？当然李再含要负主要责任。牛市（牛甫站起来）你这个秘书了不起，可以代表李再含向700个干部作几个钟头的报告。真是秘书专政啊！不过他揭发了一些问题。还有杨德政（杨德政站起来）……你留在家里负责工作，根本和中央精神相反。还有姜湘南（姜湘南站起来）……

对抗中央简直已经出格了。这些事都是"七·二九"以后了，连何司令员说服都不行了。

贵州的方向路线确实走到边缘了。必须把你们叫回来。当然41师也有错误，他们承认有派性。四一一也有错误，也要作检查；支红派就更错误了。因为他们有上面支持。搞什么"群众专政指挥部"呀！你们把它总结出来，总结经验教训，报告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锻炼，只要认识彻底了，还有改正的机会。执行反动路线严重的"二月逆流"那样的，也要给他改正的机会。谁能够一贯正确啊！

贵州出了个小领袖，有一个什么"小太阳"。红太阳只能有一个嘛。贵州天无三日晴，太阳不那么红，但总还是只能有一个太阳啊！不能搞什么"小太阳"，云雾总是要吹散的。毛主席的红太阳总是要普照大地的。

康老讲几句吧。

康老：完全同意恩来同志的讲话。回去的同志和留下学习的同志一个共同的问题，是要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犯错误就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贵州夺权是肯定的，基本上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但是后来离开了毛主席，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离开了群众，犯了错误。经验证明，凡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思想办事，事情就办得好，群众就拥护；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管你是什么，不管你自封什么"小太阳"都不行，非犯错误不可，群众就反对你。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不管是在这里学习或回去的同志，必须紧紧按党性办事，特别是"九大"之后，一切要按新党章办事。

贵州最大的错误，当然"七·二九"事件是严重错误，但更严重的是党风不正。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很少的，是对党对中央对毛主席说假话。有的是因为情况没有调查清楚，不了解，这个难免；另一种是明明自己做了坏事硬说没有做，用一切办法想方设法来欺骗中央。上欺中央，下压群众，这是不能允许的。就是一个一般的人说假话都是不对的，背离为人的道德的。

同志们想一想在贵州发生什么事呢？

一个解放军一个师的政委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说假话；革委的主任、副主任，可以向中央发电报欺骗中央，这在贵州不是一个例子，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在一般群众都是道德败坏。你们都是共产党员，这种情况是向党向群众玩两面派手法。你们不是反刘少奇的吗？你们怎么也这样呢？完全离开了党的立场，走到党的对立面去了，自己走到背离党的边缘了。这是歪风邪气。我们同意总理的讲话。当然广大党员不是这样的。在贵州主要是领导、负责人，是他们做坏的。

另一件事，在贵州，一些领导同志采取这样一个办法，自己坐在后面，用群

众出面去压另一派，用群众名义来骗中央，用群众名义来给中央施加压力，对抗中央。这是共产党员做的吗？这种手法很恶劣，很阴险。我对罗锡康讲了，工代会要警惕，不能给人家当工具。知识分子篡夺了工代会。我给罗锡康讲了，工是傀儡。用群众出面反中央。你想这是正气还是邪气？

如在"七·二九"事件的第二天，你们成立了什么"群众专政指挥部"。这是省革委组织的。革委会的李再含、李立同志同意搞的。你们想一想，这样把革委会放到哪里去了？把解放军放到哪里去了？革委会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你们把革委会和解放军都否定了。

"七·二九"不但镇压了"四一一"，也毒害了"捍三红"。所以"八一八"、"捍三红"要觉悟。这是引导你们脱离共产党的。这比打死几个"四一一"更严重。"捍三红"要觉悟，他们拿你们当工具。

作为共产党员，你们这样欺骗群众，镇压群众，毒害群众，如果这种事情不觉悟，后来还要犯错误。你们工代会还要组织三万人上街游行。杨德政同志，是不是你支持的？（杨德政站起来回答：不是我支持的）是工人自己要来的吗？你是党员吗？（杨答：是）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杨答：1938年）你是加入的哪个党啊？是共产党啊？是国民党啊？我看你这个样子不大像个共产党员。你们走到边缘了！不彻底觉悟还要犯错误。当然"七·二九"事件要承认错误，要好好检讨。但基本问题是领导同志党风不正，是最危险的问题。特别是"九大"以后。相信同志们会立刻觉悟起来，相信广大群众、革命干部、解放军会把贵州搞好。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你们的灵魂，离开这个灵魂就要犯错误。贵州犯了错误，从错误中得到教训，就更加能提高我们的觉悟，就能使你们思想上的红太阳红起来，但不是你们那个"太阳"。

吴副总长：我完全拥护总理、康生同志的指示。希望你们好好学习。贵州夺权之后，犯了一系列错误，干了一系列违反毛泽东思想、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违背了《十六条》，违背了"九大"精神。特别是军队，你们把解放军带错了，带到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道路上去了。军分区分成两派，一边分成六个；军区机关分成两派；两个师是两派。派性迷了你们的心窍，中央的话你们听不进，只听李再含的话，不请示，不报告，你们调军队开枪屠杀群众，镇压群众。铜仁屠杀几百人，杨平凡，我看你不平凡，你们这次把革委会踢翻，打死几百人，贵阳刘安民、刘金池，在李再含支持下开枪屠杀群众，镇压群众，在全国除了青海赵永夫外就是你们了。你们毫无悔改之心，还要欺骗中央，威胁中央。贵州军区、军分区应发来的电报，没有一份是真实的、可以相信的。田化一、韩国锦还没有认识。

康老：哪个是田化一哟？（田站起来：我）咱们是老乡，出了你这个名人。

总理：韩国锦同志，你的检查很糟啊！

吴副总长：铜仁军分区的几个头头，苏华、罗大勇，你们自己离开队伍几个月，在背后指挥武斗。

总理：戴着领章、帽徽，长期离队，怎么算是解放军呢？你们自己想一想。

康老：我们的部队什么时候像你们那样？

吴副总长：安顺的郭绪昆（郭站起来）在"7·23"布告后踏平了三个革委会，打了三个县革委。

总理：你们安顺有个8349部队就很好嘛，来了没有？（8349部队团长站起来）你们是从北京调去的吧？（是从怀柔县官厅水库调去的）就是嘛！离毛主席身边近，对中央精神就领会得多。他们一直有不同意见。

吴副总长：贵州报社的军代表一直不负责（《新贵州报》的军代表站起来），竟敢对抗中央。

总理：你代表哪个军呀？"一碗水端平"是"小道消息？"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搞折中调和"。简直荒唐！你是独立师的吗？（答：军区的）好好检讨！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报纸，反中央的报纸。你是共产党员吗？哪年入党的？（答：1944年）你为什么不抵制呀？顶一下就好了嘛！

吴副总长：他还说他没有看过《新贵州报》。贵州报的军代表不看贵州报。

总理：不看报，不老实，这个不老实。

吴副总长：还有独立营的政委，崔义军，支工办的负责人，动态组长，搞军阀作祟呀！怪事真多。

康老：贵州还有个特点，对同志搞特务工作。孙昌德用波兰文搞记录。

总理：康岩中也搞了邮检。（康答：邮检组）这是对待敌人的手法，用来对待革命群众，对同志、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什么行动？工代会还有动态组，你搞居报，搞单线联系，汇报到李再含那里，就可以决定方针。你李再含是从哪里学来的啊！

吴副总长：还有兴义军分区搞成什么样子。张星炳！（张：我一直没有回去，李再含把我调到招待所，不让我回去，有两年了）兴义搞得这样乱啊！（没有乱）云南武斗没有吗？（没有）怎么能说是云南把你们搞乱了？还有水城搞武斗，用机车头相撞，把机车头撞坏了，压死人。水城有人来吗？（XXX：我们介入了铁路，我们犯了错误）

总理：六盘水，三线建设的重点，最大的煤矿，你们搞成这个样子。

吴副总长：其他还有。你们犯了一系列错误。是彻底觉悟的时候啦！应该接受教训，检查错误，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学习"九大"文件，学习总理、康生讲话，痛改前非，认真向中央检查，向贵州人民检查。你们一切行动不顾所谓，党纪、军纪都不要，无法无天，这还像个解放军？像个党员？这些错误责

任在你们。解放军不能分成两派。两派都错了，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

遵义有个工人不肯造武器，就给打伤了。遵义分区，你们要坚决追查。应该警惕了，还这个枪不能收，那个枪不能收。

总理：山西武器上交了，武斗没有了。贵州交了一些是群众自觉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就没有交，你们三交三不交。

贵州还有个特点，歪曲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康老的指示，对自己有利的就拥护、欢呼，对自己不利的就抵制，把我们过去的传统都丢光了。"四一一"的同志要警惕，不要翘尾巴。你们也有许多错误的，要打倒革命委员会，打倒李再含，搞打砸抢是错误的。

康老："四一一"的同志要记得，你们就参加了"北航黑会"。你们"四一一"也有坏人，在清华丢炸弹，有袁昌福，还有其他人，炸死工宣队。"四一一"也要做自我批评。

"捍三红"头头来了没有？（郇昌峰站起来）你是"八一八"的团长。你们听李再含的话，搞武斗，对不对得起毛主席？你们把国防工业拖了多少呀？犯罪呀！谁高兴啊？美帝、苏修高兴，蒋介石高兴。我问你，你这个"群众工作组"要不要解散？（我个人意见要解散）

总理：嘿！你看这个样子，还打点官腔。

康老：你这个话是对我说的，就是不解散了？（要解散）

总理：你下面还有多少人？（20多个。工代会下面有8大片，每片10多个人）还有8大片，每片10多个人，共100多人，你是个小头子，这100多人就靠你吃饭。你们那么多工地的工作不去做，去搞武斗队。

康老：你是党员吗？（是）你有一份共产党员的气味没有？（我对毛主席有罪）

总理：应该说这个话。

纪登奎：地化所的头头，011的头头，还有113的头头，要好好检查。

总理：都站起来！你们这几个小老子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孙昌德、康岩中也站起来）那里还有一个女将，帮凶郗淑珍。（郗站起来）你看，你们三个这个样子，确实像搞武斗的。你们踏平"四一一"，事实证明也没有踏平，踏了两年另一个月，怎么样？你说是中央抓乱的，实际上你踏平"四一一"开始就搞乱了。

康老：李再含同志，共产党不要玩这一套。

吴副总长："四一一"还有1000多人在学习班。"捍三红"能不能欢迎他们回去？首先在贵阳做出榜样，影响和推动全省大联合。要保证不再发生歧视、排斥，不能武斗。"四一一"回去不能搞报复。

最后总理问其他几位首长还有什么讲的。

几位首长表示没有什么讲的了。

总理：今天就开到这里。以后还要和大家见面。

大家欢送中央首长离开东大厅后，回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天亮以后）。

（本记录系由田子明等会后回忆整理，经邓振新在京转抄后带回贵阳）

附录22 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中发（69）71号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9）71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对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党委、贵州驻军支左领导小组：

中央同意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望你们坚决贯彻执行。

为了迅速解决贵州问题，中央决定：

一、调昆明军区副政委兰亦农同志兼任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李再含同志在北京学习期间，由他代理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主持贵州工作。

调军长张荣森同志担任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并统一领导全省驻军支左工作。何光宇、石新安、李立、张明、罗锡康、张健民、刘兴胜、鲍德金、张璋、朱德兰、刘绍贤、徐英年等同志为核心小组成员。

二、调6908部队进驻贵州，担任支左工作。

三、中央为贵州举办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将省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部分干部，省工代会及三线重要厂矿两派群众组织的部分头头调来北京学习。

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应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狠抓战备动员，落实各项战备工作，迅速把大三线的生产和建设促上去。加强各族革命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军分区、贵州驻军和各地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又一次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重新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学习了“九大”文献和“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中央负责同志多次接见我们，耐心地教育我们，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经过这段学习，揭发批判了李再含等同志的错误，提高了觉悟，总结了经验，各自作了自我批评，决心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把贵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好。

贵州各族革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建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取得了伟大胜利。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是紧跟毛主席的，听毛主席的话的。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形势也是好的。但是，李再含同志和省核心小组的个别负责同志，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逐步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少数坏头头也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群众，乘机破坏。一部分地区出现了较大的反复。

贵州是我国的大后方，三线建设任务繁重，全省军民迫切要求我们迅速彻底解决贵州问题，赶上全国大好形势。为此，特提出以下措施。

（一）迅速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要狠抓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要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突出毛泽东思想。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真正做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衡量一切。坚决反对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突出个人的错误倾向。坚决抵制和批判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行动。各种会议、各种政治活动、报纸、广播电台和一切宣传工具必须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贵州高原。

（二）继续贯彻党的“九大”精神，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斗号令和一切指示，必须按规定及时地传达，坚决贯彻执行。反对歪曲、篡改、封锁、抵制中央指示的资产阶级实用

主义的作风。要加强党的观念，突出党的一元化集体领导，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山政性新党章办事。坚决反对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坚决相互不请示、不报告、无组织、无纪律、欺上瞒下、说假话的歪风邪气。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成为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模范。

（三）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名称、各种形式的武斗队。例如，所谓“群众专政指挥部”，一派建立的“民兵”，“护厂队”等。撤除一切武斗据点和关卡。立即无条件地收缴一切武器（包括轻武器，和各厂、矿封存的武器），不准转移一枪一弹。不准私造武器。

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都不准任意抓人、刑讯逼供，违者依法惩处。

（四）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加强军民之间、军政之间、军队内部之间的团结。“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革命委员会和广大革命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要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自己的子弟兵。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整体。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少数坏头头妄图分裂军队，破坏军民团结的阴谋。

军队要支持、维护革命委员会，走拥政的道路。要以八三四一部队为榜样，坚持“三条原则”“九个一样”，正确对待两派革命群众，真正做到“一碗水端平”。

（五）巩固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贵阳地区的“支红派”和“四一一”，以及同上述两派相同观点的、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各地、州（市）、县的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都必须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概不予以承认。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须坚决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要带头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全省军民必须坚决尊重、信任、支持、帮助和捍卫各级革命委员会。对于革命大联合还不巩固，革命三结合还不够完善的地方，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一派掌权，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的教导，由两派革命群众充分协商，进行补台，不准推倒重来。对其中两派长期严重对立，甚至发生武斗的少数单位，例如印江、织金、威宁、水城各县，要把两派联合起来，经过充分协商，逐步完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先后两次组织的革命委员会，应集中其全部成员和广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由省革委核心小组主持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经过协商，组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如：平坝、镇宁、安龙、册亨、贞丰、普安、赫

县、兴仁、兴义、望谟、晴隆、三都、瓮安、福泉、铜仁、石阡、赤水各县和兴义地革委、铜仁地革委。

对一个地区、一个单位，革命委员会出现了分裂的，应联合起来，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代表性不完备的可适当补台。如从江、榕江、剑河、松桃、江口、沿河、普定各县。

（六）抓紧革命大批判。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李井泉、贾启允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要批判革命队伍内部一切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要批判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搞臭资产阶级派性。要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通过革命的大批判，不断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七）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要相信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认真做好解放干部的工作。对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要信任、支持，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不要从资产阶级派性出发，揪住不放；更不能对抵制自己错误的干部进行打击报复。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靠边站，就“回炉”。

坚持毛主席的干部路线。要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提出的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不能把拥护不拥护省革委某个领导人作为提拔使用干部的标准。

对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变动，要按照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执行。

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定期参加劳动。参加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不能脱离生产，不要脱离群众。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青年知识分子要下放劳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八）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破坏“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挑动武斗，残杀革命群众，冲击人民解放军、破坏交通运输、破坏生产建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少数坏头头，必须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按照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区别情况，严肃处理。罪大恶极者，要列出他们的罪状，交给群众家家户户讨论，依法严惩。

（九）坚决执行中央对公检法实行军管的决定。纠正借口贵州特殊、不执行中央决定的错误，对全省所有公检法一律实行军管。

（十）《新贵州报》和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目前只刊登新华社电讯和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要派出军宣队，帮助他们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总

结经验，落实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

（十一）整顿工代会。各级工代会必须在党的一元化集体领导下进行工作。要反对工代会脱离党的领导、凌驾于党和革委会之上、自成垂直系统的错误倾向。省工代会的群众工作组、动态组和设在贵阳的八个片区的办事机构要立即撤销。

工代会机构要精简，在领导成员中老工人要占绝对优势，现在在各级工代会工作的知识分子，应一律到农村劳动锻炼，青年工人仍回本厂车间参加劳动。

要突出党的领导，工代会的根本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工人群众，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

（十二）加强敌情观念，狠抓战备动员，加速三线建设。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要准备打仗。要充分调动全省广大工人群众和贫下中农的积极性、创造性，“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迅速掀起革命、生产和三线建设的新高潮。以完成工农业生产和三线建设计划、保证铁路交通运输畅通的实际行动，支援国防，保卫祖国，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要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坚守生产岗位，积极生产。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对煽动工人消极怠工破坏生产的坏头头，要坚决予以打击。一切擅离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员要立即返回，逾期不归者，按“七·二三”布告处理。各单位对返回人员应热情欢迎，保证其人身安全，不得歧视、打击报复。

（十三）为了迅速改变贵州面貌，请求中央加强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力量。再给贵州增派一部分支左部队。为贵州举办一个两千人左右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省和部分地、县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两派革命群众代表调来北京学习。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有党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正确方针，有全省军民的大力支持，我们对解决贵州问题充满了信心。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总结经验，纠正错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以上报告妥否，请批示。

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

附录23　李再含:在北京学习班的检查

现将李再含同志一九七〇年元月九日下午、十日上午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贵州班大会上的检查(记录稿),印发供批判用。

(节　录)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贵州班办公室

一九七〇年元月十二日

李再含同志的检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限,决不能和平共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步伐,跨进了战斗的七十年代。放眼全球,展望未来,心潮澎湃。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次我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受教育已经四个多月了。在中央首长的亲切教育下,在同志们的耐心帮助下,我初步认识了自己的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是一个历史的罪人,要受到历史的惩罚。我犯下了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滔天罪行。

我听了新华印刷厂廉秀容同志的血泪史,深受感动。这样好的一个同志还检查自己对不起毛主席的错误,她的一字一句都刺痛了我的心。

我的罪过是极为严重的,我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在贵州推行一条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镇压和毒害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继承了大叛徒刘少奇的衣钵,在夺权以后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于种种原因我推行这样一条路线,就破坏了革命大联合,破坏了军民、军政之间的团结,破坏了军队的稳定;自毁长城,破坏了三线建设。总之,破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飞扬跋扈,狂妄自大,横行霸道,骄傲自满,夜郎自大、胡言乱语,不可一世,把贵州搞得一团糟,我就是罪魁祸首。贵州夺权较早,因为我的错误领导,使贵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一个大反复,落在全国的后面,拉了全国的后腿,这是我对伟大

领袖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贵州两千万军民。

下面我交待自己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党中央的严重罪行。

一　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态度是很恶劣的

我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典型的个人野心家、两面派、伪君子。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我在贵州没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是极其反动地突出我自己。不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中心,而是以我为中心。由于我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忘乎所以,热衷于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因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采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态度,心中忘记伟大领袖毛主席,走向突出我个人,以我为核心,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罪恶道路。

较长时间内,在贵州流传着一些赞扬我的话,什么"贵州有个小太阳"、"地方出了个王效禹,军队出了个李再含"、什么"有了李再含是贵州人民的幸福"等等,在一片赞扬声中我昏昏然、飘飘然,心里热乎乎的,乐滋滋的,还觉得抑扬我的人还不少啊!因此,自己恬不知耻地经常说自己是"不倒翁";在会议上听到这些赞扬时,也假惺惺地说"受之有愧",实际上内心高兴得很。

贵阳文展馆收集展出了我的一些材料和照片,我是知道的,当有人直接向我要材料时,我表面上说不要搞,但实际上并不制止。我自恃有功,以"功臣"自居,以"西南春雷""当然主人"自居,因而有恃无恐,认为搞一点也可以,让群众知道我的所谓"功劳"。更严重的是,自认为既然主持全省工作,也需要树立个人的权威,这就完全背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的伟大教导。

听说有些地方在早读时间读我的所谓"讲话"和"插话",我是默许的,错误地认为我的"讲话"和"插话"是联系实际、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大家读一读也是可以的,真是狂妄至极,反动透顶,竟敢把我的臭不可闻的奇谈怪论同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分庭抗礼,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吗?否。很多装部,完全是胡说八道。把矛头指向武装部、革委会,自己搞垮革委会。最典型的是我在省革委常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通知全省要"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通知中还说什么我的"讲话"和"插话"给贵州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方向。为了显示自己高明,把"讲话"和"插话"刊印成册,通过交流方式,流毒全国。是谁指明了方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明了方向。我指了错误的方向,害了大家,把贵州文化大革命搞坏了。我的原原本本是明目张胆地搞资产阶级

的多中心。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统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在贵州用我的错误的反动的思想统一大家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抗衡，唱对台戏。

第二，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唱反调，发表和讲过许多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

1.“贵州特殊论”。经常讲，贵州和外省不一样，外省在建立革委前就存在两大派，贵州不存在，贵州是成立革委后分裂的。认为“四一一”这个革命群众组织是分裂主义的产物，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实现个人野心目的，又如：认为贵州公检法也是特殊的。我认为贵州公检法是革命造反派掌权。当中央发出公检法一律军管的指示后，我就借口特殊，对抗中央指示，拒不执行中央指示，把公检法的同志引上了歧途。

2. ……

3. ……

4.“一派掌权论”。说穿了就是一人掌权论，想把无产阶级的政权变为个人的政权，个人独裁，改变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把贵州搞成“李家天下”，搞成资产阶级王国，把贵州党变成“李家党”。因此，对“四一一”革命群众组织，长期以来顽固坚持不承认主义，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央指示后，还大要两面派，在中央面前坚持不承认“四一一”及其相同观点的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我说，是不是只承认“四一一”、支红两派都是群众组织，我就不提“革命”二字，这是我耍的一个花招，阴谋诡计。当然中央首长一听就完全听出来了。中央首长在去年二月、五月会议中都提出贵州存在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一派是“八派”，一派是“四派”。特别是九大结束后，党中央又把我们留下，进一步解决贵州问题。我还没有离开北京，就在京西宾馆统一口径，对抗中央，说对“四一一”总体上承认，具体分析，把主动权交给各单位。把党中央指示否定了，坚持一派掌权的反动观点，说穿了就是搞我的一人掌权。

5.到处封“核心”，定“为主”。全省各地都是这样子，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封“核心”定“为主”，要害在于全省各单位都有我封的“核心”，自然我就成为全省的核心了，实际上是封我自己。全省都有我定的“为主”的组织，全省就自然以我为主了。这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我的反动思想指导下，造成贵州长期两派对立，我是地地道道的罪

魁祸首。

6. ……

7.革命分先后。我在贵州长期划分“革”与“保”，明确革委会中老造反派应占绝对优势，对抗毛主席关于“革命不分先后”的伟大教导。

8. ……

9. ……

这些是我同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唱反调的一系列反动言论。同志们声讨我的滔天罪行，狠揭狠批我的肮脏的东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会照遍贵州高原。我诚恳接受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声讨、控诉。

第三，拒不执行、抗拒中央的许多指示和批评。例如，中央对公检法一律实行军管的指示，我篡改了，这是我的罪状之一。这里面隐藏一个很肮脏的东西，我想一个人独揽贵州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党、政、军、专政机关的大权。我认为某同志是支持我的，听我的话的，思想上想把公检法大权交给113组织的某同志，如果实行军管，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了。

又例如，关于要承认“四一一”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也是拒不执行。要害是我承认了，岂不是我过去执行的踏平政策就错了吗？岂不是要承认自己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吗？自己的名利、地位岂不是就破灭了吗？所以，硬着头皮就不承认有两派和“四一一”是革命派。同时把真相隐瞒起来、封锁中央的声音。毒害了广大支红派的同志。这是我的错误造成的。

又例如，中央多次指出不要告下面的状，不要告41师的状。我给中央报告情况，相当多数是告状的材料，而且都是一些道听途说，好多是假报告、假情况，欺骗中央，目的是想把41师赶出贵州，给中央千方百计施加压力，要把41师调走。中央非常英明，看出了我的罪恶目的，所以没有同意我的意见，而且批评了我。

又例如，中央关于国防系统不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我也没有执行，严重破坏了三线建设，使国防系统严重失密。这都是不执行和对抗中央指示造成的恶果。

我对中央的批评也是抗拒的。总理、康老、谢代总理关于“肃薄”的批评。张春桥同志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评我不请示报告，闹“独立王国”，我是对抗的。龙广事件我是有罪的，镇压了“贫造司”广大贫下中农，非常错误。不请示中央，取缔这个组织，胆大妄为，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总理对“七·二九”事件部队开枪严厉批评，我也是抗拒的，认为部队是捍卫“九·五”命令，部队是自卫还击有理。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这是抗拒中央批评的第三个方面。

第四、第四个方面，我是很少向中央请示报告，少量的有限的报告，多数是假报告，告状的报告，派报告、是说假话的报告，达到个人野心的罪恶目的。

我还有好多事情擅自处理，如多次调部队我没有请示中央和军委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八月，擅自调动部队和工人围攻贵工，踏平"四一一"。这是我个人决定的。有调动两个连去龙广，也是我决定的。（对）盘县擅自调动一个连。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我自作主张，胆大妄为，违反党纪、军纪、国法，我应当受到党纪军纪、国法的制裁。

第五、我对党中央的指示和批评，采取了资产阶级两面派的恶劣态度。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春桥同志批评我不请示报告，闹独立王国和在六次省革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错误。我采取两面派的态度，一方面觉得没有一个态度不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向毛主席写了一个假检讨，表示愿意改正错误，还承认对"四一一"的问题也是有错误的。但回到省里后，也没有传达中央的批评，也没有讲自己的检讨，更没有改正错误，把毛主席的声音封锁起来，使大家不明真相，并在一次省革委常委会议上说，贵州有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把责任推给其他同志，玩两面派、对抗中央，欺骗了毛主席，当面说得好听，回去以后又在鸡鸟，同时，也蒙蔽了贵州的广大军民和同志们。

去年二月，党中央看到贵州问题，召集41师、49师、昆明军区领导同志开会，帮助我认识和改正错误，中央通过何光宇同志向我提出了四个问题：一，要我检查对中央的态度；二，对军队的态度；三、对群众的态度；四、组织纪律问题。听了以后，使我大吃一惊，当时我想如果我存在这四个问题，我不完蛋、垮台了吗？我根本不去想是不是这些问题，根本不接受中央对我的批评，根本不接受对中央、对军队存在一个态度问题。而且十分错误地认为这是"整我"，认为是大军区"整我"。非常错误地认为贵州是由于部队调防搞乱的，根子在大军区。因而思想不通，毫无自我批评之意。我在中央首长面前非常勉强地敷衍了几句，说话声音比蚊子声还要小，一句话要讲五分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我写出书面检查，由于自己的思想不通，为了蒙混过关，写了一个搪塞、敷衍的假检查。根据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精神，我起草了一个《十条意见》，得到中央同意后就带回贵州。由于思想上对抗中央召开的这一次会议，回省后既不传达会议精神，又不作自我批评，把传达贯彻任务推给何光宇同志，还散布不少荒谬的言论。我对一个同志没头没脑地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我自己就是在军内工作，这个话是非常反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忘得一干二净，并对一些同志说，这次会议是"九比一"，官司怎么能打得赢呢？我又在省革委常委、省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说："我在纠正错误中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不该同意撤销'八一八'。"

对抗中央二月会议对贵州的处理，对这次会议，我耍了两面派，在中央是一套，回到贵州又是一套。后来我和张明同志到中央参加九大预备会，九大期间，听说省内很乱，我一方面大为不满，认为是何、石等同志在家里搞右倾翻案。另一方面又幸灾乐祸，我没有在家，搞乱了你们负责，把责任嫁祸于何、石和41师，甚至联系到昆明军区党委。我参加了九大，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亲切地握了我的手。可是我回到贵州后就忘记了毛主席的指示，完全背离了毛主席指引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政治方向。

九大后学习九大文献、毛主席指示、新党章，代表们给我提了些批评意见，自己基本听不进去，在十分混乱复杂的心情下，一方面不得不搞点自我批评，装装样子。一方面又认为中央发了两个"红五条"，中发25号文件，自己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自己得意忘形，摆出一副"胜利回朝"的姿态回到贵州。心里想，九大召开了，大局已定，更打不倒我了。并且念念不忘省军区党委召开的三月会议。听说有的同志喊了打倒我的口号，我怀恨在心，认为这是搞右倾翻案。我思想上想的不是贯彻九大精神，而是搞自己的一套，我认为三月会议是右倾翻案，就决心把这个案翻过来，回去后就办了一系列坏事。不该传达的传达了，自己在有的问题上加油加醋，扩大化，从花溪、磊庄会议一直发展到七·二九事件，破坏了团结，把广大军民引上了邪路。特别在九大期间，我干了破坏团结，分裂中央的罪恶活动，散布了分裂中央的流言蜚语。九大以后，充分表现出我是典型的两面派。九大上我举手赞成毛主席指示、新党章，回去就干背离九大精神的坏事，是一个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上一套，会下一套的典型的两面派。

二 关于对待群众的态度

我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我是只相信自己，唯我"正确"，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堕落成资产阶级政客。我对"四一一"采取"踏平政策"，对支红派采取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危害政策。对"四一一"我长期顽固地坚持不承认主义，给"四一一"及其相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把"四一一"打成"反动大杂烩"，挑动群众斗群众，利用一部分群众专另一部分群众的政，自己不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由于我执行了一条毒害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导致全省武斗不断，内战连绵，使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无辜伤亡，家破人亡，我是罪魁祸首。为了踏平"四一一"及其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我不择手段，搞情报，搞动态，打进去，拉出来，分化瓦解，擅自调动部队，动用专政机关，通过报纸、电台镇压"四一一"，做了亲痛仇快的事，使

国内外阶级敌人大做文章，挑拨离间，造谣中伤，起到了国内外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

为了踏平“四一一”，我同意组织“八一八”，利用“八一八”来维护我的独立王国，镇压群众，镇压“四一一”。为了蒙蔽“八一八”广大群众，说什么“八一八”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说什么“八一八”可以起到专政机关起不到的作用。我提倡每一个地区都必须有一个拳头。我不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去掌好权，用好权，而是用刀枪棍棒去镇压群众。我派了“八一八”的一些同志到铜仁、兴义、赤水等地去贯彻一派掌权，踏平另一派。派这些同志去指挥武斗。“八一八”被撤销后，我又默许组织“捍三红”、“群众专政指挥部”。我做了国民党、资产阶级做的事情。由于我指导思想错误，把工代会带到邪路上去，把工代会变为“第二政权”，以工代政，达到巩固我这个独立王国的目的。我要负完全责任。

长期以来我顽固地坚持支一派，压一派，武装一派，消灭一派，“七·二九”事件达到最高峰。“七·二九”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我，我要负主要责任。“七·二九”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是由于我长期对“四一一”采取踏平政策的必然结果。我错误地认为“红五条”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在41师和“四一一”。我认为九大后解决“四一一”在贵阳据点的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不能拖过八月。我主张工人进城，要警司告诉“四一一”撤除据点，首先撤除省革委办公的大楼，我讲了如果“四一一”拒不执行“红五条”，一定要坚持据点，就要采取“南宁道路”的办法，并且讲过少数人要走“南宁道路”是不可避免的。对支红派造枪，我是同情和默许的。有人找我，我说，你们走上层路线是不行的，我是不会点头的。并且我找了工代会的军代表，叫他们调动工人进城。当独立师连队开枪后，就要工代会调动工人队伍占领政法大楼，支援计委大楼。我表面上说，打掉“四一一”据点要请示中央才行，真正的思想是端掉就端掉了。“七·二九”前后我退居幕后，假装不知道，后来打了以后，我非常高兴，说打得好，打得有理，打出了一个大好形势。还说要因势利导，彻底整顿贵阳市，限三天之内把贵阳焕然一新，这就是我对待群众的恶劣态度。我背离毛主席的教导：“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我根本没有把毛主席指示记在心上，我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把群众当成阿斗，把群众看得很落后，也是推行了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

三　关于对待军队的态度

1. ……

2. ……

3. ……

4. 对41师，态度非常恶劣。对两师调防不满意。对41师错误地认为，他们是来夺权的，所以千方百计挑起41师、独立师的矛盾，拉拢独立师，排斥41师，还千方百计地向中央施加压力，想让中央把41师调出贵州。表面上说，41师刚到贵州，他们人地两生，要很好地关怀这个部队。实际上，想把41师调出贵州，这是非常错误的，并且为达到这个罪恶目的采取种种错误做法，怂恿、挑动支红派同志给41师出难题，搞变相围攻，我要承担完全的责任。

5. 对支左人员，挑选我认为支持我的，听我的话的。对我有意见的坚决不同意他们出去支左。

6. 军区党委有些同志多次提出研究部队支左问题，41师到贵州是有支左任务的，我迟迟不研究，不给41师支左任务。我认为，如果给41师支左任务，他们就把权夺过去了，这非常错误。我借口支左的同志任务很忙，不同意研究，使主持部队工作的同志不了解支左的情况，也使支左的同志不了解部队的情况。互不往来，互不通气，把部队分裂，党委分裂，使党委瘫痪，我一个人领导，破坏了军区党委集体领导。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我更谈不上发挥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了，只相信少数人，把多数同志撇在一边。

四　关于“三反一粉碎”

我的指导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接过革命口号，塞进自己的私货。想通过“三反一粉碎”进一步达到独揽贵州大权的目的。我错误地认为，贵州实现全省一片红以后，是整顿内部的时候了。通过整顿内部，进一步独揽党政军大权。在“三反一粉碎”中，我错误地提出，革命干部要补课，要“回炉”。由于矛头指错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一大片，把斗争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军队，指向革命干部，指向革命群众，而没有指向阶级敌人。这是根本的错误，方向错了。所以“三反一粉碎”的结果，粉碎了革委会，粉碎了革命干部，粉碎了军队干部，粉碎了革命群众，把贵州搞乱了，使贵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很大的反复。在“三反一粉碎”中搞垮了二十几个县的革命委员会，伤害了相当一批地方干部、军队干部，有一些已经结合了的干部又重新推了出去，把一些参加支左的军代表调回。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贵棉样板也不例外，认为贵棉的领导班子不理想，错误地认为贵棉革委领导班子是中间偏左，是“中左政府”。在常委会上提出要改组贵棉革委，把革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调出，把多数同志排斥出去。结果破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贵棉归口大联合的样板。从此以后，革命大联合就更不好，这是我的罪过造成的。

五　破坏了民主集中制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党的领导原则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

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新的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有这些我都违背了。两年多来，我在贵州是大权一言堂、个人独裁，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把政权和党的性质改变了，把无产阶级政权引向了资产阶级政权、个人政权，把无产阶级的党变为个人领导的党、资产阶级的党、法西斯的党。毛主席教导我们："哪有个人说了算？那就是个人称霸，成了霸王。"我在贵州就是一人称霸，还想称霸于整个西南。

我搞的这些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以下原因：

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

二是表现在大搞独立王国、目无中央，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恶性发作。

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反映在第三个方面是派性严重。

世界观没有转变的第四个方面是：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恶性膨胀，唯我正确，唯我独革，唯我独左。

我的问题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我在贵州就是顽强地用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贵州，还要改造西南。由于我世界观的错误，立场的错误、方向的错误，因而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的，也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看问题，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问题必须看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和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对贵州存在的问题，我是怎样看的呢？对贵州出现的反复、乱，我是从外部找原因而不是从内部主观找原因，一直认为贵州出现的反复、乱，是别的方面造成的，外部造成的。实际上主要原因在我这里。我应承担完全主要的责任。我跑到了一个地方，不问环境情况，不了解事物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更谈不上抓典型，搞调查研究。由于立场上的错误，思想方法的错误，工作方法也是错误的，仅凭一封信、一次汇报、一次见面就决定重大问题。我受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黑六论"的毒害，有"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入党做官论"、"公私溶化论"、"群众落后论"、"驯服工具论"、"党内无原则论"、"两面派论"、"两面人论"、"两面性论"、"两面人论"、"两面性论"、"两面人论"、"两面性

李再含为了标榜自己是“老造反派”，还经常吹嘘他自己是早就与保守组织划清界限的。李再含当过贵阳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总辅导员，是人所共知的。他自己觉得不够光彩，曾多次解释说，贵阳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一成立我就看出他是保守组织……他们请我当辅导员。我只挂个空头衔。当时嘛，限于当时的情况，也不大好摆脱；本着做工作的精神，去讲了一次话。李再含真无耻！李再含对贵阳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请他当辅导员一事心里没底，是派了××到贵阳市找到×××进行了解，在×××说“这是贾书记支持的，可以当”以后，李再含才敢于去挂辅导员的头衔和发表讲话的。

李再含并没有为他用欺骗得来的荣誉而感到满足。一九六八年五月，他不但在地方上大划“革”与“保”，而且公然违背中央的规定，在部队内开展“四大”；更恶毒者，竟说在省军区内有两个司令部。不言而喻，李再含是把自己说成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头，妄图使自己在贵州军内有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妄图一手控制部队；他在此时期，竟提出让刘安民当省军区政委，这是李再含篡军野心的铁证。同年五月份，他公布了在一九六六年十月间给贾启允的六封信件。当时，我见到这些信件，自然引起对这个“造反派”的崇敬，但看里面左一个“贾书记”，右一个“贾书记”，感到疙里疙瘩，在一次谈话中，我问他“那个时候已是十月份了，你还喊贾启允叫‘贾书记’呀！”他有些尴尬，辩护说，“那个时候路线斗争还未公开。”奇怪！时至六六年十月，“路线斗争还未公开”！李再含在胡说八道。贾启允炮制“六·九”通报时，李再含就献计说，“现在反击还不到时候。”贾启允把“六·九”通报抛出来了，镇压开始了。李再含就把“现在还不到时候”抛到九背云外，在军内大打“反革命”；在“九·五”事件后，当李井泉、贾启允已临灭顶之灾，无处藏身之时，李再含又把李井泉、贾启允搞到军区大院进行保护，使其逃遁法外，逃避群众的斗争。李再含什么“觉悟高”、“站出来早”，完全是他搞野心而撒下的弥天大谎！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严厉地批评了李再含突出个人的严重错误，但他根本没有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教育，对中央的批评教育满不在乎。李再含在中央是这样，回到贵州他就更耍“威风”了，更加不可一世了。至于中央对他的批评，他一个字也没有透露。十一月，在贵阳召开了省党代会，在开会前，他专门召开一个常委会，向常委说：“今天我们要整整齐齐地进入会场，学中央的。”接着他指定他坐中间，左边是谁，右边是谁，左边第二个是谁，右边第二个是谁，而且几次声明“不准乱来”，并责成秘书处进行监督。李再含从北京回来就这样地自封中心，突出自己，耍他的“座山雕”威风！在党代会期间的一次核心小组会议上，他突然提出报纸问题，他说：“怎么搞的，《新贵州报》总点名字，把名字都搞到标题上去了。老孙，以后报纸一律不准点名字。下个死命令。”这个反革命

两面派，就是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根本不谈他自己叫报纸点名的问题，而是把责任全部地推给《新贵州报》。当天，我就给《新贵州报》下了死命令，以后《新贵州报》一律不准点名。可是过了半个月之后，这个野心家、阴谋家李再含出于维持他“独立王国”统治的需要，于十二月十八日来到××师，参加××师的学代会闭幕式，关于这次会议的新闻报道，李再含就当场布置给《新贵州报》，要《新贵州报》点他的名，并挂上他的三个头衔。见报后，我跑到李再含那里，我问他“怎么又点了名字？”他说：“我考虑了，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用一下。”他的秘书在一旁说“让他们知道知道，李政委还是昆明军区副政委。”李再含说：“哼，说我反军乱军，我不是解放军？我还没有打倒！”原来，李再含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新贵州报》登他的讲话，点他的名，挂他的头衔，就是为了不让革命群众造他的反，就是为了要人们把他作为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王！”

李再含疯狂地反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

李再含为了实现他独霸贵州、左右西南的狼子野心，不仅千方百计，用极卑鄙的手段来大树他的淫威，还制造了一系列为他“独立王国”服务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革命大联合的好经验”一文，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树立了“贵棉”这样一个革命大联合的先进典型。贵州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贵棉为榜样，纷纷撤销山头，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至四月底五月初，贵阳地区跨行跨业的群众组织均全部撤销，绝大部分人员已回到本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形势是向前发展的一种好形势。可是这个野心家李再含，对此极为不满，在一次常委会上说：“群众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是有不可磨灭贡献的，我们撤早了。”他背着其他常委，找“三团”部分头头，要他们成立“司令部”，重拉山头，并且他亲自为这个“司令部”写了所谓“宣言”，只是遭到广大群众强烈反对，才未能得逞。事隔不久，李再含又以坚决镇压、“错了找负责”的反革命决心搞了“八·一八”事件，在八月二十日，李再含又说什么“捏拢起来不容易，不要散摊子，要保持机动力量，防止‘四一一’组织反扑”，由他具体组织了“八一八”兵团，极严重地破坏了革命大联合，破坏了贵州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九月底十月初，贵州广大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视察三大区六省市的重要指示，积极响应中央关于跑步大联合的号召，夜以继日，跑步实现革命大联合，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内就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单位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形势很好。李再含又慌了手脚，几次在常委会上提出批评，他说“革命大联合要强调革命二字，丢了革命二字，就谈不上革命大联合”，批评没有分“左

中右”，污蔑这样搞大联合是搞了“大凑合”。更可恶者，他攻击说：“跑步大联合是小道消息，我们上当了”。李再含的黑指示一发出，又重新挑起内战、武斗，刚刚形成的大好形势被李再含一手破坏。一九六八年二三月份，中央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指示，中央报刊转载了《文汇报》“论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的重要文章。全省军民再次振奋革命精神，狠批资产阶级派性，经过两个多月时间，于四月中旬实现了全省“一片红”。可是李再含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在四月二十日又跑了出来，在省革委简易礼堂大声狂叫：“现在‘斗私批修’把‘造反派’搞得灰溜溜的。”又胡说现在“复活了旧班底”，批评“造反派”把“棱角磨光了”，要“造反派”向“保守势力”作斗争。接着，他又批评《新贵州报》“看不出阶级斗争新动向”，“抓不住阶级斗争新特点”，“解决不了阶级斗争新问题”，“尽抄别人的文章”，“跟别人屁股转”。指责《新贵州报》“没有火药味”，要“敢于捅马蜂窝”。过后，他还嫌《新贵州报》不得力，便在一次核心组会上，对《新贵州报》的头头讲：“以后我给你们出题目，我也参加你们的写作”。接着，他就亲自出题目，亲自审稿，通过《新贵州报》贩卖他的黑货。《新贵州报》从五月八日开始，发表了“打击造反派便是打击革命”、“论组织革命化”、“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等一篇篇毒草文章，全面兜售了李再含的“造反派是一个阶级”，“革命分先后”，“革命大联合要以一派为核心”，“革命三结合中老造反派要占绝对优势”，“造反派无大私可斗”，“坏人多在保守派一边”，“干部要回炉”等等反动谬论，为李再含搞“三反一粉碎”大造反革命舆论。就是这样，李再含还嫌不行，他又在五月二十日召开了省革委常委第六次扩大会，在会上发表了他那个臭名昭著的“插话”，并亲自写通知要“原原本本”传达，通过行政力量贯彻他破坏贵州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六月十日，我从铜仁搞李再含的“三反一粉碎”回来，向他反映了下边对他的讲话议论纷纷，应该如何对待时，他恶狠狠地说：“实践经验证明，哪里怕插话，哪里就有问题，我就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大量地印，大量地发，我看你怎么办！”而刘安民在一旁帮腔说：“对插话的态度，是革命和不革命的试金石。”

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李再含，出于搞“独立王国”的需要，对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和典型，进行了肆无忌惮地攻击、否定、歪曲和污蔑。他以他自己的言行充分说明，他既是一个野心家，又是一个“夜郎”式的人物。

一九六七年十月，中央报刊发表了青海省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先进经验，李再含见到这个经验，就在常委会上说：“我们‘八一八’办的也是‘学习班’，我们也没总结出几条上报中央！”一九六八年夏，中央报刊发表了河南省灵宝县机关革命化的先进经验，李再含就在常委会上说：“我们遵义地区的××县也很革命化，才剩三十三个人办公，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好经验’还不知道！哈

哈！”中央报刊发表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先进经验。李再含就在常委会上说：“这是个好经验……有些干部没事干，留在城里串来串去，尽捣乱……哎，这是个好办法，叫他们统统到干校去！”对干部进行再教育的好经验，经李再含歪曲，被他利用来为“回炉”干部服务。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发表了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新指示，李再含在革委会上领导大家学习的时候就说：“我们六七年组织‘八一八’到贵工去也是工人阶级进驻上层领导，我们一年前就开始了！”李再含真是反动透顶！

全国的先进经验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先进经验一个接一个地推广。在中央报刊上，不但未出现贵州的先进典型和经验，就是对贵州的一般的报导也越来越少。贵州夺权早没搞出经验，李再含感到不光彩，有点着急了。于是在一次常委会上说：“贵州夺权早，先进经验是有的，就是我们嗅觉不灵，看不出来，看出来了，又写不好。”接着指示秘书处和政工组找“嗅觉灵”的“笔杆子”，来给李再含找“典型”，总结“先进经验”，好“上报中央”，来为他捞取政治资本。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中央发文件推广了北京市西城区某小学红小兵的先进经验，李再含读完这个文件就说：“我们贵阳××小学红小兵也不错嘛，可惜就是没有总结。”大概会前他的老婆向他介绍过某幼儿园不错，于是他接着说：“××幼儿园不错嘛，那些小孩子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哎，这方面的经验还没有，赶紧抓！”当场吩咐秘书处立即组织人前往调查，限十天之内搞好上报，而且还表示“要亲自抓”；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算是搞“成”了，也上报了，但中央根本没有理睬。

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李再含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指示，恶毒攻击林副主席对群众组织要实行“一碗水端平”的无产阶级政策。李再含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以后，李再含搞一派掌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用心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在一九六九年元月中旬的一次研究××县问题的会议上，遵义××同志介绍了他去××市与×××、×××等同志谈解决××县问题的情况，介绍××地区驻军是按“一碗水端平”的原则来处理××地区两派的。李再含听了之后。就大发雷霆，恶毒攻击说：“把人家先联合了，再通过清理坏人把人家搞垮，这是资产阶级政客的作风。我们不搞那一套！”××同志反对李再含调八县民兵攻打××县一派的意见，李再含就骂这是“右倾机会主义！”他还说：“两派掌权是名义，一派掌权是实质。××省不就那样，××省他端平啦？端不平的。”元月十八日在贵阳地区工宣队大会上，李再含就公开讲：“不能笼统讲‘一碗水端平’。‘一碗水端平’没有阶级内容，不能到处都‘一碗水端平’，这是个原则问题，立场问题。”元月十九日零时，李再含把《新贵州报》、省广播电台等单位的头头叫去，对他们讲：“什么‘一碗水端平’，人家要搞垮革委

会了、还能端平吗?"接着要他们开动一切宣传工具,大造舆论,把所谓"右倾翻案妖风"打下去,要报社写"有份量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在李再含的这个黑指示下,《新贵州报》发表了"用战斗来保卫社会主义铁打的江山"、"誓做红色政权的坚强后盾"、"人民得到的权利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誓死保卫西南春雷"等一系列大毒草,用极其反动、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毛主席关于两派联合的教导和林副主席关于对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的英明指示。

李再含疯狂地对抗中央,罪该万死

一九六八年七月,李再含为了造"三反一粉碎"的反动舆论,在刘安民的提议下,亲自把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炮制的"五个回合"作为省革委文件下发全省,要人们"学习"。事后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中央发现,康老亲自打电话给李再含进行批评,对中央给予的这个批评,他只是在开一次核心组会议进会场时,边走边说:"康老同志说我们下发的那个'五个回合'是上当了。哈哈!上当了。收回收回。"根本没有检查和纠正"三反一粉碎"的严重错误。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央军委通报批评他擅自调动部队和镇压兴义地区革命群众的严重罪行,李再含进行了封锁,根本不讲中央军委批评内容,在核心小组会议上只是说:"兴义问题,云南告了我们的状;我们不怕,我们要把'真相'上报。"接着指使×××搞了一个所谓"真相",上报中央,下发全省。没隔几天,他又在核心小组会上说:"×政委打电话来说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那多了。'确实云南、四川比我们多多了。哈哈!不就是死了几个人嘛,有什么了不起。"他根本没有接受中央的批评,而是对抗中央,坚持自己的罪恶行径。

中央为解决贵州问题和教育李再含本人,一九六九年二月中旬至三月六日召开了"二月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中央对解决贵州问题作了一系列的英明指示,关于"八一八"组织,中央明确指示,是跨行跨业的组织,要撤销;关于"四一一"革命群众组织问题,中央明确指示要承认;关于铁路问题,中央明确指示交由四十一师负责军管;对李再含本人,中央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是李再含却大耍两面派,"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他一回到贵州就猖狂地对抗中央。声嘶力竭地——推翻中央的决定,李再含就是破坏二月会议的罪魁祸首。三月七号,正式开会传达中央"二月会议"精神。刚一开始,就在怎样开这个会的问题上争起来了。省军区有的同志提出建议省核心小组和省军区党委分别开,李再含坚决不同意,他说:"省核心小组嘛,不是外人,有什么不可谈的!"省军区首长高姿态,还是同意合起来开。接着李再含在传达中央精神的这个问题上又耍了花招,他再三推脱,要×××同志传达。第三天,李再含

又在×××师同志参加会议的问题上大耍了花招。七号那天。×××师同志要求参加会议,李再含拒绝了。八号上午,会一开始,李再含又突然提议:"我昨天晚上又考虑了一下,×××师同志参加这个会的问题要研究一下。"大家都说:"还是你定定吧!"他说:"不,这是大家的事,核心小组、党委常委同志都在。集体领导嘛!"接着要大家举手表决,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除我二三个人反对×××师参加会议而外,其他都同意。李再含见"集体领导"对他很不利,大家一放下手,他就改口说:"我又考虑了,我放弃我的那个提议,我不同意×××师参加会议。"先后不过三分钟的这场表演,真是丑恶到了极点。在传达过程中,李再含更是进行破坏和捣乱。一会说"中央没讲这句话",一会又说"不是这么说的",一会又拍桌子起来吼叫,公开翻案。例如当×××同志传达到中央关于承认"四一一"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指示时,李再含就说:"关于'四一一'组织问题,只是邱副总长一句话'政治上要翻身'其他没别的。"当传达中央关于撤销"八一八"组织的指示时,李再含就站起来气急败坏地说:"'八一八'跨什么行?跨什么业?我在改正错误的时候,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哎!我没坚持!"

三月七号晚,在开会之前,我跑到李再含家里,问:"'二月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想了解一下'二月会议'的所谓"真实情况"。我话音刚一落,李再含便挥着手,边站起边说:"哎!'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他为了破坏中央的指示,他还制造混乱,恶毒攻击"二月会议",他说:"××办事组、××军区的那些人,经常找他(指省军区首长),谁知他们搞什么!反正我哪也不去。"李再含在进行这一场反动的自我大暴露之后,便装死躺下。他说:"我不行了,我要有自知之明,另请高明!"李再含有"自知之明"吗?没有,一点也没有。他把自己看做是贵州人民的所谓"救世主"。他在所谓"检查"中有一段自供:"我有一个经验,我不在,贵州就乱;我在,贵州就不乱。"真是贵州出的"夜郎"!不知耻的东西!

三月二十五日深夜,李再含(在北京)指使××同志由北京打电话向我讲"撤销'八一八'组织、不是中央精神","对李再含一批二保三看根本不是中央方针"。三月二十八日,××同志同×××司令员和×××军长受中央委托,来贵州传达三个文件。一见面,××同志就讲:"李再含向你们问好,你们辛苦了,但要坚决顶住,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不能马虎,马虎不得。"四月中旬以后,李再含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更是每天不断,后来干脆约定每天晚上十一点我在他家等电话。李再含多次讲"撤销'八一八'组织不是中央精神","对李再含一批二保三看不是中央方针",要我们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几次要我们在家的要准备挨骂,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动摇自己的信念。向在家常委发出指示还嫌不够,还把同样内容的电话打到省革委秘书处,由秘书处打印传

向社会。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贵州广大军民非常关怀，看到贵州局势严重，“九大”一闭幕就于五月五日召开第二次解决贵州问题的会议。

五月二十三日中午（即五月会议期间），李再含突然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说：“方才总理打来电话，称‘四一一’为群众组织。”我说：“真的？”他说：“真的，我听得清清楚楚，我耳朵没毛病。”当晚中央首长接见了我们，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是一回事”。五月二十四日，李再含在七楼会议室召集开会，用他的反动思想来统一大家的思想。李再含开始说：“中央这回明确了，×××是革命群众组织，大家看看怎么办、各把自己的想法谈一谈。”我发了言，××、××、×××等也接着发言。大家都认为：“再不承认‘四一一’组织不行了，回去要承认，不管怎么样，这条得办。”对大家的表态，李再含是很反感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刚一说回去宣布“四一一”是革命群众组织，李再含就很惊诧地对我说：“噢？你也承认‘四一一’是群众组织！”很明显，李再含自己不承认“四一一”，也要大家不承认“四一一”，要大家跟他一道对抗中央。大家表态完了，一直没有吭声的刘安民开始讲话了。他说：“‘四一一’嘛，我们承认是得承认，但公开宣布我认为有问题，我的意见是‘总体上承认，主动权交给基层革委’，因为各单位的‘四一一’情况不一样，笼统承认不行，他们的情况，他们本单位最了解，让他们回到本单位去，是什么算什么，是什么承认什么。”刘安民的这一鹅毛扇子，很得李再含的赏识。刘安民的话音一落，李再含就举着手说：“我认为刘安民同志的意见值得考虑，笼统了有问题，总体上承认，主动权交给基层革委，这样‘稳妥’些。”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五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再次接见我们。会上，中央首长要求我们表态。我们欺骗了中央，只说回贵州后一定要承认“四一一”是革命群众组织，而且表示要到据点里去做工作。李再含也表态说：“要亲自出面做工作。”但李再含这个反动的两面派典型，篡改中央指示的老手，一走出会场，在回京西宾馆的路上就说：“这回可明确了，看中央想的，哪有承认‘四一一’组织的意思！”

回贵阳不久。在一次省军区干部大会上，×××司令员、×××政委高姿态，做自我批评，而李再含却在这个会上讲：“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第一次军区党委扩大会反对我，第二次军区党委扩大会也反对我。怎么样？打倒了吗？没有。我是打不倒的，我也不想倒，我是打不倒的‘不倒翁’！我准备再挨打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在去年九月上旬“汇报团”期间，在中央已经对他进行了批评之后，他还在省革委的会议上说：“我坚持我还是‘不倒翁’，我也不想倒，倒了我还要爬起来。”李再含不但在贵州是这样，在北京也是这样，这个李再含反动到了何种程度！

也是在回贵阳不久，大约在六月上旬，李再含向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李再含说：“这次‘五月会议’开得很好，中央对贵州问题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以前我们报得少，人家报啥就是啥。”他不但要贵州部队来个“根本转变”，而且要中央也来个“转变”。李再含的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还是在北京时，在讨论回贵州后如何传达中央指示的过程中，省革委、省军区、两师共同一致商定中央首长讲话的一句原话不作传达，不向外传。五月二十六日回贵州后，大家再次重申了这点，李再含也重申说：“大家都在这里，一致协议，要遵守嘛！”第二天，他和他的秘书整理了中央首长讲话记录，写出传达稿，并交×××政委原原本本地传达。×政委本想叫李再含传达，但李再含说：“你是政委，这个讲话谈部队的事多，我不大好讲，还是×政委你传达。”这样×××政委就一字不掉地按传达稿照读，把共同协商不做传达的一句原话也照读了。这可不得了，李再含回来就大发脾气说：“×政委为什么传达这句话，这是大家协商的，这不是不按协议办事是什么？产生一切后果由他负责。”这还不算，接着他就写电报给中央说“×××政委不按协议办事”，告×××政委一状。直到去年九月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第三次会议上，还在告这个状，喋喋不休地讲：“没按中央指示办事的是他们，是××××，他把那句话给传达了。”其实，这是李再含一手搞的鬼把戏，是李再含搞的一个阴谋。其一，是他和他的秘书整理出的传达稿将原话有意保留。其二，他很想传达，妄图从中捞取政治资本，以达到他反军乱军的罪恶目的。其三，他自己不传达，推给×政委，说什么“这个讲话谈部队的事多，我不大好讲。还是×政委你传达”，李再含既捞了个所谓“高姿态”，又给×政委一靶子！其四，他生气是假，高兴是真。李再含搞的这手，不是一箭双雕，而是一箭几雕了。

在六月上旬，李再含为统一原核心组在“四一一”问题上的宣传口径，他公开篡改中央指示，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个绝密文件，把五月二十四日那次黑会上确定的对“四一一”革命群众组织“总体上承认，主动权交给基层革委”的反动方针，用文件固定下来。李再含多次在会上讲：“‘四一一’掌权不行。他们掌权，干篡我们下台。”在核心组会议上，也公开地有这样的议论：“以后，‘四一一’要选好的，三五个委员，一两个常委，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们也可以让他们开会上主席台，看戏坐前排、坐汽车自己来。”

在这样一个反动方针支配下，我根据李再含“要找一个典型”的黑指示，选择了贵州汽车大修厂“×××”为所谓“典型”，经李再含同意，我亲拟批语，推广全省（所谓黔发［69］77号文件）。李再含对“×××”极为欣赏，他在六月末七月初的一次核心小组会议上就公开讲：“解决‘四一一’问题，有三个办法：一是安顺的办法，一个是遵义的办法，一个是‘×××’的办法。‘×××’的办

法最好。"他幻想着推行"×××道路"的政治欺骗办法,在全省贯彻他的"总体上承认,主动权交给基层革委"的反动方针。李再含在会上还说:"黔发[69]7号文件有一个美中不足,如果贵州汽车大修厂革委有一个相应的东西,用'×××'表示欢迎,这样就完整了。"并指示要给汽车大修厂革委做工作,要他们写个东西,再批转全省,以表示"×××道路"的"成功"。就是说,以便对全省人民进行更大的政治欺骗。这个罪恶活动终因一些同志抵制,没有搞成。另一方面,李再含一回贵阳就定了调子:"'四一一'我是没信心,总有一部分人要走'南宁'道路。"

李再含清楚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群众正在觉悟,他开始感到自己有些不灵了。他根据自己搞"独立王国"的反革命经验,首先确定抓稳定和加强骨干力量的工作。于是,省革委、省军区、两师会议一结束,在六月五六号,他就指定×××、×××和×××在花溪301小别墅给支红派的所谓"钢杆"开会。由于心中有鬼,把会议开成了绝密的。为了"保密",饭在外面做,偷偷送进屋子里面吃,甚至门口不准停车子,更不许与外面接触。致使许多单位光知道人参加开会,但不知在什么地方。在内容上,传达了中央首长讲话的全部内容(包括不准传达的军内部分)。关于会议的目的,×××在向李再含请示时是这样说的:"现在支红派头头心里没底,我们得赶紧抓,不抓乱了套可就麻烦了,得给大家鼓鼓劲,得给大家交交底……"李再含欣然同意,并就在这个会议进行中间(6月8日-6月18日)赶忙制定了对"四一一"革命群众组织"总体上承认,主动权交给基层革委"的绝密文件,由×××拿到会上进行贯彻。通过这一措施,把贵阳地区的八个片区和主要厂矿就基本上控制了。

第二步。磊庄会议。磊庄会议是六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五日在贵阳远郊磊庄召开的。在这个会议期间,李再含分了会议班子和工作班子。会议班子有李再含、刘安民、康岩中、××××。这个会议,名义上是传达中央指示,实际上是篡改了中央指示。在北京时,中央首长再三教育我们,要我们搞好团结,要我们执行毛主席在"九大"发出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战斗号令;可是李再含却大搞反军乱军,大反所谓"右倾"翻案妖风。我就听李再含几次讲"×××(军区首长)不做检讨","×××(军区首长)装病"。

李再含为加强"反右",决定把中央首长对部队同志的讲话也对地方人员进行传达,妄图把中央首长严格要求部队做的某些批评,利用来为他反军乱军服务。当时,中央首长对部队同志的讲话稿不在贵阳,李再含就决定派人坐飞机出省取回进行传达。李再含反军乱军之心真是到了切切不可忍耐的程度。在这个会议上,还将对"四一一"革命群众组织的"总体上承认,主动权交给基层革委"的绝密文件进行了贯彻;怕泄露"天机",怕留下辫子被抓住,只让××同

志在会上宣读,而在下发的××同志讲话稿中,又删去了。李再含的黑心是多么不可见天呀!

在磊庄会议上,李再含还演了一场"引退"的丑剧。磊庄会议是六月十五日开始的。在磊庄会议开始之时和开始之前,李再含曾几次说:"我也有错误。在会议上,我也要做自我批评。"文化大革命几年来,李再含不但未做自我批评。而且连"我做自我批评"的这一句话也未讲过,向来都是别人"错"!这回要做"自我批评",要算是"高姿态"了吧!不,他开的是空头支票,他耍的是一个使人难以想象的无赖手段。磊庄会议,由于他亲自督战,一开始就反所谓"右倾翻案妖风",一开始就反军乱军,很快点起火来。李再含见大势已成,目的确能达到,很是高兴。为了逃避检查,他就演了一场"引退"的丑剧。六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我和××同志见到李再含的秘书,我们问:"你怎么回来啦?"他说:"哎呀!你们看看,李政委就是抗不住刺激,几天没睡好觉,昨天在磊庄又把被子烧了,坐不稳,站不牢,说话也颠三倒四……看不行了,我把他送回来休息。"第二天,我和××同志到他家,见他神态恍惚,有气无力,像刚从棺材里出来似的。李再含见我们去了,小心小气地说:"不要紧……昨天发了一夜烧,医生给我吊了盐水,退了下来,现在才三十八度多,好多了。……会议上,请××同志照顾一下。"他的老婆也在旁说七道八,不外乎说,"受刺激太大","得不到休息,劳神过度了"罢了。我和××同志也看到房子里又是盐水架。又是药瓶子,不老少……李再含很像重病在身,以至我们建议他去北京三〇一医院进行治疗。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贵州班上,省军区的医生揭发了:李再含根本没有病,根本没发烧,吊的根本不是什么盐水,而是葡萄糖!这是李再含为了逃避"自我批评"这一"关"耍的鬼把戏!

当时工作班子是处理日常事务,更主要的是贯彻李再含对抗中央、镇压群众的反动政策。工作班子有××、××××和我。对工作班子的要求,李再含在分班子的会议上对我说:"老孙,你前一段在家顶的'不错'嘛,跟××同志再值一个月的班,不要到下边去了。"意思叫我"顶"。跟谁"顶"?跟中央"顶",跟革命群众"顶"。这就是李再含对工作班子提出的反革命要求和反革命部署。

李再含关于武器、据点的方针是早已明确了的。还在磊庄会议前(六月上旬),李再含就在会上说:"康老都说了,一派有武器,另一派也千方百计地搞武器。"这句话是康老在批评我们不承认支红派有武器时说的,意思是要老实承认支红派有武器,要我们去收支红派的武器。而到李再含嘴里,竟成了搞武器的"理论根据"。李再含对中央首长指示就这样进行公开的歪曲。

李再含还公开说:"基层搞一点(武器)就搞一点,不然要吃亏,尽挨打。"当某个单位的部分人员找李再含要武器时,李再含边笑边说,"跟我要武器?我告诉你

们,走上层路线是行不通的!"接着用加重语气说:"我相信你们自己有办法。"当我和××同志向他报告工厂已经造出冲锋枪时,李再含哈哈大笑说:"以前炼钢如搞枪搞了几年也没搞出来,现在才几个月、几天就搞出来了,工人就是有办法。"

关于捉点问题,在六月中旬李再含就几次说过:"什么事情都是这样,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你不打他,他打你,躲是躲不了的。"当我们向他反映下边要求"明确'四一一'是什么组织,如果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坚决不干"时,李再含说:"××(省)两派是中央早就定了的,可是人家还在斗,××(省)××地区打的可凶哩!××(省)的造反派是斗出来的。佩服!佩服!"李再含就这样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安顺××(组织)被踏平(六月二十八日)后,李再含就将安顺和铜仁做了对比,他说:"两种办法,两种前途;铜仁就右倾,结果吃了个大亏!"他把×××叫到家中训斥,大发雷霆,并骂自己是"瞎了眼,看错了人",不该让×××去当铜仁地革委主任。七月四日,开完核心小组会,待部队同志退席后,他又开会说:"我现在正式提出,我主张调安顺地区几个县的民兵去解决××(县)问题。"有同志说:"那不又成了第二个赤水?"不同意他的意见。可是李再含坚持说:"哎!错了我负责嘛!"没隔几天,刘安民到了安顺,贯彻了李再含的黑指示,调安顺一派的武装对××县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贵州水泥厂一打下来,李再含就做出黑指示:"组织力量,恢复生产,做好善后工作。"在该厂有一个烟囱冒烟后,他就叫《新贵州报》报导所谓"大好形势"。实际上李再含订了由群众出面打,打了之后就做善后工作,"恢复"了生产要宣传的一整套方针。

在七月上、中旬,李再含说:"贵州的造反派锻炼太少了,太老实了。不管什么事情,不敢斗争是不行的。"

关于一线二线。李再含为了突出自己,在过去他是经常出头露面的。五月会议后变了。自五月二十六日从北京回来起,至八月二十二日去北京止,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他才公开露面两次。第一次是六月十三日在省革委简易礼堂和基层革委头头的所谓"会面",在这个会上,他向大家表示"问候",说什么"你们大家辛苦啦!"这实质上是在群众面前把他不在贵阳这段时间内的重大事件,如我挑起的"四·二五"大武斗,四月二十八日成立"捍三红","五·一六"影光炮轰杀革命群众,都进行了肯定。第二次公开露面是七月二十八日,在六广门体育场。他怕群众怕得要死,这次连他的法国"四〇四牌"专用轿车都不敢坐,而要坐普通甚至旧一点的"华沙"。怕死这一点,也是不去某地开党代会的一条原因。我曾问他"为什么不去××(地方)开党代会",他说:"××,我才不去!那个地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能下毒手!"李再含真已陷于四面楚歌的绝境。

六月中旬,就在他家,他向我和××同志公开提出:"根据现在情况,我不宜直接出面,我在二线为好。"接着,"哈哈"大笑一声,自我陶醉地说,"幕后指挥!"他的确是幕后指挥!关于武器、据点的反动政策,就是在他家交待或研究的。与"四一一"革命群众组织的每次座谈时间、地点、内容、方式,如"分别接见","对××要提出警告","调子要高高的"等等,都是李再含亲自交待的,要我、××、××××、×××等出面执行。

在七月五、六日,李再含为了加速一派群众的武装速度,以执行国务院文件国发(十五)号文为借口,从××军区关于收缴、修理、整顿武器的"通知"中断章取义,捞取稻草,提出发放武器,组织"民兵",当场成立了发武器小组,并指定由×××和×××负责。第二天一个晚上,就批准下发二千四百多枝枪,并要省革委保卫领导小组和××分区连夜下发。在这个会上,有同志向李再含提出了发枪要向中央请示报告的问题,李再含说:"边报边发,发错了,×××(军区)负责,我们是执行××(军区)文件。"李再含还说:"既然中央叫组织民兵,民兵当然不能空手守卫,必须有武器,组织民兵守卫就包含着武装民兵。"这就是李再含所惯用的偷天换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伎俩。

七月中旬,在核心小组部分成员会议上,李再含明确提出"要工人立即进城,稳定局势"。并要求据点"无论如何不能拖到八月"。他不仅提出要求,而且还提出了具体办法。具体办法是:"一千人带袖套在外面维持秩序,一千人拿武器在后面藏着,见'四一一'的人出来就捉。"其实他这一套在前约一个星期,即七月九日,就背着核心小组早已布置给工代会了。他在这个时候再拿出来,绝不是出自于什么"尊重集体领导",而是求得所谓"集体讨论通过",以各事后"集体"为他承担罪责。

会后第二天,我、××、××、×××就急忙找工代会前来汇报,并全面地开展打据点的计划、物资、队伍、武器、舆论的准备工作。

从七月初起,我、××、×××、×××等按李再含的黑指示与"四一一"革命同志开"座谈会",至七月中旬已经进行了三次(平均不到一周一次)。李再含还专门指示把××同志的"谈话"大量印发,传向社会,"以正视听",以便造成"省革委接见多次啦,没办法啦,群众愤怒啦,只好打……"的这样一种反动社会舆论。即李再含的"接见的次数越多,我们就越好说话,越主动"。实际上,用这种"接见"向"四一一"革命群众下了公开镇压的通牒令。

七月二十五日,清电据点被"踏平"了,对贵阳延安路据点的攻打就在眼前。在这个时候,李再含召集××、××、我和刘安民等开会。一开头李再含说:"现在情况复杂,变化也大,有些事情要随时研究,看来像以往隔好几天才开一次会已经适应不了这种形势。现在定下来,两天开一次。参加的人嘛,有的看

病，有的不在家，就这些同志，不是核心组会，咱们学中央的，叫做'碰头会'。"这是李再含搞的一个大阴谋，这是李再含对中央的严重对抗。中央在五月会议上，确定四十一师张琦等同志参加核心小组，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但李再含出于独霸一切、占山为王的个人野心，他对每次以"多数压少数"来否定张琦同志的正确意见还感到不够，觉得这样不能保证杜绝泄露他的"天机"。李再含几次讲："我们有点什么事，四十一师马上就知道，四十一师搞什么我们连个底也摸不着。"李再含为了不让张琦同志知道，打出"学中央"的旗号，搞"碰头会"，企图通过这种"碰头会"把张琦同志"碰"出去。李再含搞这种"碰头会"，实际上在核心小组内又建立他能一手控制的"核心"。实际上，他偷偷地改组了核心小组或在核心小组之上又秘密建立了一级政权。李再含多么阴险！多么胆大妄为！

李再含在谈完"碰头会"之后，他要大家对据点问题发表意见，说："大家看看，据点问题怎么办啦？我们是五月二十六日回来的，两个月了，还是乱糟糟的！'接见'几次了，有五六次了吧？"（有人答："五次了"）接着说："是啊！已经五次了，像'四——'那个样子，叫他们回去，就是不干。而且要求越来越高！哈哈，怪事情！现在人数不多了，剩下的都是些有问题的……虽然人数不多，但占着据点哪，拖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已是相当耐心了。"李再含见"大势已成"，有人要打，马上改变调子，举手连续两次用加重语气发表所谓"郑重声明"，李再含说："我郑重声明：打据点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请示中央！啊，我再说一遍，我郑重声明：打据点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请示中央。"我和李再含认识近三年来，从未见他发表什么"郑重声明"，更未见他在这样四五个人面前用举手发表"郑重声明"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意见。散会时，我问刘安民。他说："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但要'有理'、'有利'。'有理'，就是让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有利'，就是确有决胜的把握。"李再含这样做，是为了在核心小组中再后退一步，逃避罪责。

反革命两面派李再含，在七月二十五日会上举手发表"郑重声明"所装出的假面具，由他自己撕破了。"七·二九"事件发生前，李再含打电话给××××，××××在电话中向他们汇报了工人即将进城的情况，李再含问"有把握没有？"××××在电话上讲了，李再含还不放心，接着又要××××带着地图到他家当面汇报。他听汇报后，在十一点左右，亲自给工代会下命令要"小分队"进入政法大楼去镇压革命群众。中央当天就知道了贵阳的情况，晚上七点钟就发来了命令，中央命令指出："省革委、省军区、两师都不能开枪，开枪要犯严重错误。"李再含怎样来执行中央的命令呢？他叫"分头传达"，把中央的命令分成两半，一方告诉一半。当时街上已开始广播中央命令全文，李再含下"令"说："谁叫他们

广播，马上停下来！"就这样，李再含用自己的"命令"把中央的命令封锁了。当时××同志向李再含、核心小组提出忠告说："不向中央请示报告，你们可要犯大错误。请你们下命令制止。你们这样不请示中央，我坚决反对。我建议不要散会，研究制止工人进城……"李再含哪里肯把会再开下去，前边还等着指挥呢！李再含决定立即散会。这是李再含目无中央、抗拒中央、搞"独立王国"的反动本质的大暴露。

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三十日中央首长解决贵州问题的会议上，在中央再三通同"七·二九"事件的情况下，李再含说："我要说句公道话，'七·二九'不光××一个人，光说××是不公道的，搞'七·二九'的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工代会的××××。"李再含在中央首长面前耍的这套花招，被中央首长一眼看穿了。第四天，李再含亲自炮制了一份所谓"检查"稿来要大家通过。"检查"说："诚恳接受中央的批评"，"关于'七·二九'事件，我们核心小组个别同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有责任的"，"李再含同志犯了错误，可惜没有把他的个人财富变为集体的财富，以致出现了'七·二九'事件"。读完了他的所谓"检查"后，他又发表了长篇议论说："中央批评我搞'独立王国'，搞'多中心'，可是我们核心小组的同志也搞'多中心'，贵州到处是'多中心'，贵州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接着他又假惺惺地说："向中央报嘛，就不点张三李四的名了。内部嘛，知道谁搞的就行了。"李再含在"检查"中说："诚恳接受中央的批评"，完全是假话。在"检查"会下面几次对我说："我反复考虑了，'七·二九'的方向没有错，在组织上有错误，急了一点。"李再含就这样要反革命两面派。

八月二号，中央决定四十一师给"四——"革命同志办学习班，李再含得此消息后，就对我讲："你看，中央高明……哎，就让你四十一师给'四——'办'学习班'，结果给四十一师背了个大包袱。"过了两天又说："你看，中央的态度是变化的，杨××就是转不过弯来，卡着五万元不给。"在八月十二日，中央首长的一个批示下来后，李再含又恶毒地从中挑拨中央首长，并为"七·二九"事件翻案。李再含、刘安民还向我说："老孙，你到独立师和工代会做做工作，他们有些急躁，有什么错误我们负责。何况'七·二九'中央还没有做最后结论呢！"指派我到独立师和工代会去做"稳定情绪"的工作。这是李再含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严重的犯罪。

李再含的垂死挣扎

八月十六日，中央正式通知：中央决定召开第三次北京会议来解决贵州问

题。李再含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他说："这次，'官司'是非打不可的，而且是'大官司！'"因此，他下了狠心进行准备来打这场"官司"。李再含除争"自己的人"多去而外，又当即布置各部门速搞告状材料。他布置搞一九六九年以来贵州工农业生产下降情况的材料，说什么"在此以前贵州形势是稳定的，生产是正常的"等等，企图把贵州落后的罪责，嫁祸于四十一师，嫁祸于中央。为了证明"七·二九"的大方向是所谓"正确的"，他布置宣传队调查"七·二九"死伤人员的政治状况，企图证明"打死打伤的都是些有问题的人"。他几次发脾气说："'七·二九'到底死伤了多少人？我们自己连个数也没有！人家说多少，就是多少！"结果，又是所谓真相，又是"调查"，搞了一大堆。为了证明"四一一"革命群众组织是所谓"坏组织"、"大杂烩"，他又布置将"××专案"材料迅速整理，而且将×××同志派往北京，企图利用该同志在北京工作过，熟悉情况，把"××专案"材料直接送给中央首长。为此，李再含写了亲笔信件交该同志带往中央。什么"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共有二三十份。除了常委们每人一份外，而且给每位中央首长也预备了一份。为了不泄露这些鬼名堂，李再含指令这些材料由秘书集中看管带往北京。因为太多(两大皮箱)、太重，秘书×××扛这些材料上飞机时，竟将腰肌扭伤，直到北京会议开完，还没有恢复健康。

八月二十二日，李再含就经过这一番紧张的准备，带着这帮人"整整齐齐"的到北京去了。一到北京，李再含就召集了会议。他说："回去还不到三个月，哈哈，又来了。这回，来这么多人，中央不会像上次留那样长的时间。两边都检讨检讨就回去了。一个星期，十来天，最多半个月，九月中旬前就得赶我们走，无论如何不会叫我们在这里过国庆。到中央来，就得准备挨批评，中央从来不只表扬一方，批评一方；中央批评一方时，想办法也要把另一方批评两句。批评对方时，千万别吭气，一吭气就挨批。可不能翘尾巴，越翘越糟糕。"李再含根本不想向中央作检讨。会还未开始，他就计算着要溜了。李再含还对我们几个人说："我们一定要整整齐齐，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是不如人家。我们是各说各的，连个统一口径也没有。像上次在中央五月会议上，关于'八一八'组织的枪支问题，有的就说一支也没有，有的说有三五百支，又有说有千把支……到底多少？中央一看就不像个样子。我们带来那些材料，大家看一看，不了解的要熟悉熟悉，要记住，不要讲时还得拿本本念。"李再含就这样在搞对抗中央、欺骗中央的统一口径。李再含还多次说："中央爱听工人、农民讲话，××××、××××、×××这些同志可以多讲，哈哈，他们就是讲错了，中央也不责备他们。上次会(指五月会议)上，××××的发言很有劲，中央很感兴趣。哈哈，41师最怕×××了。"这一切一切，都是李再含对抗中央的部署。

×××同志受李再含的指派，带着李再含的亲笔信件，大约和我们同一时

间(八月二十二日)去北京上送"××专案"材料。当时，中央已在军内颁发了"八·二〇"命令，对部队人员的外出作了严格的规定。送"××专案"材料的同志到北京后，受到北京卫戍司令部的查问。这个同志讲明了来历，并拿出李再含的亲笔信件作证明。接着，卫戍司令部向中央请示，中央军委打电话问李再含，李再含回答说："我没派人到北京，当即被拘留。后来，该同志向中央交出李再含的亲笔信件，中央派人拿此信当面向李再含进行核对，在铁的事实面前，李再含才不得不承认，人是他派的，信也是他写的。八月二十六日晚，中央首长接见原省核心小组成员。接见前，李再含向大家说："你们要讲话，不要到时候谁也不讲，中央就不知道。"李再含要大家给他对抗中央打头阵。李再含又说："七·二九"嘛，我的意见是不讲。搞不清中央现在是啥态度，先听听中央的再说。"接见开始了。中央首长说："你们来好几天了。今天政治局同志委托我和×××同志和你们见见面，听听你们的意见……以你们看，贵州形势怎样？如果说有问题，问题在哪里？怎样解决？"当时，没人吭声。中央首长说："李再含，你讲讲，你说说你的看法？"李再含有些紧张，过了好大一会，发言了："这个，这个嘛……吭吭"，以大约五秒钟一字的速度还是："这个、这个……"中央首长有些生气了，说："你讲吧！你讲吧！"李再含用手指着自己的太阳穴划圈，嘴上只好说"这个、这个"磨时间，脑袋里现编词儿应付发言。又因为还"搞不清中央现在是啥态度"，怕说错露了马脚，一时也不知说啥才"保险"，所以陷入了这种狼狈不堪的境地。后来，李再含说："贵州问题，不在贵州，贵州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军区)，因此贵州问题根子在××(军区)。在部队换防以前，贵州形势一直是好的，工农业生产是稳步上升的，只是以后出了问题……"李再含还是没有编出新词儿，开始按他准备的材料讲了。中央首长跟着就问："根据什么这样讲？你摆出几条来我们听听。"李再含不得不停止背他的那本豆腐账，"吭、吭"又咳了几声，接着又是"这个、这个"，过了好长时间，李再含才说："贵州铁路自从41师军管后，问题很大，不听我们指挥，不给我们贵州运输物资……最近一个时期，生活用品的运输也进行了刁难，致使我省吃盐都成问题。盐价高涨，听说六盘水和兴义地区某些县要×元×角才能买一斤盐巴。对工业物资的运输就更成问题，汽油奇缺，致使工业受到……"李再含想了半天，又说："××军区今年七月份开了党代会。在选举党委的时候，有不少人反对我，不让我进党委，××政委坐卧不安，向大家做工作说：我们应该团结李再含，虽然他犯有错误；有些犯有'二月逆流'错误的人，毛主席还准予他们进入中央委员会……某政委说我犯有错误，把我和'二月逆流'的那些人相比！"李再含连"犯有错误"这一点都不接受，谁说他"犯有错误"，他就对谁极大不满。谁说他"犯有

错误”，按李再含的反动逻辑，谁竟成了贵州问题的根子。

“八·三〇”接见和“九·二”大会后，在中央首长的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面前，原核心小组多数成员不得不丢开李再含那一套，不得不考虑自己的问题，虽然还不认真，还不彻底。李再含清楚地看到了大家情绪发生非常的变化，清楚地看到他众叛亲离，“独立王国”的末日到来。但他并不甘心。在九月四、五日的一次省革委会议上，李再含还歇斯底里地狂叫“现在我还坚持；我是‘不倒翁’，我也不想倒，就是倒了，我也要爬起来”。反动透顶。更为卑鄙的是他进行的自我表演。他变乖似的说：“哎，你们都不知道我会唱京戏吧？京戏，我会唱，也很喜欢；我还会拉二胡哩！我给你们唱一段听听。”中央在七千人的大会上批评他，他还唱京戏，企图以此来给原核心小组其他成员打气，以便跟他一道对抗中央，死守其“独立王国”。（此据发材料，有删节）

（揭发李再含材料之十二，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革命大批判领导小组办公室印 1970 年 12 月）

附录 25　红雨斋：不会“卖友求荣”的蓝亦农

蓝亦农又名兰亦农（1919–2008）。蓝亦农何许人也？请看 2008 年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原昆明军区顾问兰亦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 月 14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9 岁。兰亦农逝世后，郭伟雄、曹刚川、徐才厚和梁光烈、李继耐、廖锡龙等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兰亦农是湖南省茶陵县人，1919 年生，1938 年 9 月参军，同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学员、干事、连指导员、朱德警卫二团总支书记、团政治处副主任等职，参加了“反扫荡”、百团大战和豫西、豫北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委、政委等职，参加和指挥了锦州、辽西、天津、衡宝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师副政委、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昆明军区副政委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以及中共广西靖西县委书记（1950 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1971 年）等职，参加了西南剿匪、抗美援朝，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兰亦农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他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

蓝亦农不会“卖友求荣”的故事发生在“文革”时期。蓝亦农在“文革”前的所的 1967 年–1972 年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一句话可概括为历任二市一省革委会主任（重庆市、昆明市、贵州省）。“文革”前的蓝亦农任 54 军副政委，54 军驻

驻重庆市，军长韦统泰，政委是谢家祥。“文革”初期的重庆处在最混乱中，在中央三支两军的部署中，54 军介入当地“文革”运动，1967 年 5 月 16 日中发〔1967〕159 号文件中，决定成立由 54 军副政委蓝亦农、54 军副军长白斌分任正副组长的重庆市革委会筹备小组，1967 年 7 月原 54 军政委谢家祥升任成都军区副政委，蓝亦农又被提拔为 54 军政委，1968 年 5 月蓝亦农任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任四川省革委会常委），1968 年 10 月中央决定 54 军与驻防昆明的 13 军对调，这样蓝亦农又与当时的 13 军政委兼昆明市革委会主任段思英互换了两市的革委会主任职务，这在“文革”支左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1969 年 4 月蓝亦农又升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同月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蓝亦农在“文革”时期的一系列提升与重用，一方面是当时形势使然，一方面蓝亦农本人也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军队政工干部，受到过去的老首长如萧永胜、邱会作等人的赏识，在邱会作的推荐下，1969 年 10 月 18 日，周恩来在中央召集的贵州学习班上宣布：昆明军区副政委蓝亦农任中共贵州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替代原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周恩来 1969 年 12 月 27 日，在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委会及成都军区赴京学习班全体同志的重要讲话中，谈到免去蓝亦农四川省革委会常委时是这样说的，“蓝亦农同志已经转到昆明军区去了，担任副政委，做了昆明市革委会主任，现又转到贵州省，代理核心小组组长，处理贵州工作。贵州工作有很大进步，新的领导去了，做了大量的工作。又增加了新的部队。我们这样做，‘春雷’又响了，‘西南的春雷’嘛。开始响了，后来打闷了。现在春雷又响了。”

1971 年 5 月，蓝亦农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9.13 事件”后，蓝亦农受到牵连。在 1972 年 9 月 15 日的中发〔1972〕38 号文件里，有经中共中央同意转发的《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中谈到，“中央为了挽救蓝亦农同志，曾多次对他进行耐心教育，但蓝顽固地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态度很不老实。从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一九七一年二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四月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直到今年五月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贵州工作会议上，中央都给了他交代自己问题的机会，但他始终耍阴谋，搞两面派，对抗中央。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当中央负责同志指出蓝的问题后，他无动于衷，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后，当张荣森同志揭发、交代问题的时候，蓝对张说，我不会‘卖友求荣’。”文中提到的张荣森（1917–1984）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为此蓝亦农付出了代价，1973 年–1980 年下放工厂劳动。1983 年才恢复大军区副职的待遇任昆明军区顾问。时过境迁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对不会“卖友求荣”一说作出各种类型的解释呢？

蓝亦农的老领导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邱会作(1914-2002)晚年在回忆"文革"时,是这样谈到蓝亦农的,"当时贵州很乱,工作很难做,总理叫我一定选一个好的干部去支左,他还调侃说:'强中自有强中手!'亦即选个最好的去。蓝亦农是昆明军区副政委,是一个优秀的军政干部,我把他推荐给总理。总理很满意,让他当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多次表扬过贵州的工作。可是,'九一三'之后,蓝亦农也受到牵连和打击,在批判他的会上当面和江青顶撞,而后被摘到邯郸钢铁厂里去劳动,一摘就是近十年。"

(红雨斋《文革史笔记》之五十五,2013-01-08)

第二十三章 蓝张入黔主政

按照中共中央(69)71号文件和中央领导指示,1969年10月下旬,原54军政委、时任昆明军区副政委的蓝亦农和时任43军军长的张荣森入黔主政,分别担任贵州党、政、军一、二把手;随同入黔的还有43军129师,主要负责贵阳地区"三支两军"工作。跟着,中央又从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军区抽调一批干部入黔,担任省市各级党政机关、各大厂矿的军代表。

由于蓝、张的雷厉风行,以及贵州两派群众组织的积极配合,贯彻中央(69)71号文件,制止了武斗,收缴了武器,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对各级革命委员会进行了补台,迅速扭转了李再含造成的混乱局面。过去两派严重对立的局面从此结束,全省工农业生产稳步恢复,社会秩序日渐稳定。贵阳地区"四——"的各个山头都自行解散,人员都回到各自单位,中学生陆续上山下乡,大学六四、六五级学生正忙着毕业分配,社会上的组织活动已完全停止。

蓝亦农、张荣森根据中央(70)3、5、6、7号文件,开展"一打三反"、疏散城镇人口、"整党建党"和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但他们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不批陈(伯达),不批林(彪),犯下了严重错误。

(一)蓝张主政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尽管当时贵州一时间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贵州旧的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新问题又慢慢产生了。

旧矛盾没解决的有:

第一、李再含时期因镇压“四一一”而制造的冤假错案，有许多并未解决。比如毕节“四一一”负责人吴胜祥被诬陷强奸，被判刑五年，就没得到昭雪。兴义“四一一”头头罗安义，还关押在监狱。

第二、有些在李再含时期忠实执行李再含指示镇压“四一一”的“三结合”领导干部，仍然大权在握。1964 年“四清”挨整的干部许多在李再含时期又挨整，并没得到平反。

新产生的问题有：

第一、在各级革委的“补台”中，“四一一”真正的群众代表，绝大多数并未补进各级革委会，比如袁昌福、李少华等人，连省革委常委都没份。即便补进革委会，顶多是个摆设，甚至连摆设都不是，比如补为省革委副主任的田子明，仍然分配在贵阳市红星拖拉机厂当技术员。同时，蓝、张对两派头头高举“反派性”旗帜，实行高压。比如 1970 年 5 月底，袁昌福等三人相约去到新添光学仪器厂看望魏志将，驻厂军代表如临大敌似地来盘查，硬将“省革委委员”身份的袁昌福带到厂办公室讯问。不久，在全省工交系统大会上，省革委政治部主任、129 师政委马扶增点名批评袁昌福是去“搞串联”、“搞派性”。又比如 1970 年下半年至 1971 年上半年的全省工矿企业大招工，“四一一”众多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几乎全被排除在外。这样，蓝、张执行的极“左”路线便引起“四一一”头头和群众的反感。

第二、在全省开展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蓝、张对凡是参加了两派武斗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按“混入群众组织的坏人”或“五一六分子”清查；在地、州、县和厂矿问题更突出。比如贵州橡胶总厂的两派头头，造反夺权的王宝临和“捍三红”的马汉武，都被隔离审查；受牵连的总厂领导干部王洪生也立案审查。从北京大学分配到轮胎厂子弟中学任教的张甦，这个学校也成立专案组，由厂军代表魏德古直接领导，对他隔离审查，直到林彪“九·一三”事件爆发才罢休。

第三、在省市党政机关、各大厂矿，都是军代表说了算，形成了“以军代党”、“以军代政”的领导格局。在必须用干部的地方，也是用 1964 年“四清”来黔夺权的“支黔干部”。党的干部政策没有得到正确执行，大批干部还关在“五七”干校“改造”。

大约到 10 月下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投敌的（1971）57 号文件先党内后党外传达到各单位群众后，贵州局势才出现了微妙变化。

（二）“一打三反”和马绵征之死

“一打三反”运动源于 1970 年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它是“文革”中深入“斗、批、改”的一个重要措施，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各类犯罪分子。到 1970 年 11 月底，全国共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 万多名，批准逮捕各种分子 28.48 万多人，其中判处死刑的 9000 多人。

贵州省的“一打三反”是在蓝亦农开始主持贵州工作之后进行的。但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在贯彻“公安六条”的情况下，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征于 1970 年 1 月 17 日在本单位大字报专栏张贴了一张《从元旦社论看贵州形势》的大字报，触怒了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被警方拘留。此后成为阶级斗争的样品，被贵阳市各单位轮番“借”走，接受“革命群众”批斗。

2 月 22 日，她接过军代表要她写检查的纸笔，给毛主席写了长达 5800 字的信。信中她把自己比作“一只在暴风中逆流而进的小鸟”，坚信“乌云永远遮不住太阳，邪谬永远掩盖不了真理”。她咬破手指，把鲜血印在每一张信纸上。信的最后写上诗句：

碧血腾腾化怒潮，虎胆英雄壮气豪；
安得倚天抽宝剑，迷雾丛中斩魔妖。

2 月 25 日，她被“借”到贵阳市糕点厂建设工地，在 500 多人的批斗会上，她先后四次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号，当场被击倒，嘴里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后，她被正式“逮捕”。原来，“文革”初当她得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件事后，她就对此表示怀疑。她对丈夫说：“江青在部队没有职务，为什么林彪要委托她召开军队会议？他们两人是什么关系？”

从2月25日起她就被关进贵阳市看守所。她开始绝食。省革委当局指示公安局一定要让她活到枪决的那一天，强行给她鼻饲。

2月22日、26日和3月2日，她先后三次被提审。

5月10日，当局在贵阳春雷广场组织了20万人的公审大会，将她拉去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会结束后，这个女子又被拉上卡车满城游街。为防止她喊口号，嘴里强行塞进了不锈钢牙托。直到下午四时才被拉到郊区野地，按成跪姿，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给她的最后洗礼，死时年仅30岁。

1979年8月10日，中共贵阳市委、市革委会召开平反昭雪大会，为马绵征冤案平反昭雪。市委决定追认马绵征为中共正式党员。贵州省革委会批准追认马绵征为革命烈士。

贵州榕江县小学教师莫定钦剪贴、编辑刊登在报章杂志上的各类人文资料、图片，汇成了一本集子，作为教学资料供该校的教师和学生翻阅。不料这本资料成了反革命罪证。1970年9月，他被五花大绑押到县人民广场，在宣判大会上，判了20年徒刑。该校两位写抗议书为莫定钦鸣不平的教师也被判处"劳动管制"两年。

[1] 马绵征，女，1940年1月19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幼年丧母，主要靠姑母抚养长大。1957年进广州体校，反右中因在一张攻击一位老师的大字报上批写"人身攻击，不予理睬"八个字，惹来批判她的大字报150张；她也一肚怨气熬了七天七夜，还击大字报150张；她因此被广州体校逐学回家。她是在同这位受大字报攻击的老师此前还有过争吵的情况下招惹此祸的。半年后她考入武汉建筑学院中专部城建系煤气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建筑设计院。1962年3月经省建材局安排到阳关砖瓦厂实习，当煤气烧砖工。由于工作积极，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后调入贵阳市建筑公司任技术员。马绵征烈士墓在贵阳市凤凰山陵园。

(三)清理阶级队伍 疏散城市人口

1970年3月10日，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对城市中的几种人员进行清查处理的通知》和对省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关于进行城市人口疏散的请示报告》的批示。前者确定八种人员为遣送对象，后者确定九种人员或单位为疏散对象。

遣送对象包括：

1. 明确了地富反坏右分子身份的（包括摘帽子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

2. 查有确实证据漏划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3. 在"文革"中被清查出来，按照规定批准手续定了案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

4. 坚持反动立场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5. 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和反动会道门中的小道首以上和职业办道分子；

6. 品质恶劣、流氓成性、政治骗子、盗窃、投机倒把、招摇撞骗、为非作歹、屡教不改的分子；

7. 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查有实据仍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

8. 在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和"文革"中被杀、被关、被斗的阶级敌人的亲属，心怀不满，坚持反动立场，有现行破坏活动场所的分子。

《通知》规定，凡被遣送人员的粮食、户口关系要随同本人迁走；依靠被遣送人员生活的家属、子女，政治上是疏散人员的待遇，要动员他们随同遣送人员疏散出去。

疏散对象为：

1. 无正式职业的街道居民；

2. 退休和离职休养的干部、职工和无正式职业的家属、子女；

3. 烈士、病故干部、职工的无正式职业的家属、子女；

4. 工作单位不在市内，干部、职工家在市内的无正式职业的家属、子女；

5. 在"五·七"干校或农场劳动的干部无正式职业的家属子女；

6. 民政部门所属的社会福利单位；

7. 住在市郊、外县的单位设在市内的长期或临时性质的招待所、转运站要撤离市区；

8. 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无演出任务的文艺单位，分期分批搬到农村搞斗、批、改，进行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9. 纯粹为农业服务的小工厂（包括手工业）和无正式职业的家属子女，一起迁往指定的地点，就地组织生产。

贵州省1967年11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至1970年12月底，全省共疏散下放城镇闲散人口和遣送所谓"五类"分子共107350人。

（四）省革委补台　李再含撤职

1971年2月3日，贵州省革委会发出《关于省革命委员会补台协商代表会议工作方案》。

《方案》提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曾四次增补成员，但经中央正式批准的仅两批22人，其余未报中央审批。由于李再含背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使一些坏人和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乘机混进革委会，造成省革委会政治上、组织上严重不纯。现省革委会基本上是一派掌权。因此，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确定召开协商代表会议对省革委会进行补台。《方案》提出了对省革委会成员的撤、免、增补原则和调整意见以及补台的方法、步骤。

5月17日至22日，省革委会举行补台协商会议，对省革委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5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贵州省革委会补台意见：

1. 同意蓝亦农等205人为贵州省革委会委员。

2. 同意蓝亦农、张荣森等34人为贵州省革委会常委。

3. 同意蓝亦农为贵州省革委会主任，张荣森为第一副主任，石新安、贾庭三、李立、何光宇、张明、张健民、张琦、刘兴胜、马扶增、陈行庚、李庭桂、罗锡康、田子明、孙昌德为副主任。

4. 同意撤销李再含贵州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职务；免去刘安民、刘金池、康岩中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免去李再含等8人的贵州省革委会常委职务；免去李再含等44人的贵州省革委会委员职务。

在省革委会举行补台协商会议期间，5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撤销李再含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职务。

"四一一"补台保留和新进省革委会的委员9人，其中常委2人（戴宗祥、寿云夫），副主任1人（田子明）。

（五）省公安厅清查"五一六"学习班

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2]此后，清查"五一六"逐渐扩大成为全国范围的一场大运动，其罪名扩大为"三指向"（即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其打击面之宽，清查时间之长，成为"文革"中一大冤案。[3]《王力反思录》在写到1970年大抓"五一六"时说："全国搞了一千万人，抓了350万人。"

1971年3月起，一场清查"五一六"运动在贵州全省迅猛展开。当年9月初，贵州省公安厅军管会在7578部队教导大队驻地龙洞堡白腊山主办清查"五一六"学习班，学习班由43军129师一位营长主持，由公安厅一处两位科长张克和张世玉具体领导。参加学习班的有2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原省公安厅动态组全体成员，这些人除中医学院崔美琪外，其余都是公安厅"113"总队成员；另一部分则是"113"对立派成员。此外还有张甦作为证人参加。

学习班的重点揭发对象是高蟾光和刘祖新，前者是原"113"总队"四一一专案办公室"负责人，后者是该专案办公室下属"动态

组"负责人。学习班主要追究两个问题，一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二是运用特务手段对付不同观点革命群众组织的问题。前一问题涉及把矛头指向邱会作，因为1967年11月间杨成武因追问"二月兵变"材料而接见"四一一"代表李树林和原"红卫军"人员张国荃时，陪同接见的还有邱会作在场。1968年3月"杨余傅"(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发生后，李再含等将杨成武视为"四一一"黑后台，高蟾光和刘祖新为此不仅整了杨成武的材料，连带也整了邱会作的材料，因邱会作在"九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把矛头指向邱会作，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后一问题牵涉到高蟾光和刘祖新等人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法搞特务情报活动。他们从"四一一"大中学生中物色"卧底"(即"单线")，又一对一地安排所谓"复线"来对"单线"的活动进行暗中监控。原动态组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揭发了两个案例：一是他们物色某中学一名初中男生为"卧底"，这是"单线"；又物色另一所中学一名支红女生作"复线"，采取与"单线"谈恋爱的方式进行暗中监控。省公安厅对这名"卧底"软硬兼施，从1967年10月至1969年7月底，胁迫他作了大量的情报搜集工作，极大地毒害他的心灵。二是他们物色某高校一名男生作"单线"，又安排另一所高校一名支红女生作"复线"，也采取与"单线"谈恋爱的方式进行暗中监控，但阴谋没有得逞。他们用这种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窃取"四一一"活动的核心机密，先后抓捕"四一一"头头耿铁、邱富伦、潘少炎、陈贤等人，制造了"三·六"大围捕事件，致使"四一一"主力几乎被一网打尽。

由于高蟾光和刘祖新在检查交待中把责任向上推，9月下旬学习班正要转向他们的上司，与康岩中短兵相接。此时突然传来林彪"九·一三"事件的消息，学习班随即宣布结束，无果而终。

---

[2]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词条

[3]据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逆潮派》(原载独角兽)

(六)"四一一"上层从团结到分裂

1971年11月底，贵阳的"四一一"头头田子明、袁昌福、耿铁出面召开了自蓝、张主政贵州以来贵阳地区"四一一"核心人物的第一次会议。时间在一个周六的晚上，地点在今天盐务街东侧的一间大房子里面。主要与会者有补进省市革委的王长宽、方守廉、林和芳等。还有其他人员：陈贤、李少华、张甦、郭平、伍昆宪、吕茂廷、冉隆伟、伍律等。会议被大家呼为"团结会议"。田子明给会上带来两条消息，一是蓝亦农、张荣森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贼船，中央将再次解决贵州问题；一是"支红派"已经抢先行动了，康岩中等人带了材料到北京告状，说蓝、张在贵州支持"四一一"，压制"支红派"，贵州是"四一一""一派掌权"。康岩中得到周总理接见，也受到周总理严厉批评，警告他不要为李再含翻案。大家听到这些消息后，都感到形势逼人；都认为康岩中他们胡说八道，怎么会是"四一一""一派掌权"呢？大家都被蓝、张压得气都喘不过来。于是，田子明、袁昌福、耿铁在会上都"交了心"，相互提了提意见，都同意田子明的意见："我们内部不能再扯皮了！要团结起来，抓大方向。"第二天晚上又接着开。会后"四一一"派头头之间"团结"了。会议决定，由省文联作家伍律执笔，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一份关于贵州情况的汇报材料。至于材料落名，田子明提议落贵阳地区的"四一一"省市革委会成员姓名和有影响的四派代表人物的姓名，大家都通过了。

过了一个星期，又开了一次会议，主要是审查伍律写的材料。仍由田、袁、耿三人出面主持。大家提了些修改意见，请伍律修改定稿。会上确定由田子明、陈贤赴京向中央递送材料。田子明、陈贤在北京等了七八天，也没等到中央首长接见。于是他们只好动身回来了。田子明回来后，也没召集大家开会，交待赴京情况；在后来"四一一"内部分裂为"台上派"和"台下派"之前，田子明再也没有出面召开过"四一一"派内部的会议。到中央(1972)38号文件下达以后，因依靠的干部不同派系，"四一一"就公开分裂成了两派：

一派以田子明、陈贤为首，他们支持支黔派干部，核心成员有方守廉、王长宽、莫伏麟、邹沧萍、袁家璧等；一派以袁昌福、耿铁为首，他们支持冀鲁豫干部，核心成员有李少华、张甦、郭平、伍昆宪、吕茂廷、毛羽丰、毛洪礼等。人们呼之为“田派”和“袁派”。

（七）蓝亦农调离贵州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各地深入开展批判林彪罪行的批林整风运动。但是贵州领导人采取消极态度，到1972年秋，一年的时间里仍坚持着一条决不“卖友求荣”的错误防线，致使贵州干部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干扰了中央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措施，生产停滞，社会动荡不安。中央虽一再给当时贵州主要负责人打招呼，让他紧跟全国批林步伐，但他仍不能迅速改变被动局面。为此，贵州召开了全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

1972年9月3日，贵州的蓝亦农、张荣森、贾庭三、李立、石新安、马扶增、张琦、李庭桂、陈行庚、张心田、薛光、吴荣正、吴向必等13人到达北京，在中央负责同志指导下，对全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进行了总结，9月12日向中央提交了会议总结提纲（修改稿）报请审批。9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贵州省的中发〔72〕38号文件[附录26]，同意这个总结提纲。文件指出：“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后，当张荣森同志揭发、交代问题的时候，蓝对张说，我不会“卖友求荣”。昆明军区副政委、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蓝亦农调离贵州，被下放劳动。张荣森留任。

1972年9月16日，中央决定调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4]到贵州工作，任解决贵州问题工作组组长。偕同来黔的是原云南省副省长郭超。郭超是冀鲁豫干部，曾任贵州省委组织部部长，对贵州情况比较熟悉。

[4]鲁瑞林（1911—1999），甘肃省临夏县民主乡鲁家沟村人。少时家贫，放羊砍柴，读书不多。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军孙连仲部驻临夏，鲁瑞林投军。民国二十年（1931）11月随部参加宁都起义，加入工农红军，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不久，所在部队连长和部分班、排长密谋杀害指导员，煽动士兵哗变，他探知情况后立即向指导员报告，使哗变未遂。在第四、五次反“围剿”中作战勇敢，苏区埃《红星报》上给予登报表扬。因战功显著，升任红五军团某部营长、民运科长，军供给部政治委员等职。长征途中参加四渡赤水、攻占遵义、抢渡乌江等战役，经历九死一生，到达陕北。第二次国共合作部队改编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科长、太行军区五分区副司令员、政委、三分区司令员、二分区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任太行五分区副司令员的鲁瑞林受刘伯承、邓小平委托，赴河南省武安县国民党冀察游击第二师范子侠部，争取该部起义，改编为八路军。在任太行三、二军分区司令员期间，参加旧关、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安阳、白晋、磁县、武安、涉县、林县、百团大战等战役。安阳战役中他和政委王一伦率部在曲沟、水冶间设伏阻击日伪增援部队，一天内打退日军5次反扑，保障了战役胜利完成。

解放战争时期，鲁瑞林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三纵队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六十一军副军长、六十二军政治委员。参加山西上党、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进军西北战场后，参加咸阳、扶眉阻击战和西安保卫战。1949年8月鲁瑞林奉命率六十二军沿甘谷、武山、临洮向临夏进军，所部一八五师在和政松鸣岩与国民党敌逃军队接触，当即歼、俘敌人700余。8月22日临夏解放，25日晨在东校场庆祝临夏解放大会上，王震将军任命鲁瑞林为临夏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临夏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鲁瑞林即从六十二军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分赴宁定（今广河）、和政、康乐、永靖、夏河县，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清匪反霸，维持治安，筹备粮草，并争取夏河保安司令、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黄正清起义。

1949年底，鲁瑞林奉命率部进军大西南，行程万里，指挥部队歼灭国民党军队6.8万余人，剿灭土匪8万余人，巩固了凉山地区的新生政权。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军政治委员、西康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凉山工作委员会指挥部党委书记、西南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云南省军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职，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7月14日9点12分在广州病逝，享年88岁。

(八)"四一一"上层人士走近待解放干部

在1972年春节期间,袁昌福、耿铁等以"拜年"的名义,走访了前省委的许多领导干部,有贾启允、汪小川、吴实、徐健生、秦天真等。也拜访了前省委许多厅局干部。1972年七八月间,北大中文系被分配在河南工作的陈一谘来贵阳出差,通过张甦介绍了河南二七公社掌权的经验,就是革命群众组织要特别注意做好依靠老干部的工作。二七公社由于听进了纪登奎的意见,正确对待干部,河南形势较好。袁昌福等深受启发,到1974年批林批孔止,他们从未间断过同贵州老干部的私下接触。当时张甦还陪同陈一谘走访了贾启允、汪小川等老干部。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袁派基本弄清了贵州干部队伍的情况:1949年11月底,二野杨勇、苏振华率军解放贵州,随即留下了大批来自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干部主持贵州工作。他们在土改、"清匪反霸"等一系列斗争中,培养了贵州本地干部。这是贵州干部的主体。他们为贵州的革命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他们中间的领导干部几乎全被打倒;在李再含时期这批干部继续挨整,许多人同情或者暗中支持"四一一"反李再含的斗争;在蓝、张时期,他们继续靠边站,政策没有落实,对蓝、张也有共同看法。因此,袁派认定要支持和依靠冀鲁豫干部。于是袁派核心成员,按照"支持冀鲁豫干部"的方针,在1973年春节期间,走访省市委领导干部,做干部工作。

田子明、陈贤接触密切的老干部杨辛克,并非贵州本地干部的代表人物,在老干部中影响不大。粉碎"四人帮"以后,杨辛克被当作"黑后台",同田子明等在贵阳六广门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批斗大会上,进行了批判。

冀鲁豫老干部中的核心人物罗英看好陈贤,陈贤去他家很随便。罗英说:"我们很看好你。但是,你要听话。"陈贤一听这话,觉得不讲原则,当面宣称一刀两断,就再也不去罗英家了。

本章参考资料
1.贵州人民出版社《当代贵州大事记》
2.《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3.张甦《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附录26 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中发〔72〕38号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2〕38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的通知

中央批语

贵州省党委,省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望你们抓紧批林整风,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搞好生产救灾,加强三线建设,努力完成党和国家规定的各项任务。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五日

主席、中央:

我们贵州十三个同志于九月三日来京,在春桥、登奎、德生、洪文、周兴同志帮助教育下,对我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进行了总结,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现将会议总结提纲(修改稿)送上,请审批。

蓝亦农 张荣森 贾庭三 李 立
石新安 马扶增 张 琦 李庭桂
陈行庚 张心田 蔣 光 吴荣正
吴向必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

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修改稿)

(一)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我们在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会议结束后,召开了地、师级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在京召开的贵州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反复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开展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会议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教导,揭发批判了蓝亦农、张荣森同志的错误。蓝、张作了检查和补充交代。到会同志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会议开得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由于蓝、张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对抗同志们对他们的帮助,再加上我们领导思想上的不一致,会议也曾一度发生了偏向,出现了起哄现象。有的同志没有从思想上同李再含的错误划清界限,不是站在党性立场上批判蓝、张的错误,而是从个人恩怨和资产阶级派性出发;有的同志缺乏自知之明,自以为"一贯正确",借批判蓝、张表白自己;有的同志跟着蓝、张犯了错误,不积极揭发、批判,而是节外生枝,转移目标。我们一些领导同志不是努力把会议引向正轨,而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对于会议发生的问题及其严重后果,我们原来是认识不足的。经过中央负责同志的启发教育,认真总结前段的经验教训,大家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排除了干扰,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我们深深体会到,要牢牢掌握批林整风的大方向,一定要正确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要有一个好的作风。要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条原则,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正确的话,错误的话,在党的会议上都可以讲,但绝对不能起哄,决不容许在背后搞非组织活动。只有这样,才能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批林整风的正确方向。

这次会议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发展贵州大好形势,奠定了基础,是一次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二)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

一、蓝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积极配合林彪一伙向党进攻,为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效劳。在庐山上,他同林彪死党邱会作、李作鹏和上了贼船的梁兴初、谢家祥等同志,背着党中央,进行秘密串连。他提出在宪法上加上"三个副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在西南组一煽动,他跟着起哄,提出要"揪人"。会议期间,韦祖珍向他"交底",造谣说反对毛主席的就是中央某负责同志。

二、蓝、张极力转移批陈大方向,大肆吹捧林彪。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张不认真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批陈不痛不痒,反而为林彪及其死党涂脂抹粉。蓝亦农同志说:"黄永胜前段没上庐山,他的检查是为了给其他同志承担责任。""吴法宪解决贵州问题作了一些工作,有功。"他们不抓批陈,用反资产阶级派性、反无政府主义、整顿军队、整顿机关为借口,转移批陈整风的大方向。他们擅自提出在全省开展"让毛主席满意,让林副主席放心"的群众运动。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张同林彪死党提出的"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反革命口号相呼应,更加起劲地吹捧林彪,调子越来越高。他们在遵义为林彪修纪念馆,并组织参观;利用遵义会议解说词,篡改历史,宣扬林彪。蓝从庐山上私自抄回了林彪的反党讲话。张从广州抄回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又从梁兴初那里抄回了林彪在庐山上的反党讲话。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广为传播。蓝在去年八月省积代会的报告中,大肆贩卖林彪是"三大助手"中最光辉的助手的谬论,要"保卫接班人"、胡说什么这"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迎头痛击"。蓝、张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还在贵州私自印发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讲话,并大量印发《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学习资料》、《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和周赤萍吹捧林彪的小册子,为林彪反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三、"九·一三"事件后,蓝、张不但不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不向毛主席、党中央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而且封锁中央。他们多次表白自己,谎称同黄、吴、李、邱没有打过一次电话,没有写过一封信,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往来。并以各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压制干部和群众对林彪反党集团和他们自己的揭发,大捂盖子,干方百计转移斗争大方向。蓝、张还对抗毛主席关于云贵部队由周兴、王必成同志统一指挥的命令,擅自调动部队。

四、蓝、张同林彪死党和梁兴初等上了贼船的人拉山头,搞宗派。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同黄永胜、邱会作、黄志勇以及梁兴初、谢家祥、韦统泰等来往频繁,极不正常。他同梁、谢、韦等从一九七〇年以来传递材料达一百四十多件。张同温玉成、梁兴初有电话和信件往来。"九·一三"事件前,关光烈给张荣森同志写了一封

信，并送了皮包等礼物。蓝、张同林彪死党早就有不正常的关系。蓝在昆明时，就曾陪同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借选“外事人员”为名，搞阴谋活动。一九六九年十月，蓝、张到中央接受任务时，蓝事先去见了邱会作。在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他们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又单独接见蓝、张。蓝还向邱会作要求把云南的雷远高调到贵州工作，邱不同意，说：“昆明有个通风报信的也好嘛。”蓝将邱的这一黑旨意告诉了雷远高。蓝、张来贵州后，许多问题不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示报告，而向黄、吴、邱等人写私人信件和打电话，对林彪死党的黑指示坚决执行。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蓝亦农和梁兴初、任荣三人串连，由蓝执笔，联名告张国华同志的状，为吴法宪开脱。

蓝、张到贵州后，积极垒自己的山头，搞宗派主义，影响了毛主席干部政策的落实。

中央为了挽救蓝亦农同志，曾多次对他进行耐心教育，但蓝顽固地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态度很不老实。从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一九七一年二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四月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六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直到今年五月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贵州工作会议上，中央都给了他交代自己的问题的机会，但他始终要阴谋，搞两面派，对抗中央。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当中央负责同志指出蓝的问题后，他无动于衷，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后，当张荣森同志揭发、交代问题的时候，蓝对张说，我不会“卖友求荣”。他要他的秘书给谢家祥、韦统泰、雷远高等人的秘书写信，统一传递材料的口径，订立攻守同盟。蓝亦农同志经过中央负责同志的耐心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交代了一些问题，有所进步，但立场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对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交代清楚。这一次到北京，当中央负责同志拿出证据，他才交出传递材料的目录，接着又交代他在目录中隐瞒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避重就轻，吞吞吐吐。张荣森同志的错误程度与蓝亦农同志有所不同，态度比较好一些。

我们希望他们转变立场，与林彪及其死党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交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三）正当我们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时候，社会上刮起了一小股邪风。有人秘密串连，制造舆论，全盘否定贵州自贯彻中央（1969）71号文件以来所取得的各项工作成就。

我省贯彻中央1969，71号文件，制止了武斗，收缴了武器，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对各级革命委员会进行了补台，恢复和发展了生产，迅速扭转了李再含造成的混乱局面，成绩是很大的。经毛主席批准的中央（1970）7号文件，反映了贵州当时的实际情况，蓝亦农、张荣森同志在这个时期也有许多缺点错误，但

他们主要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不批陈，不批林，严重地破坏了贵州大好形势的发展。

“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省根据中央的指示，开展“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成绩是主要的。由于林彪及其死党的干扰破坏和蓝、张错误的影响，某些地方和单位也发生了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教导，既要纠正扩大化，又要防止“一风吹”。

对李再含的错误，中央早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结论，他的案是翻不了的。中央（1969）71号文件指出，李再含“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逐步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九七一年五月经毛主席批准的贵州省关于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也指出了李再含曾经同陈伯达、王、关、戚勾结在一起，进行了反党、乱军、篡权的阴谋活动。毛主席批准了撤销李再含在贵州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李再含执行的那一条路线，就是林彪、陈伯达的路线。不论是跟着李再含还是跟着蓝、张犯了错误的同志，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在批林整风中提高觉悟，划清界限，改了就好。对他们不应揪住不放，更不能搞层层检查，人人过关。

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和中央两次贵州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逐步揭开了全省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盖子，调动了全省军民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全省形势必将越来越好。

（四）对今后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搞好批林整风，是全党的头等大事，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各级党委一定要抓紧、抓细、抓好。我省前段批林整风运动搞得不深不透，要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认真学好中央规定的文件，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狠批林彪的滔天罪行，狠批林彪死党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要加强专案清查小组的工作，彻底查清林彪及其死党在贵州的阴谋活动。联系贵州实际，主要是揭发批判蓝、张的错误。为了消除他们的错误影响，决定将他们的检查传达到县团级。

要把批林整风运动和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批林整风中，重点在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整风的重点要紧紧围绕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不正之风，以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团结的目的。

二、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各级党委要首先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贵州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李再含掌权时期，不少干部受到打击迫害。中央[1969]71号文件下达后，解放和使用了一批干部，但由于蓝、张实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还有一些应该解放使用的干部没有及时解放使用。要结合批林整风，认真抓好干部政策的落实，该解放的及时解放。即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作了检查，取得群众谅解，也要尽快解放，安排适当工作。对有历史问题的干部，要抓紧审查，作出结论。

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干部，包括少数民族干部。要加强对新干部的教育。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共同提高。

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经济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要作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加以解决。

三、进一步搞好三支两军工作

从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军区调来的支左干部和支左部队，都是中央决定调到贵州的。我省驻军和广大支左人员，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人民立了新功。三支两军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主要由蓝、张负责。张荣森同志长期把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和支左办公室凌驾于党委之上，不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在地方各级党委成立之后，仍坚持保留各单位军代表党委和支部，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对于这些问题，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支左部队和支左人员要自觉地遵照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教导，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进一步发扬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全体三支两军人员要顾全大局，坚守岗位，安心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搞好各项工作。

四、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这三级地方军事机关，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同时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应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广大的三支两军人员，要自觉地维护和服从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加强工、农、青、妇等群众工作。各级党委必须保证上级党、政府和军队的指示和命令的贯彻执行，切实防止与克服地方分散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

蓝、张过去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削弱了党的领导。党委成员都要增强党的观念，把自己置于党委之中。主要负责同志要充分发扬党的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一切重大问题必须集体讨论决定。要

建立和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要及时请示中央。

五、增强革命团结

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是革命的大局，一切革命同志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增强党内、军内、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和各民族的革命团结。有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对人对己都要一分为二。要严于解剖自己，多做自我批评，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和行动。要坚决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了加强革命团结，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六、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对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的人，要批评教育，作好思想工作。对秘密串连，重拉山头，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派性头头，要严肃处理。

对阶级敌人的造谣惑众，行凶杀人，放火投毒，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盗窃国家资财等现行反革命活动，要坚决打击。

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由于蓝、张错误的影响，加上我省今年遭到几十年未有的严重旱灾，粮食大幅度减产。工业生产问题也不少。要以批林整风为纲，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切实搞好生产救灾，安排好社员群众的生活，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强三线建设，更好地完成国家规定的各项任务。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第二十四章　鲁郭赴黔履新

(一)鲁郭从解放干部入手，打开工作局面

在到贵州之前，中央派飞机把鲁瑞林和郭超接到了北京。李先念要他们到贵州后，首先要贯彻好中央(72)38号文件，主要内容是批林整风，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迅速解放干部，抓生产，抓三线建设工作。纪登奎说：贵州的问题关键在于用干部，这几年真真假假，翻来覆去把贵州的干部搞得差不多了，我看关键是你们要大胆解放干部。陈锡联也说：对，不要一个一个，一定要一批一批解放干部，否则时不我待啊！瑞林同志，你这次又是临危受命，要好自为之。

1972年9月中旬，鲁郭到贵州后，把解放干部、加强领导班子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1]。贵州的干部本来人数多、资格老的多，有原五兵团的干部，南下工作团的干部，"四清"的支黔干部和原贵州地下党的干部。在县级干部中有不少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可是由于这几年特别是"文革"期间翻烧饼把他们都"烤煳"了，不少敢于仗义执言的老同志都被搞得抬不起头来。为了解放干部，鲁郭两人达成共识，决定先从最难解决的、被人们视为禁区的陈璞如、秦天真的问题入手。

鲁瑞林首先把陈璞如有几十万字的材料调来和郭超连夜审阅。但是看来看去，没有一份材料能确切说明问题，有许多内容都是从大字报上抄来的，无非还是那种"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即是走资派"的谬论，没有一份材料有可靠的真实性和权威性。鲁瑞林请省委领导和公、检、法的有关领导，先认真传阅陈璞如的材料，准备好意见，用一个上午来讨论陈璞如的问题究竟是"敌我"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经大家认真讨论，都感到按现有的材料，只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下午又根据陈璞如的自述"参加革命以来的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致认为陈璞如不但在抗日时期、解放战争中有很大的功绩，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成绩也是主要的。鲁瑞林根据大家的意见，给陈璞如作了一个280字的结论。然后又经大家反复衡量，斟酌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最后取得了统一的意见。两天的时间，结束了对陈璞如的审查。当结论拿给陈璞如看时，陈璞如完全同意组织的结论，表示愿积极投入新的工作之中去。

解决了陈璞如的问题后，在全省机关、群众团体、基层革委会，以及被审查的干部中间都引起了较大的震动，特别是在省革委和军区机关，成了议论的话题。当然褒贬都有，但多数人感到是实事求是的。鲁瑞林和郭超听到这些反映后，信心更强了。

随后又把秦天真的材料作了反复审查、验证，发现在他100多万字的众多材料中，有不少是出自一份材料，道听途说，辗转传抄。这份所谓"钢鞭"材料，是出自一个女特务的揭发。鲁瑞林抓住这份材料，请省负责公安工作的张琦负责，把秦天真的材料又进行了反复查对。在张琦的努力下终于发现了一个破绽，材料中所提供秦天真"叛变自首"的许多细节都不能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有一份材料证明，秦天真那时并不在女特务所揭发的秦天真"叛变自首"的那个地方。根据这一疑点，提审了女特务，经多方面交待政策，女特务终于坦白了写这一材料的真实经过，她承认材料中所说秦天真"叛变自首"一事，完全是在调查人的逼迫下写出来的。但他们并不轻信犯人的口供；又从敌伪档案中，证实了秦天真那时确实不在那个女特务所说的地方，经再次提审了女犯人，后当众结了秦天真的冤案。不仅解决了秦天真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也为因秦天真的问题而被株连的干部都平了反。这一认真负责的行为，使很多干部都放了心。在这种影响下，很快一批一批地解放了大量干部，他们满怀激情又重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在不长的一个时期内，解放了98.7%的干部。

鲁郭乘胜把基层的领导班子加强起来，于是郭留在省里坚持和巩固已取得的成绩。鲁于1973年3月和张玉环(原省委干部)用三个月时间，走了遵义、铜仁、都匀、凯里、贵阳五个专区市，16个县，还深入到公社，贯彻中央(72)38号文件精神，调整了各地的领导班子，恢复了党的领导，后来有12个县委班子团结起来了，工作也搞上去了。

鲁郭到贵州工作后面临的局面，一是派性十分严重，这是人祸；二是天灾，近年雹灾、旱灾甚为严重，不少地区缺粮断炊，再加上各级虚报、浮夸，致使贵州人民深受其害。1970年全省2500万人口，商品粮只有11亿斤，只及云南当时有21亿斤之半。1972年底，贵州全省包括仓底不足三亿斤粮食，平均每人不足12斤。民以食为天，如果不迅速解决这一危机，后果不堪设想。鲁瑞林向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兴发出紧急呼救，请求他支援贵州渡过难关。周兴代表云南人民慷慨地伸出了援助之手，马上答应支援贵州六亿斤粮食。后因运输问题，以及省内小春收成已有好转，只运入贵州三亿斤。[1]

[1] 鲁瑞林《在贵州的五个春秋》目录：1. 临危受命 2.人是革命的第一财富 3.拨乱反正 4. 病中的苦痛与悲痛。(全文见《贵阳文史》2008年第3期)

(二)“十大”前后两大派的“反潮流”活动

鲁瑞林、郭超人黔主政，大刀阔斧落实干部政策，解放了相当一批贵州老干部，并让他们走上了领导岗位，有许多人接替了原先“支左”干部的领导工作。他们根本不把两派头头放在眼里，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

1973年4月15日，陈永贵受中共中央指派，从四川来到贵州推动全省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贵州省委在贵阳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大会。袁派在喷水池百货公司门外一块大墙壁上，贴出了大字报《致陈永贵同志的公开信》。大字报的主要内容：一、贵州批林整风运动没有发动群众，搞得冷冷清清的。二、贵州批林整风运动没有抓住要害，要害就是蓝、张忠实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三、蓝、张批“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批无产阶级革命派，目的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四、蓝、张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打击革命群众，制造的众多冤假错案至今许多没有平反。大字报最后要求陈永贵把这些意见带给毛主席、党中央。落名是“贵州革命群众”。当天，新华社驻贵州特派记者郭丕霄专门找到袁昌福了解情况，袁昌福就叫人抄了份《公开信》，请他转交给陈永贵。

1973年6月份，支红派在贵阳街头贴出一副对联：“兰花不如李花香，张三不如李四好”，横批“远看鲁郭”。明眼人一看便知：“兰”即蓝亦农，“张”即张荣森，“李”即李再含。

1973年8月24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隆重召开。“十大”通过了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和王洪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都非常突出地肯定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非常充分地肯定了九大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强调了“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十届一中全会上，上海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当选为党的副主席，名列周恩来之后。人们注意到，中央委员名单中有邓小平。

在“十大”反潮流精神鼓动下，贵州“支红”和“四一一”两派头头或明或暗地恢复了组织活动。除“四一一”派袁昌福等人外，支红派赵福岭(《贵州日报》记者)、张应保(贵阳师范学院教师)等也不断有大字报上街，其中林业厅汽车场石永辉公开落下自己的姓名，大字报连篇累牍上街。石永辉原来是“四一一”。原“八一八”兵团头头郁昌峰、彭先胜、张德茂也从公安厅放出来，9月22日支红派上街示威游行。省总工会12月下旬成立后，支红派还在1974年3月2日集会，要求恢复李再含时期的“八一八”、“捍三红”、“群专部”等几位一体的“工代会”。1974年3月9日，孙昌德、徐英年在《贵州日报》发表重新挑起派性的文章。李立也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说“彭先胜是造反派，是好人犯错误，彭先胜死得惨，要平反。”从4月30日起，陆续出现了一些为彭先胜翻案的大标语、大字报。贵阳市委第一书记金风也表态支持为彭先胜翻案。

在省公安局，从1974年3月份开始，已经调出去的原省公安厅“113”总队造反派一些头头又聚集起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返回省公安局“闹革命”，以康岩中为首，他们轮番地找刚刚上任不久的省公安局局长贾贯之要求“解决问题”，核心是要求调回省公安局，并日夜轮番地折腾贾贯之，从3月至5月，日夜地纠缠、围攻，使贾得不到休息，贾的身体本来就极度虚弱，经他们日夜纠缠折腾，其身体更加疲惫不堪，日进食不足一两饭，最后硬是于5月4日被逼死，终年57岁。贾贯之被迫害致死之后，造反派又不放过，想借此大做文章，掀起恶浪，嫁祸于人。经医务专家和法医检查，做出科学鉴定，系造反派迫害致死。

(三)陈贤阻止贵阳市委替彭先胜翻案

“文革”时期贵阳市的情况比较特殊。“四清”时，支黔干部来夺取了贵阳市党政财文大权，“文革”初期也是他们当权，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贵阳市造反派造反夺了权。夺了权后的造反派支持李再含，成了支红派。鲁瑞林、郭超来后，“四清”时被处理的老干部解放了，纷纷重新掌权。金风从遵义调来当贵阳市委书记，由于

历史上“四清”的原因，他同贵阳市的造反派走得很近。批林批孔的时候，贵阳市的造反派为了显示他们革命，提出要为“八一八”兵团副司令彭先胜平反；彭先胜是七冶的，七冶是央企，同贵阳市不沾边。彭先胜得癌症死了，贵阳市支红派居然要求市委追认彭先胜为烈士。市委居然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让市公安局为彭平反。陈贤去找了金风。金风当时正在开会，马上出来见陈贤。陈贤问彭先胜平反是怎么回事，金风是个敢作敢当的人，他就说：“这件事是我支持的。”陈贤说彭先胜的问题，在中央解决贵州问题时，就定了案的，怎么能翻案？如果你不改变这个态度，我们就公开辩论。金风说：“好！”他俩就约定那个星期的星期天开辩论会。星期天上午十点钟，陈贤就在市委大院和金风展开辩论，辩到最后，金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陈贤说这事还得找鲁瑞林解决，于是就请金风坐上陈贤开来的宣传车到省委。陈贤和金风一道坐在驾驶室。不料车上有人沿路就对着喇叭喊：“金风在车上！”后来这件事就成了陈贤一条罪状：把金风弄来游街。

到了南明堂省委办公大楼，他们要求见鲁瑞林，得知鲁瑞林在省军区，他们又到省军区。陈贤和金风在省军区等了两个小时。中午十二点，陈贤专门给金风弄来了开水，又专门买了几个馒头。金风北方人，当时也饿，一口气吃了三个馒头。陈贤见鲁瑞林不出来，就对金风说：“我们开车送你回市委。”金风说他不回去。陈贤他们就开车走了。

为彭先胜平反终未得逞。

(四)袁派奋力挤进“贵州省总工会”

十大以后，全国各省积极筹备召开“工代会”，重建工人造反派占主体的各省总工会。为了能在工会中占多一点名额，袁派积极活动起来。袁昌福频繁召开贵阳地区各大厂矿“四一一”头头会议，研讨对策。先在伍昆宪家、耿铁家，后来多在袁昌福家。有一次，郭平专门带着贵州橡胶总厂原来的造反派头头王宝临来到袁昌福家介绍说：王宝临造反夺权，当上了贵州橡胶总厂革委会头头，后来同

情“四一一”，“七·二九”事件期间，李再含派彭先胜带领武斗队，配合橡胶厂的“捍三红”组织，武装攻打橡胶厂革委会，打了几天几夜。王宝临指挥大家，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在武斗队的眼皮底下，硬是从水田里爬出来，脱险了。郭平希望大家能推举王宝临进入省总工会。袁派同意了。

在1973年12月下旬，王宝临作为代表，参加了省工代会，并以“四一一”方面的推荐人选，被选为第五届省总工会常委。省总工会21名常委中，“四一一”进入的有袁昌福(省新华印刷厂工会副主任)、方守廉(省运输公司)、颜亨友(贵阳化工厂)、戴宗祥(林业厅汽车场)、王宝临(贵州橡胶总厂工会副主任)。罗锡康是省总工会主任。

在省工代会召开之前，贵阳市工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贵阳市总工会成立，主任杨建昌，龙明昌等任常委，郭平(郭学余)任宣传部副部长。

省工代会之后接着召开了全省共青团代表大会，“四一一”代表陈贤当选为团省委副书记，书记是王朝文；召开了全省妇女代表大会，“四一一”代表高筑花当选为省妇联副主任。

(五)袁派和支红派不约而同争得“批林批孔”话语权

1973年8月，郭超离开贵州。9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鲁瑞林任中共贵州省委委员、常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委员、常委、主任。李葆华任中共贵州省委委员、常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委员、常委、副主任。吴向必任中共贵州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1974年1月27日至2月4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全省层层布置，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大约在3月初，袁派在贵州省总工会挂牌成立“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林批孔总司令部”。“总司令部”成立后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在三月底四月初冲击了贵州省委在省军区大礼堂召开的

全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批孔大会。袁昌福带着500多人，分乘10多部汽车，来到省军区大礼堂大会会场；不料支红派杨世才、赵福岭也带有700多人的队伍已赶先到达。双方目的都是为了争取大会发言权。经鲁瑞林同意后，双方友好协商，支红派让袁昌福最先发言，随后依次由杨世才、赵福岭和石永辉发言。

袁在发言中肯定了省委在贯彻中央(1972)38号文件以来的工作成绩，但认为省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犯了右倾错误。建议在各级批林批孔领导小组中要吸收革命造反派的优秀代表参加。会后这个发言稿在新华印刷厂铅印了几千份广为散发，题为《袁昌福同志在中共贵州省委地师级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会后第三天晚上，鲁瑞林在家中非常客气地会见了袁昌福和支槐春。在得知这两人原来都是他的兵后，鲁把他的秘书李先珍介绍给袁昌福。

那天会上，杨世才从袁昌福手中接过话筒只说了几句，贵州日报社赵福岭接着发言。他讲了儒法斗争史，随后指出了省委在批林批孔中存在的问题：一是落实干部政策，大搞“官复原职”；二是蓝、张借清查“五一六”，把一些犯过错误的革命造反派，关进监狱，直到现在，有的人还没有得到平反；三是以反资产阶级派性为名，打击广大革命群众“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遵照规定，“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林批孔总司令部”于4月11日下午宣布撤销。

过了几天，袁昌福和张甦乘坐由汽车三场陈维俊驾驶的吉普车，历时一周，到六盘水和毕节地区了解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他们先后到了盘县、水城、威宁、赫章妈姑铅锌矿和毕节，比较普遍的反应是群众很难发动，批林批孔阻力大，实际上是在走过场。

在威宁县城，他们还看到一片茫茫田野，那原本是高原湖泊草海。从前，草海岸边长满芦苇，海中碧波荡漾。尤其在秋天，黑颈鹤和野鸭群飞群落，真像唐代诗人王勃写的那样：“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县革委把草海放干，原计划种粮食，但根本长不了。因为全是淤泥，土太肥了。草海放干后引起威宁本地气候变异，很少

下雨了。邻省云南也向贵州抗议，当地山泉干涸了，老百姓没水吃了。有关草海的问题，他们建议威宁战友写一个材料送到贵阳。

在毕节，袁昌福、张甦还了解到，李再含时期结合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都是冀鲁豫体系的，他们坚决执行李再含指示镇压毕节“四二”派（即“四一一”观点）毫不手软；蓝张时期也是他们掌权；38号文件下达后还是他们掌权。吴胜祥的冤案就是他们炮制的，至今还没平反。他们建议毕节战友直接上贵阳，找省里的冀鲁豫领导干部反映毕节情况，通过内部渠道，由上而下来解决问题。

袁昌福、张甦和陈维俊此行，通过与盘县的罗国英、朱燕萍；水城的吴陈福、宫新华；威宁的岳世民、高国新和毕节的吴正鹄等战友的沟通与交流，了解了许多情况。

（六）袁派和支红派联合反鲁

1974年5月上旬，袁昌福通过调到贵阳铁路分局工作的李少华，在与贵阳铁路分局团委书记李学英有了过从之后，引起袁派内部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袁昌福提前通知核心小组成员到省总工会礼堂开会，到会成员除有张甦、陈茂昌、毛洪礼、李忠祥、刘春山、罗朝纲、姚凤梧、崔盛恩、胡颖、鄢光禄、支槐春、刘元忠等核心小组成员外，还有李学英、李少华也赫然在座。

会议开始，袁昌福说：“我正式通知大家，李学英、李少华代表铁路分局‘四一一’参加我们核心领导小组工作。原先我们留给耿铁的位子一直空着。从现在起，耿铁的位子就给李学英。以后我们内部排名，我之后就是李学英。”接着袁昌福说：“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从今天起，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鲁瑞林。这是李学英对我们的重要建议。”李学英接着说：“鲁瑞林是个什么人？他在云南挑起武斗，残酷镇压‘炮派’，人们喊他‘鲁屠夫！’‘炮派’在云南是老造反派。我们在铁路上经常接触到‘炮派’，他们一提起鲁瑞林就咬牙切齿。鲁瑞林到贵州不批林不批孔，成了当前运动的最大障碍。只有搬开这块绊脚石，贵州的批林批孔运动才可能向纵深发展。”

李学英的这番讲话，赢得了许多人纷纷发言赞成，只有张甦和陈茂昌坚决反对。因为鲁瑞林背后是广大冀鲁豫干部。张甦说：“目前贵州这几派，支红派台上有他们的代表人物李立、张明、罗锡康等等；田子明他们有张健民、陈行庚等支黔派的干部当后台；如果我们反鲁瑞林，我们就将失去冀鲁豫干部的支持。我们这派就没有干部队伍了。”双方观点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袁昌福通过大家举手表决，强调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办法，压服了张陈二人。袁昌福高兴地说：“现在批判鲁瑞林已经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我们就马上执行。”于是第二天，袁派批鲁瑞林的大字报、大标语就上了街。此后，陈茂昌就与袁派决别；张甦出于无奈，只好转变立场。后来，李学英、李少华忙于应付贵阳铁路分局内斗，根本没有参加袁派核心领导工作。

袁派反鲁瑞林的大字报、大标语上街，立即引起“支红派”的关注。没过几天，大约在六月初，“支红派”杨世才、赵福岭、张应保就捎口信给袁昌福，希望双方联合起来，共同反鲁瑞林。双方约定了会谈时间和地点，袁派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参加见面，“支红派”由杨世才带队，赵福岭、张应保、石永辉、欧玉才、曾令德、吴石川、梁玉屏、周荣富等出面，双方在头桥罗朝纲家会面，气氛显得非常融洽。通过两次会谈，双方对贵州现在的问题，看法相当一致，就是：贵州批林批孔深入不下去，根子就在鲁瑞林。鲁瑞林的问题，一是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二是执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

按照会议决定，在一个星期天中午，在市中心大十字召开了一个批林批孔大会，在大十字百货大楼前，罗朝纲开来一台平板大拖车充当会场主席台，杨世才调来贵钢的宣传车靠在旁边当会场大喇叭，两派头头都在主席台就座。大会由石永辉主持，袁昌福、杨世才、张甦、赵福岭发言，两派动员的群众，再加上星期天逛街的人，真把大十字堵得水泄不通。大会按既定程序进行。然后一批大字报上街。于是社会上都知道贵州两大派真正联合起来了。两派都把斗争矛头指向鲁瑞林。

到了七月中旬，两派头头再一次聚会，经过认真分析，大家认为，应该到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贵州批林批孔情况，促使中

央解决贵州问题。会议还确定由袁昌福、杨世才、张甦、赵福岭代表两派赴京汇报，并作了分工：由张甦、赵福岭领头整理材料；由袁昌福、杨世才向两派群众和骨干筹集赴京费用。

张、赵商量，向中央汇报材料，分主件和附件两部分：主件扼要汇报贵州情况：(1)贵州原来的两派头头，真正消除了派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了。(2)贵州现在的主要问题，一是鲁瑞林同志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相反，还压制和打击群众批林批孔的积极性。二是鲁瑞林在贵州垒山头，拉宗派，分裂干部队伍。三是蓝张时期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冤案，有许多至今没有平反。(3)要求中央撤换鲁瑞林，另派一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主持贵州工作。附件则分列事实，说明主件观点。主件由张甦执笔，附件由张、赵分别撰写。关于干部宗派问题，由红派执笔。

经过十多天紧张准备，赴京汇报的材料准备了三套，给毛主席、周总理、王洪文各一套。每份文件之后分别署上两派头头姓名。"四一一"和支红派各自筹集的经费最后都汇总交由袁昌福保管，大约有三百多元，其中包括威宁岳世民等筹集的三十多元，由高国新专程送到贵阳，还带来了上报中央的关于"草海被填平"的材料。

于是在8月初，袁、杨、张、赵一行四人便由贵阳乘车赴京，于8月中旬返回。他们把给毛主席、周总理的材料以及关于"草海被填平"等材料交给了国务院接待站；给王洪文的材料则通过罗锡康转交。罗当时在中央党校办的培训省市自治区工会主席的中央读书班学习，王洪文在直接领导这个中央读书班。离开北京后，袁昌福单独到上海市总工会取经，他作自我介绍说："我就是贵州的王洪文。"他从上海市总工会了解了许多情况和工作经验。张甦也独自到河南驻马店走访了陈一谘，听陈一谘介绍了当年春节陈在北京胡耀邦家中与王震和胡耀邦两位高层老同志不期而遇的情形，了解到当时的在京老同志们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彼此串联交往频繁，过从甚密。普遍的反应是他们对造反派崩大富等很反感。

1974年11月7日，鲁瑞林、李葆华、吴向必、贾庭三(随后还有何光宇、石新安)到北京向中央汇报贵州工作。中央对贵州工作提出12条意见，其中指出：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69)71号文件和(72)38号文件都是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不准为李再含和蓝张翻案。

1974年12月25日，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翻印下发《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贵州问题的谈话要点》，对鲁郭的工作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使得省委领导在对待"文革"的问题上，不至于同毛主席离得太远。

鲁瑞林因患癌症于1975年4月19日入住北京301医院后，由第二书记李葆华主持省委工作。

(七)从全面整顿到批邓反右

在"反潮流"重新掀起的派性影响下，京沪、陇海两大干线交汇的徐州以及长沙、贵阳等全国多地铁路枢纽堵塞。1975年3月中央下达9号文件整顿铁路，从徐州开始。万里上任后对徐州铁路枢纽进行疏通，造反派头头顾炳华被捕，大大消除派性，铁路很快四通八达。

贵阳铁路分局团委书记李学英掀动和制造了中断铁路运输两三个月和停尸贵阳市大十字26天的重大事件。徐州经验推动贵州的铁路整顿，铁路运输得以恢复正常。李学英成功脱逃避难十多年，直到被人们淡忘之年才公开露面。

1975这一年是全面整顿之年。贵阳地区"四一一"派在这一年里偃旗息鼓，没有任何活动(包括"地下串联")；也没听说支红派有任何响动。但却有人向贵州省委揭发，说"1975年3月份，贵阳地区两派骨干一两百人在紫林庵黑大楼召开了一个反动黑会。会议由袁昌福、杨世才主持，赵福岭、张甦发言；赵福岭恶毒攻击周总理，张甦发言批判中央9号文件"。中共贵州省委将这次会议定为"三月黑会"。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消息传来，贵州人民大众沉浸在震惊和悲哀之中，各地各单位干部群众不顾"四人帮""不准戴黑纱、白花，不准送花圈开追悼会"的禁令，自发地臂戴黑纱，胸前挂着白花，进行各种形式的追悼活动，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敬仰和哀思，同时也是对"四人帮"的蔑视和痛恨。

1976年3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判。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

资派还在走。"社论诬陷邓小平是"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从此开始在内部点名批判邓小平。

3月10日凌晨，贵阳市中心的紫林庵街道上，出现一份鼓呼现代化的大字报，标题为《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给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信》，反映了贵州广大群众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持消极抵制态度。

（八）"批邓反右"与"三月黑会"

"三月黑会"子虚乌有。根据罗锡康提供的情况，袁昌福基本摸清了编造者是原铁二局在黔单位（后改为铁五局）十一处一个"四——"观点的头头，外号叫"毛老八"。他们单位在贯彻中央9号文件时，把他作为批判对象。在批判派性的强大压力之下，他便胡编乱造了一个"三月反动黑会"。于是铁二局将"毛老八"的揭发材料上报贵州省委，省委领导极为重视，立即将材料上报中央。邓小平批示："坚决查清，严肃处理。"于是省委成立了专案组，由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冀峰任专案组长，进行清查。

袁昌福一行十多人专程去省委找到专案组组长李冀峰。李冀峰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他们时说了一番话，然后说："我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现在头疼得很。"说着他就从衣袋里掏出了几小包药，倒了开水吞服。袁昌福就说："李部长既然有病，就好好养病，等病好了，我们再谈。"袁昌福一行就离开了。事后了解，李冀峰身体很好，没有他说的那些病；再找他，他下乡了，在贵阳找不到。

1976年3月27、28日晚上，张甦参加袁昌福召开的会议，他提出批邓反右要以解决"三月黑会"问题为突破口，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要求办一个报经中央批准的学习班，也要让揭发人参加，情况弄清后要求省委平反。大家一致赞同这个意见。会上确定趁省委领导要到省总工会常委会议上听取意见的机会，去找省委领导，要求解决"三月黑会"问题。

3月29日上午9时左右，当省委第二书记李葆华、省委副书记李立、罗锡康、张荣森、省委常委李庭桂、付爱农、陈行庚、张明等八

位同志来到省总工会听取意见时，张甦带领数十人赶进会场，经省委领导同意，他们在会上发言要求省委举办专项学习班，解决"三月黑会"问题。省委领导听后一一表态，个个发言都很好，有的发言还赢得了群众的鼓掌，会场气氛达到高潮。最后，李葆华同志表态：省委将开会研究大家要求"办学习班"的问题，到时会把结果告诉大家。

此后，袁派骨干抓紧了对省委领导的工作，强烈要求省委领导尽快举办"查清'三月黑会'学习班"。大致在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省革委常委在花溪招待所开会，被支红派围了起来。袁昌福得知这个消息，便带领核心小组成员和骨干三十多人坐上罗朝纲开来的车子，火速赶到花溪招待所，这时支红派的人已陆续散去，他们只见到省委李葆华、张荣森、张玉环三位领导。袁昌福他们围着李葆华，追问举办"三月黑会"学习班的事情。李书记说省委已经向中央报告了，现正等待中央批复。

尽管袁昌福他们后来又多次催促省委举办"查清'三月黑会'学习班"，但李葆华书记都以等待中央批复作答。他们也无可奈何。

4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后的一天，张甦等人在省委办公大楼，正碰上省公安厅康岩中、高蟾光等人挟持朱迪厅长到省委开会解决问题；会议开完后，康岩中热情邀请张甦同坐公安厅汽车回家。车子开到张甦家门口，张甦下车时对朱厅长说："朱厅长，如果邓小平资本主义复辟成功，你要抓我，我就住这儿。"朱厅长无话。

（九）帮助张荣森"转弯子"

在4月中旬的那天晚上，袁昌福他们在花溪招待所同张荣森的交锋最为激烈。当时大家围住他，请他讲一讲对"批邓、反右"的认识。作为四野王牌部队的43军军长张荣森，尽管追随林彪路线犯了严重错误，在党内生活中接受了批评教育，但从来没有经历过，也可能极为反感群众运动的斗争场合，所以对造反派的问话就爱理不理。他披着军大衣，坐在沙发上一句话也不说。他的秘书，姓牛，长得非常敦实，中等个，黑黑的，同大家周旋着。袁昌福一看就

火了："到现在你对群众运动还是这种态度！非得好好帮你转弯子不可！"袁马上吩咐支槐春、罗朝纲："由你们两位负责，把张荣森同志请到省总工会，让工人同志帮助帮助他！"张荣森坚决不动身。大家怕违反政策，因为他身穿解放军军服，不敢拉着走。袁昌福下令："连人带沙发，一块儿抬走！"于是支槐春、罗朝纲就叫了六七个工人来，把沙发连同沙发上坐着的张荣森抬起就走，牛秘书来阻拦也阻拦不了。袁昌福追过去对支、罗交待："要绝对保证张荣森的安全！如果他从汽车上摔下来摔死了，你我都要掉脑袋。"

他们将张荣森抬到外面，又连人带沙发将张抬上罗朝纲开来的"卡斯六九"汽车，罗朝纲拿了一捆绳子，对他说："张书记，你委屈一下，为了你的安全，我们不得不把你捆在沙发上，我们怕你跳车。"于是他们七手八脚把张荣森扎扎实实捆在沙发上。车子发动了，支槐春带着七八个工人守在张荣森旁边，一直护送着张荣森到达了省总工会大楼。然后把张荣森连同所坐沙发抬上省总工会大楼的三楼，找了间房子，放下沙发，解开绳子，另找了把椅子，请张荣森坐下。然后大家又把沙发抬上汽车，由罗朝纲一人开回了花溪，交还给花溪招待所。这时候已是凌晨三点来钟。

他们余下的人坐上罗朝纲的汽车返回贵阳。当天上午袁昌福亲自带了一筐鸡蛋来到省总工会，问张荣森情况怎么样，支槐春回答说："我们找了个大沙发，抬到张荣森房间，让他在沙发上休息，他穿得有军棉大衣，冻不着。我们守在门口，轮流值班。"袁昌福交待支："这筐鸡蛋是我专门从我妈那儿拿来的，每一天给张荣森煮七个鸡蛋吃。"袁又说："你要组织人好好帮助张荣森转弯子。"当天下午，省委派人找到袁昌福说："省委将你们绑走张荣森报告了中央，中央回复说：'决不能伤害他。'"袁昌福回答说："我们每天给张荣森煮七个鸡蛋吃。只要他端正了对待群众的态度，转了弯子，立即送他回省委。"袁昌福马上将中央意见传达给支、罗二人，他二人回答说："我们对张荣森好得很！"袁走后，支、罗二人找到张荣森，把中央意见转告了张，希望他端正对群众的态度。可能张荣森受到了感动，在随后由支槐春、罗朝纲主持的工人群众大会上发表声明讲了话，态度很好。

支槐春2013年5月6日回忆说：张荣森态度很好，他在讲话时说，他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队，对不起毛主席、党中央，表示坚决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永远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当时总工会里到处都是来看的人，连过道都挤满了人。他讲完话后，工人们还鼓掌呢。后来支、罗二人向袁昌福作了汇报，袁说："既然张荣森转变了态度，就送他回家休息。"于是罗朝纲开车，支槐春带人护送，车子从省总工会出发，经大十字转南明堂，把张荣森送回了他的住所。

1976年5月13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充分发动群众深入批邓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通知》，要求迅速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

1976年8月18日上午10时，两派在省政府大礼堂召开了"批邓、反右"斗争大会。会议由杨世才、张甦主持，会上宣布了两派头头参加的主席团名单。其中，罗朝纲在"四一一"里排列第三位。张惠泉排在鄢光禄之后。游行总指挥，"四一一"和支红派各一名；"四一一"派由罗朝纲担任。张惠泉担任广播宣传工作，因为他会说一口非常标准又悦耳动听的普通话。会后，贵钢宣传车开道，20多部汽车载着与会成员，由省政府大院出发，途经六广门、喷水池、大十字、邮电大楼、新路口，再到省总工会，一路高喊口号，转了一大圈。这是两派骨干在1976年里最后一次"联合行动"。

（十）粉碎"四人帮"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群众聚集北京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邓小平被指控为"天安门事件"的"幕后黑手"，第三次被打倒。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元帅逝世。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贵州铜仁地区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参观团在参观大寨后，去河北省遵化县参观途中，在唐山市遭遇强烈地震，铜仁地委副书记张仁龙等243人遇难，16人幸存。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

席毛泽东，因病在北京逝世。18日，省委和贵阳市委在贵阳春雷广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贵阳地区各族各界群众40万人参加。同日，全省各地也都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

10月16日-17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并进行学习讨论。会议一致拥护中共中央10月6日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采取的英明果断措施，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

约在1976年10月25日，中共贵州省委在贵阳市“春雷”广场召开了贵阳地区数十万群众参加的盛大集会，“热烈庆祝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会场上旗帜招展，口号声此起彼落，犹如咆哮的海洋。会后，人们按系统、按单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本章参考资料

1.闫志峰《党史纵横》

2.群众出版社《春风化雨集(上)》(1981)第52页

3.鲁瑞林《在贵州的五个春秋》(《贵阳文史》2008年第3期)

4.贵州人民出版社《当代贵州大事记》

5.《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五章

6.张翅《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7.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左起：林和芳 袁昌福 邹应臣 耿 铁 印木刚

“四一一”部分成员1975年春节合影

第二十五章　贵阳街头鼓呼现代化的《七人大字报》

1976年3月10日凌晨，贵阳市中心的紫林庵街道上，出现一份鼓呼现代化的大字报[附录26]。这份大字报长达80余页，贴满了紫林庵街道旁的那堵围墙，标题为《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给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信》。大字报的末尾标明了作者的姓名和单位。他们[1]是：

贵阳制药厂	李洪刚
贵州无线电厂	叶忠源
贵阳永恒精密电表厂	黄维鸣
贵阳制药厂	郭成望
贵阳制药厂	王大卫
贵阳制药厂	陈明云
贵阳黔灵印刷厂	卢　炎

（一）《七人大字报》的内容

这份长达3万余字的大字报，包括序言和结束语，共分8个部分。它从理论到实践，集中阐述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中国到了非实现现代化不可的时候了。

《序言》中写道："调整我们的战略重心，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方面来，使我国经济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这

乃是我国在目前时期的首要问题和中心任务。"

《结束语》中写道："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最根本的利益，只能而且必然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现在，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文化的现代化——历史已经把这一个伟大的任务再度提到了一切问题的首位。"

大字报的作者相信："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正在开始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人民盼望已久的现代化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里建立起来，几千年来未被抛弃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将和锄头一起放到历史博物馆里去，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将在这个历史时期变成全体人民的幸福乐园。"

大字报的结构包含以下三个层次的思考，同时也就建立在三个重要前提之上。

其一，理论思考。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指出，"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之间，是有着重大差别的。"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说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由小生产占优势的尚处于发展之中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无论各个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会有怎样的区别，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身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只能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化生产和更强大的社会生产力"。

其二，历史思考。第二部分《我国历史的发展特点》中写道，"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有着重大区别的中国专制封建主义，统治中国达2100余年之久"，这个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中国农民的小生产经济"；而自1840年以来的"旧中国"，也仍"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因此，在中国的历史遗产中，"最严重的问题不仅在于使小生产者摆脱中国的传统观念，而且还主要在于手工业经济过渡到现代化的大农业经济和大工业经济"。

其三，政策思考。在回顾了1949年以来的党的路线变化之后，第五部分《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指出，"我国在过去的20多

年中，不能不把主要精力和战略重心放在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方面。因而，我国在这段时间内，并没有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我国现在还是一个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能否"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却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命运的决定性关键"。

这些论述无论是否充分，现在读来似乎有些乏味。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它的确像是"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事实上，直到大字报问世时，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会被提上议事日程。"我国能否在下一次战争来临之前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呢？"大字报作者显然在字里行间这样表示了极大的不安和忧虑。但大字报的基调始终是乐观的。它相信并预言："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期不可避免地必然到来！"

(二)张春桥给《七人大字报》贴修正主义标签

《七人大字报》的作者们曾担心，紫林庵的大字报可能很快会被撕毁。为不致湮没无闻，他们除了在贵阳市的另一中心地带——大十字，贴出大字报的序言部分外，还刻印了300多份油印稿。大字报贴出的同时，这些油印稿分别寄给毛主席、党中央，以及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全国大部分省、市委，有关报刊和重点大学。每人还凑路费30元，委派陈明云、卢炎到郑州、武汉、长沙等地张贴。大字报的作者们十分清楚，他们所做的一切，将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理应作好遭遇最坏境遇的各种准备。

但没料到，紫林庵的大字报居然存活了28天。更没料到，大字报一问世，就受到了贵阳人的强烈关注，引起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响。沉默已久的人们，纷纷走上街头，紫林庵很快成了贵阳市乃至贵州省的议论中心。成千上万的人们阅读、议论、摘录、传抄。不计其数的支持标语、批语、大小字报，布满大字报前；数以百计的支持信件、电报，来自全省、全国各地。很短的时间内，大字报就传遍全

市，轰动全省。

中共贵阳市委批林批孔办公室对这张大字报采取了包容的态度，没有覆盖撕毁，并派出工作人员数人分工全文抄录上报和存档。但张春桥在看了《学习与批判》摘报的大字报内容后，写下了"看来修正主义已后继有人"的批语。于是，在4月6日，北京"四五"事件之后的第二天，贵阳街头的《七人大字报》被覆盖、被撕毁。5月25日，中共贵州省委迫于当时的形势，将大字报定性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折中主义诡辩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大字报"，要7人所在单位进行批判和对有关人员进行调查。然而，大字报和它引起的震动，无疑是贵阳人在"文革"后期作出的一次勇敢举动。正如两年之后的1978年6月26日，中共贵州省委在给《七人大字报》恢复名誉时所指出的，它在当时"集中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胡作非为的严重不满，集中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大抓快抓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强烈愿望"。

(三)关于《七人大字报》的作者

《七人大字报》因7人署名而得名。这7人中，年龄最大的李洪刚30岁，最小的陈明云25岁，当时都是普通的青年工人。他们来自社会底层，并曾有过一段或多或少坎坷的生活经历。这7人本不相识。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差不多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又都属于被称为"老三届"的那一代人。郭成望、王大卫，算得上是早期知青。贵阳也与一些省会城市一样，早在"文革"之前，就有青年学生响应号召上山下乡。1964、1965两年，全市先后两批共800余名高初中毕业生，离开城市到了农村。郭、王即属第二批，初中毕业后，于1965年8月被安置到贵阳郊区的孟关公社插队落户，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农民"。

也许是巧合，1969年8月前后，这7人同时进厂当了工人。其中3人各在一个工厂，另外4人则在同一工厂同车间——贵阳制药厂驱蛔灵车间。更巧的是，这4人中的李洪刚、郭成望，不但在同一宿舍住了两年，还有过多次工种变动：披上白大褂当了制药工，

穿着“再生布”成为锅炉工。在制药这个原本不算笨重的行业中，锅炉工说得上是地道的产业工人。更何况，那是全靠手工操作的立式锅炉，每班两人8个小时的拼命干活，也满足不了整个车间的一半生产需要。体验过农业的落后、如今又体验了工业的落后，自然也有理由不止一次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丢掉这样的锅炉呢？工作之余，便是读书、当然也经常在一起交谈对形势的看法。中国如此落后、何以总是“抓革命”而不是“促生产”，即是经常议论的话题。不能不说，来自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使得他们对于中国的落后、有着相当痛彻的感受；对于中国的发展，又有着相当热切的期望。其实，社会底层的人们、都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和期望。尤其是在1975年初的四届人大召开之后，这些感受和期望，还很自然地表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要求，而且越是漠视和压制这种要求、希望表达的情绪就越是强烈。

1975年年末、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中国再次面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国人民再次感到失望的同时终于积酝了怨恨。也就在这时，由李洪刚牵头，开始酝酿联名写一份大字报表达自己的看法。7人出身低微，也没有任何“后台”支持，只阐明实现现代化的观点而不提反对谁，就成为明智的选择。执笔起草的任务，则由此时已调入贵阳制药厂子弟小学当教师的郭成望承担。1976年1月，在北京人自发地“十里长街送总理”时，《七人大字报》已有了初稿。当时7人不曾料到，一场全国范围的群众自发参加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正在酝酿、正在兴起。更不曾料到，贵阳如此远离北京又如此靠近北京，大字报一贴出，就不再是孤立事件，而已不可避免地汇入了以北京“四五”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其实，无论全国各地的零星抗议，还是祖国首都的“四五”事件，都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当时的7人，不过是有幸却无意识地参与其事罢了。

（四）《七人大字报》获公开平反，王震接见作者

1978年，对于“文革”中乃至“文革”前遭整的人来说，是获得平反昭雪的重要一年。在贵阳，自5月底开始，中共贵州省委派出省委调查组，对“七人大字报事件”进行了调查。随即，继6月26日在揭批“四人帮”大会上为大字报恢复名誉之后，8月18日，中共贵州省委又在贵阳市召开6万余人的揭批“四人帮”大会，正式地、公开地为《七人大字报》及其作者平反。与此同时，7人中有3人被调离原工厂，重新安排了工作。郭成望调入省委办公厅，李洪刚到团省委，黄维鸣到贵州日报社。

1978年9月24日，在贵州视察工作的王震副总理接见了大字报的作者们。这是对《七人大字报》的再次肯定，同时也为“七人大字报事件”划了句号。

而对中国来说，1978年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这一年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地、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正式地、明确地决定“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及时“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全局性的历史性的根本转变。毫无疑问，中国当代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化，不但启动艰难，起步迟缓，而且时断时续，步履蹒跚。如今，好几代人的梦想终于有可能成为现实，人们终于有可能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更重要的或许是，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中国的现代化被赋予了日益广博而深刻的内容，而不再是以往那种主要甚至仅仅关注生产力的“四个现代化”了。

---

[1]《七人大字报》的7人，李洪刚任过贵州省城调队队长（副厅级）；叶忠源任过贵州省检察院技术处处长；黄维鸣曾从贵州日报停薪留职；郭成望提前退休之前任贵州省工商局办公室主任；王大卫曾任贵阳市史志办副主任；陈明云曾任贵州省老干部局办公室主任；卢炎曾任贵阳家用电器厂厂长。

本章参考资料

1.郭成望《现代化：关于<七人大字报>的回忆》《当代贵州》1999年第3期
2.金春明《四五运动述评》(《党史研究》1984年第5期)
3.《贵州日报》1978年6月27日
4.《贵州日报》1978年8月19日

第二十六章 对帮派活动的揭批查

(一)袁派吊唁毛主席的活动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亲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去世了！9月11日，袁派在鄢光禄家外面布置了一个简易而又庄严、肃穆的灵堂，正面墙上挂了镶有黑边的毛主席像，两边贴上了白纸黑字的条幅："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次日，袁派的核心成员几乎都在。一位60多岁的造反派女战士、街道委员宋安芬，在不停地抹着眼泪。大家戴上黑纱，胸前别上小白花，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10点钟，袁昌福带着大家举行了庄严的吊唁仪式：大家整齐地排列在毛主席遗像前，袁昌福站在最前面，喊着："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又喊着："默哀三分钟！"之后，凡到鄢光禄家来的四派成员，都要先向毛主席遗像鞠躬，默哀。

张甦参加了这次悼念活动。后来他被抓进省公安厅看守所，办案领导要他交待这次吊唁活动。他将举办悼念活动的经过和场景写成材料交了上去。这位领导对此并没说任何一句不满的话。

参加完9月18日在春雷广场全市几十万群众追悼毛主席的大会之后，罗朝纲、支怀春他俩还要代表大家自费去北京瞻仰毛主席的遗容，吊唁毛主席。他俩便坐火车上北京了。

大约过了八九天，罗朝纲只身回到了贵阳，他说支槐春在河南下车了，他要趁便回老家看看。罗讲了赴京经过。他说，一到北京，他俩便被送到专门的群众接待站。当时全国各地来京悼念毛主席的人太多。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接待站的解放军就地专门组

织大家参加了隆重的吊唁活动。在默哀、讲话之后,支槐春用了最大的力气高呼口号,大家都和着一块呼喊起来!罗说,集会结束后,周围的人都围着问他是哪里人,他们说是贵州"四一一"造反派!是代表贵州造反派来悼念毛主席的。罗朝纲说:"我们向接待站的解放军说了,我们还要到清华大学参观访问。他们同意了,我们又赶到了清华大学。"

因为罗朝纲在讲他俩出了贵州之后,半道上来了几个解放军,在车厢里公然骂江青,张甦便插嘴问罗:"解放军战士敢公然骂江青,这是兵变的信号!你们去清华大学向8341部队反映没有?"罗说:"我们专门找了8341部队军宣队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也认为是军队不稳的表现。"张甦问:"他们怎么说?"罗答:"他们很重视,还作了记录。问我们'你知不知道他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们说当时没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清华军宣队还说解放军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要我们放心。"罗又说:"全国各地造反派到北京,到清华大学的不少,都非常担心毛主席去世了,'批邓、反右'运动还搞不搞得下去。8341部队军宣队的同志说'毛主席去世了,但江青、王洪文等同志还在嘛,要相信党中央嘛'。"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情况非常不明,应当停止一切活动。于是大家都回到各单位去了。袁派也没同红派联系,大家在忐忑不安中细数着日子,一天天挨着……

(二)所谓"反革命应变会"

大约在1976年10月9日之后,大量的"小道消息"在贵阳地区群众、干部之间快速传播着,都是讲"北京出事"了。大约在10月12日左右,在鄢光禄家,袁昌福、张甦、罗朝纲、姚风梧、支槐春、鄢光禄、刘春山、崔盛恩等在座。袁昌福便说:"既然大家都来了,就先把听到的消息说一下吧。"于是姚风梧、罗朝纲便先讲了美国之音、英国BBC等外台广播的消息,归纳起来有:

(1)北京发生了"政变!"

(2)这场"政变"是由邓小平在幕后策划和指挥的!

(3)"政变"中华国锋被挟持,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全被抓起来了。

(4)过一段时间,邓小平就会重新上台掌权。

刘春山说:"外台一般说来还比较实事求是,不造谣。"大家都认为外台播放的这些消息是真实的。张甦便说了起来:"看来非常清楚了,这是一场反革命政变!矛头是对着毛主席,对着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全被抓了!"在全部与会者中,只有张甦一个人讲了"这是一场反革命政变",其他人都没说。张甦又接着说:"看来对造反派将有一场血腥的反革命大屠杀!"

到这时,会场气氛变得非常沉重。袁昌福突然发问:"我们要不要上山打游击?"张甦马上接话:"上山打游击?你打谁?谁是我们的敌人?文化大革命,人的观点变来变去,变过来是自己人,变过去就是敌人。你分得清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再说,有几个人愿意上山打游击!"张甦问:"就说老鄢,他拖儿带女,家中儿女就有六七个,眼睛又是半瞎的,你问问他,他会上山打游击吗?"鄢光禄说:"我不会。"张甦这么一说,都没有任何人表态说他愿意上山打游击。

袁昌福起身把张甦拉到鄢光禄家中小门边上(是屋中屋),小声对张甦说:"张甦,说实在话,我也不想上山打游击。我只是这么说说,看大家有什么反应!"然后他俩又回到座位上,袁昌福说:"看来大家都不同意上山打游击。大家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张甦就说了:"今天是最后一次会议。今后不能再开了。大家各自回去想想,用什么办法来保护自己。"

张甦被抓后,专案组非常重视这一次所谓"反革命应变会"(性质和称呼也是他们定下的),分别追查两次,中间隔了近两个月。

后来省公安厅专案组对张甦说:"你们的一切行动我们都掌握得清清楚楚。你们派王世伟去发电报。电报底稿我们都拿到手了。上面有王世伟的亲笔签名。王世伟也坦白交待了。"王世伟是袁昌福的通讯员。

支红派也召开了相同内容与形式的所谓"反革命应变会"。

张甦在2013年4月26日去找张应保核实情况时了解到:1976年10月8日晚上,杨德政、张应保等人正在清镇有机化工厂

内整理一批准备上报党中央的材料，康岩中突然来到，对大家说："外电传来消息，北京出事了！"于是他把外台广播的消息，即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抓起来了，告诉了在场的人，大家全给惊住了。康岩中说："我们要上山打游击！"在场的人议论纷纷，随声附和。张应保沉思良久，说："大家想想，会不会又出现林彪那样的情况呢？当年林彪都上了党章，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结果后来发现他是反对毛主席的最凶恶的敌人。到底情况怎么样，还得看看中央的正式通知。"大家一听，也觉得有道理。于是会议就转了方向：也有人认为有这个可能，就是江青等人反对毛主席，被揭发出来了，党中央就把他们抓了。康岩中说，要做好两手准备：如果江青等人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支持党中央；如果有人借此反对毛主席，我们要和他斗争到底！

当晚他们连材料也无心准备了，连夜赶回贵阳。张应保趁着夜色去找徐英年，一敲开门，徐英年根本就不让他进家，说"这个时候了，你还乱跑什么？"就把张应保撵走了。

那么，田子明、陈贤他们是否也做了"应变准备"呢？由于1976年10月陈贤带团省委工作人员下乡，到10月下旬才回到贵阳参加学习中央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文件精神。过后，陈贤曾到某夫妻家闲聊，谈了他的看法。在揭批查中，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分别隔离的这夫妻俩揭发了陈贤的"恶毒攻击"言论，有两条：一条是说这是"宫廷政变"，第二条是说"华国锋不过是个过渡式人物。"而这对夫妻是田派的得力骨干。陈当时认为他俩非常可靠，所以才谈了自己的看法。省清查领导小组一得到这对夫妻的揭发材料，就于1977年6月间，立即将陈贤抓进了省看守所。经验老到的省公安厅干部用尽浑身解数，也没有找到其他旁证。所以便在1978年3月4日《逮捕、拘留条例》下达实施之日，不得不释放陈贤了。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通知》下达，并陆续传达到党内外。《通知》列举了王、张、江、姚反党篡权的罪行和毛主席1974年2月以来对他们的批判。同时传达的还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在分批召见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时的讲话。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传达、学习之后，袁昌福和张甦都认为，当

初只不过是"虚惊一场"而已。因为他听到的中央精神和那天晚上开会讲述的"外台消息"出入非常之大。张甦和袁昌福等人都没把自己和"四人帮"自觉地绑在一起，更没想到自己是"四人帮"帮派体系中的骨干成员，而是认为自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跟着毛主席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战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都没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三）两派核心骨干全部落网

从1976年10月22日到11月25日的一个多月里，袁派的核心成员都在单位上班，或参加批判"四人帮"的学习。11月25日晚上8点来钟，康岩中身穿绿色军大衣，敲开张甦家门，压低声音对他说："你赶快通知袁昌福，省委已经定了，'四——'派先抓你俩！赶快躲一躲！"张甦同袁昌福一道在市内躲了两天。第三天傍晚，袁昌福和贵州工学院顾健一道离开了贵阳；张甦仍躲在贵阳熟人家里，11月30日傍晚，冲进两名省公安厅干部将他抓进了看守所。当晚，时任省公安厅厅长朱迪，陪着省领导吴实来审讯他。朱厅长讲："你不是叫我来抓你吗？今天就把你抓进来了！你赶快把你同江青、'四人帮'秘密联络的情况交待出来，争取坦白从宽！"大约在1976年12月4日，袁昌福和顾健二人刚到昆明也被抓回贵阳。顾健是贵州工学院六一级机械专业学生，"文革"中参加"四——"反李再含，毕业后分配到贵阳帆布厂，未再卷入政治活动。因协助袁昌福逃跑，被抓进省看守所。公安人员一进顾健家，看他家中摆设豪华。后来顾健果因经济问题判刑五年，老婆离婚，儿子判给老婆。至于袁、张两人的家庭当时所经受的惊吓、痛苦，以至于后续的苦难，那更不用说了。袁昌福被判15年徒刑，妻子离异，女儿两岁，由袁昌福年迈的父母抚养，直至袁昌福出狱，父女始得相见。此时女儿已近15岁了。

在抓捕袁昌福、张甦前后，支红派的杨世才、赵福岭先落网。不久，潜逃至贵定山区的康岩中持枪拒捕，被围山的公安干警、民兵击伤下身而抓获；经省领导下令全力抢救，才保住性命。接着，支红核心成员张应保、曾令德、吴石川、梁玉屏以及四派的石永辉、崔盛

恩也抓进省看守所。省水泥厂的毛洪礼、李忠祥，汽车三场的罗朝纲也都关在贵阳市看守所。

在1976年12月上旬，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冲杀在第一线的贵阳地区两派核心人物全部落网。

（四）对帮派骨干的揭批查

在中共贵州省委领导下，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及其在贵州省的帮派同伙的人民战争，全面打响了！

这场人民战争，历时两年半，经过了三大战役：

第一战役，是贯彻中央（1976）24号文件（即中共中央转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之一》的通知），即如1977年11月27日新华社转发的《人民日报》社论所说：“我们要抓住‘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抓住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这个基本特点，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中共贵州省委在李葆华书记主持下，首先隔离审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罗锡康，勒令其检查交待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接着下令抓捕袁昌福、杨世才等两派骨干。

为了掀起第一战役的高潮，中共贵州省委于1976年12月6日在春雷广场召开十万军民参加的集会。集会由中共贵阳市委第一书记金凤主持，省委第二书记李葆华讲话。李在讲话中说：“今年三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我省一些人紧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有领导、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妄图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篡夺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权。他们派人同‘四人帮’秘密联络点直接联系，‘四人帮’也派出黑干将到贵州进行阴谋活动。他们这些人，有的是现行反革命，有的是坏人，都是‘四人帮’的黑爪牙。对‘四人帮’及其黑爪牙在我省的种种阴谋活动，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出来，一件件地查清。”

直到1976年12月14日，省委才对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及其在贵州的黑爪牙作出部署，相关领导机构才成立了“清查办公室”。对于省委主要负责人那种右倾、保守的做法和态度，贵州许多工作干部表现极大不满，纷纷向省委提出了批评，并向中央反映。

于是，中共中央在1977年2月28日任命原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力同志为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主持贵州工作。3月9日《贵州日报》称“马力同志来自华主席身边”，是带着华主席对贵州工作的重要指示来的。

1977年2月28日、3月1日，在六广门体育场由省委书记吴向必主持，连续两天召开了以工建交系统为主的“批判‘四人帮’在我省的两个黑干将，妄图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大会”，省委第二书记李葆华讲话，号召全省人民将揭发、批判‘四人帮’滔天罪行的斗争推向高潮。这次大会点出了罗锡康、田子明的名字，并称“经华主席批准，省委已对这两个黑干将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支持田子明的老干部杨辛克也被押进会场接受批判。

不久，李葆华同志调离贵州。马力同志主持贵州工作以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动贵州省揭、批、查运动迅猛发展。由于省工建交系统是“四人帮”在贵州的黑干将干扰、破坏的重灾区，经过前段摸、排之后，在省冶金局举办了工建交系统有两三百人参加的“揭批查学习班”。专案组负责人号召学习班人员“竹筒倒豆子”，人人过关，说清楚自己的问题。

于是，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贯彻中发[1977]10号文件，“揭露王、张、江、姚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的第二战役打响了。（1977年3月21日贵州省委发出专门通知）

工建交系统的学习班，经过“竹筒倒豆子”的揭发、检举、清查之后，“四一一”和支红派核心成员和骨干，全部查清，无一漏网；清查领导小组就将这些人员隔离在相宝山招待所，让他们进一步交待、揭发。袁派核心罗朝纲、姚凤梧、支槐春，田派骨干王长宽、莫伏麟、老干部杨辛克就隔离在此。当时气氛异常紧张，大门有警卫战士持枪站岗。被审查的人一人一个单间；每个人都有两个专门人员搞专案；每个人由两个武警战士、两个民兵看守。

据三十六年后当年隔离在相宝山的人回忆，对于个别负隅顽抗、拒不交待罪行的人，也是毫不心慈手软的。比如参加学习班的贵钢造反派头头张大华(省总工会常委)，就在会场上被揪出来，专案组人员用水浸泡的细棕绳将他“苏秦背剑”，一支手从肩上往后背下压，一支手从后背往上拽，合绑在背后，两个手臂也被细棕绳缠绕着。办案人员大声问：“交不交待？”张不哼声。“你不交待？”专案人员一边问，一边用水往背上、手臂上浇，水把棕绳淋湿了，两三分钟后，大家见张大华的脸部、额头慢慢变红，越来越红，最后变成紫色，他两眼一瞪，咚的一声倒在地上。办案人员才给他松绑。

当时省财办政工组组长李仁受不了，就割断颈动脉，自杀身亡。《贵州日报》副总编吴某跳楼自杀未遂，摔断双腿。

对于那些拒不交待的人，专案组领导就果断宣布升级，戴上手铐，关进监狱！

于是在重压之下，有的人就胡乱招供。也就出现了所谓成立暗杀队、企图炸毁铁路、桥梁，企图抢夺枪支、弹药，举行反革命暴动的检举揭发。

其他系统也差不多，张惠泉先在贵阳一中被揭发出来，然后送到市教育系统隔离所在地河滨饭店，揭发、交待搞了一个多月，后被送到遵义路服务大楼，由贵阳市公安局领导进一步揭、批、查，又待了两个来月。

总之，声势浩大的第一、二战役取得了丰硕的战果。就如马力同志1977年11月22日代表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在贵州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工作报告所说的：(1)“混入省革委、窃踞省革委副主任职务的罗锡康、张明、田子明、孙昌德，是‘四人帮’在我省的黑干将，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对他们进行了隔离审查，并将他们的罪行材料印发全省进行批判。据揭发检举，这四个人在历史上都有严重问题。他们的资产阶级帮派同伙，有的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有的是流氓、阿飞、坏分子。这些人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对他们的问题，各级党委正在进一步查证核实，然后根据本人的罪行和认罪态度，按照党的政

策，分别作出处理。”(2)“目前，大体查清了‘四人帮’插手我省大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些主要问题，基本上查清、摧毁了‘四人帮’和在我省的黑干将拼凑的那一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揭露和粉碎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进行反革命暴乱的罪恶阴谋，夺回了被‘四人帮’在我省的黑干将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他们严密控制和严重破坏的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问题已经和正在得到解决，被他们搞乱了的阶级阵线已基本分清，他们包庇、纵容和支持的一小撮新生反革命分子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受到坚决打击。”

1977年10月5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说“揭批‘四人帮’已经打过两个战役，现在要乘胜前进，打好第三个战役。我们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在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和反革命罪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

中共贵州省委立即跟进，作了细致、周到的全面部署。1977年10月23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传达宣讲中央中发[1977]37号文件的通知》和附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主要是集中揭露“四人帮”反对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罪恶活动。要求各级党委要抓好传达和宣讲工作，掀起揭批“四人帮”的新高潮，认真打好第三个战役。为此。在1977年12月16日下午，省委和贵阳市委召开了15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中心会场设在省委礼堂，由贵阳市委第一书记徐健生主持，马力同志对打好揭批‘四人帮’第三个战役提出了具体要求。他强调说：“搞好清查工作，是关系到党和革命队伍的纯洁，关系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胜利成果的巩固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必须抓紧抓好，一抓到底，决不能松懈。要有除恶务尽的决心，拿出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那样一种革命气势，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个个、一件件地彻底查清楚，一个也不能漏掉。要下最大的决心，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四人帮’及其在我省的黑干将拼凑的那一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决不留下后患。”(《贵州日报》1977年12月17日)

又经过将近一年的战斗，全省揭、批、查运动基本告一段落。

1978年12月5日至14日，省委在贵阳召开了全省“一批双打”工作队座谈会，省委要求抓紧搞好揭批查运动和“一批双打”斗争，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标志着揭批查运动基本结束。

本章参考资料：

1.张酷《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2.贵州人民出版社《当代贵州大事记(1949-1995)》

第二十七章 “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和判处帮派罪犯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贵州省委领导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积极揭批“四人帮”及其贵州的帮派体系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中共中央对中共贵州省第三届委员会领导成员作了重要调整。在“文革”期间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的人被隔离审查或撤职，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1978年3月27日至30日，中共贵州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中共贵州省第四届委员会和中共贵州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马力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一)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

中共贵州省委遵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认真纠正“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附录27]。从1979年初开始，省委陆续为1955年申云浦、刘钊案件以及因此而受到株连的所有人平反；为1959年常颂、夏德义、李庭桂案件及全省40多个“反党集团”案件作了复查，给予平反；澄清1964年贵州“四清”运动问题的是非，推翻对贵州省委、贵阳市委以及重点开展“四清”运动的地方和单位的错误评价和定性，撤销对周林、苗春亭、赵欲樵、伍嘉漠、何仁仲等原省委领导人以及受株连的干部所作的错误结论，作了纠正，给予平反；撤销“文革”初期在《贵州

日报》发表批判汪小川等人的文章，为汪小川等人平反。贵州省委还为贵州秘密党、游击队、"曙光社"和罗盘地区秘密党和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的问题作了认真复查。彻底解决秦天真、徐健生历史审查案件遗留问题，推翻对秦、徐以及所有受株连的人所作的错误审查和错误结论，恢复名誉，给予平反。

在此期间，全省复查各类案件 79717 件。其中属于"文革"中的 28886 件，"四清"运动中的 5260 件，"反右倾"方面的 5172 件，"反右派"斗争中的 13585 件(其中改正错划右派分子 10082 名、"中右"和"反社会主义分子"3503 名)，秘密党方面的 3345 件，历史老案 23469 件。按照"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不错不改"的原则，对这些案件都重新作了结论，对被诬陷和错误处理的人作了改正，为被迫害致死的干部平反昭雪。全省有 30331 名干部恢复公职，5883 名恢复党籍。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调动积极因素，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党的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被李再含迫害的贵阳医学院教师李吉杰，被提升为院党委书记(1984–1989)；被诬为"四一一"黑后台的原贵州工学院党委副书记达昭，被任命为贵州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历时 3 年半的整党，全省查处一批严重以权谋私、严重违法乱纪的案件。共查处党员违纪案件 9413 件，受处分的党员 7609 名，其中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 128 名。在此期间，省委和各级党委成立核查"三种人"小组，在过去清理打砸抢、揭、批、查和审理"林彪、江青两案"工作基础上，善始善终地进行核查工作。至 1987 年，全省列为核查对象 1203 名，记录在案对象 150 名。定案处理 1184 名，其中，定为"三种人"的 141 名，犯严重错误的 321 名，一般错误的 672 名，一般问题和其他情况的 50 名。在整党中，受到党内处理的党员 14954 名，占参加整党党员数的 1.86%。其中，开除党籍和不予登记的 7421 名，出党面为 0. 94%；缓期登记和留党察看的 7374 名，撤销党内职务的 159 名，共处理 7533 名，处理面为 0.95%。[附录 27]

在党内，"三种人" 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造反起家的人，指紧跟林彪、

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指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进行帮派活动的人；打砸抢分子，指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的人，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分子和幕后策划者，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子。邓小平说"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1]

[1]《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 页

(二)对下乡知青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

1979年2月,贵州省委在批转上山下乡知青、劳动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对下乡知青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的问题。不久,省委负责人在全省待业人员安置会议上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委会进一步重视这个问题,尤其各级知青办要当下乡青年的代言人。6月,省知青办召开地、州、市知青办主任会议,具体落实这项工作。除确定专人负责外,还先后派工作组赴麻江、黄平、罗甸等县进行调查,将调查结果向省委、省革委分管知青工作的负责人作了汇报。与此同时,省知青办配合省高级法院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复查,使一些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下乡知青平反昭雪。

1979年7月,贵州省对下乡知青案件开展复查工作,据黔南、黔东南、毕节、铜仁、兴义、六盘水等地、州和桐梓县的不完全统计,下乡知青被判刑的165人。对其中110人复查结果,无罪释放的22人,占复查数的20%;免予刑事处分的5人,占4.5%;轻罪重判的15人,占13.6%。贵州省知青办的工作走在全国各省的前面,这年8月,国务院知青办在《情况简报》(增刊第39期)中以《贵州省知青中冤假错案不少》为题,通报了有关情况,引起各省、市、自治区知青部门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截至1980年5月,省知青办对黔南、黔东南、毕节、铜仁、兴义、六盘水、贵阳等7个地、州、市的221名被判刑的知青,复查了156人,占70%。复查结果:无罪平反释放的56人,占复查数的35.2%;免于刑事处分的17人;轻罪重判减刑的21人;原戴帽交群众管制后摘帽的4人;维持原判的61人,占复查数的38.4%。罗甸县下乡知青被判刑的19人,有10人属于冤假错案。麻江县下乡知青被判刑的12人(有3人是由上海捕判的),由本县判的9人中,有5人属于冤假错案。从复查结果可以看出:贵州省60%以上的下乡知青案件,不同程度地存在错判、误判、量刑不当问题。

贵州桐梓县有11名下乡知青被判刑,地区中级法院提出应予复查纠正,县法院却坚持原判。罗甸县一上海下乡知青,因"反革命罪"被判刑5年。经复查,主罪的事实(收听敌台、呼喊反革命口号)均不存在,县法院就改为"流窜扒窃罪",将刑期由5年改为2年。后经省高级法院直接干预,该县才不得不恢复无辜受害者的自由。岑巩县一上海知青,1970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8年徒刑。上海市知青办曾三次派人到贵州配合当地政法部门进行复查,确认主要罪状均不能成立。而州、县法院却决定维持原判,直到1979年4月上海有关部门第四次派人到贵州交涉,并经省法院出面做工作,才宣布无罪释放。

(三)"文革"中一批帮派罪犯受到法律制裁

1978年10月9日,中共贵州省委、省革委会召开全省两百万人参加的处理反革命、打、砸、抢罪犯广播大会,严惩反革命、打、砸、抢罪犯康岩中、张德茂、郁昌峰、杨世才、袁昌福,省检察院批准逮捕反革命分子杨德政,决定宽大处理程文华、周荣富,不予起诉。(《贵州日报》1978年10月14日)康岩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张德茂、郁昌峰、杨世才判处无期徒刑;袁昌福判处15年徒刑。

《贵州日报》支红派记者赵福岭,1974年7月份,有人检举他传播散发淫秽小说《少女之心》,毒害青年,并侮辱奸污女青年邹xx。"四人帮"被粉碎后,赵于1976年12月被拘留审查,在看守所里如实地交待了自己的罪行。1978年转逮捕后经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1983年1月25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犯孙昌德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处徐英年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1984年12月2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因贵阳医学院王斌诬陷迫害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罪行严重,判处王斌有期徒刑8年。

其他被关押在省市看守所的帮派骨干分子,于1982年7月全部释放。

本章参考资料

1.博客小子 345《各省市自治区文革后的揭批查和拨乱反正 22》
2.麻竿社区戈壁滩《知青重大冤案的昭雪》
3.《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第六章
4.当代贵州简史编委会《当代贵州大事记》
5.贵阳医学院院史编委会《贵阳医学院院史》
6.晏乐斌《史无前例的年代》

附录 27　贵州省"文革"后的揭批查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贵州省委员会领导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积极揭批"四人帮"及其贵州的帮派体系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中共中央对中共贵州省第三届委员会领导成员作重要调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的人被隔离审查或撤职,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1977 年 2 月,鲁瑞林离任,马力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1978 年 3 月 27 日至 30 日,中共贵州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 914 名,代表 67.5 万名党员。马力代表第三届省委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中共贵州省第四届委员会,选出省委委员 87 名、候补委员 29 名。四届一次全体会议选出省委常务委员 18 名,第一书记 1 名、第二书记 1 名、书记和副书记 6 名;选举产生中共贵州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选出纪委委员 11 名,选出纪委书记 1 名、副书记 4 名。

贵州省委遵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从 1979 年初开始,省委陆续为 1955 年中云浦、刘钊案件以及因此而受到株连的所有人平反;为 1959 年常颂、夏德义、李庭桂案件及全省 40 多个"反党集团"案件作了复查,给予平反;澄清 1964 年贵州"四清"运动问题的是非,推翻对贵州省委、贵阳市委以及重点开展"四清"运动的地方和单位的错误评价和定性,撤销对周林、苗春亭、赵欲樵、伍嘉谟、何仁仲等原省委领导人以及受株连的干部所作的错误结论作了纠正,给予平反;(注)撤销"文化大革命"初期在《贵州日报》发表批判汪小川等人的文章,为汪小川等人平反。贵州省委还为贵州秘密党、游击队、"曙光社"和罗盘地区

秘密党和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的问题作了认真复查。彻底解决秦天真、徐健生历史审查案件遗留问题,推翻对秦、徐以及所有受株连的人所作的错误审查和错误结论,恢复名誉,给予平反。

在此期间,全省复查各类案件共 79717 件。其中,属于"文化大革命"中的 28886 件,"四清"运动中的 5260 件,"反右倾"方面的 5172 件,"反右派"斗争中的 13585 件(其中改正错划右派分子 10082 名、"中右"和"反社会主义分子"3503 名),秘密党方面的 3345 件,历史老案 23469 件。按照"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不错不改"的原则,对这些案件都重新作了结论,对被诬陷和错误处理的人作了改正,为被迫害致死的干部平反昭雪。全省有 30331 名干部恢复公职,5883 名恢复党籍。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调动积极因素,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党的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历时 3 年半的整党,全省查处一批严重以权谋私、严重违法乱纪的案件。共查处党员违纪案件 9413 件,受处分的党员 7609 名,其中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 128 名。在此期间,省委和各级党委成立核查"三种人"小组,在过去清理打砸抢、揭、批、查和审理"林彪、江青两案"工作基础上,善始善终地进行核查工作。至 1987 年,全省列为核查对象 1203 名,记录在案对象 150 名。定案处理 1184 名,其中,定为"三种人"的 141 名,犯严重错误的 321 名,一般错误的 672 名,一般问题和其他情况的 50 名。在整党中,受到党内处理的党员 14954 名,占参加整党党员数的 1.86%。其中,开除党籍和不予登记的 7421 名,出党面为 0.94%;缓期登记和留党察看的 7374 名,撤销党内职务的 159 名,共处理 7533 名,处理面为 0.95%。

注:中云浦、常颂案件及 1964 年贵州"四清"运动问题见《文革前受到批判斗争的省级领导》贵州篇。

1976.10–1978.3 贵州省委领导:
第一书记
鲁瑞林(1976.10～1977.2)
马力(1977.2～1978.3)
第二书记
李葆华(1976.10～1977.12)
书　记
吴向必(苗族,1976.10～1978.3)
张荣森(1976.10～1977.9)

贾庭三(1977.8～1978.3)
副书记
贾庭三(1976.10～1977.8)
李立(1976.10～1977.4)
何光宇(1976.10～1977.2)
苏 钢(1977.3~1978.3)
苗春亭(1977.8~1978.3)
徐健生(1977.8~1978.3)
常务委员
鲁瑞林(1976.10~1977.2)
李葆华(1976.10~1977.12)
吴向必(苗族,1976.10~1978.3)
张荣森(1976.10~1977.9)
贾庭三(1976.10~1978.3)
李立(1976.10~1977.4)
何光宇(1976.10~1977.2)
张玉环(1976.10~1978.3)
张健民(1976.10～1978.3)
张琦(1976.10～1978.3)
张明(1976.10～1977.2)
傅爱农(1976.10～1978.3)
陈行庚(1976.10～1978.3)
刘兴胜(1976.10～1978.3)
李庭桂(1976.10～1978.3)
马力(1977.2～1978.3)
苏钢(1977.3～1978.3)
苗春亭(1977.8～1978.3)
徐健生(1977.8～1978.3)
宋树功(1977.8～1978.3)
王朝文(苗族,1977.8～1978.3)

(资料来源:博客小子345《各省市自治区文革后的揭批查和拨乱反正22》)

第二十八章 从民俗现象看"文革"

民俗就是世代相传的民间风俗。一次活动在此时此地发生,其活动方式如果不被另外的人再次付诸实施,它就不会成为民俗;如果这次活动能成为多人多次重复实施的内容,它就有可能成为人人相传乃至代代相传的民俗。

在"文革"三大回合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中,伴生了许许多多的民俗现象。如果说政权斗争是"文革"的内涵,那么,"文革"中的种种民俗现象,则可以说是"文革"的外延。把"文革"只理解为决策层的权力斗争是不够的,是只见内涵,不见外延。"文革"历时十年,八亿多中国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这场运动从一切方面看来,都是"中国式"的,也是"民俗式"的。因此,我们从民间层面、从民俗现象来看"文革",能使我们对"文革"的认知较为全面,且比较容易引发"文革"过来人的追忆。

(一)"造神"运动

"文革"可以说是一场"造神"运动。在"文革"中,人们确实是把毛泽东视为神的,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是神圣的和绝对不可怀疑的。不仅如此,对于毛泽东的信仰,还具备了偶像崇拜与一神崇拜的属性。

毛泽东的巨型塑像,遍及中国各个大、中、小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如今仍耸立在贵阳市筑城广场东区的巨型毛泽东全身塑像就是在1968年全国山河一片红时塑造起来的。那时全国各地在几乎所有的机关礼堂或会议室里,无一例外地都布置着毛泽东的全身

或半身塑像，他慈祥并庄严地与人们一起，参与人们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活动，在各种礼仪中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与运动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动员，一直深入到每个家庭，触及到每一个人，因此，小型的毛泽东全身或半身塑像，也就被请进了每个家庭，在堂屋或民居的神圣空间里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过去，那些位置是为祖宗的牌位或其他各种神明所占据的；通常的情形是将塑像放在“雄文四卷”之上。以家庭、会议室或礼堂里的毛泽东塑像为核心，分别形成了各自的礼仪空间，人们在这里进行各种礼拜和表敬仪式，如高唱颂歌和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尤其极端的是每人胸前都佩带有毛泽东的像章，各种质料和各种型号的毛泽东像章，据说有几千种之多，从大如老碗者到小如豆粒者。贵州省也把省工会干部学校改变为制造毛泽东像章的工厂。据说，由于制造毛泽东像章，全国消耗了过多的铝，以致于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制造飞机。有的人甚至还把毛泽东像章，直接别在自己的肉体上。

“忠字舞”是当时流行的集体向毛泽东表忠心的一种群众舞蹈。人们佩带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围绕成象征红心的圆圈，然后，一起边歌边舞，做出许多与歌词内容相应的动作。

毛泽东的画像与照片，日复一日地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即使是在十分偏远的农村和山区，农户和山民家的墙壁上，也喷漆涂有毛泽东的像。一方面是绝对的崇拜，另一方面则是绝对的禁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若有毁坏或污损毛泽东像的行为或事情，当事人就可能被视为“现行反革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故居韶山，“文革”中很快修通了铁路，连同他生活过的一切地方，都被当成了“圣地”；他的一切阅历都成了“圣迹”；他的著作成了圣经；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不容怀疑的“圣旨”。人们不厌其烦地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毛泽东表达“三忠于四无限”的决心，除1967年至1968年盛行一时的以“最、最、最”为特点的“致敬电”现象之外，最典型的还有“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晚汇报”，犹如一种宗教仪式：人们在每天开工、上班、就寝，甚至饭前，集体或个人肃立在毛泽东的画像或塑像之前，仰望他慈祥

的面容，手握“红宝书”并贴至胸前，向毛泽东表达忠心和敬意，祝愿毛泽东“万寿无疆”。人们在“早请示”之后，才能各就各位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与生活；在“晚汇报”，向毛主席报告了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之后，才能安然就寝。

这一切当然伴随着权力的集中过程，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神秘化必然与极权化相联系。不仅如此，信仰的高度集中，还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极端统一化，而这是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前提的。破除对各种“牛鬼蛇神”的迷信，才能将信仰集中并统一于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从多神到一神的过程。

（二）“红海洋”

中国民间认为，红色具有热闹、喜庆、温暖、驱邪、警示等意义或功能。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以红色作为象征。这两个方面的契和，便形成了“文革”中一片红的“红海洋”现象。

1966年，毛泽东戎装并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之后，“红司令”与“红卫兵”、“红小兵”之类组织之间，便有了特殊的关系。人们用红心来表达对“红太阳”毛泽东的忠诚，人手一册“红宝书”，时时高唱《东方红》。把毛泽东比喻为“红太阳”，在城市社区里就出现了“向阳院”，人们自喻为葵花，取其围绕太阳之意。在广大城乡的大街小巷，店铺门面和民居墙壁之上，到处都涂或绘有毛泽东与红太阳相组合的图案，以及红底黄字的语录牌和语录匾，还有各种各样红色的标语与口号。

样板戏中有《红色娘子军》与《红灯记》。

每年的一月，被叫做“开门红”，五月因为有“五·一”、“五·四”和“五·七”等日子，故被叫做“红五月”。人际关系中，要求“一帮一，一对红”。除了“全家红”以外，还有“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外）。

贵阳市1966年的“八·三一”事件的起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贵州日报》刊登的毛泽东题词“新北大”和“中国妇女”没有套红，中科院贵阳地化所一些人带头到报社造反，认为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忠，因此提出严正抗议。地化所因此成为支红派大本营。

与“红”相对的是“黑”。人们被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有“红色”血统的人们，被视为可靠、革命、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文革”中曾广泛流传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民间谣谚。人们曾对此种血统论表示过怀疑，但随着遇罗克写《出身论》蒙冤被处决，人们竟然也屈从过血统论。这只能说明“一人有罪，株连九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在中国民间有十分广泛的基础。血统论如此强大，以致于许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极力与自己的家庭出身划清界限，他们虽然加入不了红卫兵之类的红色组织，但也组成“红外围”，以便与“红”建立起一点联系。血统论不仅为多数人提供了安全感，还为迫害那些出身不好的“少数人”提供了依据。于是，查祖宗三代、挖“狗崽子”们的祖坟和株连，就成了人们见怪不怪的寻常之事。我们知道，在中国民俗里，祖坟有阴佑后代的功能，挖祖坟和揭露某人的祖先，可将对手置于非常尴尬和不利的处境之中。

此外，让“牛鬼蛇神”戴高帽，剃阴阳头，挂黑牌，游街示众，也是中国传统式的侮辱对方人格的方法。因为，示众意味着彻底摧毁对手的“面子”。与“早请示，晚汇报”不同，有“罪”者对毛泽东行的仪式叫做“请罪”，“请罪”通常要跪在毛泽东的画像面前。

（三）语文巫术

巫术是利用虚构的“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某种愿望的法术，是原始社会的信仰和后世天文、历算、宗教的启源。在中国古代，巫的权力很大，主要的职司是奉祀天地鬼神及为人祈福禳灾，并兼事占卜、星历之术。其后职权逐步缩小，演变成为旧社会中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巫师。中国的巫术来自于舜帝部落。传说舜帝的儿子当上了巫咸国的酋长，带领巫咸人生产食盐，蒸煮卤土析出盐份，生产出白色晶体的食盐。因此，最早的巫术是指巫咸人能使土变盐的“变术”。古代施术者女称巫，男称觋。

巫术可分为黑巫术和白巫术。黑巫术是指嫁祸于别人施用的巫术，白巫术则是祝吉祈福时施用的巫术，也叫吉巫术。巫术、巫风

和巫术思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文革”中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见其踪影。原始文化和古代巫术认为只有用最残酷的手段才能与可怕的牛鬼蛇神相抗衡；对神明的“无限崇拜”的最好方法是尽可能残酷地诛戮和惩罚敌人。信仰包含着凶恶的本质。“文革”中北京大兴、湖南道县和广西多地的凶残屠人现象，由此可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借助语言文字嫁祸于人的巫术即语文巫术。“文革”中嫁祸于人的语文巫术，也是一类十分典型的民俗现象。贵州“文革”序幕中的“六·六”事件，是因侯存明写文章批判汪小川而引发的，文章中列举出“太阳像块死马肉一样挂在西边的天际”这句话，被侯认定这是汪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罪证；但侯也因其批判文章中几个小标题省略了主语，而使整篇文章被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侯也立即遭到毁灭性打击。这实际上都是嫁祸于人的语文巫术流毒在作祟。

“文革”中，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老三篇”、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雄文四卷，都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乃至“圣旨”。语录本，成了每个人的必备之物，语录牌和语录塔，成了许多地方和场所必要的装饰。每天的报纸，都在显要的位置上，刊登毛主席语录或最高指示；每一篇文章，都必须引用毛泽东的话，为了表示庄重，语录还要采用特别突出的字体。人们认为，只要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就会有说服力，就感到安全。“四大”中的大辩论，实际上就是相互打“语录仗”，人们分别以不同的语录为依据，相互攻击和辩驳。“向阳院”的外部特征，就是必须要有抄着毛主席语录的黑板报或墙报。从1966年至1968年，全国共出版《毛主席语录》约七亿四千多万册。人们一事当前，必诵语录警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先获取伟大的“精神食粮”和“精神武器”。凡有群众集会，必齐挥语录本，高呼口号，或翻开语录本，集体选念其中某些段落。

每逢毛泽东有最高和最新指示发表，则举国若狂，人们敲打锣鼓，载歌载舞，通宵达旦地欢呼。通常，传达最高指示是不能过夜的。

在一切仪式上或各种场合，“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

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问题是人们真的相信这些词汇所具有的含义。“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每天上班前，第一件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卡和传单，学习班、讲用会，经验交流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及“活学活用”，语文巫术在礼仪化和形式化的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越来越注重“说”和“写”，而不是“做”。语文巫术也越来越影响乃至控制了人们理性思维和行为的能力。标语和口号泛滥成灾。地名和人名中的“卫东路”、“向阳大院”、“红卫巷”、“左红兵”、“李反修”、“赵卫东”之类，也不外乎是语文吉巫术的一种表现形态。与语文巫术相联系的，还有语文的禁忌。文字狱、讳名、数不尽的“反标”事件，在“敌人”的名字上打以红色的叉，或把他们的名字写的颠倒起来，“炮打”、“油炸”、“火烧”的诅咒，砸烂狗头和利用谐音漫骂和攻击对方，等等，无一不是语文黑巫术的表现形态。

贵州大学物理系63级学生杨远猷，因看到一幅毛主席画像没画好，他说“画得像朱德”，被听到此话者利用谐音揭发为“像猪头”。他立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祸从天降，遭遇大难。

西红柿，因为犯忌而被改成了“东红柿”。无独有偶，南京铁路建筑段一位姓肖的工人，因在一座土窑的西侧工作，苦于东风刮来窑烟，无意中说了一句“要是刮西风就好了”的话，不想被指责为与毛泽东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相对抗，从而被处以管制三年的惩罚。

当然，“文革”中的巫术行为，远不止语文方面。受毛泽东接见，与他握过手的人，为了那份殊荣，会长时间内不洗手，这明显的是基于感染巫术；红卫兵的步行大串联，其实就是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模拟，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巫术的阴影吗？

（四）应运而生的语录歌

语录歌是“文革”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文革”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在1966年6月2日新华社记者有关上海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述评中，就已提出：“广大工农兵聆听了毛主席诗词演唱

以后，纷纷要求把毛主席的一些语录也谱成曲，使之广为传诵。”

“毛主席语录歌”在196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时由官方传媒正式推出。《人民日报》9月30日发表了第一批经官方审定认可的“毛主席语录歌”，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以上三段毛泽东语录在“文革”中使用频率极高，被称为“老三段”）和《我们的教育方针》《工作就是斗争》《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分清敌友》《争取胜利》《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10首。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批“毛主席语录歌”，这一批主要是鼓动造反精神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打它就不倒》《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等4首。

10月25日，《人民日报》推出了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全部是选自被称作“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三篇文章的语录，包括《完全彻底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白求恩》《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大家要学习他》《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等8首。

短短的20多天里，由官方传媒连续三次推出“毛主席语录歌”，自然在群众中煽起了大唱语录歌的热潮。

1967年第5期《解放军歌曲》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有一段话讲到“毛主席语录歌”：语录歌一经出现，就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最热烈的欢迎，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从军营到工厂，从出间到课堂，到处都是一片语录歌声。语录歌家喻户晓，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开口放声歌唱，其普及之广，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五）二元对立逻辑

“文革”曾批判过所谓“二元论”，但那是就政治和业务的关系而言的。其实，政治和业务的两分法，恰好就是基于中国民间文化里的二元逻辑而成立的。类似的二元分类及其相互斗争，在“文革”中还有以下许多方面。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刘邓反革命路线、香花与毒草、红与黑、好人与坏人、造反派与保皇派，左与右、革命与反革命、公与私、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群众（外行）与专家（内行）、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红与专，多数与少数，精神与物质、人与物（天，自然，武器）、内与外，等等。这类两分法的逻辑，根源于中国民俗的思维方式，在“文革”中体现得尤其突出。

不过，二元对立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偏重，相反，它以价值偏重为基本前提。例如，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中，价值偏重为一分为二；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中，价值偏重为兴无灭资；在左与右的冲突中，价值偏重为宁左勿右；在公与私之间，价值偏重为大公无私，克己奉公，斗私批修；在群众与专家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人与物的矛盾里，价值偏重为人定胜天；在多数与少数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多数人（群众）的专政；在红与专的关系中，虽说又红又专，但价值偏重实际上为政治挂帅；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集体主义，而个人主义被认为不是个人享乐主义，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个人主义总是与封资修相关；在内与外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内，不仅强化内外有别，还总是把国内的问题和困难，归因于外部敌人的破坏。

本章参考资料：

1.《辞海》，1979 年版本。

2.周星《“文革”中的民俗现象》1993 年 6 月中国价值网
3.金春明等《“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 年
4.王毅《“文化大革命”与巫术文化》《社会学研究》1993 年第 3 期
5.周星《民族政治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中国论文联盟 www.lwlm.com
6.唐开宏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tangkaihong

第二十九章　否定“文革”带来改革开放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结论，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一）“文革”造成的损失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革”造成的政治损失

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叶剑英说：十年“文革”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

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

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8万余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7万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11]

“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

经济上，“文革”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叶剑英说：十年“文革”浪费了8000亿元人民币。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国民收入损失的5000亿元，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建国后的前30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6500亿元的2倍。“文革”十年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12]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13]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14]

"文革"造成的文化损失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5]。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

[1]《学习时报》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2]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

[3]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

[4]《学习时报》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5]《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

(二)领导人评"文革"

对于"文革"，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亲历者都有着深刻的反思：这是一次严重的错误。

邓小平评"文革"

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胡乔木同志的意见，我是赞成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6]

陈云评"文革"

陈云的讲话始终保持着平静的语气：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到1957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干，到1965年止，其间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线，不问大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在他当政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19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7]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之"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第五部分。

[7]《渤海学刊》1993年第3期，作者：《渤海学刊》编辑部，原题：《陈云评价毛泽东》。

陈毅评"文革"

开始父亲一直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类似党内整风的运动，是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保持思想纯洁的运动。根本没有想到是一场夺权的内乱，所以运动一开始，他是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的，通过"十六条"、派工作组他都是举手赞成的，甚至还苦口婆心地与造反派谈话。但是运动向毫无法纪的方向发展，完全成为了一种动乱，父亲从支持到不理解，又转向不赞成，最终是愤怒了……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走到我面前，父亲气得指着我说："你听到没有，这是革命吗？要打倒党内每一个领导干部。这不是革命，这一定是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在有目的地摧毁着我们的党……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公开批评文化大革命，是父亲认真思考的结果。[8]

彭真谈"文革"

"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就犯了大错误。不过，也有好处，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毛主席自己用他犯的错误打破了对他的个人崇拜，这对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总结教训，那就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教训要深刻得多。作为共产党员，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毛主席一世英明，最后犯了严重错误，整了那么多人，挨整的人谁没有气？这是可以理解的。[9]

钱学森谈"文革"

在"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

[8]《回忆父亲陈毅》，作者：陈昊苏 陈小鲁 陈丹淮 陈珊珊，出版：华夏出版社。

[9]《百年潮》2012年第12期，作者：彭真传编写组，原题：《彭真复出后谈毛泽东》。

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那时候我们都是军管的。军管会每星期都要向总理汇报一次。总理下了一个命令，要搞一个科学家的名单。名单送上去后，总理说："名单中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出了问题我找你们！"[10]

[10]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钱学森，原题：《周总理让我搞导弹》。

(三)"文革"的教训

对"文革"及其后果应该如何评价？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总结已经给出明确的答案：这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浩劫。造成这一浩劫"左"是最大的危险。

邓小平指出中国最大危险还是"左"

尽管有国际和国内的大量实践经验，尽管历经大约70年之久的多次挫折，尤其是亲历"文革"十年极"左"的切身浩劫，然而，"左"比右好的观念在广大干部中还远未清除，以至于在近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左"的倾向又几次抬头。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总结历史经验时语重心长地指出："几十年的'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11]

以康生张春桥为例警惕以"左"谋私

仅仅自己"左"是不够的，有时还需要以打击"右"作为垫脚石。比如风闻某人与上级精神有不一致的言论，或写文章偏离了"左"的调子，他们或充当告密者，或毫不迟疑地直扑上去，犹如疯狗一般一阵狂撕乱咬。如此这般，其勇于革命的豪情就出来了，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就出来了，在革命队伍里的可靠性也就出来了。对于这样的人，组织不重用他们又重用谁呢？终于爬到了高位，可他们真的是要为革命做贡献吗？如果我们以为然，那就太幼稚了。像康生、张春桥这些人，无一不是以此来谋求更多的利益。权力大了，所享待遇的标准更高了，谋取私利的面也更广了。他们与那些从来不讲冠冕堂皇理论的打家劫舍者并无二致，送多少礼金，来之不拒；送多少财物，照单全收，甚至还要借助手中权力安插子女、荫庇子

孙，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12]

[11]《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2期，作者：高放，原题：《"左"的根源面面观》。
[12]《学习时报》2011年7月25日，作者：张心阳 原题为《警惕以"左"谋私》。

(四)否定"文革"带来改革开放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3]

但物极必反,极端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邓小平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14]"文革"转化为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十年内乱"或"十年浩劫"迎来了大改革大开放,大乱带来大治,坏事变成好事,"文革"与改革开放相反相成,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当前经济总量已仅次于美国,走科学发展之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毛泽东"超英赶美"的愿望在逐步实现。这充分显示了"文革"的两重性。这也是国外学者那么热心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文革"的确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但历史的灾难通常会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5]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和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辉煌成就,正体现了这种历史进步的补偿。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

[13]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9页

的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历史补偿的最大成果。道路已经开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转化为宝贵财富,中国的前景光明。[16]

[16]席宣《文化革命》

书后附录 1　简明贵州大事记（1949-1976）

1949

11 月 1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二十八师解放黔东北重镇铜仁。

11 月 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八团于 14 日晚进占贵阳，15 日十七军五十师进驻并接管贵阳市，贵阳宣告解放。

11 月 18 日，十七军四十九师解放黔中重镇安顺县。

11 月 21 日，二野三兵团第十军二十八师解放黔北重镇遵义。

11 月 23 日，贵阳市人民政府成立，驻中山公园。

11 月 28 日，十六军解放黔西北重镇毕节。

11 月 23-12 月 19 日，国民党军先后在金沙安底、普安、晴隆、贞丰、威宁、安龙、兴仁起义，黔西、黔西南的 14 个县宣告和平解放。

12 月 26 日，贵阳省人民政府成立，驻南明公园。

1950

1 月 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军区成立。

7 月，贵州省共调集粮食 121.91 万斤。通过在省内各地增设代销店销售粮食，使 3 月以后猛涨的粮价下降，稳定了市场。

1951

1 月-6 月，全省群众性清匪运动普遍展开。从 1950 年 1 月至 1951 年 6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与股匪进行大小战斗 4246 次，毙伤及俘获中队长以上骨干 14397 人。省内最反动的匪首，如罗湘塔、史肇周、曹绍华等已被击毙。全省匪患基本平息，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城乡交通和物资交流已畅通无阻。

5 月 17 日，贵州民族学院开学。

1952

1 月 21 日，贵州省人民政府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将“三反”运动和工商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及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同时展开。

6 月 20 日-25 日，中共贵州省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财政工作，决定结束“三反”“五反”运动。

1953

3 月 3 日-10 日，贵州省首届农林劳动模范大会在贵阳召开。全省农林劳模 740 人出席会议。

3 月 31 日，全长 182 公里的锦屏、榕江公路竣工通车。

4 月上旬，威宁-水城公路竣工。

1954

9 月 30 日，全省已有农业合作社 3586 个。1983 个乡有了社的组织，占总乡数的 30.7%；已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 65%。

10 月 1 日，贵阳市中华路从 6 月中旬动工改建，9 月底完工，正式通车，全长 3000 米。是贵州省第一条混凝土路。

1955

1 月 1 日，《新黔日报》报道：1954 年，贵州省新建、扩建和改建了 26 个地方国营轻工业工厂。

2 月 16 日-2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选举申云浦为省政协主席。

1956

1 月 31 日，贵州省基本实现初级农业合作化，已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 5.66 万个，入社农户 243.54 万户，占全省总农户的 82.7%。其中参加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占全省总农户 25%。

2 月 9 日，贵州水泥厂新建厂全面投产。新建厂是全省第一个使用旋转窑进行水泥生产的工厂，年产水泥 3 万吨。

7 月 23 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正式成立。

8 月 8 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正式成立。

1957

1 月 14 日，贵州省第一艘浅水拖轮在赤水河试行成功。

2 月 21 日-27 日，贵州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3 月 29 日，由长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制造的 30 辆解放牌汽车驶抵贵阳，结束了贵州省无国产汽车的历史。

1958

4月29日，贵阳翻砂厂冶炼出贵州省第一炉低碳钢，重200公斤，质量符合要求，是贵州省历史上第一次产钢。5月23日，习水县弄剧场冶炼出第一炉中碳钢。7月27日，贵阳矿山机器厂用转炉炼出全省第一炉镍钢。

7月3日，《贵州日报》刊载文章《从集体吃饭看农村食堂》。此后，全省农村迅速办起了公共食堂。

7月27日，滇黔铁路全面开工修建。

7月28日，贵阳矿山机器厂制造成功贵州省第一台轧钢机。

8月15日，贵州省第一个大规模水电工程——猫跳河水电站开工修建。

8月19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试办人民公社。8月23日，贵州省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贵阳市乌当区东风人民公社。

8月30日，贵州省第一个以城市居民为主体的人民公社——贵阳市南明区卫星人民公社成立。

8月31日，贵阳市黔剧团成立。

8月，贵州铝厂、贵阳耐火材料厂动工修建。

9月12日，贵阳钢铁厂轧钢车间建成投产，轧出24毫米圆钢，结束了贵州不产钢材的历史。

9月29日，《贵州日报》报道，贵州省已基本实现人民公社。

10月，贵阳磊庄机场开工兴建。1959年交付使用。

1959

2月7日，黔桂铁路都筑段(都匀－贵阳)通车典礼在贵阳举行。至此，黔桂铁路全线通车。

2月18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下放干部加强基层领导进行劳动锻炼的通知》。19日，省委、省人委欢送1584名干部下放到基层劳动锻炼。

11月19日，贵阳钢铁厂炼钢车间1.5吨电炉炼出第一炉优质碳素工具钢。

11月20日，贵州省第一座苎麻纺织厂——都匀苎麻纺织厂正式投产。可年产高级马莎夏布400万米。

1960

1月5日，第三砂轮厂炼出第一炉棕刚玉块。10月，该厂正式投产，年生产能力棕刚玉5320吨、磨具2622吨、砂布62万平方米。

2月7日，湘黔铁路贵州境内工程破土动工。

2月26日，中央批转和下发中共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及毛泽东的批语。批语指出"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此后全国农村在1958年后重新大办公共食堂。

5月29日，猫跳河一级电站红枫电站正是发电(猫跳河电站共七级，总装机容量24.05千瓦)，电站装机容量2万千瓦。

10月11日－15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会议研究粮食工作和生活安排问题。

11月20日－12月9日，中共贵州省委第二届第二次全会(扩大)召开，中共中央检查组及西南局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方针是：总结经验，肯定成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反对以"共产风"为首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彻底纠正工作中的错误，端正党风，团结全党，战胜困难。

1961

1月3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抓紧开展粮食调运工作的紧急指示》。

2月10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继续整顿压缩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安排意见》。到1961年底，全省非农业人口压缩到191.6万，基本上实现了省委的要求。

2月23日－3月7日，全省文教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对全省各类学校作了大规模的压缩调整：高等院校从16所减为5所，普通中学从981所减为217所，中等专业学校从43所减为26所，小学从16751所减为7085所；各类学校在校生总数从246.16万人减为97.88万人。

5月26日，北京－贵阳直达航班正式开航。

6月18日－21日，中共贵州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共中央会议精神，讨论粮食分配和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等问题。

7月，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下达后，贵州省各地先后恢复基层供销社、合作商店和开放农村集市。

1962

4月18日，中共贵州省委作出《关于1962年继续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到1962年12月底止，全省全民所有制职工减少4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70多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80多万人。

6月21日，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监委《关于甄别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省委在批语中指出：1958年以来的历次运动中，受到批判、处分的党员、干

部大部分搞错了，特别是农村中的拔白旗、反瞒产私分、整顿食堂、反右倾等运动搞错了。除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以外，都应当一律宣布平反。

8月6日-18日，贵州省林业厅召开全省林业工作会议，之后，全省积极恢复和发展林业生产。到1963年末，全省造林面积达44.15万亩，较1962年增长90.7%，各种经济林木，也有大幅度增长。

1963

3月26日，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调整城乡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通知》，决定将全省现有的151个城镇和城镇居民区调减为136个，除贵阳市和遵义市可保留郊区外，其他城镇和集镇一律不划郊区。

8月26日-9月6日，贵州省工业会议召开。会议讨论全省工业形势，协调供销关系，处理产品积压，加强企业管理和进一步做好工业内部调整等问题。

1964

7月1日，贵州省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全省总人口1714.05万人，其中汉族人口1312.98万人，占总人口76.6%；少数民族人口401.16万人，占总人口23.4%。

10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国家机关、四个大区和军队抽调2000名干部到贵州工作。

10月9日，冶金工业部决定把大连钢厂、本溪钢厂、鞍山钢铁公司的部分设施搬迁到贵阳钢铁厂，并在贵阳钢铁厂内成立搬迁指挥部。14日，搬迁工作开始进行，贵州的三线建设由此拉开序幕。同时，煤炭工业部在六枝成立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及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矿区指挥部。12月，农业机械部决定，将天津拖拉机厂工具车间、机修车间部分设备迁入贵州农具厂，组成贵阳农机工具厂；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决定，将哈尔滨轴承厂和上海微型轴承厂的部分设备、人员迁入贵州安顺，筹建贵州轴承三厂（即安顺仪表轴承厂）。与此同时，川黔铁路、滇黔铁路的建设也在紧张进行中。1965年，贵州三线建设进入高潮，六盘水煤炭基地完成了配套建设六枝矿井工程，10月川黔铁路正式交付使用。此外，冶金、电力、化工等部门的搬迁、新建、续建和改建、扩建项目，也在加紧建设。

1965

4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贾启允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5月28日，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处会议决定，恢复中共兴义地委和兴义专署

建制。

7月31日，贵州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选举李立为省长。

10月1日，川黔铁路全线通车。该铁路北起四川重庆，南至贵州贵阳，全长463公里，在贵州境内有289公里。

1966

1月13日，冶金工业部下达贵州水城钢铁厂设计任务书，决定在贵州省水城县青杠林场建设水城钢铁厂，年产50万吨，分两期建设。

2月13日，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支援铁路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支援重点建设工作的报告》。

3月4日，贵昆铁路接轨，该线全长639公里，在贵州境内303公里，设36个车站，7月1日正式通车。

6月1日—8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第二届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研究制定《贵州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意见》。省委决定由贾启允为主组成文化革命小组。要求各地、州、市都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县委要有专人负责。

6月6日，贵阳地区大中学生发生矛头针对中共贵州省委和《贵州日报》的"六·六"事件，贵州"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7

1月25日，贵阳地区和外地共40个群众组织开展夺权斗争，夺取了贵州省和贵阳市的党政财文大权。

2月13日，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8月1日改名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简称省革委会)，李再含任省革委会主任。

4月11日，贵州省红卫兵代表大会被不同意见学生群众冲击，随后出现"支红"和"四一一"两派群众组织。

5月6日，贵州驻军奉命"支左"，随后又进行"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并相应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和军训办公室。

5月12日，贵州省革委会决定由贵阳铁路分局、省交通厅、商业厅、粮食厅、供销社、物资局等单位，联合组成省交通运输指挥部，指挥全省运输工作。

6月8日，冲击省红代会的大中学生组织成立贵阳市"四一一"兵团，同时成立工人支持"四一一"联络站。

8月18日，李再含组织专业武斗队，武装颠覆贵州工学院革命委员会。随

后成立贵州“八一八”兵团。在此前后武装踏平贵阳地区“四一一”及全省各地“四一一”观点群众组织，全省被武装踏平人数达26万人，其中外逃6万人。

12月26日，贵州外逃的“四一一”群众代表，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全省代表大会，会期12天。

1968

1月6日，贵州“四一一”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全省代表大会闭幕，成立贵州省“四一一”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司令部。袁昌福任司令员，邱富伦任政委。

1月12日—18日，贵州省革委会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会议。会后，发出一系列文件，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10月至1969年1月，仅贵阳市就有1.5万多高、初中毕业生和178名社会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

3月6日，李再含出动贵州“八一八”兵团，在贵阳市华家山围捕“四一一”兵团170多人。邱富伦被捕后，陈贤代政委，后明确为政委。

4月22日，贵州省革委会、省军区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紧急通知》。

9月18日，贵州发生“龙广事件”，李再含擅自动用部队镇压群众。

11月21日，中央军委就“龙广事件”发出通报，贵州驻军换防，0276部队进驻贵州，7611部队调离贵州。

1969

1月9日，贵州省革委会批转省生产领导小组《关于上海市2万知识青年到我省农村安家落户安置意见的报告》。

2月24日，中央批准在北京召开解决贵州问题会议。

3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出《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给贵州部队的指示》(简称“两个红五条”)。

5月23日，中央下达解决贵州问题的(69)25号文件。

7月29日，李再含等人在贵阳市制造武装镇压群众的严重事件，死54人，伤100余人。

10月26日，中央下达解决贵州问题的(69)71号文件，李再含留北京检查学习，蓝亦农代省核心小组组长。

11月25日—197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贵州举办有2019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70

2月10日，贵州省革委会批转省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关于进行城市人口疏散的请示报告》。随后，全省开始了大规模的疏散工作。至1970年12月底，全省共疏散下放城镇闲散人口和遣送所谓“五类”分子共107350人。

9月6日，根据国务院、中共军委批转的《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纪要》精神，贵州省革委会、省军区发布《关于动员民兵参加湘黔铁路会战的命令》。《命令》下达后，在全省分两批共组织30万民兵参加湘黔铁路会战。

9月22日，011系统试制的第一架歼6—Ⅲ飞机试飞成功。

10月14日，贵州省革委会决定：撤销原贵阳半工半读师范专科学校、贵阳业余工学院、贵阳半农半读师范专科学校、贵州函授学院，保留贵州大学、贵州工学院、贵州农学院、贵阳医学院、贵阳中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

1971

2月3日，贵州省革委会发出《关于省革命委员会补台协商代表会议工作方案》。

5月7日—14日，中共贵州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遵义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812人。蓝亦农代表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中共贵州省第三届委员会。接着举行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蓝亦农为第一书记。

5月17日—22日，省革委会举行补台协商会议，对省革委会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5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贵州省革委会补台意见：同意蓝亦农等205人为贵州省革委会委员；同意蓝亦农、张荣森等34人为贵州省革委会常委；同意蓝亦农为贵州省革委会主任。

10月7日，贵州省革委会批转省革委会办公室外事组《关于增加开放参观点的报告》，同意开放遵义市。还提出贵阳、遵义两市开放的工厂、农村、医院名单。

1972

2月23日—3月1日，中共贵州省委组织有各地、州(市)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和省级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参加的省委农业学大寨检查团一行34人，到全省各地各地检查农业学大寨情况。检查结束后，检查团向省委写出了《情况报告》。

3月15日，中共贵州省委、省革委会决定在全省开展铁路、水路、公路联合

运输，并成立省交通运输领导小组，对全省运输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9月15日，中央下达解决贵州问题的中发(72)38号文件。蓝亦农去职，鲁瑞林任工作组组长。

10月13日，湘黔铁路在贵州施秉县翁塘车站接轨通车。湘黔铁路全长902公里，东与株洲至上海的铁路相接，西与贵阳至昆明的铁路联通，在中国南方构成与陇海线平行、横贯东西的第二条铁路大干线。1975年1月1日全线交付营运。

1973

1月14日，《贵州日报》报道，乌江航道整治工作成绩显著，省内航线延伸到269公里，能行驶60吨机动客货轮。

2月28日，贵州省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通知》，提出力争1973年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23‰左右。

9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鲁瑞林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1974

1月27日-2月4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

4月27日，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成立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领导小组。8月6日，国家计委同意贵州省建立赤水天然气化肥厂。1978年12月28日，该厂建成并投入生产。

10月10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办好医疗和加强赤脚医生队伍建设的通知》。

1975

8月11日，贵州省革委会引发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普及小学五年教育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要求结合贵州实际，切实解决少数民族和边远山区在普及小学教育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8月27日-9月3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县(市、特区、去)委书记会议，制定了把钢铁生产搞上去，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国民经济计划措施。

1976

7月28日，铜仁地区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参观团在参观大寨后，去河北省遵化县参观途中，在唐山市遭遇强烈地震，铜仁地委副书记张仁龙等243人遇难，16人幸存。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因病在北京逝世。18日，省委和贵阳市委在贵阳春雷广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贵阳地区各族各界群众40万人参加。同日，全省各地也都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

10月16日-17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并进行学习讨论。会议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采取的英明果断措施，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

书后附录2 贵州省历任主要领导名录(1949至今)

省委书记

苏振华(1949.12～1954.05)
周 林(1954.12～1956.07)
周 林(1956.07～1964.10)
李大章(1964.10～1965.05)(代)
贾启允(1965.05～1967.12)
李再含(1967.12～1969.10)(革委核心小组长)
蓝亦农(1969.10～1971.05)(代核心小组长)
蓝亦农(1971.05～1973.09)
鲁瑞林(1973.09～1977.02)
马 力(1977.02～1979.10)
池必卿(1979.10～1980.06)(代)
池必卿(1980.06～1985.03)
朱厚泽(1985.03～1985.07)
胡锦涛(1985.07～1988.12)
刘正威(1988.12～1993.07)
刘方仁(1993.07～2001.01)
钱运录(2001.01～2005.12)

石宗源(2005.12～2010.08)
果战书(2010.08～2012.07)
赵克志(2012.07～)

省长

杨 勇(1949.12～1954.12)(省府主席)
周 林(1955.02～1965.07)
李 立(1965.07～1967.02)
李再含(1967.02～1971.05)(革委主任)
蓝亦农(1971.05～1973.09)(革委主任)
鲁瑞林(1973.09～1977.02)(革委主任)
马 力(1977.02～1979.09)(革委主任)
苏 钢(1980.01～1983.01)
王朝文(1983.01～1983.04)(代)
王朝文(1983.04～1993.01)
陈士能(1993.01～1996.07)
吴亦侠(1996.07～1997.01)(代)
吴亦侠(1997.01～1998.10)
钱运录(1998.12～1999.01)(代)
钱运录(1999.01～2001.01)
石秀诗(2001.01～2001.01)(代)
石秀诗(2001.01～2006.07)
林树森(2006.07～ 2007.01)(代)
林树森(2007.01～2010.08)
赵克志(2010.08～2010.09)(代)
赵克志(2010.09～2013.01)
陈敏尔(2013.01～)

人大主任

徐健生(1980.01～1983.04)
吴 实(1983.04～1985.04)
张玉环(1985.04～1993.01)
刘正威(1993.01～1994.01)
王朝文(1994.01～1998.01)
刘方仁(1998.01～2002.11)
钱运录(2003.01～2006.01)

石宗源(2006.01～ 2010.09)
果战书(2010.09～2012.07)
赵克志(2012.07～)

政协主席

申云浦(1955.02～1956.09)
徐健生(1956.09～1959.12)
苗春亭(1959.12～1967.01)
李葆华(1977.11～1979.01)
池必卿(1979.01～1980.01)
苗春亭(1980.01～1993.01)
龙志毅(1993.01～1998.01)
王思齐(1998.01～2006.01)
孙 淦(2006.01～2007.01)
黄 瑛(布依族 2007.01～2010.01)
王正福(苗族 2010.01～2013.01)
王富玉(2013.01～)

附录索引

附录 1　红雨斋:两度短命的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 …… 30
附录 2　洪　星:虾子区的"四清运动" …… 31
附录 3　贵阳市文革大事记(1966 年 6 月 6 日至 7 月 31 日) …… 45
附录 4　红卫兵破"四旧"时毁坏了中国多少珍贵文物? …… 67
附录 5　"九·五"事件部分学生包围省委办公大楼情况简报 …… 71
附录 6　柯云路:关于"全红总"典型事件的阶级分析 …… 80
附录 7　刘兴盛:贵州湄潭事件 …… 97
附录 8　晏乐斌: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 101
附录 9　中央首长五次接见贵州革命派赴京代表谈话纪要 …… 123
附录 10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权通告 …… 133
附录 11　《人民日报》社论《西南的春雷》 …… 136
附录 12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 …… 137
附录 13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告全省人民书》 …… 139
附录 14　张甦: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课题 …… 173
附录 15　王力同志接见李立同志时对若干问题的指示 …… 189
附录 16　杨永兴:王关戚被打倒之谜 …… 191
附录 17　贵州大学踏平"四一一"后的公告 …… 196

附录 18　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二月会议"精神 …… 250
附录 19　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两个红五条" …… 254
附录 20　中共中央处理贵州问题的中发(69)25 号文件 …… 255
附录 21　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全体贵州赴京人员 …… 285
附录 22　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中发(69)71 号文件 …… 291
附录 23　李再含:在北京学习班的检查 …… 296
附录 24　孙昌德:彻底揭发两面派的反动典型李再含 …… 305
附录 25　红雨斋:不会"卖友求荣"的蓝亦农 …… 322
附录 26　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中发(72)38 号文件 …… 337
附录 27　贵州省"文革"后的揭批查 …… 384
书后附录 1　简明贵州大事记(1949-1976) …… 406
书后附录 2　贵州省历任主要领导名录(1949 至今) …… 415

后 记

48 年前发生在中华大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与我们渐行渐远。《贵州风云》反映贵州“文革”的风云变幻。促使我编写《贵州风云》有三个动因。

一是看到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贵州通史》第 5 卷《当代的贵州》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贵州大事记》,发现贵州的“文革”有不少大事被遗漏,觉得有拾遗补缺和填补空白的必要;

二是受“‘文革’在中国,‘文革史’的研究在国外”这种现象的驱使,觉得自己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写“文革”是应尽之责;

三是作者是在贵州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现已到从心所欲之年,现在头脑还管用,如不留下史实,到老糊涂时就无能为力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为了抢救历史。

因此我用了一年多工夫,在 1970 年编写的《贵州在前进——贵州“文革”大事记》的基础上,2010 年 4 月编写出《贵州文革实录》征求意见稿。又历时三年多,在吸取了许多宝贵意见后作了多次补充修改,形成现在这个版本,并定名《贵州风云》。编写的指导思想是基于 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方法是忠实地列举贵州“文革”全过程中的大事,只摆事实,不予评说(仅第二十九章最后一节例外)。作者深信,有了事实,自有他人评说。

本书的正文和附录引用了许多作者的资料,在此一一表示衷心感谢。尤其要感谢张甦先生,他在审读中发现本书原稿有关蓝张入黔后好几年的历史内容不充实,于是热心地挖掘史料,赶写出《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一文七万多字,为充实和丰富本书后几

章的内容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帮助。

由于作者水平不高,能力有限,资料不足,书中缺点错误难免,欢迎并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银川当代文学艺术中心积极、热情地推动本书出版面世,谨致深深谢意!

作 者

2014 年 1 月 1 日于贵阳

邓振新，男，湖南衡阳人，1956年毕业于铁道部衡阳铁路工程学校，在川、陕、渝、黔、桂、滇等省市区从事铁路新线工程地质工作多年，1962年调干考入贵州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贵阳市工厂、市委机关工作，在市农机科研所任工程师，后在贵州省科协工作到退休。退休前任《贵州科技报》总编辑、主任记者。现职称高级编辑。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贵阳市委批林批孔办公室调查组组长。

www.CSW56.COM
Email: chinachushu@163.com